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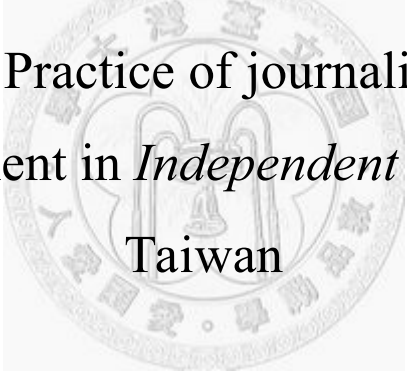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1980年代《自立晚報》社會運動線記者的專
業意理形成與實踐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Reporters of
Social Movement in *Independent Post* in 1980's
Taiwan



管嫻媛

Wu-Yuan Kuan

指導教授：林麗雲 博士

Advisor: Lihyun Lin, Ph.D.

中華民國97年10月

October, 2008



謝辭

2008年5月30日，在我所謂的「歹戲拖棚之論文日誌」系列一（其實這個系列也沒撐多久，大概才三回…）之中，我寫下了這樣一段話：「荒誕了一段時間後，重拾書本與論文。在閱讀這群受訪記者的報導與資料時，讀到激動處，時常不能自己。在書寫論文前，以及論文題目發想之初，老是抱怨媒體環境之差，擔憂以後沒有理想的工作環境，無法跑出自己想跑的新聞。因此，總是極度羨慕這群當年在黃金運動、民主轉型時期的台灣社會，站在第一線當記者的這群人。而我也藉由閱讀這群記者當年的報導，逐一釐清、整理自我對於「記者」這份工作，是否為自己一生之志業這回兒事。說『一生志業』未免太過沈重，但我確實在其報導之中，看到自己原先踏入新聞所的那股熱情與誠摯。同時，也在閱讀這些報導的過程中，重新讀過了台灣八〇年代的那段歷史。現今我以為理所當然的事物、觀念、公平、正義，在當年，得經過多少人的努力與奮鬥，才能深植於我這在九〇年代後出生的小毛頭心中。而我也才發現，我心目中的那個記者形象，原來是來自他們。」這麼樣噁心濫情的文字，在我論文終於完成之後，再閱讀一次，反倒開始質疑起我當時所確認的記者形象到底是什麼？而這本論文的完成，又代表什麼？

「勇於感受參與當下的激情與衝動」，是起初參與樂生教我學會的事。而「冷靜與理性的分析與琢磨事物、人性之本質」，則是這本論文教會我的事。更精確的說，是在訪談的過程中，我的訪談者、我的指導教授、與我討論論文、生活瑣事、情感、壓力的好朋友們，所教會我的。

我絕對無意在這本論文中，呈現太多、褒獎太多這些受訪者的豐功偉業，甚至，將他們神化、英雄化；而這也是本論文的受訪者們亟欲避免與抗拒的事情。這本論文所欲表達與呈現的，無非只是為了回應我個人所面對的困境與重複質問自己的問題：我想當一個什麼樣子的記者？或者，我真的想當記者嗎？

於是，總算在這本論文完成之後，好像更理解了自己，以及，所謂的「志業」這回事情。如果說這本論文的完成能夠貢獻些什麼的話，我想，受益者大概也只有我自己了。

感謝老爸、老媽，謝謝你們的耐心與體諒；我仍舊是個不學無術、不事生產的女兒，所以，真心的感謝你們的包容與給予我的，無私的愛。

2008.10.21



摘要

國內對於記者專業意理（professionalism）的研究，大多直接移植西方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研究的三種分類，缺乏對於台灣社會歷史背景的整合，以致於台灣記者專業意理內涵只能被填鴨式的填入西方記者專業意理的分類圖像中。有鑑於此，本研究選擇特定歷史階段與特定記者群---台灣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一九八〇年代《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之記者，做為主要研究時期與對象。本研究採取生命史（Life history）研究途徑，企圖從當時的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為背景出發，結合記者個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與實踐，以檢討過去西方專業意理分類合理與時宜性，重新探討與反思台灣記者專業意理之內涵，整理出屬於「台灣經驗」的記者專業意理圖像。

本研究提出兩層主要研究問題核心：第一、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的記者抱持何種新聞專業意理進入職場？這種專業意理如何形成？為何會選擇進入《自立晚報》？為何（選擇）主跑社會運動線？第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的記者，在八〇年代採訪社運／弱勢議題的經驗如何影響社運記者的當下的新聞專業實踐？如何拿捏與社運／弱勢團體間的關係？

本研究使用生命史研究途徑之意義，在於具象化這群「小記者」的形象過程中，能同時關照記者的主體能動性（subjective activity），以及歷史的、環境的可能限制；深入「理解」記者個人在社會情境、媒體場域、個人因素下，其個人特質與所抱持的新聞專業意理，如何影響記者在採訪現場時、報導時、生命實踐上的各種選擇，甚至影響到如何拿捏與社運／弱勢團體（消息來源）間的關係；藉以開闢傳播研究領域中，研究傳播者的新途徑。

關鍵詞：社會運動、生命史、生命歷程、專業意理、自立晚報、關懷倫理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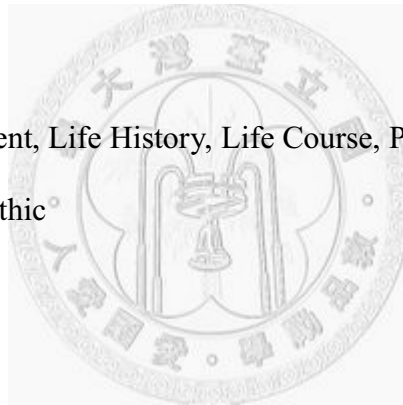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about professionalism of reporter generality are transplanted from the three categorization of research about professionalism of reporter in west. By lack of the integration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aiwan social history, result in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of Taiwan reporters can only be cramming with the category image of professionalism of reporters in western. To ground on it, this research select the particular history period and reporters---the reporter of *Independent Post* which major in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80's Taiwan with flourishing growth of social movement as the mainly study subject and period. This research take the way of Life History attempt to start against the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of Taiwan to combine with the reporter's individual life course and practice, so as to review the rationality and seasonable of past western professionalism's categorization, and re-treat and ponder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of Taiwan reporters. To arrange the images of professionalism of reporters belong to Taiwan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brings up two layers of major study cores. The first: On the option and ideal. The reporter of *Independent Post* which major in social movement take what kind of professionalism to involve the career? And how does the professionalism arise? Why they will choose work in *Independent Post*? Why they will choose to maj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e secon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field of reporters. How the reporters of *Independent Post* which major in social movement to influence the practice of field of reporters maj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nowadays by their experience of interview about subject of social movement and minority? And how do the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 and minority ?

The meanings of take of way of Life History in this research is in the process of concretion those minor reporters can look after the subjective activity of reporter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o realize in depth what to influence those reporters who under the society, press, individual causes, the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himself entertain all the kinds of options about interview in live, reports, and practice of life of reporters. Even affec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roups of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minority. So as to opening up a new way to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mass media.

Keyword: Social movement, Life History, Life Course, Professionalism, Independent Post, Care Ethic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 記者專業意理相關研究	13
第二節 另一種觀看記者專業意理的方法：從關懷倫理概念出發	20
一、「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爭	23
二、另一種觀看記者專業意理之研究視角：從「關懷倫理」概念出發	25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0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途徑之定義與意義	30
一、生命史研究之定義與特質	30
二、生命史研究之重要性	31
三、生命史研究之限制	32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4
第三節 研究對象範圍界定	36
訪談大綱設計	38

第四章 研究詮釋- -記者的生命圖像·····	40
第一節 林美挪的生命圖像·····	40
第二節 王幼玲的生命圖像·····	63
第三節 李瓊月的生命圖像·····	94
第四節 彭琳淞的生命圖像·····	118
第五節 邱家宜的生命圖像·····	140
第六節 綜合分析·····	164
一、記者生命圖像整理·····	165
二、影響記者生命圖像形構之外部因素·····	172
第五章 結論·····	178
參考文獻·····	190
附錄一：訪談題綱·····	201
附錄二：訪談時間地點·····	216
附錄三：受訪者大事記·····	21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運動與集體抗爭行動大量的出現，有農民運動、原住民權益運動、環境、自救、婦女、勞工…運動等，興起了一股「新社會運動」風潮（高承恕，1989：9-10；許傳陽，1991：3）。根據統計，1983至1987年，總共發生了1500餘件人民集體行動的抗爭；1983至1988年「社會抗議事件之頻率」共計2892件。自1987年9月間，台灣共發生了1285件民眾集會抗議請願等街頭運動（《中國時報》，1987年1月4日；張茂桂，1992；呂東熹，2002：139）。許多研究探討這股風潮的起因，大多認為在解嚴前，從1970年代末開始，黨外運動勢力就不斷挑戰國民黨的威權政體結構，進而聚集了一群有著相同自由改革理念的社會勢力，並時與上述各類運動做結合與同盟；加上在戒嚴體制下長期被壓抑的勞工、農民等弱勢群體，趁著1980年代國民黨政權鬆動的縫隙中，激起無論以實際抗爭行動、或是文化層面的反抗力量反撲（高承恕，1989：9-19；蕭新煌，1989：21；翁秀琪，1991：400；王甫昌，2003：422）。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範型，正從過去威權時代的社會形態中鬆脫轉型，形成一種集體對政府重新要求「平等」的共同訴求；蕭新煌（1989）就認為1980年代的獨特歷史意義，就是「已經進入以『社會力』展現的時代，以抗衡過去『政治掛帥』和『經濟掛帥』的專斷力量」。

而媒體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形塑機制，社運團體多半欲透過媒體管道發聲，爭取對於制度或價值觀的定義權（彭慧惠，1998：35）。媒體不僅是政府機關欲掌控籠絡的曝光資源，更是社運團體所欲藉助動員群眾加入陣營的重要管道（Wolfdfels, 1991：9）。

就1980年代台灣整體的媒體環境而言，當時的台灣社會仍處在解嚴與報禁開放前後的民主化探索時期，國民黨政府對於言論的箝制，使得言論自由的拓展尺度仍處在一個模糊有待摸索的空間。報禁開放前，平面媒體經營者，得時時受限於國民黨政府的控管：包括在政治言論上的審查制度、報社內黨國特務系統的監視。在動輒得咎的報禁時期，報老闆不僅需要與國民黨威權政府、高層維持一定程度上的友好關係形態，¹來換取報社在資金與經營上的「通行許可證」。基於這樣的考量，報社在報導黨外或社會運動議題時，立場通常也會受制於有形與無形的具體威權式的控管與對於黨國意識的內化認同而有所差異。

根據過去以報導黨外與社會運動議題的新聞數量來探討各報社言論立場的相關研究來看，在1970到1980年代期間，《自立晚報》在報導社會運動議題篇幅較其他媒體為多，立場也較為偏向社運與弱勢團體。尤其以社會運動事件的報導數量與立論傾向而言，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即各領域的運動抗爭逐漸明朗化的時期，《自立晚報》與其他各大報紙在政治立場、處理社運議題「大相逕庭」的態勢更加明顯（楊韶彧，1993：36-40；吳芳如，2001：136-139）。

2

¹ 《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老闆余紀忠與王愷吾在1979年分別入選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李漢主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4：361）。

² 以1989年核四廠興建引發當地貢寮居民群起抗議的事件為例：《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在核四議題的報導次數、內容、意識形態、非新聞體文類（社論、投書）等，多以明顯政治立場、經濟發展等層面上，持「擁核」觀點。《自立晚報》則以「環保議題」、「核四興建應交遊人民公投」為論述基調，呈現反對核四廠興建的立場。如吳芳如（2001）以反核四事件探討媒體消息來源、新聞框架和媒介真實建構之間的關係研究中，訪談了多位在反核四事件中的社運人士與專家學者，皆認為《自立晚報》不論是立場或是報導方式，都持支持社運團體訴求的立場：「…整體來講《自立晚報》我們的消息比較多，這第一是傳統，第二是記者多是從反對運動陣營裡面介入的…（綠黨中執委、台大教授高成炎）」（吳芳如，2001：136-155）。楊韶彧（1993）以核四爭議為主題，研究消息來源在影響議題建構的過程中，發現上述四家報社在議題處理上，《自立晚報》也採取不支持核四建廠的明顯立場；而《中國時報》次之，《聯合報》、《中央日報》最次。在婦女運動方面，相較其他各報著重以官方婦女團體作

事實上，過去《自立晚報》最與人稱道的，就是在報導黨外、社運新聞時的積極立場與特立於其他報紙的言論風格。研究《自立晚報》的相關文獻認為，《自立晚報》在1970至1980年代間，屢屢突破當時的政治禁忌，對於黨外與群眾運動議題，經常以社論聲援並大篇幅報導，報導次數更高居其他報紙之上。當時許多重大的國家建設、政策時常牽扯到政治的敏感禁忌，許多報社礙於「生存立場」，壓縮了社運團體訴求的發聲空間。相形之下，《自立晚報》經常在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弱勢關懷和維護人權方面，扮演積極角色，大量報導，並時常讓各報見勢跟進（吳圳川，1996：260；陳國祥，1998：546）。同時，《自立晚報》也因為在1980年代大量報導黨外與社運議題，異軍突起，甚至一度佔下晚報市場市佔率的七成（吳芳如，2001：152-154；呂東熹，2002：158）。

《自立晚報》從戰後創刊至報禁解除，共經歷了三次停刊，四次改組。其中第二次改組接辦的外省人士李玉階，在不堪國民黨政府時以審查內容不符規定為由，勒令停刊的干擾下，宣佈脫離國民黨籍，並宣示了報社經營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為方針，替《自立晚報》定下了日後的發展方向。本省籍的吳三連在第三次改組加入經營後，仍堅持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風格辦報。在報禁開放前後，《自立》報系為了提昇報譽與拉近和本土人士的親近與連結，除了刊載更多本土性新聞外，更招攬了許多新聞界本省籍或具有本土意識的報業菁英加入《自立晚報》（呂東熹，2002：148）。

從1970年代開始，《自立晚報》的人事組成呈現了外省與本省籍比例各半的情況，與其他報社外省籍人數幾乎佔了八、九成的組成結構截然不同。同時，也因人事組成結構有別於其他報紙，更能容納各種不同政治意識形態混雜在報

為報導的消息來源，《自立晚報》較重視讓民間婦運團體發聲（翁秀琪，1997：201）。在勞工運動議題上，《自立晚報》也較其他報紙較重視資方立場的報導不同，多偏向勞方的立場，替勞工發聲（翁秀琪，2000：491-492）。

社之中，形成了《自立晚報》的獨特自由風氣。許多優秀的本省與外省籍新聞人材也受到《自立晚報》這股自由風氣的吸引，紛紛自動加入；如資深新聞人胡元輝、張友樺、黃德北、蘇正平、劉克襄…等等。在吳三連與吳豐山的主持下，除了極力排除《自立晚報》最大的投資者---台南幫勢力進入外，更堅持讓新聞專業的實踐，讓《自立晚報》能發揮建言效果與民主政治的催化作用，同時，在真相告知上有別於宣傳性的報紙（周慶祥，陳國祥訪談，2006年5月12日）。

在上述《自立晚報》的經營方針、報社組成結構與內部工作氛圍之下，《自立晚報》的記者也較其他報社記者，能保有更多自我對於新聞事件的判斷以及採訪風格。蔡士敏（2008）在其探討參與「自立事件」的核心成員生命史研中指出，她的研究對象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是他們跑新聞最充滿熱情、信心的時期。其因素包含：這群在1980年代中期後，進入《自立晚報》的記者，大多年輕有理想，把社會關懷寄託在記者工作上；另外，在解嚴前後的《自立》早晚報，相對其他傳統大報，給予記者自主的空間較大。就1980年代新聞工作生態而言，《自立晚報》對於異議聲音的容忍程度是較開放的（蔡士敏，2008：51）。

除了報社經營者的開放態度促使記者自主性提高外，報社內部自主性與自由開放的融洽工作環境氛圍，同樣也需要由記者由下而上努力開拓與建立。蔡士敏（2008）的研究中，呈現了《自立晚報》工作環境中，同事間融洽的同儕氛圍與認同感。前《自立早報》記者蔡崇隆在〈不可不思議：我的青春與記者夢〉一文中，有著對於同事間同志般的情誼與認同的描述：

...當時晚報的彭琳淞松跟我路線相仿，有時我才抵達運動現場，就會碰到他匆匆迎面而來，塞給我一把他剛傳真回報社的稿子，讓我在第一時間得以了解最新狀況繼續採訪，兩人好像在進行一場無聲的

接力賽跑。

多年之後，他熱切的眼神，龍飛鳳舞的字跡，以及抗爭現場的群眾吶喊，都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最珍貴的媒體記憶。
。（見http://ban-lift20.blogspot.com/2007/09/blog-post_5884）

除了上述特殊的同儕氛圍外，《自立晚報》的記者們，在爭取新聞自主與採訪自由方面，也有異於他報記者的表現。前《自立晚報》主跑環保與教育線的記者李瓊月，回憶在採訪「一百行動聯盟」³新聞時，曾因為憲兵驅逐當時在場的媒體記者，而由《自立晚報》的記者們「帶領」其他報社記者群起靜坐，爭取新聞採訪權，與抵制政府新聞的過程（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6年10月22日）。前《自立晚報》主跑司法與社會運動線的記者呂東熹也描述了《自立晚報》的記者特性：不論報社是否有指派記者採訪，《自立晚報》的記者們都會自動到新聞現場、自動採訪、發稿（管嫻媛，呂東熹訪談，2007年8月30日）。此種「自動自發」主動採訪的方式，或許是情境使然，又或者是同儕間的影響，但在缺乏行動者自主意識的條件下，這些無論是偶發或是自然發生的採訪特性，是不可能憑空發生的。記者在《自立晚報》環境中，所逐漸養成的「採訪方式」，亦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記者所身處的媒體環境與同儕工作氛圍，是形塑記者對於自我角色與功能理解的重要場域；而記者的新聞專業實踐（包括採訪方式與特性），更是基於記者對於自我新聞工作的基本理念而產生的，而這樣的理念與對於新聞價值的判斷，即是記者的專業意理。換言之，記者所做出的新聞專業實踐，都受到記

³ 參考自李瓊月訪談「我們去採訪100行動聯盟行動的時後，當時憲兵包圍了靜坐群眾，甚至要把我們幾個新聞記者趕出來，我那時有個同事叫做陳銘城，就打電話回報社說，如果他們不讓我們採訪，我們明天就抵制他們的國慶新聞！」（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6年10月22日）。

者專業意理的影響。

而《自立晚報》記者專業意理的養成，除了受到《自立晚報》自主風格強烈的工作環境、同儕氛圍影響外，記者的每一次的採訪經驗、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亦是形塑記者專業意理的重要關鍵。過去研究記者與採訪對象關係的相關研究皆指出，記者容易受到採訪對象的影響，而產生對採訪對象意識形態的認同感，進而在新聞訪現場或報導立場上偏向受訪對象（楊渡，1994：57；羅文輝，1995：1-13；馮建三，1995：41-60）。楊渡在一篇探討社會運動與新聞倫理的專文之中，將記者「介入」新聞現場的情況祥實地記錄了下來：「…以五二〇為例，當時警方逮捕人犯，進入警察局即有刑求的發生，記者中有極少數的警政記者竟然加入拳打腳踢的行列，而另有社會運動記者則出言阻止，不料此一記者卻反而遭到警方的毆打。該記者是《自立晚報》記者，被打傷後送醫治療……」（楊渡，1994：57）。

記者可能因為長期關注某個議題，或時常與固定的受訪者接觸互動而產生認同感。而採訪的情境、議題範疇、受訪者處境，也同樣可能促發記者的認同感與同情之情。不論是上述何種情況，都可能使得記者在新聞採訪現場或報導立場上傾向受訪者，甚至無意識的「介入」了新聞事件當中。

本文考量了上述影響記者專業意理形成的各種因素，包括媒體環境、同儕氛圍、記者特性與時代情境…等條件，而鎖定以1980年代間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的記者作為研究主體與觀察對象。其原因如下：如前文所述，在媒體環境條件方面，1980年代的整體媒體環境，正在一個民主化與言論自由化的摸索時期；而《自立晚報》在報導立場與傾向上，不同於當時其他主流報紙壓縮弱勢與社運議題空間，反而給予社會運動與弱勢者較多版面，且報導多持正面、聲援立場。在同儕氛圍與記者特性方面，《自立晚報》獨立辦報的經營方針與充滿自由風氣的工作環境、同事間的革命情感，也有別於當時主流報紙的記者工作環境。就時代情境與記者易受到採訪情境與對象影響層面而言，1980年代

是台灣社會的社運黃金期，同時更是社會範型轉變時期，而當時所發生的各大重要社會運動事件，正是當時《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所主要負責的業務範圍，他們親眼見證了動盪變革的年代，並時與抗爭者、弱勢者接觸互動，更有可能受到社運團體訴求的感召而產生認同與同情。這群記者的專業意理形塑過程就是在上述條件下而逐一形成的。綜合上述，台灣1980年代《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所具有的獨特性，正提供了一個得以讓研究者聚焦、深入地觀察與探索記者專業意理的研究對象。

本文以《自立晚報》綜合組五位主跑社會運動議題的記者：林美挪、王幼玲、李瓊月、彭琳淞、邱家宜作為研究主體，他們分別在1980年代間的不同時期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負責弱勢與社會運動議題；他們大多是在1950到1960年代間出生，在1970到1980年代間進入大學、研究所的求學階段，他們成長的時代背景有同質性，又基於個人成長環境而各有差異，但多半在1980年代前後進入媒體場域，受到台灣黃金運動風潮的洗禮，而發展與形塑其個人專業意理內涵。

這五位記者，一開始也許是受到報社指派分配而進入綜合組，也可能是基於記者個人的選擇；不論他們是否在跑線之前，已經抱持著對於該路線的想像與理念，在採訪過程中，他們面對這些抗爭者、社會運動團體所可能產生的同情與理解，才是影響記者個人專業意理形成之重要關鍵與影響因素。而這部份的影響因素，在過去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的相關研究中，卻極少被研究或討論。本文認為，由行動者本身的實踐過程來理解行動者如何在環境中，基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做出的實踐，能夠補足過往「古典社會學」⁴研究裡，讓社會行動與行動者概念無法被彰顯之遺憾。正如Alain Touraine (1984) 所言，研究者越

⁴ 此處「古典社會學」的概念，引用Alain Touraine (1984) 所定義的三種原則內涵：「在現代社會這個觀念終將某種社會類型與歷史意義混同；把社會系統與國家等同起來；以及，以各種統計學的整體來取代各種社會行動者，而這些統計學整體則是根據社會參與與某個層次或形式，以及根據社會系統運作之內在邏輯的各種符號來定義。」(Alain Touraine, 1984/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104)。

是探究社會結構與條件，就越容易忽視各種行動者的角色；因而只能使行動者被視為依其在某種社會系統中所處的位置，而「應當」具有某種屬性的人；反而使得行動者個人之影響與主體性被隱沒在分析鉅觀條件的研究之中。

雖然，以鉅觀的研究視角理解整體歷史與社會結構是重要的，但就微觀的研究視角而言，我們也不能夠忽略事件中行動者的所處位置，如何讓事件本身具有意義。就傳統史學與社會學而言，許多行動者在事件當中是「隱而不顯」的；換言之，研究者大多從鉅觀的環境、政經脈絡來由上而下的檢視事件對於行動者的影響與促動，卻未能進一步由下而上檢視歷史如何在行動者的策動下發生。基於此點，本文藉個人生命史的建構來探述行動者在大環境之下的實踐意義，進而建立出「由下而上」的研究觀點。

本文依據五位研究對象的文字作品或自述之中，找出了聚焦的問題與方向；而這些現象亦是本文在詳述研究問題前的發引：

王幼玲在自述那段《自立晚報》跑工運議題的過程中，不僅將工運團體理解成採訪對象，而是更為親近的「朋友關係」；王幼玲更直接地坦承，在寫新聞報導時，會站在推動工運的觀點上，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從王幼玲的自我認知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她認為當時自己是一名記者，同時也是一名「社會運動者」，站在勞工的立場替他們發聲（蔡士敏，2008：44）。而王幼玲自我認定的記者與運動者的雙重角色，如何形成？如何影響她個人專業意理之專化與形塑？這個問題正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這五位《自立晚報》綜合組的記者，不僅僅可能在報導上具有側重弱勢的傾向，在新聞作業流程之外，與抗爭者更可能產生了實際的接觸與互動，而經由這些接觸與互動而產生的情感，正可能記者在專業意理養成型塑過程裡發酵作用的重要因素。

本文另一位研究對象之一---前《自立晚報》環保與社運線記者林美娜，在其報導中更具體的表露出她對於受訪對象的關懷情感。她在一篇記錄採訪水源

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時，這麼寫道：

…不急著尋找水源里居民和李長榮化工廠雙方對立的焦點，不趕著探索雙方僵持的糾結，也不忙著澄清雙方互控的傳聞，僅僅想要比較專心地去傾聽他們的心情，觀察他們的日子（林美娜，1989：139）。

曾經對守夜「全勤」的溫亮一說，週四要起個大早來看他們，而年輕的莽撞也就在於常發豪語卻時常做不到，午後，溫亮一半似調侃地說我們不守信用，他一早四點半起床，掃地、褶被，一直等到七點多仍不見我們人影，這才下田去（林美娜，1989：142）。

四時二十分，溫亮一這個被喻為「班長」的實踐者，步出帳棚，開始他一天的生活，從掃地、燒茶、洗碗，「一仔」的一舉一動就像在他家一般，毫無兩樣。「一仔！你早！」一語劃破清晨的寂靜，互道早安，讓我們最起碼做一個不亂發豪語的過客（林美娜，1989：143）。

藉由林美娜的書寫，我們可以發現，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對於受訪對象產生的關懷情感，也影響了記者的報導方式與筆調，而這些亦包含在記者的專業意涵之內。藉由本文所鎖定的研究對象，本文觀察到，他們除了在報導立場與對於記者角色的理解上，偏向受訪對象與社運團體外，他們在新聞專業實踐之外的行動，亦受到採訪經驗與自我理念之影響。如書寫上述文字的林美娜，在採訪多年環境與公害議題之後，與當時參與環保運動的健將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等人，成立「綠色和平工作室」，持續關懷台灣環境議題，投入環保運動中。而王幼玲更在關注勞工議題多年之後，離開新聞界，進入勞工局

繼續運用公部門的資源為勞工爭取權益。

依據本文所觀察到的上述現象，若我們理解專業意理如何影響記者之實踐，我們除了要重新探究專業意理對於記者本身的意義之外，更要理解記者受到哪些採訪經驗影響而形塑自我的專業意理內涵。過去的相關研究多半使用量化的研究方式，依據記者所選擇之新聞工作方式，而將記者專業意理分成幾種類型，提供了我們理解記者專業意理與記者角色的認識雛形，然而，卻無法得知記者形塑專業意理與自我記者角色的過程。因此，為了補足過往研究未能提供我們理解「記者專業意理形成過程」之不足，本文主要關懷焦點，在於探索這群《自立晚報》綜合組的五位記者們獨特的個人特質與生命經驗、在新聞工作場域中的實踐意義，以及他們形塑、建構專業意理內涵之過程。

綜合上述，本文提出兩個主要研究問題：**第一、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的新聞專業意如何形成？** **第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基於記者個人之專業意理，《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專業實踐？**

本文採生命史研究途徑，從記者個人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與實踐，作為探討上述問題的研究主體；藉由當時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媒體場域，與記者個人的生命／採訪經驗，理解記者的生命／專業「選擇」與「實踐」因素。本文不同於過往相關研究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從數據顯示來論證分析記者專業意理形貌，因此，本文特別強調以「理解」行動者的質性研究方式，來探索記者專業意理形塑之過程。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本文在第二章的部份，將重新討論現有的記者專業意理之不足：現有的專業意理三種分類，確實有助於研究者理解記者的大致形貌，但卻無法使我們了

解其發展成三種意理的過程與原因。而正如本章第一節所述：《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的特殊性---即記者在實際工作場域中的實踐，並不能僅以「該記者屬於某類意理型的記者，因此有如此作為」來粗糙地概括解釋。因為，任何過於定論式的理解，只能使研究僵化停滯，而失去發現與探索更多研究主題的機會與空間。因此，本文選取生命史的研究途徑以及質性研究方法，企圖開闢新聞史與傳播研究領域中記者研究的另類研究取向。

近年來，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逐漸重視「個人／主體」；如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重視以女性觀點來書寫的女性生命史；社會學與歷史學家也發展出「聽底層的聲音」的研究主題，以生命史作為研究取徑，讓底層小人物歷史發聲；人類學研究領域也開始以「生命史」方式進行組織和理解他人經驗，來敘述某一種文化特徵的研究（McCall & Wittner, 1990：46；熊同鑫，2001：110）；然而，生命史的研究途徑，在國內的傳播研究領域卻還未受到重視。生命史研究雖不算是新興的研究取向，但是生命史研究逐漸在上述研究領域開始大量出現，主要因近年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於「主體」（subjectivity）的重視，認為人類是根據事件對其主觀的意義而行動，因此個人主觀生活經驗（life experiences）應該成為研究的對象，不應忽略行動者的角色。因此，本文採用生命史研究途徑，除了希望能更具象化出這群「小記者」個人角色外，更企圖藉由記者「個人」生命歷程的研究方向，結合「人」的主體能動性，以及歷史的、環境的限制，開闢傳播研究領域的新路徑。

過去傳播研究領域開始重視新聞從業人員角色之研究，最早可從1958年 Kurt Lewin 首創「守門人」一詞開始（翁秀琪，2000：104）。早期「傳播者」的研究，多以「守門人」模式來探討傳播者職業角色，後來逐漸轉變為探討組織內部文化，以及外部環境對於記者的限制。相關研究主題如外部環境（新聞室）如何影響記者個人的勞動條件、媒體的科層制度對於記者在工作場域中的壓迫、記者面臨在職場上的困境，如何調適與抵抗等。近年則開始大量出現以

記者對於自我工作的滿意度與角色期望為主題的量化研究，探討記者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條件如何影響記者對於工作與記者角色的設定（楊秀娟，1989；蕭蘋，1989；楊志弘，1991；陳雅琳，1994；陳科佃，1995；蔡佩琳，1990；劉智慧，1996）。

而對於新聞從業人員有專文探討者，也多是以媒體經營者個人故事與經歷為主軸（如周慶祥，2006），相形之下，「個人」的面貌則模糊不清。除了探討媒體經營者個人的研究外，上述研究通常以統計數據來論證分析，較缺乏對於記者角色的深度探討與理解。因此本文使用生命史研究途徑之意義，在於具象化這群「小記者」的形象過程中，能同時關照記者的主體能動性，以及歷史的、環境的可能限制；深入「理解」記者個人在社會情境、媒體場域、個人因素下，其個人特質與所抱持的新聞專業意理，如何影響記者在採訪現場時、報導時、生命實踐上的各種選擇（蕭蘋，1989：78-81；楊渡，1994：57），甚至影響到如何拿捏與社運／弱勢團體（消息來源）間的關係，藉以開闢傳播研究領域的新途徑。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綜合第一章所述，本文研究問題有二：第一、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的新聞專業意如何形成？第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基於記者個人之專業意理，《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專業實踐？本文研究問題之核心，在於關注記者專業意理養成過程，以及基於記者所具之專業意理而選擇做出的各種「實踐」意義；而這些實踐包括了是否介入了新聞事件？個人如何詮釋「介入」的意義？本章第一節將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相關研究，並整理出過往研究之優缺。本章第二節則援引倫理學中對於Carol Gilligan (1982) 的「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 的討論，並結合傳播學領域，重新思考觀看記者專業意理發展的方式。

第一節 記者專業意理相關研究

專業意理又可稱作為專業意識型態。意識型態 (ideology) 一詞最早出現於18世紀末期，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社會樂觀時期，由John Locke的門徒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 所提出。用以表達一種藉由學習而得來的一套抽象、系統性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被視為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觀念或價值系統，可做為人們思想的準繩和信仰的歸條。意識型態具有邏輯的概念組合及符號系統，會影響人們對周遭環境之認知、評估和期許；也可以形成一套具體行動策略和準則，並作為實踐行動之綱領。意識形態是包括對人性、種族、性別、環境、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關係、經濟與政治體之關係理想秩序的見解，以及政治目標等之明確態度。因此，意識形態具系統、排他、情感和主導性，也建構認同，以及整合和凝聚社會力之功能 (曾華源、胡慧葵、李仰慈、郭世豐，2006：

53-54)。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意識型態是社會信念與態度的體系，表達有關社會與人群關係的道德價值與理想，並用來激發人們行動和社會變遷的一套有系統的觀念（曾華源、胡慧葵、李仰慈、郭世豐，2006：53-54）。Siporin（1975）則指出意識型態提供個人信念與利益合法化，是相同想法之他人的重要參考團體，據此以感受到凝結；這是認知、詮釋的方式。因此，意識型態能夠給予保護、支持、道德目的與激勵，甚至一種身分或認同，如同一種特定的認同類型（曾華源、胡慧葵、李仰慈、郭世豐，2006：53-54）。

基於上述，本文對於記者專業意理（意識型態）的定義與內涵，綜合了過往相關研究而整理下列概念：「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而此一信念系統的內涵又包括「記者的專業價值」（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ewsman）或「記者責任」（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等概念，而研究專業意理之憑據又以記者對於新聞、媒介之功能的看法，以及新聞專業操作等層面（Weaver & Wilhot, 1986：104-145；蕭蘋，1988：6；田志剛，2000：12）。

從歐美國家新聞史的發展中，可以歸納出歐美研究所認知的的主要記者角色，應該保持「客觀性」和具有「追求真理」的職業特性，而「中立客觀」也一直是記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理念（童靜蓉，2006：95）。而記者角色的內涵，乃是基於個人特質，與實際社會脈絡、情況互動中不斷變動的；因此，即便「中立客觀」是主流價值，但過去西方卻也有不少新聞記者跳脫「中立」的價值觀，參與社會運動的案例。如美國1960年代的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男女平權運動、學動等等，都有不少新聞傳播工作者宣揚「參與宣傳」（participant-advocate）的新聞意理，為社會運動推波助瀾（翁秀琪，1991：407-408）。因此，為了讓社會理解記者這種職業角色面貌，美國從1970年代開始了一連串探討記者職業內涵與記者專業意識形態的實證研究，企圖看清朦朧

「中立客觀」薄紗裡的記者真實面貌。

過去對於職業的專業發展與認可的探討，會從幾個影響該職業專業使命的實現情形等面向來分析；這當中包含兩個彼此牽扯的議題，一是專業本身的從業人員所能展現的能力是否能勝任和被肯定；另一則是專業角色的定位是否清楚，並且確實執行職責（曾華源、胡慧葵、李仰慈、郭世豐，2006：17，53-54）。因而，判斷新聞工作是否具有「專業性」，或者，是否是一種「專業職業」，角色的定位是否清楚等等，成為西方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研究之始。而國內相關研究也多以上述兩者議題探討主軸。

Meleod & Hawley（1964）年依據「專業態度理論」⁵發展出一套檢測新聞工作是否具有「專業性」的「專業態度量表」，並針對美國威斯康辛州115位新聞從業人員與93位非新聞從業人員進行測試，確認了新聞工作具有「專業性」。幾乎同一時期，Cohen（1963）則針對駐美國華盛頓的外交記者進行相關研究，發現了記者對於自我角色有兩種不同的看法。Janowitz（1975）則依循新聞從業人員發展歷史脈絡，整理出新聞從業人員所具有的兩種專業意理模式：「守門人意理模式」與「鼓吹者意理模式」；前者重視專業責任與專業技術，主張報導需要客觀、正確，而後者則認為記者須揭發政府的不當政策。而Johnstone等人（1976），以記者專業的實際行動、想法作為判定「專業認同」（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的指標；其中包括記者是否參與專業社群，以及記者對於新聞工作的態度與價值觀（保有專業自主、具有公共服務的概念、具有使命感）。

之後，Johnstone等人（1976）更針對全美國1,313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研究，發現有「參與」（participant）與「客觀」（neutral）兩種彼此競爭的專業意識形態存在於美國1970年代前期的新聞從業人員專業意理中（Weaver & Wilhoit, 1986：104-105, 112-117）。而Weaver & Wilhoit觀察到，這樣「二分法」的研究

⁵ Meleod & Hawley（1964）根據專業態度理論和社會學家所提出的職業特性，發展出了一套「專業態度量表」。「專業態度」包括：以同事作為工作準則參考、具有位大眾服務之信念、努力爭取工作自律、對工作具有使命感、在知識領域中能獨立判斷等。

結論過於粗糙，所以在1982年底到1983年初，他們以電話訪談了美國1,001位全職的新聞從業人員；其中包括日報、週報、新聞雜誌、廣播電視記者；藉由個人教育程度、職業路徑、專業價值、倫理，以及工作條件等指標，做量化分析後，發現過去兩種分類的不足。Weaver & Wilhoit (1986) 將Johnstone等人對記者專業意識形態的「參與」(participant)型再細分成「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 與「對立者／鼓吹者」(adversary role／advocator)；而兩者間最重要的差異就在於：記者是否「有意識」地運用報導改變、介入政策。以下便就三種專業意理類型內涵進行闡釋：

(一)「資訊傳播者」(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這種角色的產生乃基於自由報業哲學及意理。其基本觀念在於將資訊告知於人們，讓人們自己判斷做出決定。因此，這類角色強調客觀，且極度要求記者在報導呈現現實客觀，因此也稱為「記錄者」或是「中立的資訊傳達者」(Weaver & Wilhoit, 1986：112-115；蕭蘋，1988：17；翁秀琪，2000：104-112)。

(二)「解釋者」(interpretative role)：此種角色認為新聞事件是相當複雜的，若沒有記者將事件意義解釋清楚，閱聽人就無法了解其重要性。因此這類型記者認為「能夠在報導中，對事實加以分析，甚至陳述意見」是重要的。如「調查者」、「新扒糞者」等角色內涵，都類似「解釋者」意理類型 (Weaver & Wilhoit, 1986：113-124)。

(三)「對立者／鼓吹者」(adversary role／advocator)：Weaver & Wilhoit (1986) 認為可將Johnstone等人所歸類的「參與者」的角色再細分為「解釋者」與「鼓吹者」兩種。因為「鼓吹者」角色強調的是「解釋者」角色所沒有的參與、介入過程。而這種角色可能是「政府的政策的鼓吹者」或是「政府的批評或對立者」。不管是政策鼓吹者或是政府對立者，這類型的記者「有意藉由新聞報導，或是主動介入來影響政策結果」。因此，這類型記者也被稱為「行動的促動者」(the precipitator of action) (Weaver & Wilhoit, 1986：104-145；蕭蘋，

1988：19-21)。

Weaver & Wilhoit (1986) 研究的結果顯示，抱持「解釋者」專業意理的記者最多，「資訊傳播者」次之，「鼓吹者」最次。而多數的記者又同時在這三種意理間游移，有時兼具其中兩者或三者。

而台灣在1980年代黃金社會運動期，社會知識份子也紛紛選擇媒體場域來展現改革力量。如過去反核運動中，除了自救團體之外，記者在採訪現場，除了扮演「資訊傳播者」的報導者身分，記錄新聞事件外，也可能扮演了「解釋者」，甚至是「鼓吹者」的角色，在採訪現場介入事件中。記者在某種程度上，使用報導介入社會運動的發展（張茂桂，1989：43；張茂桂，2003：193）。如台灣在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發展中，新聞媒體大量的報導與評論，促使原本屬於地區性規模的新聞事件轉眼變成全國焦點，讓其他類似性質的自救運動起尤效仿，擴展了整體的反污染運動規模（楊渡，1994：61）。

以社會運動議題而言，長期在現場採訪的社運記者，通常會逐漸將社運團體或是政府單位所各持的意識形態「內化」成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楊渡，1994：57；羅文輝，1995：1-13；馮建三，1995：41-60）。例如以上述楊渡提及五二〇農運事件採訪現場來看，長期採訪警政路線的記者，會無意識的從警方的觀點來看待抗爭者，認為他們是暴亂份子；而相反的，跑社會運動線，長期接觸弱勢團體的社運線記者，也可能因為同情弱勢者，而有相反的觀點，或是在報導、採訪現場上有不同的實踐。這些實踐都牽涉到記者所具有的專業意理內涵。

過去以記者專業意理為探討主題的相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使量化研究方法，採用「專業量表」測量記者屬於哪一種類型，再將之分類。即將三種專業意理角色的內涵概念化成條列式的敘述，再藉由問卷調查做量化分析。這類研究結果顯示，西方的記者多偏向「解釋者」與「對立者」，而國內記者則多屬於「資訊傳播者」與「解釋者」（蕭蘋，1989：21-23）。而這樣的研究結果只能將記者概念化的分類，而無法得到記者如何成為某一專業角色之形塑過

程。

這類研究包括如蕭蘋（1989）研究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並使用「專業量表」做量化研究，該研究發放問卷調查台北、台中、高雄等六縣市的報社環保記者對於專業量表的自我評估後，發現台灣環保記者的專業角色多傾向於「資訊傳播者」。張舒斐（1997）同樣使用「專業量表」探討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該研究以新聞總部或新聞中心設於台北縣、市的電視台新聞記者為研究對象，包括無線、衛星電視新聞台之文字、攝影記者。該研究主要研究發現，電視新聞記者個人專業價值觀最重視「專業責任」，「專業自主」次之，再為「專業知識」，「專業承諾」則最不受重視。類似研究還有施致平（1991）研究記者專業意理與新聞製作流程對體育新聞報導之影響，以及單文婷（2003）的國會記者新聞專業性研究。施致平（1991）探討記者專業意理與新聞製作流程對體育新聞報導之影響；陳永富（2003）聯合報系地方記者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係的研究；陳淳毅（2003）衛星電視新聞頻道社會記者專業性與守門行為之研究等等。

上述研究將記者行為與選擇、實踐化為簡單的量化概念與數據，缺乏深入了解記者個人生命經驗如何促成記者專業理念與角色認知的形成。再者，使用「專業量表」的量化研究多半直接移植西方專業意理類型套用在台灣記者身上，容易忽略了台灣本土歷史與西方國家歷史發展上的政經與文化差異，而缺乏在地的研究觀點。

另有使用質化研究方法探討記者對專業角色認知的相關研究。如楊志弘（1991）混合量化與質化研究法，以臺灣地區報社總編輯「職業角色」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台灣地區報社總編輯的職業角色，並將其放到報社的科層組織來觀察，分析「角色行為」（role performance）和「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s）兩個領域，並就職業社會學的角度，討論職業角色的「幅度」（scope）和「蔓延性」（pervasiveness）兩個課題。其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報社總編輯的

職業角色較傾向「資訊傳播者」，其次是「解釋者」，而「鼓吹者」最少。楊的研究與過去量化相關研究不同之處，在於該研究加入了質化的訪談方法，蒐集記者個人經驗資料作為詮釋量化數據之基礎。

又如李祖舜（2003）以質性研究方式探討報紙政治記者對新聞實務與專業角色的認知。該研究分析內、外在環境對政治記者實務工作與新聞專業表現的影響，進而理解政治記者面對各種外在影響因素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李祖舜使用深度訪談法，以國內八家主要綜合性日、晚報的20位現任資深政治記者與主管為訪談對象，針對「政治新聞編實務與內容呈現變化」、「外在環境對政治記者的影響」、「組織對政治記者的影響」、「編輯室內控機制與記者角色認知」、「變動環境下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與工作困境」以及「政治記者對政治新聞與記者地位及發展前景的認知」等面向進行訪談分析。其主要研究結果發現，政治記者的新聞專業不敵「政治正確」；而報紙政治記者的新聞價值觀呈現分歧現象，部份堅持專業自主，拒絕來自組織內外的影響與壓力；部份則是主張階級權力掛帥、不問新聞專業、只問利害關係。另外，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普遍不高；報紙政治記者的工作滿意度受到「人力配置」、「組織規模」、「新聞路線」、「組織互動」以及「言論立場」和「新聞價值觀」等檢驗指標的影響，多數記者工作滿意度不高。

上述研究雖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記者專業意理研究，但是研究範圍仍只關注記者在媒體場域中受到的影響，而忽略了行動者生命經驗的重要性，以及記者在個人生命經驗與時代、媒體組織文化互動過程中，所選擇做出各種不同「實踐」的理由。

綜合上述，過去相關研究大多呈現出記者在各種環境條件下做出不同形式實踐、選擇的「結果」，而沒有進一步從記者個人的生命經驗中探究出這些「結果」背後可能的更深層因素；即個人經驗與特質如何影響與形塑一個記者的專業意識的養成過程。

第二節 另一種觀看記者專業意理的方法：從關懷倫理概念出發

本章第一節所整理之過去相關研究指出，過去研究多以「專業量表」將記者分類成可以具體辨識的三種類別，提供吾人理解記者職業之特點與功能特性。然而，正如本章第一節所述，現有記者專業意理分類模式，雖可將模糊的記者形貌加以分類與辨識，但此種分類法仍無法細緻的描繪出不同的個人差異，以致於忽略了記者自身的生命經驗如何與工作場域、生命情境互動。本節將借取Carol Gilligan（1982）提出的「關懷倫理」概念，以及其後在倫理學方面的討論，來彌補記者專業意理分類之不足，並試圖重新思索記者形象與內涵之意義。

自啟蒙運動之後，主流的哲學思維認為的「人」的內涵，應是獨立的、公正的、客觀的；人運用普遍的、抽象的原則思考事物，即Immanuel Kant式的道德哲學觀點。這套觀點將「道德人格」理解成一種抽離具體經驗特徵與特殊人際脈絡的個人，並且藉著一套可以導出個人基本道德權利（與義務）的抽象原則，來確保做為道德人格或主體個人不受侵犯，以保障其「目的自身」的地位，使個人不致淪為純粹的工具。因此，個人是公正、公平而不具個人私慾的，這套道德哲學觀點又可稱作「正義倫理」。

同樣地，在上述西方主流哲學思惟脈絡下，西方主流新聞界所發展出的記者角色，推崇的亦是獨立思辯與公正客觀的概念與特質。在過去西方的歷史脈絡中，⁶記者角色的宗旨就在於為公眾服務，同時擔負伴隨「權力」相對形成的社會責任（Johnstone, 1976）。Deuze（2005）在探討記者角色內涵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發現，「公眾服務」（public serves）一直都是社會

⁶ 此處僅指民主國家社會的發展脈絡。

大眾理解與認識記者功能的重要指標。因為，媒體擁有影響社會認知的重要力量，而記者隨時在下筆之際，一念之間，或多或少地呈現或保留事件的各種面向；也因為如此，記者若要躍升為一種具有「專業性」的職業，在民主社會的發展中，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責任，藉以與「門外漢」做分別（Deuze, 2005：445-447）。同時，在記者的新聞專業實踐上，也特別重視所謂的「客觀性」。

因此，當我們回頭檢視現有專業意理的三種類型之內涵時可以發現，每一種記者專業意理其實都是在「正義倫理」的哲學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例如，記者與媒體是「社會公器」，因此，必須具備公正、客觀的特質，此種經過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放諸四海皆準的倫理概念：媒體既然能夠影響大眾對於事件的認知，記者必然需要肩負某種社會公器與社會良心的角色（Deuze, 2005：445-447）。本章第一節所述之專業意理中的「資訊傳播者」，便是典型具有上述道德哲學內涵的記者角色。記者專業意理中的「資訊傳播者」角色，一如「正義倫理」所闡述的概念：即要求個人的獨立與自主性，要求個人公平客觀，符合社會「正義」標準，不能有所偏私。同樣地，「解釋者」與「鼓吹／對立者」角色，即便在實踐的內涵上有所差異，卻也同樣極度要求與重視某種社會公平正義，而這種社會公平正義，正屬於「正義倫理」所說：「求諸四海皆準」的正義、公平內涵。當我們回頭檢視記者專業意理發展的道德理論基礎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既然記者的專業意理類型皆以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為立基點，又為何會發展出「三種」⁷不同的專業意理類型？

藉由記者專業意理的定義，我們可以很明確的得知記者專業意理是一套：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價值之系統。但記者專業意理之定義與分類，未能具體言說的是，這種近乎抽象、普遍、形而上的信念、價值系統又如何被研究者經過實證研究後分成三類型。

過去西方學者在研究記者專業意理內涵時，基於對於評斷「專業意理」

⁷ 三種專業意理分類與內涵詳見本章第一節。

的標準不同，而將其分成兩種或三種不同類型；但不管是以教育背景、年齡、性別、專業技術、專業認同、專業自主性等概念化的變項作為實證的量化研究之基礎，皆無法探究記者到底是如何受到上述變項影響來建構出個人對於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

而本文之所以試圖以「關懷倫理」概念來討論記者專業意理之原因，在於藉由「關懷倫理」之概念，我們得以尋出另一種不同於過往研究觀點的方式來觀看記者專業意理的發展。本文對於「關懷倫理」的說明，將在後文繼續闡釋；在此，本文首先將討論上述「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的不同之處，藉以說明本文援引「關懷倫理」討論記者專業意理之意義，以及，本文與過去相關研究之差異與重要性：

「正義倫理」是一種普遍抽象的邏輯，重視形式之推理；而「關懷倫理」則是「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倫理（徐明，2003：39-40）。此點差異正說明了，過去相關的量化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邏輯性的推演，藉以發展出一套幫助我們理解記者專業功能與角色的認知架構，但卻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架構如何產生。簡單地說，我們僅能藉由記者專業意理的三種分類得知，記者在「實踐」方法與信念系統層面的不同，卻未能深入理解記者的實踐方式與信念系統「如何」產生。更具體地說，過去的記者專業意理研究旨在說明：「記者是一份什麼樣的職業」以及「記者職業具有什麼樣的特質與社會責任」，而未能深入討論「記者如何變成這樣子」的過程。

因此，要探討記者基於個人信念系統在實際新聞專業實踐時所呈現的各式樣貌，就必須回頭探討與理解個人在生命經驗的差異性，以及，在其「實踐」背後之信念、價值系統的發展過程。換言之，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建構的「過程」；即記者受到何種因素影響而建立了自我的信念、價值系統，再進一步地去建構了自我的新聞專業內涵與新聞專業實踐方式。

基於上述，本文提出「實踐」過程中產生的倫理---「關懷倫理」，欲補充

上述過往記者專業意理研究之不足。Gilligan所提出的「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正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群記者在實踐上的差異性因素，繼而了解其專業意理形成之過程與關鍵。下面將先介紹「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概念之發展，以及說明提出這兩種概念的兩位學者間的爭辯。

一、「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爭

Lawrence Kohlberg (1958) 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源自於啟蒙運動以降的主流Immanuel Kant、Sigmund Freud、Jean Piaget等人的道德觀點，根據其論點，最高的道德發展，出自人們對於正義的反省性理解，而正義道德不同於責任道德，強調個人與他者的分離而非連結，應考量個體而非關係；換言之，違背「正義」與「客觀」的偏袒，是不能被容許的，即所謂的「正義倫理」(ethics of justice) (黃怡菁，2002：7-8；徐明，2003：2-3，37-38)。同時，「正義倫理」也是Kohlberg等人所認為的人類道德發展應該遵循的終極目標。而民主國家的發展歷史中，也受到啟蒙運動之精神影響；因此，一般民主國家社會對於道德的理解與認知，正與上述之普遍抽象的道德原則觀點相符。

心理學家Kohlberg認為，人對於道德判斷的能力和其他認知能力是共同發展的，並且有一定的發展階段與形態，是階層式的發展形態 (戴華，2001：4)。

⁸在Kohlberg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中，每個發展階段都具有不可逆轉

⁸ Kohlberg 所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將人的道德發展模式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即「前常規層次」(pre-conventional level)：主體是在任何特定社會中尚未成熟的個體，社會規範尚未「內化」成行為規則。再者，「常規層次」(conventional level)：主體已是特定社會中的成熟個體，以其所身處之社會所共同遵行的道德規範，作為不可任意更動的個人行事基本原則。最後，是「後常規層次」(post-conventional level)：主體已能超越其社會奉為圭臬的規範，並以某些可以跨越社會各領域、且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原則，做為判斷依據與行為指南 (戴華，2001：4-5；黃怡菁，2002：5-9；徐明，2003：39)。而上述三個層次中，每一層次又包含兩個道德發展六階段。在「前常規層次」(Pre-conventional Level)中，包含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分別是「他律道德」(heteronomous morality)、「個人主義式、工具取向的道德」(individualistic, instrumental morality)。第二個「常規層次」(conventional level)則分別是第三階段

(irreversible)的特性，他認為後一個階段都比前一個階段在道德智識上更為高階，而只有少數人能達到高道德的發展第六階段。而Kohlberg也認定，一般女性只能進入第三階段，男性則大多可以進入第五階段。這樣的觀點其實隱藏著Kohlberg的價值判斷；他認為這樣循序漸進的發展階段理論，適用於各種特定宗教、文化的人類社會中，而按照Kohlberg的遊戲規則，女性是無法成為高道德發展的一群（李瓊音，2000：8-16）。

然而，Kohlberg的實證研究採樣全是男性，而且該實證研究的概念架構，多偏向父系社會所著重的道德議題，如社會正義與道德權利等等公領域事務。再者，Kohlberg將女性可能較為重視的人際關係，以及在特殊的人際關係中所需處理的特殊責任等，放置在一個不符合所謂主流的道德「正義」尺規量表下的標準來檢視。因此，Gilligan認為Kohlberg的理論概念忽略了女性經驗，而提出了「關懷倫理強調另外一種理解與思考道德問題的可能，即「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Gilligan認為Kohlberg所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或是「正義倫理」，只是「一種」解讀與思考道德問題的方式，而「關懷倫理」則是另一種詮釋道德問題的方法（戴華，2000：1-7；徐明，2004：115-117；吳秀瑾，2005：1-11）。Gilligan認為，女性的道德問題是從衝突的責任中出發，而不是從衝突中爭論權力；其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是重視情境而非重視形式；是敘述性的而非抽象的。因此，她認為，道德的概念集中在關懷活動，而責任和關係的理解成為道德發展的中心（Gilligan, 1982：19／簡成熙，2005：232）。

因此，「關懷倫理」將道德問題至放在一個「特殊的人際關係」，以及個人如何履行自己在特殊人際關係中的「特殊責任」上。Gilligan認為道德無法只

「人際規範的道德」(interpersonally normative morality) 與第四階段「強調社會體制的道德」(social system morality)。第三層次，「後常規層次」(post-conventional level) 包含道德發展階段的第五階段「強調人權和社會福祉的道德」(morality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以及第六階段「強調可普遍化、可推己及人、且具強制力的一般性倫理原則的道德」(morality of universalizable, reversible, and prescriptive general ethical principles)。

用一般性或抽象原則去解決，因為個人無法獨立於群體。任何個人與他者之間，都存在著特殊的人際關係，而非單純使用是否公正、客觀的標準去思考或解決道德責任或問題。換言之，Gilligan認為道德問題不能僅僅一個「道德旁觀者」的角度來處理。

在繼續援引上述兩位學者提出的辯論，來討論傳播學領域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的分類與反思前，本文有必要針對兩種道德倫理對於自我假設的差異再加詳述，以說明「關懷倫理」為何能夠補足過去直接移植西方專業意理分類的記者研究之不足處。

二、另一種觀看記者專業意理之研究視角：從「關懷倫理」概念出發

一如主流哲學思維對於人的自我假設，主流的「正義倫理」同樣強調自我的獨立與自主；而Gilligan從女性經驗提出的「關懷倫理」，則強調自我在人際脈絡中的「不可分割的關連性」(connetendeness)和「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戴華，2000：7-9)。事實上，上述兩種對於道德問題的思考方式，除了源於男性與女性經驗的視角差異外，同時也來自兩種不同的「自我假設」。

「正義倫理」將道德問題的概念放在「公領域」中檢視與思考，而「關懷倫理」則從人際脈絡的特殊關係來思考道德問題。換句話說，即兩種不同「詮釋」問題的方式，造成這兩種道德思考路徑的差異。

Gilligan認為Kohlberg的道德倫理發展學說，忽略了人際關係與私人情感，將個人的道德倫理置於一個真空、純淨的「正義」標準之下。相對的，Gilligan則指出了人在道德問題上更複雜的層次。她認為，人是社會的產物，當我們面對道德問題時，不可能忽略人與人相互間的互動與微妙的人際關係、情感、責任等。正如Kohlberg與Gilligan對於所謂「公正旁觀者」的爭論；現有記者專業意理三種類型，將記者置放在一個普遍抽象的道德倫理層面上去理

解，而無法解釋產生不同類型記者專業意理之因。本文所討論的研究主體---記者，正如Gilligan所認知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情緒，並且與人接觸互動產生關係與責任的社會產物，因此，本文採取一種不同於過往相關研究看待記者的研究方式，以另外一種觀看與理解觀點，來討論記者專業意理之形成。下文將接續說明從關懷倫理的觀點來檢視記者專業意理之研究意義：

第一，Gilligan與Kohlberg的爭論基礎來自於女性經驗與男性經驗實證研究差異，因此，在兩位學者辯論之初，Gilligan所提出的觀點，容易被歸類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對於以男性社會為主之道德觀點與遊戲規則所提出的反駁。也因此，Gilligan所提出的「關懷倫理」容易被視作一個與性別差異有關的道德理論。⁹而本文欲跳脫以性別差異的角度來觀看Gilligan的「關懷倫理」所激發的道德辯論與觀點之意義。「關懷倫理」理論能激起本文對於記者專業意理討論的重點與精華在於：Gilligan所提出的「不同的語音（in a different voice）」，即對於道德問題的「另一種詮釋觀點」。本文的研究價值在於提出另外一種理解記者專業意理內涵與形成之觀點。因此，本文以研究對象個人的生命史，來理解因為個人經驗的不同，所造成個人對於道德問題與專業意理在實踐上的差異。

第二，相對於「正義倫理」認為人應是抽離私人情感而公正無私之個體，「關懷倫理」反而大張旗鼓與大聲疾呼的提醒人際間「關係脈絡」的重要性。Noddings（1991）指出，正義倫理中的道德普遍化法則，其論證與論證後所形成的義務法則，都有賴「相同」（sameness）的假定，之所以強調道德論證，遵守義務，是假定了人們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情境是相同的，這也是道德能夠普遍化的基礎。而關懷倫理不認為有這樣的基礎，他們認為每一個道德情境都是

⁹ Gilligan自己解釋，她所提出的「關懷倫理」雖然來自女性與男性經驗上的差異，但是這樣的性別差異，其實是歷史的偶然，而非絕對以性別作為區分（黃怡菁，2002：11；徐明，2003：4）。關於這一部份的討論，我在之後會做更詳細的說明。而學者N. Noddings（1984）提出「關懷倫理學」一詞時，亦對於「關懷倫理」是否只是適用於女性經驗為主的倫理紛爭，再度做了詮釋。Noddings並非站在「女性本質主義」之立場，而主張「關懷」是人性共通之基礎，是人性中道德的根源。

獨特的，普遍化法則沒有辦法具體指引，而從人類本有被關懷經驗中所滋生的感同身受之關懷原則，才是各種獨特情境衝突中，最後抉擇的最大動力（簡成熙，2005：241-242）。

而記者堅負著社會公器的社會責任，且處理與報導的事件，大部分是所謂「公領域」的議題，如民生議題、公共政策等，因此必須保有公正客觀的特點；但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既可能因為受到自我個人關懷、與採訪對象的特殊關係與責任的影響，而無法保持絕對的客觀無私，也可能因為每次所面對之採訪情境不同，而在實際的實踐過程中，無法總是遵照某一形而上的原則行事。因此，本文認為，「公正客觀」既是無須戒守與盲從的絕對準則，則探究記者的專業意理如何受到實際的採訪經驗、情境與對於受訪者產生關懷情感的影響，是更能理解記者個人的研究重點。

第三、Gilligan提出之關懷倫理也有階段式之發展，分為三階段與兩個轉換期。藉由關懷倫理的轉換與三階段發展，本文得以從五位受訪記者之生命史中，細緻的觀察在其實踐過程中，關懷倫理形成之形貌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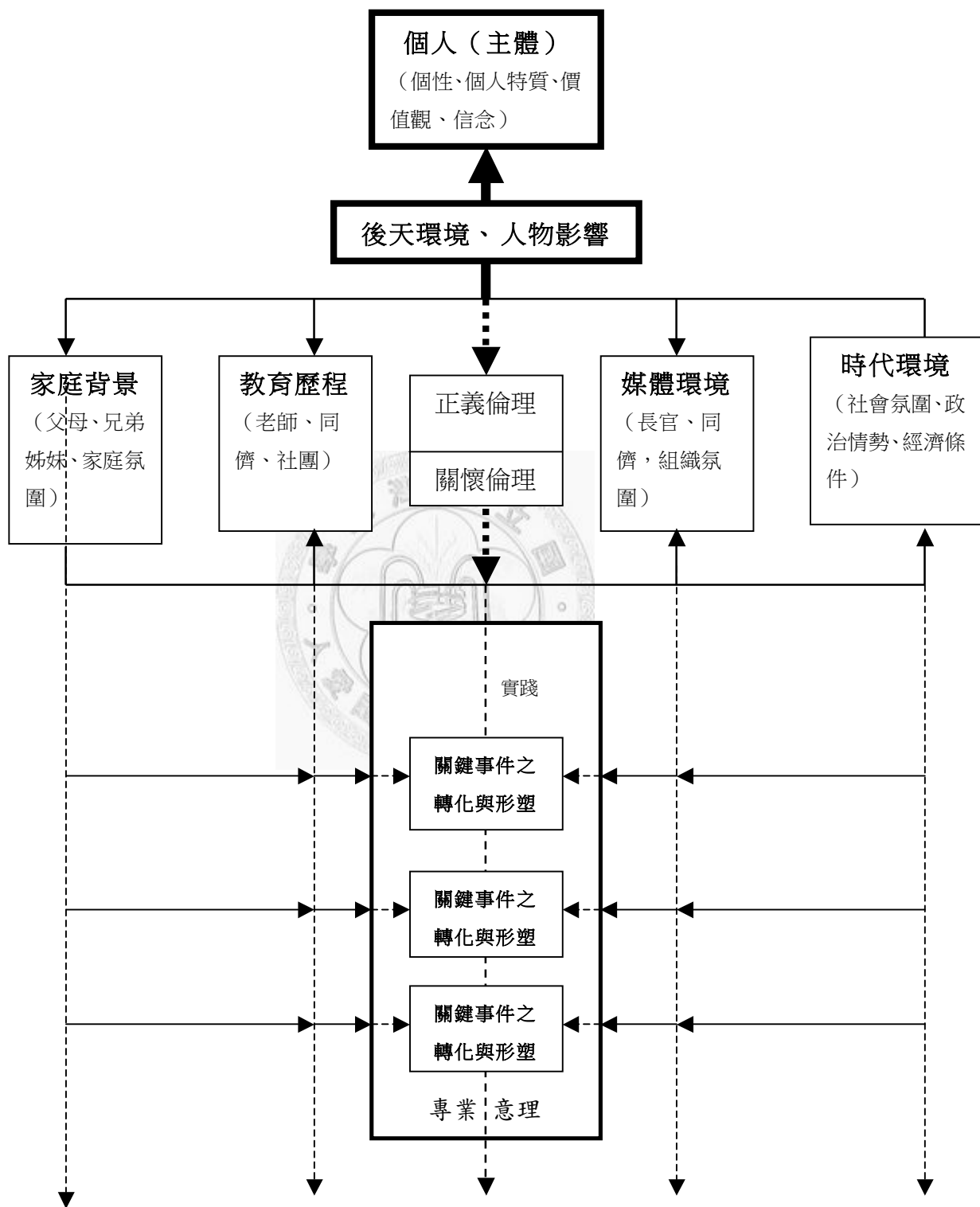
關懷倫理的第一階段是個體生存導向，即自利取向。第二階段則是自我犧牲。在進入第二階段時，會有一轉換期：即在自利的過程中進一步思考，而逐漸產生對自我及他人的依附性責任。在經過轉換期之後，自利變成對自我的責任，再推而廣之，著重在社會層面。如墮胎與否，關係著不僅是胎兒，還有配偶、可能涉及的人、社會期望、規範、價值等產生很大影響力。在面臨抉擇時，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也就成為重要考量。第三階段是「不傷害的道德」。由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間，有一轉換期，即權變過程：把「善」界定成自我犧牲與和諧關係，而這是一種手段，目的在於滿足自己與他人的需求，加深對於責任的概念，道德的責任感之提升，正是對自己、他人負責後產生的普遍性關懷（簡成熙，2005：237- 239）。

綜合上述，本文取經於Gilligan的「另一種詮釋道德的觀點」，提出「另一

種觀看記者專業意理的研究觀點」，同時，並藉由關懷倫理的發展階段來細緻的觀察記者在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關懷倫理發展，如何影響其專業意理的轉化與形塑。本文認為，《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線的五位綜合組記者，同時得面對著「公正客觀」與「個人關懷」的複雜道德情境；即記者既要面對自我關懷，以及與採訪者之間的特殊情感關係，又得回應自我所擔負的社會責任。而本文所採用的生命史研究途徑，能夠具體回應與討論影響記者專業意理的更種因素，且企圖藉由更細緻的方式，來理解記者面貌的複雜與多樣性，重新彙整出一條理解與觀看記者形貌的方式。

因此，基於前述，本文發展初步的研究架構如下：





圖一 研究架構圖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基於本文之研究問題與研究動機，本文將採用生命史的研究途徑，探討《自立晚報》主跑社運議題之記者生命與採訪經驗如何影響專業意理養成，而基於這樣的專業意理，這群記者又如何在其生命與職業生涯中展現不同的實踐方式。因此本章第一節將說明生命史研究之定義、意義與限制。第二節將說明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第一節 生命史研究途徑之定義與意義

一、生命史研究之定義與特質

生命史 (life history) 與生命歷程 (life course) 在廣義上，概念相同，都是指人的從生到死的一連串變化與選擇，但在狹義的概念上而言，生命歷程則可精確為一群人或個人的生命過程的某一段特殊歷程或是經歷，相較之下，生命史則是個體生命的經驗歷程 (William McKinley Runyan, 2002: 113)。生命史研究，與口述歷史、自傳等研究方法類似，均屬於質性研究中傳記研究法 (biographical method) 的一種 (Denzin, 1989: 7)。生命史也是一種生命的書寫，主要以訪談或對話建構生命，目的是要說明人的生命的經驗內容與意義 (王麗雲, 2000: 267 - 269)。生命史研究取徑正是關心研究對象的經驗事實資料以及對其生活世界的詮釋 (Denzin, 1989: 29; 王麗雲, 2000: 268)

而個人生命歷程乃是一連串「個人」、「行為」與「情境」互動的動態過程，換言之，雖然藉由個人的主觀來描述個體經驗，卻能夠在特定的「情境」下，去了解「個人」。但個人生命歷程範圍可分為好幾個層面來探討，如教育經

驗、職涯經驗等等，因此以生命史研究乃由研究者選定關心的主題，有意義的聚焦（Denzin, 1989：29；王麗雲，2000：268）。

生命史研究在二十世紀初就已成形，在1970年代開始受到重視，主要是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逐漸產生對「主體」（subjectivity）重視，特別是在瞭解並說明弱勢團體如女性與少數民族的生命史觀點上（王麗雲，2000：273；熊同鑫，2001：110）。因為弱勢者通常無法「發聲」，而生命史可提供他們發言的空間，記錄「小人物」的歷史，同時也突顯生命史能夠作為強調主體性、彰顯生命獨特性的研究途徑。如林立衍（1999）研究女工生命史的變化與歷程，指出生命歷程結構化概念（life-course structuration），強調的是發掘女性生命中的變化與轉折點，從這些轉折點上發生的事件去瞭解個人對家庭、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歷史轉變的回應和她們所運用的不同策略和決定。換言之，即不會把女工在生命過程中的角色和處境看作是自然產物，或是把是文化的構造和結構限制下的產物，而忽略了作為一個行動主體的女工，在進入和退出勞動市場以及面對整個台灣經濟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

而研究記者基於個人專業理念做出的各種實踐與選擇，也同樣必須從記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政經環境、媒體發展來探討，而生命歷程恰巧能夠貼切此一關注點；因此本文從記者個人的生命歷程出發，企圖補足了以往傳播或新聞史研究，缺乏理解「記者（個人）」的不足。

二、生命史研究之重要性

生命史研究途徑之所以獨特，在於其不論在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上，皆重視個人主體性，重視個人主觀性與主觀意義，強調「個人觀點」。且生命史研究能夠提供個人歷程豐富的過程資料，能夠說明事情發生的內部機制，這也同時能夠挑戰研究者通常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想像與假設；藉由傳主主觀經驗與觀點，研究者能不斷修正先前的預設與想像，而作為理論修正的基礎（王麗雲，

2000：51)。

生命史研究最重要之特點，同時也是本文採用生命史研究途徑之最重要因素，即生命史研究能夠同時了解個人生命經驗，也同時了解個人與其生存時代歷史的關係，以及當下社會脈絡帶給個人的影響；這是一般量化研究或是問卷調查研究的研究限制。歷史與時間因素，在注重個人生命經驗歷程的研究中，是極重要的變項，研究者不但探討個人歷史，也將個人歷史置入於個人所存在的廣大歷史、社會脈絡中，讓個人經驗並非真空於社會之外（王麗雲，2000：152；熊同鑫，2001：110）。

三、生命史研究之限制

生命史研究因為以個人生命的主觀經驗，作為研究素材之一，通常對於事件的蒐集與解釋，只能得到個人詮釋下的主觀見解，不免會因為個人記憶力有限，或是選擇性記憶、詮釋等等情況，而使得研究者蒐集到的資料只是「部份」或者牽涉到是否「真實」的問題，而有資料蒐集不完整的情況（王麗雲，2000：153）。因此，生命史的內省性與回溯資料的效度不高，內在效度低，因為經由個人主觀經驗所取得的資料，通常無法以「客觀」標準來評斷。然而生命史研究途徑正因為對於事件與生命採取開放性的多重詮釋態度，才能顯現各種多元觀點，彰顯個人或一群人生命的特殊文化（William Mckinley Runyan, 2002：43-76），故研究者需要對當時的社會與歷史脈絡資料掌握得當，以對照經由個人生命經驗所取得的資料是否合宜。

此外，生命史研究的外在效度也相對較低，乃因個案無法類推至其他個案中，因此具有推論性的限制。生命史在推論性、因果關係建立上具有一定的缺陷，因為生命史研究通常所需的訪談時間，或是文件蒐集與分析時間長，所以取樣數量限制大，只能獲得部分的生命經驗資料；故除了個案分析外，以生命史做為研究途徑的相關研究，通常使用「集體」生命史研究盡量補足這點缺失。

因生命史程雖然泛指一個人人生整體上的一連串變化，但同時，生命歷程可以聚焦在階段一狀態分析，可以使用在特定領域之內的經驗歷程中，例如教育生涯，職業生涯的人際關係。而一組特定的階段和狀態定義，容許將所有可能的生命歷程作周全的分類（William Mckinley Runyan, 2002：133）。因此本文採取生命歷程分類中的職業路徑（career path）概念來具體說明。職業路徑包括「先前的經歷」（antecedents），包括個人的、教育的、專業（工作）的特質與經歷，而這些會影響「隨之而來的職業轉變」（consequents），即隨之而來對於工作的選擇與影響，而這其中也受到「間接的影響變項」（mediating variables），如社會、政治、經濟、個人因素的影響等（王麗雲，2000；William Mckinley Runyan, 2002）。

過去社會科學研究長期受到量化模式的主宰，因此各類研究都會被極力要求說明預期的研究貢獻與研究價值，而生命史研究因為研究主體通常為個體生命經驗，而有無法推論至其他案件上的限制；在量化研究的思惟模式下，研究過程與結果是否科學、是否客觀、是否可重複驗證等評斷標準，也同樣被拿來審視取徑於生命史的相關研，這是過往受到極大爭議的問題（王麗雲，2000：156；William Mckinley Runyan, 2002：231-291）。但由於生命史研究的特殊之處，就是在於強調重視人的主體性以及自我覺醒，藉由個人主觀經驗產生的生命經驗，來理解個人（或一群人）如何看待、詮釋某些事件或是經驗的意義。因此研究者必須考察當時代的整體社會文化脈絡，在分析與詮釋時，反覆將個人經驗與蒐集得來的歷史、社會、文化資料驗證對照，以補足上述之方法上的限制。另外，當時《自立晚報》綜合組之組成，大約七到八人左右，而本文之受訪者涵蓋了五人，雖然五人進入綜合組之年份不同，但路線相仿、所處之媒體組織一樣，屬於集體生命史研究，因此，藉由集體之敘說，本文得以互相對照彼此說法，以及不斷修正研究者先前之假設與認知，增加研究之深度。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生命史之研究途徑，並以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方法，分析記者專業意理之形成歷程。以下便分別說明敘事研究之定義，與實際分析之過程。

敘事是一種用來組織劇情（episodes）、行動、和對行動之說法的方式，其結合事實和想像，融合時間和空間，並且賦予個人行動的理由，以及事件的因果解釋（Michere L. Crossley, 2000／朱儀羚等譯，2004：86-87）。而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泛指任何使用分析敘說資料的研究；敘事研究是使用一組故事形態來描述人類行為之質化研究（徐明，2003：40）。而敘事研究乃根源於質化研究之傳統，強調個體生命歷程，多元觀點，情境脈絡等，是一種以「經驗」為探究核心與基礎的研究方法（林家德，2004：42-43）。本文關注記者在其個人生命歷程與採訪經驗交融的過程中，其專業意理形成之脈絡與緣由，因此，在訪談之過程中，藉由受訪者的自我敘事，結合時代背景、當時所處環境之條件等，進行「後設分析」。

首先，本文將藉由半結構式的訪談，即採用初步設計的「訪談大綱」作訪談，再經由訪談後的資料文本，逐一修改、反省我原先的假設與先前理解，藉由「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的過程進行研究。而本文初步的「訪談大綱」乃是依據筆者根據每位受訪者之出生年份與重要採訪路線經歷，製作個人之生命大事紀，標誌出關鍵年份與受訪者之可能關鍵事件，整理出相關問題所製作，再依據受訪者之回答與敘述進行第二次的訪談。再者，生命史之研究雖首重個人生命經驗與自我敘述，但為使研究具研究信度，除了訪談後所得到的資料後，還須關照當時歷史脈絡與客觀的社經條件，即二手資料的蒐集，其包括報章雜誌、相關研究等。故本文的訪談大綱僅為訪談時的主軸與方向，隨時可依照受訪者受訪內容做適度的調整與彈性的變化，並藉由已取得的受訪者訪談資料，和其他相關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如新聞文本、書籍、期刊、網路資

訊等做比對，若有模糊之處，則在當場追問，或在下次訪談時補問以釐清（黃瑞琴，1991：124-125）。

而在取得大量的訪談資料後，除了將其訪談謄錄為逐字稿、反覆閱讀之外，還須作有系統的分析。即以開放登錄的方式進行，將逐字稿之內容，以開放式的編碼進行，根據逐字稿所涵蓋之主題，進行不同編碼，在加以分類，將類似之概念資料歸類集中，形成一種類屬，而後，因資料分類不同，將產生不同類屬，再將其不同類屬命名。最後，將分析後的資料，根據本文之主題，呈現於論文中（黃怡菁，2002：35-38；徐明，2003：73-79；林家德，2004：41-46）。

再者，本文之資料撰寫與分析方式，根據敘說資料之四種分類，第一種為「整體-內容」分析法，即將焦點放在個體完整生命故事的內容呈現上，類似「個案研究」。第二種則是「整體-形式」分析法，側重整個故事的情節或結構。如該故事的發展式喜劇或悲劇？是敘說現在或是過往時光？第三種是「歸類-內容」分析法，此類型類似於「內容分析」方法，其研究主題的歸類是先被定義的，再從文本中摘要出敘述加以歸類到某些類別中。第四種則是「歸類-形式」分析法，此類型之研究焦點放在敘說定義單位中的抽象文體或語言特徵（林家德，2004：41-46）。基於本文採取生命史研究途徑，因此著重受訪者敘說之經驗，換言之，屬於個案之敘述。因此，按照章節安排，初期個人生命史之撰寫方式，將先以故事性的序列作鋪陳，本文第四章的寫作方式，即屬於「整體-內容」分析方法。先呈現出受訪記者之生命經驗、採訪歷程等整體印象，使其敘說之經驗具有整體脈絡與連貫性意義，再從個別所敘述之關鍵事件（個人主顯節）中，理解本文之所關注的專業意理形成之重要轉折；故後期撰寫方式為「歸類-內容」分析方法，歸納出其專業意理形成之歷程，對其歷程轉變作清楚的的界定與呈現，即第五章結論的部份。

本文企圖結合個人經驗與政經研究，用以補足生命史研究容易流於「一人之詞」而不夠客觀之缺失。基於上述，本文考量個人經驗與記憶力有限，並

未能同時顧及與訴說出時代與其他客觀的歷史、環境因素，因此若單據個人之敘說鋪陳個人生命故事，容易失去時代與歷史深度，故在書寫時，使用第三人稱寫作方式。再者，本文考量研究倫理，以及筆者與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所產生之特殊關係與責任，因此，在訪談過程中，若受訪者在言辭上表明不願透露之事實，筆者將不呈現在本文之中。另外，受訪者即便沒有口頭明確表示不願繼續說明，但在情緒上顯露出來時，筆者為顧及受訪者個人之隱私或受訪心情，將不再追問個人之隱私。因此，在第四章記者生命故事鋪陳中，若基於研究需要而必須呈現之事件若受制於上述原因，而受訪者未能針對此一事件說明時，本文將以受訪者之文字作品或其他文本、資料補足。

第三節 研究對象範圍界定

本文以1980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期，在《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議題之記者群為研究對象。《自立晚報》當時的路線分配，因無法明確分類何者為社運線記者、何者為政治線記者，只能經由研究者初步訪談前《自立晚報》記者李瓊月與王幼玲而取得的資料得知；當時主跑社運議題之記者，大部分由《自立晚報》民生社會組的記者負責，包括林美挪、李瓊月、王幼琳、彭琳淞、邱家宜等五人。上述五人皆在1980年代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除彭琳淞為男性，且先在政治組，後來才轉至綜合組，但因取決於彭琳淞在1980年代進入報社後，採訪的多為社會運動新聞，因此將其放在研究對象之中。另外，林美挪、李瓊月、邱家宜三人分別在1980年代間不同時期進入綜合組負責醫藥環保路線，藉三人之經驗，亦可同時關照其所屬路線在1980年代間之變化。受訪名單請見【表一】。

此外，本文對於社會運動的定義，與黨外運動有清楚的分界。1970年代後新興的社會運動，被稱為「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如生態環境

運動、女權運動、環境自救運動、原住民運動等等，與台灣過去黨外運動以政治目的主要核心訴求有所不同，乃是出於「受害群體群起反抗」以及「要求生活合理化」的運動類型，如過去反核四廠興建議題、反杜邦自救運動等等（高承恕，1989：9-19；蕭新煌，1989：21-46；許傳陽，1991：3-5）。故本文在選擇受訪記者時，主要以採訪次類型運動的記者為主。

表一：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姓名	出生年	省籍	學歷	進入《自立晚報》年份	主要負責新聞路線
林美挪（女）	1960	本省籍	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1983	醫藥環保
王幼玲（女）	1956	外省籍	中興大學 社會系	1987	勞工
李瓊月（女）	1958	本省籍	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	1988	醫藥環保
彭琳淞（男）	1961	本省籍	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1989	教育（政治組） （1989-1993） 勞工社運（綜合組） （1993轉入）
邱家宜（女）	1964	外省籍	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1990	醫藥環保

訪談大綱設計

依據本文主要兩個研究問題，發展出下列訪談大綱，而針對每位記者所跑

的專業路線的不同，將有所更動，如王幼玲主跑勞工線，則按照當時勞工運動或重大勞工議題事件發展訪談問題，本文之訪談模式，採取較為開放式的訪談方法，以記者個人認為影響自身較為顯著的採訪經歷，作為其個人的「主顯節」。

本文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

第一、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的新聞專業意如何形成？

*家庭背景：

- (一) 外部生長環境。(家庭關係、求學經過、人際關係)
- (二) 個人特質。(興趣、理想、個性)

*記者的歷程：

- (一) 為何想當記者？想當什麼樣的記者？專業理念為何？如何形成？
- (二) 為何選擇進入《自立晚報》？

第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基於記者個人之專業意理，《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專業實踐？

*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經歷：

- (一)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工作氣氛、同事關係如何？
- (二) 採訪經歷。(在採訪社會運動事件的現場，認為自己是客觀的記錄者嗎？為什麼？／認為自己曾經介入社會運動的現場嗎？當時為何這麼做？／和消息來源如社運／弱勢團體間的關係如何？)
- (三) 採訪經驗的影響。(在《自立晚報》工作時，認為記者的社會角色與功能是什麼？認為報導應該發揮什麼樣的功用？跟當初進入《自立晚報》前的想像有何不同？)

補充問題：在生命轉折與實踐上，這群記者採訪社會運動事件的經驗，如何影響記者離開《自立晚報》之後生命歷程的選擇與實踐？

* 職業生涯轉變歷程

- (一) 離開《自立晚報》後去了那裡？做過什麼職業？為何做這樣的選擇？
- (二) 對於新聞工作的想法跟在《自立晚報》工作時相比，是否有差異？
- (三) 在《自立晚報》工作與採訪經驗，對於自我的意義為何？



第四章 研究詮釋---記者的生命圖像

第一節 林美挪的生命圖像

林美挪，本省籍，1960年出生於彰化縣，1983年進入《自立晚報》。在進入《自立晚報》前，林美挪對於記者並沒有太多的想像與理解，只把這份工作當成是一個自新聞系畢業的學生應該從事的行業。她在1983年進入《自立晚報》時，《自立晚報》還未建立出對於環境運動的議題熱烈關注的顯著報導走向；其影響因素，除了外在整體環境運動在1980年代中期前，還未形成一股具有集體性的抗爭風潮外；政府當局對於環保議題的重視，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才逐漸提升。林美挪的記者生涯，與1980年代整體環境運動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同時，與《自立晚報》內部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與走向亦大有關係。因此，本節之寫作重點，除了以1980年代的整體環境運動作為歷史背景，鋪陳她在採訪李長榮化工廠事件與後勁反五輕事件中，所感受到的經驗是如何影響她的專業意理形塑過程之外，前半段則著重在描寫林美挪如何在環境限制下，開拓個人報導空間與爭取採訪自主性。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林美挪在進入《自立晚報》前後，對於記者角色理解的差異，以及自我社會改革意識，如何在實際採訪過程中成形。而後半段敘寫林美挪專業意理之形貌的兩次關鍵事件，則主要取自於她在1989年出版的《台灣的綠色災難》後記中，所自述「參與」與「投入」之啟蒙採訪事件，藉由她當時的在新聞專業上的報導實踐，本文試圖建構出她所謂的「啟蒙」，如何讓她從關心「議題」延伸至「人」，並兼具「記者」與「運動者」角色的過程。並描述了她在新聞工作之餘，加入社會運動團體，參與謀略討論，甚至自組發起「綠色和平工作室」等實踐方式之因。

【林美挪的生命圖像】

「老師建議我唸新聞系，原本我想讀法律…」

林美挪，本省籍，1960年生於彰化縣。在林美挪的認知裡，她人生的走向與選擇的實踐方式，並非來自任何家學淵源或是家庭環境的影響，最主要的影響與形塑，是來自於她進入媒體職場以後，因環境、情境影響而產生的。

林美挪並非從小就對於記者工作抱懷著憧憬；她大學時期選擇新聞系就讀，其實是來自高中導師的建議。1978年參加大學聯考時，就讀彰化女中的她，在老師的建議之下，選擇了新聞傳播科系就讀。其實，她原本想唸的科系是法律系。林美挪的老師認為法律系分數太高，她未必能順利考上，因此針對林美挪的個人特質與個性判斷，建議她也許適合做傳播媒體工作。

以1975年第一屆大學聯考高中畢業生考取四年制大學的機率來說，文組學生，大約每一百人之中只有十二～十四人能順利考取。當時林美挪所就讀的班級中，就有三十五人考取大學，與她類似考上私立大學，屬於班上「倒數」志願的同學們，紛紛選擇重考，但她因家庭因素，加上想享受「自由的空氣」，一心只想趕快「飛」到台北唸大學；因此，她並沒有像其他同學選擇重考。在1987年畢業於彰化女中後，同年九月，她便進入文化大學新聞系就讀。

其實，在林美挪就讀高中時，她所認識到「出社會」之後，能夠「養活自己」的工作，不外乎就只有法官、律師、老師、記者等等的職業，其他例如哲學、中文、歷史科系等，對她來說，或者在父母的想像裡，這些都是些「前景堪憂」的大學科系。尤其，考取法律系的分數很高，大學錄取的名額又少，若是在校成績普通的一般生，想要考上法律系是很困難的。同樣地，若想求取教職，你則非考取成績門檻高、名額也少的師範系統大學才行。因此，在能夠順利就業的考量下，似乎只剩下「記者」的工作選項了。林美挪回想當時整體的

社會風氣，以及整個氛圍所建構出來，對於職業貧賤的想像，是非常明顯的：

其實我們長大了以後才會知道，即使是歷史系，妳看，現在歷史系多「夯」。可是那時候會覺得，開玩笑！讀了歷史系將來怎麼工作？那時候也是…其實跟整個台灣社會，或者說政治，我們是被宰制的，那個風氣是不開放的，所以，妳根本不知道那些有什麼用途。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因為不懂，妳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讀文組可以做的工作，就是當老師，可是當老師，就得唸師範系統；妳考不上師大，就當不了老師。那也是整個社會的…一個結構的（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1978年，林美挪進入文化大學新聞系的這一年，正逢國民黨威權政府失去外援支持。中美斷交的消息傳出後，國民黨政府極力呼籲全體國民要「共體時艱」，激發民眾「愛國情操」；因而，無論是在輿論方面，或在校園之中，學生們紛紛發表「愛國」與團結論述。然而這些社會動盪，對於身處在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學生與林美挪而言，似乎有著一股無形的斷裂。在林美挪的認知裡，她認為文化大學位處偏遠山區，校園氣氛並沒有像其他國立大學有這樣「同仇敵愾」的張力；加上文化大學是私立大學的「後段班」，一般人對文化大學學生的認知，通常都是「愛玩」的學生，校方似乎也不在意學生在學習方面的態度。¹⁰

在文化大學求學期間，林美挪雖然沒花太多心思在課業上，但對記者工作的興趣，以及對於記者的角色，已經藉由校外的實習經驗，開始有了初步的雛

¹⁰ 參考林美挪訪談。「文化的校園，不是那樣的…妳在陽明山，沒事啊，都沒事啊。文化它也沒有要妳努力讀書啊，我也沒有努力讀書啊。…可是也許我的朋友我的同學看我，就是看自己的書。」（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形。在就讀新聞系期間，林美挪擔任大學報《文化一週》的實習記者，當時，她就開始為了尋找有趣的主題，而展開她在校園之外的學習。

學生時期的理想記者形像---「大媒體中的大記者」

1979年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當時，政府只允許少數幾家媒體進如採訪。當時，林美挪還是個青澀的大二學生，她為了《文化一週》的新聞實習工作，採訪當時進入庭內旁聽的黃年。這一次的採訪經驗，也讓她逐漸開始對於記者角色有了這樣的想像：「我是覺得我是蠻景仰他的，覺得將來要當記者一定要像他這樣子，可以到這麼大的場面、第一線的聆聽。(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即便在日後，她認為她與前輩黃年對情勢的判斷與價值觀逐漸不同，但是如黃年當初能夠採訪一個這麼重大政治事件的記者位置，她確實是嚮往的；當時的她，對於「大媒體中的大記者」有著美好的憧憬，這也促發林美挪在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初期，因為實際環境上的「落差」，而不斷產生的挫折感。

陰錯陽差進入《自立晚報》

1980年，林美挪進入《聯合報》實習。當時《聯合報》給記者的待遇與福利極好，連當時只是以實習身分進入的她都感受得到：

…我在《聯合報》實習的時候還有零用錢拿欸，我只是個實習生，我可以什麼都不做，我忘記領多少錢了…我還有糧票，他們的職工福利、設施…妳可以帶糧票去吃飯。他們有職工餐廳啊，然後糧票他有給妳一個額度，那一個月用不完，妳還可以去換牛奶，換鮮

奶回去…就等於是公教福利中心欸，妳看，《聯合報》給那麼好的待遇欸…（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實際上，民營的《聯合報》當時提供給員工的良好待遇，可從當時的發行量與規模就看出端倪。從1970年代開始，《聯合報》在民營報紙中，無論是在發行量或是廣告業務上，都已位居民營報業之首。¹¹除了在政府在報紙張數開放造成廣告收益外，有黨國資源在背後運作，也促使《聯合報》在1970到1980年代間，一躍而升成為民營報業的龍頭。而報社內部對於員工的優厚福利與待遇，更是報社為了爭取優秀人才以增加與他報競爭的重要條件。¹²相形之下，《自立晚報》雖然已經在1970年代成為三家晚報銷售量之首，但是相對於整個報業市場而言，廣告大餅並不會區隔早、晚報，因此，當1980年代開始，《中國時報》開始與《聯合報》競爭報業龍頭位置時，兩報所使用的「分版」、「縮版」、「換報」等搶奪廣告資源的招數，讓其他民營報紙在經營收入上受到極大影響（陳國祥、祝萍，1987：161-164）。因此，林美挪在大學實習期間感受到大報社的優厚資源，讓她逐漸構築出對於記者工作環境的期待與想像。能夠進入福利好、薪水高的《聯合報》工作，自然成了林美挪畢業後的首要考量。

然而，當時兩大報為了競爭，挑選新進員工，除了學歷的考量外，報社內部本來就具有所謂的「人脈系統」；如有熟識的人或是同校學長姐在所應徵的報社中，自然會受到前輩的「關照」，求職自然也較為順利。林美挪在1982年畢業於文化大學時，因為在大三《聯合報》實習期間認識了顏文門，因而畢業後求職一事，就寄望在他身上。¹³

¹¹ 從1959年到1970年間，《聯合報》輝煌發展時期的每日發行量來看，《聯合報》發行量在當時已達四十萬份，在民營報紙發行量排名第一；員工由初創時的一百五十人擴充到一千多人，廣告量也從一百四十五萬元暴增至八千多萬元（陳國祥、祝萍，1987：134）。

¹² 《聯合報》優渥的薪資在1970到1980年間，堪稱民營報業之冠。而福利制度更是周全，除了有員工休閒設施外，舉凡員工的購屋、托兒所、醫療費用、教育進修獎助金等都有一定的補助（廖郁毓，2002：41-42）。

¹³ 參考林美挪訪談稿。「那我又不是師大或政大畢業，你也知道，政大或師大，在中時聯合

當時，顏文門已經轉往《自立晚報》擔任總編輯，基於「新聞圈我只認識他一個」的理由，以及「那我既然讀新聞系，我理所當然要當記者」這樣的想法，讓原先對《自立晚報》毫無概念的林美挪，就這麼誤打誤撞的進入了《自立晚報》。

不受當局重視的小媒體中的小記者…

一開始，林美挪先在《自立晚報》實習了一個多月，在1983年，才正式成為醫藥環保線的記者，負責衛生署新聞。而《自立晚報》與《聯合報》在薪水與福利上的落差，讓林美挪初入報社時大感失望。但是，讓林美挪感到更大衝擊的，是報社根本不重視政治新聞以外的其他新聞，讓林美挪倍感挫折。

那我沒什麼選擇，因為《自立晚報》本來就是政治掛帥。所以我最早跑醫藥環保，那是根本…其實報社沒有這類的新聞也無妨。（管：那個時候是這樣？）對啊，它也無所謂「線」，只是其他線都有人，其實它也可以說：「我不要你！」是這樣子的，所以，無所謂「線」。那些新聞在當時來看，它們可登也可不登的，不在它們foucs的範圍…（管嫻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有固定的系統。可是我是文化的…那我剛好是認識了那時候的總編輯，從聯合報去的顏文門；那我大三的時候在聯合報實習，當時我是很希望進兩大報的。對啊，因為我也不知道有《自立晚報》。我實習是跟他，可是我畢業後的第二年，他已經到《自立晚報》當總編輯，那我想，我新聞圈指認是他一個…，當然還有聯合報那些記者，像高惠宇啦，陳春木啦…我大三的時候…其實是很年輕很年輕的年輕人，那他們是大人，成年人這樣。那主管我就只認識顏文門，所以他去哪裡，我就去ask他說，『我可不可以來當記者？』」（管嫻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林美挪在1980年代前期進入《自立晚報》跑衛生署（包含當時隸屬其下的環保局）時，當時環境災害雖屢有頻傳，但卻仍未形成一股較具有集體性環保意識或者是區域性居民自救形態的環境運動風潮。根據過去研究指出，台灣環境自救運動激進化的時期，大約是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才逐漸開始。這與林美挪所說的「那些新聞在當時來看，它們可登也可不登的，不在它們foucs的範圍」以及《自立晚報》開始重視環境與其他社會運動議題是「那個至少是我去的第三年，那也可能是從我們開始的」的情況，可以大致看出在時間點上的重疊性。再加上，在1987年底成立的環保署，在林美挪剛進入報社工作時，不過是附屬在衛生署裡面小小的環保局，因此，不論以報社規劃的路線，或是當時政府當局對於環保事務的重視程度來看，林美挪當初會認為自己所跑的新聞不受到報社重視，跟整體環境因素有著極大關連。

林美挪在正式進入《自立晚報》後，覺得自己不被報社看重的因素，還來自於她初期跑衛生署時，發現衛生署根本沒有訂自己所屬的報紙。這讓她遭到非常大的打擊，甚至曾因此萌生辭職的想法。

…也因為這個衛生署沒有訂我們《自立晚報》，我就很傷心。甚至曾經想不幹了，因為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你這家媒體的存在！（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官署部門對於記者或所屬報社的重視程度，除了是否有訂記者所屬的報紙外，對於是否看重這位記者的態度，從林美挪當時所發生的「難忘」經驗中，亦可略知一二。林美挪回憶當時還曾經發生環保局主管將林美挪辛苦追到的獨家消息，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就任意的「傳遞」給別家報社記者，讓林美挪非常生氣。當時，年輕氣盛的她，甚至衝進這位主管的辦公室，拿起高跟鞋就要砸他的玻璃辦公桌：

我有一次，好像環保局，好像我有一個獨家，可是那個主管，又把那件事情告訴別人了。然後，我氣得，氣得一個人到他辦公室，把我的高跟鞋脫起來要砸他的桌子，他桌子有一塊玻璃（大笑），他也嚇壞了，然後我只是…我記得我就跟他講說，其實我的意思就是，因為是我辛苦打探來的消息，不應該未經我同意就share給別人，就這麼簡單。……之後就整個署裡頭就轟動了，然後公關室就馬上去訂《自立晚報》。然後在發新聞通知的時候，就不能夠忽略晚報，不只我，包括另外兩家。所以，就是這兩家的同儕，其實都是因為這樣…。如果到現在的話，我一定跟他們講說，朋友們，那妳們要回饋我什麼favor？（笑），我就會說：「那你是不是把你的獨家告訴我一下？」不過那時候沒想這麼多，就曾經有類似這樣的事情。（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在官方與報社不重視的情況下，記者似乎只能把握機會，自己開拓空間。林美挪就從充實自我專業知識開始。一開始就得跑衛生與環境在專業知識門檻相對較高的新聞路線，對於新聞專科畢業的林美挪而言，自然得花很多的時間「做功課」。當時林美挪為了要補足專業知識，她一個人跑去光華商場，把早期台灣醫界聯合出版的所有《環境與健康雜誌》一整套搬回家研讀。據林美挪自己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土法煉鋼」。

當然，專業工夫備足了，還得等待時機來臨。

1986年，台灣各地方因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災害，逐漸引起一波具有自救、環境意識的環境自救運動風潮。起初引領這波風潮的重要案件之一，就是美國杜邦公司來台投資案。當時，台灣各界對於政府單位與環境政策是否有足

夠的條件讓杜邦設廠，展開了熱烈的辯論，而輿論也促發了行政院組成美國訪問團前往美國考察杜邦公司的建廠條件。當時林美挪參與美國訪查團回台後，寫了一系列三萬多字、針對杜邦案的分析報導，引發了地方自救團體的注意，而與之聯繫，使她開始與地方居民接觸，逐漸將報導與關懷觸角深入至社區與民間運動團體之中。

小記者的美國杜邦行

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經濟部為了促發台灣工業發展，大刀闊斧的規劃了彰濱工業區，包括鹿港、福興、線西、伸港四鄉鎮的海埔新生地為工業建設腹地。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後，這塊原本前景看好的工業區計畫因而暫緩，原本規劃的工程款與利息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在政府情急之下重新規劃該地為農藥區遭受當地居民強烈反彈之後，1985年8月間，來自美國杜邦公司一億六千萬美元的「外資」預計進入台灣，在彰濱工業區建設二氧化鈦工廠，反而成了替政府當局解套的「救火隊」（楊憲宏，1986；林美挪：1989：48-50）。當時，在政府的強勢主導下，引發贊成與反對興建的爭執辯論。部份新聞記者在深入探討之後，發出警語檢討政府作為，質疑政府亟欲通過杜邦設廠案的理由絕不單純；林美挪也在採訪過程中發現諸多有待釐清的設廠條件。行政院為了澄清外界疑慮，在1986年六月份，組成考察團赴美，而林美挪也受邀進入該考察團之中。然而，在即將出發前的前置作業過程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報社說：「這個案子已經決定了！」

當時，雖然是受行政院之邀，而有旅費補助，但仍不足基本開銷，林美

挪便寫了簽呈希望社方能夠補助她一些「出差經費」。結果，林美挪沒想到主管將她找去後，對她說：「這個案子已經決定了！妳再去，這個案子也已經決定了，這個案子已經沒有新聞價值了！」當時，在林美挪的理解中，主管認為她純粹抱著「玩心」才想去美國，加上主管單方面的判斷政府興建杜邦案乃「大勢已定」，已不具新聞價值，再去無益；加上當時的《自立晚報》在財務方面確實不如其他報社充裕，因此，反對她參加考察團赴美採訪。

確實，林美挪回想當初想去美國採訪的理由，其實多少帶有一點想「增廣見聞」的心態，對於杜邦的議題，她個人在當下也不認為有任何轉圜餘地；但是她仍極力要求社方給予補助讓她去美國這個西方大國探探風。

……那我就興致勃勃，因為那時候一個單身的女生要去美國，取得美國簽證也不是那麼容易，其實是因為這個。…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杜邦是什麼東西，那時候還沒有網路，妳也不知道。那妳只是覺得說，恩，假設能藉此跟行政院訪問團去美國玩一下也不錯！很高興，其實也是有一部份這個成份啦（笑）。…可是因為《自立晚報》就是很窮嘛，所以它根本就是…其實那時候，就是如果是誰邀請妳，就是哪個單位出錢。他也沒想到應該出一點補助給他的記者啊，或者才不會影響…或者妳的記者這樣子跟人家出去，是公關性質的出去，還是為了一個採訪的事情出去，會混淆不清哪。那時候行政院當然已經有一些補貼了，只是還是不夠。那我就寫簽呈ask說，報社可不可以給我一點補助（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當時）我真的也不認為這個案子還有什麼不同的發展。只是我覺得，我跟著一個中華民國政府的參訪團，我去增廣見聞啊

，因為我又沒有留學，所以我等於是一個…這還是一種土法煉鋼，這是一個機會給我增廣見聞，去開開眼界，能夠去美國很棒啊！（管嫻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在美國行後，林美挪從環境政策的觀點來分析杜邦設廠的條件，她甚至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說明當時杜邦設廠的情形：

……我就常常舉一個例子，說，人家就要送我們一件貂皮大衣，可是我們家就沒有那個特殊保存的房間，它要溫度、溼度什麼的條件，那件貂皮大衣才會永遠如新啊。那你可能一年都穿不了一次，我也沒有那個社交生活要去穿貂皮大衣出去秀啊，可是人家就一直要送我們。這就是不搭嘎，台灣的鹿港那個彰濱工業區，就沒有這個條件啊。我們沒有很好的、高規格的、環保的規定要求、水平，沒有對污染限制的一些法令上的、指標式的一些要求，你是要塞給我這個廠，我會覺得，類似是這樣子的…，那就不搭嘎了嘛。（管嫻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然而，當她的美國行結束回台，正值地方的反爭聲浪越演越烈之際。當林美挪三萬多字的深入政策分析在1986年7月2日至16日連續刊載在《自立晚報》之後，開始有鹿港當地居民主動和她聯繫；她才真正開始理解當地實際的情況，從在地人的觀點來理解整個杜邦設廠案件帶給當地鹿港居民的恐懼與衝擊有多大。

關懷倫理的產生---從關心「議題」到關心「人」

其實在當時，鹿港當地居民無法在居住地附近買到《自立晚報》，他們得前往彰化火車站買《自立晚報》後，回來複印放大貼在廟宇前的布告欄，才能讓其他居民得知原來有媒體記者「替他們說話」。林美挪也知道自家報紙鋪貨的限制性，所以一開始寫杜邦案時，她承認「我也不是為居民他們寫的欸，因為他們其實看不到！」但在接續有鹿港人與她聯繫之後，才開始了解當地實情，甚至開始「膨脹」傳達出居民的負面反應：

……我其實最早寫的案子是杜邦案，當然，我是先寫政策，我政策是去了美國回來以後，才去知道居民這一塊。那時候他們才嘗試來跟我聯繫，因為那是地方新聞，那我們有中部的記者，所以輪不到我去touch他們，這個一個新聞工作非常狹隘的地方。也是由我去突破。所以，即使是像杜邦這樣，我是站在環保這一塊，來寫這個政策，可是那個鹿港的居民離我太遠了！我也接觸不到他們啊，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那後來，鹿港的聲音也出來，我們就更抨擊他了。那你去人家那裡「下雞蛋沒有，放雞屎倒是有（台語）」！所以，我就覺得是政策面的問題。當然我是去承認，居民的一些反應，其實是被我們膨脹的，我覺得也不至誇張，但是有膨脹的效果。（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一開始，林美挪基於探討政策與環境的觀點出發來報導杜邦「議題」，但隨著逐漸與鹿港居民接觸之後，她開始將這份關心衍生至「人」身上：

……當時，我覺得還是因為議題開始，那當然，人的聲音出來以後……就是，我不是一個鄉下小孩，所以我看起來就是會覺得反差就更大。我記得是有膨脹，當然，同情就更多，我會覺得是這樣。

…這絕對是同情多於一切了。因為我認定他們是絕對的弱勢嘛。(

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小公司的大螺絲釘

從這次的採訪經驗之後，林美挪採訪地區性的公害議題，每每都希望爭取到達現場採訪的機會，而報社方面，似乎也開始「放心」地讓林美挪前往各個公害發生的地區，同時希望她能帶回深度的分析報導，以充實《自立晚報》的新聞內容。《自立晚報》原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有較偏重弱勢、社運新聞的傾向；但即便如此，報社願意開放更多版面給記者，讓自己擁有更多的自主與發揮的空間，也需要由記者本身自己開創。林美挪回憶在1986年四月間，前往台灣西海岸採訪因工廠排放廢水造養殖漁業重創的「綠牡蠣事件」時，報社還沒有這種讓北部記者下鄉採訪的「習慣」，因此常常會發生踩線的問題：

……像我們更早去西海岸，去看養殖漁業，因為我們各地都有記者，所以你要去專題的時候，報社的總編輯，還得去跟各個地方的記者說，現在有誰啊誰的要去做這個專題。要不然你就等於去採人家的線，以前都是這樣。(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尤其，讓北部記者下鄉採訪地區公害事件的「習慣」，在林美挪升任綜合組組長之後，她更是在總編輯的支持下，堅持要採訪相關路線的記者抵達地方採訪，親身經歷事發現場。據林美挪的說法，這也是在機緣巧合、陰錯陽差之下發生的：

……開的頭可能是我啦，可是我是因為陰錯陽差的。…因為很多事

情不是發生在台北市，那妳在local，那裡有記者啊。那以前是不鼓勵，一方面妳要出差費，那後來，我當了主管以後，我也要謝謝我的總編輯都很信任我……因為地方記者什麼都要管嘛，他不一定照顧得到這一塊啊。那事實上我們因為這樣的跨區域或是跨界的報導，引起的迴響很好，報紙就變得有可讀性嘛。…就是這樣跑新聞才好玩啊，一方面是可讀性提高啊，那另一方面就是內容很豐富。…其實那時候兩大報做這樣子的橫向跟縱向的採訪也不多的，可是人家地方記者相對就很強嘛，那我們沒有…，搞不好中部幾縣市就他一個啊，那所以，我們做得到的地方就可以這樣做啊，而且是可讀性提高很多啊。那當然，總編輯是支持的嘛。那我是從西海岸那一次的經驗以後就發現，這樣跑新聞才好玩啊，就說故事嘛。妳每次都跑官署，那有什麼啊？而且好久才有一次政策啊（笑）。（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也許就是在林美挪所謂的「陰錯陽差」之下，讓她逐漸感受到報社內部對於這類新聞的重視有所轉向，而她自己當然也因為這樣抵達現場而寫出的深度新聞，獲得了一定的好評。在她1991年離開《自立晚報》前的十年之間，其實她有很多機會可以跳槽到兩大報之中，但是她擔心去了其他環境後，就得處處受限，無法讓她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因而，她選擇在「小公司當大螺絲釘」，反而能讓她保有相對較多的記者自主性與成就感。¹⁴

¹⁴ 參考林美挪訪談。「我是覺得，我自己會有成就感。在一個大公司當小螺絲釘，或是在小公司當大螺絲釘，應該是說，我是在小公司很快的就當了大螺絲釘…。我在1991年底，優退的時候，將近十年的時間，我是有很多機會可以去兩大報。那…可能是，我那時候是狂熱份子，我對那當下的發展的事情，我是很狂熱的，所以我就覺得，我去了搞不好就變成小螺絲釘了，那就不能了…就，好吧。…錢，比他們當然不足，可是，大概中等吧，在那個社會，其實…好像還不錯，就是就我的生活，我都覺得好像算是應付得宜…然後，我年輕的時候其實對於金錢的價值就比較淡，我不曉得別人是怎麼樣…我想是有不一樣…」（管嫫媛，林美挪

就時序邁入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台灣整體環境運動而言，確實在反杜邦運動之下，建立了一股環境自救運動風潮；而政府也在1986年的杜邦事件之後，於1987年將原本歷屬於衛生署的環保局，提升至單獨的環保署層級；這不僅顯示了政府當局開始重視環保事務外，對於媒體而言，環境議題的重要性，也逐漸提升。例如，《中時晚報》在1988年二、三月間創立了「社會運動採訪寫組」；各媒體對於社會運動的重視提高，可見一斑。

林美挪所說的成就感，自然與整體時代脈絡，以及報社對於環境議題態度的轉向有關；然而，她在這樣的情勢當中，隨著關心議題與人的採訪過程裡，逐漸從「記者只是一份工作」的想法中，轉變成對於運動的「狂熱份子」。

「我那時候是個狂熱份子」

在林美挪於1989年2月出版的《台灣的綠色災難》一書的後記中，她這麼寫道：

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以五天的時間露宿水源里九甲埔路採訪李長榮事件，這第一次圍堵的經驗成為日後我不畏懼參與的啟蒙。同年的秋天，佇足立法院的大門口採訪後勁請願活動，這一次流血的經驗成為日後我甘於投入的啟蒙（林美挪，1989：269）。

林美挪所指的「參與」與「投入」，其實就是在新聞採訪工作結束後，進入運動團體之中擔任「義工」；參與策略討論，寫聲明稿，並在下班後一同綁上布條在街頭抗爭，在1987年底與環保人士共組「綠色和平工作室」投入環保運動的行列。甚至，她當年的「狂熱」程度，讓她甘願冒險提供「人頭」讓


訪談，2008年7月17日)。

鄭南榕申請雜誌執照；也讓她在1989年底，甘願留職停薪，獨自背著行囊前往台中，替林俊義競選台中市立法委員擔任助選員。

到底是何種「參與」與「投入」的啟蒙，讓她成為自己口中所說的「狂熱份子」呢？也許可以叢林美挪在杜邦案之後採訪的重大環境議題尋其脈絡。

「參與」與「投入」之啟蒙

林美挪在1987年七月間，在《人間》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於水源里居民圍堵李長榮工廠的深度報導，在報導的開頭，她寫了這樣一段如詩如歌的文字：



曾經，這裡是新竹的米倉
芳香甜美的水質
給養了大半市民的生活
而今，恣意排放的
工業廢水毒染了清澈的水源
為了生存的延續
他們在廠房邊
打起帳篷：輪流戍守
「除非停工遷廠，否則絕不撤離」
如今圍堵的行達已逾百日
而堅持與污染抗爭到底
水源里民的
精神卻依舊昂揚……（林美挪，1989：144）

這一系列的深度報導，不僅僅回溯了水源里居民圍堵的理由，以及他們受

到污染而苦不堪言的受害事實，更多了描寫「人」的部份；人的處境、人的面貌、人們的生活與對話，以及人的真實情感與感受。而在報導中，她對於這些「採訪對象」的描寫，不僅只是「水源里圍廠居民」這樣籠統而模糊不清的稱謂，而是以「黑仔」、「一仔」、「火旺伯」等這些近似朋友間的暱稱，具體刻劃了每一個居民的面貌。而在報導的字裡行間，林美挪細緻的描繪了每一位水源里居民在圍廠百日後的生活狀態，這些包括個人的病痛、感受，以及藉由這些情況而呈現出來的水源里居民們抵抗的決心。

她在1987年六月間刊載在《自立晚報》的報導文末，寫著：

記憶中的感動一直深刻地埋在返回台北之後的工作心緒之中，尤其當在日前消基會所舉辦的「環境保護與自立救濟」座談會中，知名的傳播學者以幾乎討伐的口吻描述「自立救濟就是造反有理」的變態行為時，令人心中有一陣一陣酸楚。

也許是一名「既年幼又無知」的訪者，但我要說：離開冷氣房，丟下教科書，比較專心地去傾聽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希望得到什麼？（林美挪，1989：144）

就如她在文中所寫的，她在這次露宿路邊的採訪寫作方式，就是從「傾聽他們在想些什麼？」的角度出發，所謂關心「人」的報導。

1987年10月20日，後勁居民圍堵立法院請願，卻意外的造成嚴重的警民衝突，而引發了一場流血事件。林美挪當時正佇足於發生衝突的立院門口採訪。而這次的流血採訪經驗，成了她「甘於投入的啟蒙」。

林美挪在後勁事件的系列報導中，除了譴責當局將後勁人當作「暴徒」、「不肖民眾」，而使用警力粗暴的執法態度外，更細緻的描寫了衝突事發之後，幾

位遭經方壓扣的後勁居民不畏打擊，誓死抗議的決心。

雙重身分：「記者」與「運動者」

後勁流血衝突發生沒多久之後，在1987年底，林美挪與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等人，共同發起了「綠色和平工作室」。她除了在報導上偏重弱勢與社運團體之外，更致力於環保運動之中。從過去當社運團體的「義工」，直至組成環保團體等實踐作為來看，她所謂的不畏懼「參與」與「投入」，實際上就是在「記者」身分外，同時又兼具了「運動者」的角色。

這兩種角色的重疊，似乎在她逐而轉變成「狂熱份子」的當下，是義無反顧的，是情境使然的。當然，其中也包含了林美挪對於各種因素的考量與判斷，以及為了這些「狂熱」得付出的代價。

事實上，在1987年底發起「綠色和平工作室」的原因，除了對於環保運動抱持著高度熱情之外，同年「環保聯盟」成立時，林美挪與其他環保人士被排除在外，也是她與其他夥伴另組環保團體的主要因素：

……因為那時候就有另外一些人去組了環保聯盟，那我就心裡想：我們站在這麼第一線，我們比他們都更早擔任，怎麼沒有找我們？（管：所以跟張國龍他是不和的嘛？）不是，可是我覺得得其實環保聯盟也是有政治立去萃取的嘛，就是新潮流啊，那我覺得這也沒什麼ok或不ok，可是那時候就會覺得，「哇，你們就去組了一個環保聯盟，啊怎麼沒有找我？」我不曉得別人啦，我不曉得林俊義怎樣，我不曉得蔡仁堅怎麼樣，我只講我自己…我也是頂尖的一個，即使我不是專職的環保人士，我是當記者的，可是…立法委員都來找我諮詢啊，那你們要組這個環保團體怎麼沒有找我一起？那當然

，就其他沒有被找的人的，就我們也組了一個團體。可是，你看，就長期而言，存在而言，環保聯盟是成功的，然後綠色和平是夭折了。（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然而，以一個《自立晚報》記者的身分做了這份「兼職」工作，報社又從來都不會「講話」嗎？

以王幼玲的經驗來說，她在採訪遊行時被人「舉發」她在遊行時綁布條，而總編輯因而找她去「談話」。但反觀林美挪，即使在採訪時不將布條綁在頭上，但是在新聞工作之餘，進入社運團體討論策略、寫聲明稿，又另外組成環保團體，更把自己的「畢業證書」借給鄭南榕申請雜誌執照，成為《自由時代》雜誌發行人；¹⁵這一切的作為其實都牽涉到林美挪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的想像與定義、她個人對於整體情勢的判斷。

在林美挪的認知中，《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對她是「又愛又恨」的。就身分而言，她雖然兼具「記者」與「運動者」角色，但正因她身處在社運團體之中參與決策，因此對於該事件與議題通常都能較其他記者更快取得「內幕消息」；因此在新聞迅速與正確度上，通常能夠領先他報記者。另外，她認為自己在工作質量上的表現，在報社中可說是「一人抵三人」，無可挑剔的；報社主管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報社對她的「放任」理由，林美挪另有一番詮釋；她認為《自立晚報》給予記者的薪資與福利，是不能與當時的兩大報相比的；也因為如此，《自立晚報》對於記者的限制相對也就少於福利與薪資接高的兩大報。相反的，這也是林美挪留在《自立晚報》工作的因素之一：她擔心去了兩大報之後，兩大報的環境無法讓她如此「隨心所欲」。

¹⁵ 當時，鄭南榕辦的《自由時代》不斷遭政府查禁，依此從鄭南榕辦雜誌開始，他前後一共申請了十八張雜誌執照。而以林美挪申請雜誌執照之名稱為《寶島時代》，同時，也是最後一張在他自焚前使用的雜誌執照。

……我想他是默許。因為無從挑剔，我在工作上又不打折扣，所以……我想他不是支持，他是默許。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辦……也不能把我fire，好像也沒有。那我是認為，我的工作質量是絕對超過別人的，這點我有自信。……我就說我在小公司當大螺絲釘啊。我去《聯合報》的話，《聯合報》老闆絕對不容許我這樣的（笑），晚上去當義工，早上又變記者……即使我對新聞這一塊還是沒有耽誤，還是沒有做錯，可是如果換成我是一個老闆，會覺得，欸，妳體力有限欸，妳下班不去休息，妳又去搞東搞西……就像妳去兼差一樣啊，隔天早上妳怎麼有力氣工作？我也會care這個事，不管你做什麼，光這個表現來講，我也會care的。如果今天來看，我是個老闆，我也會這樣。所以……應該是說，因為《自立晚報》它錢給得很少，所以它不太計較，它只要妳把工作作好，其他它不太敢跟妳講什麼。我猜是這樣。所以妳看，我又去當了《自由時代》的發行人。（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其實從1989年底，她為了要替林俊義助選而離開工作崗位，而《自立晚報》竟願意讓她「留職停薪」這一點，也多少符合了上述林美挪個人的詮釋。當然，她的「參與」與「投入」的狂熱程度，也讓她付出了代價。助選工作結束後，她再度回到報社中，但是報社內部組成已經有些變動，因為各線皆有記者，主管位置又因為她的離開而換了人；她返回報社後，只能擔任編輯審稿業務。但一心想重回新聞現場的她，甚至一度要求總編輯讓她跑影劇新聞：

我那時候，1989年，我有去幫林俊義助選，回來的時候，因為……半年以後，當然有一些改變，所以我就幫採訪主任審稿，那我就跟他講說：「你要不要派我去跑影劇？你找我去跑影劇我都願意！」

（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狂熱」，讓她付出的代價，是讓林美挪逐漸與她原本鍾愛的第一線新聞事業漸行漸遠。她更沒想到，在1993年報社工會抗中過程中的一個決定，讓她自此離開新聞界。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就從此回不了新聞界…」

1993年自立報系因財務危機經營困難，準備由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陳政忠接手，在此之前，報社記者們擔心易主之後，新聞自主性將大為縮減，因而展開了激烈抗爭。當時，林美挪也成為工會的一員，並擔任勞方談判的代表。在1991年底，工會替勞方縮減了報社裁員人數之後，開放一批「優退」名單。林美挪當時極力要求主管將她「放入」174位「優退」名單之中。一開始，主管拒絕了這項要求，但林美挪仍舊對主管說：「好吧，如果沒有，我還是得走，可是我會為了我的退休金哭三個月，然後就繼續努力吧…」其實，林美挪當時判斷若許她留在《自立晚報》，不久後就可以升任報社的副總編輯職位；但她認為，她有這麼多位的同事都要離開，而她作為工會的一份子，在「道義」上，她也留不得。

……你想想看，一百七十幾個人要離開，那最主要談判的是我，所以你說我還能繼續留下來升官嘛？我是有自信在工作上可以再往上，我搞不好馬上就可以升副總編輯，不只是老闆要攏絡我，而是我覺得我工作質量來講可以…，恩，好像說不太過去，對我的同仁而言…（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當然，林美娜當時會做這樣的判斷，除了和同事之間的「革命情感」之外，她認為她自己是有足夠的「資本」讓她往後在媒體圈中繼續求存的；只是她萬萬沒有料想到，當初的這個決定，讓她從此離開了第一線的新聞工作：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其實人沒有預想要做那麼多、發生那麼多事，是情勢已經到那個階段了，那我覺得，一方面我年輕，二方面我沒有家累。因為那時候我都已經三十多一點了，我沒有家累，一直是單身。就是變成這一路走來也是個重要的因素，我現在想起來。如果我結了婚，我要關照到我先生的意見啊，我的小孩啊。…就是沒有家累，我年輕，那個氛圍到了一個臨界點，那我覺得我願意賭一下！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就從此回不了新聞界欸…我覺得像我這麼努力工作的…（管嫻媛，林美娜訪談，2008年7月17日）

離開《自立晚報》後的林美娜，先後在陳菊與施明德的邀請之下，進入台灣人權促進會擔任執行長；之後進入綠色和平電台。甚至在1998到2002年之間，以民進黨黨員的身分參選兩次台北市議員選舉，接遭失敗。一直到如今，因為各種環境條件使然，使她轉而成為替媒體拉廣告的「廣告代理」，而媒體環境的變遷與變化，也使她無法重新回到新聞媒體工作的崗位上。一路走來，當年的「狂熱」與情勢，促使她走上一條雖不令她後悔，卻不免有些感傷與「滄桑」的道路：

……嗯…我覺得不是後悔，不會後悔。可是…有點滄桑…我覺得其實那時候是有一些狂熱，可是也有一些不懂事，不懂事不代表不好，可是相對就沒那麼勢利，沒那麼現實。那妳有一點點就會覺得很快樂，快樂很容易，成就感很容易。所以我覺得是因為那樣…那現在

想起來當然是覺得有點滄桑。妳想想看，人生整個路都不同欸！如果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就跳槽了，到兩大報，就… 不一樣，就是這一路下來的三十年的過程，都會不一樣…（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林美挪，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的十年之間，她從一名原本認為記者只是一份工作的新聞系畢業生，到開始關心「議題」與「人」的記者，轉而變為一名實際投身進入運動中的「運動者」，除了因情勢與就個人條件的考量，而讓她甘願投入外，當年她莫名的「狂熱」心緒，也是促使她這樣轉變的主因。她回想當年的風風雨雨，有著這樣的感嘆與滿足：

……就是曾經在這個過程裡面，參與過、或是實際影響過台灣的社會的一些議題。這算很好的，因為沒有多少的記者有我們這樣的機會。很多人那時候也是…，很多的人那時候，很優的就去留學啊，那我們沒有去留學的，就讀台灣這個社會大學，然後你也在發生一些事，在面對一些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它本身也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那…大概空前絕後了，以後大概也不可能了。所以就是…因緣際會吧！（管嫫媛，林美挪訪談，2008年7月17日）

由「狂熱」而帶來的「滄桑」人生，是林美挪自己為當年她一路走過的記者實踐作為，所「暫時」下的註腳；「滄桑」，是因為當她回首來時路，遙望當初在各種人生關鍵時所作的選擇，讓她的人生雖然豐富充實，但卻始終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暫時」，則是因為她認為，人生是一條漫漫長路，而她永遠不會知道下一步，她又將如何因「勢」而為，又將如何選擇。

第二節 王幼玲的生命圖像

王幼玲，外省第二代，1956年出生於一個典型的工人階級家庭，1987年進入《自立晚報》跑勞工。據她自己的描述，在上大學之前，一直是個個性單純、父母說什麼就做什麼的乖孩子。從她求學期間到擔任記者，她的工作經驗一直沒有脫離過文字寫作。而她的成長背景、記者生涯，其實與台灣1980年代工運發展過程密不可分。因此，本節除了按照時序，鋪成她從小生長環境到求學歷程、在《自立晚報》的採訪經驗如何的影響她專業意理的形成之外，會特別藉詳述她個人所說的三次難忘採訪經驗---桃園客運罷工事件、大同三峽廠工人自組工會事件、遠東化纖大罷工事件之中，她個人的體悟與轉變，以及其中藉由與受訪者互動所逐漸成形的「關懷倫理」。我們可以藉由她在這三次採訪工人抗爭事件中，所採取的不同新聞專業實踐方式，來理解她在每個不同時期，面對工運，以及自我認知的記者理念、功能的轉化。正如前所述，王幼玲的記者專業意理的形成，其實是伴隨著1980年代整體工運發展史的不同階段，而有不同時期的實踐與轉化。因此，本節在這三次重要經驗的書寫方式，特重於她在採訪時的「情境式」的描繪，並且說明每個抗爭事件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及王幼玲個人對於每次運動發展的態勢與個人見解、反省等等。

【王幼玲的生命圖像】

藍領工人階級家庭出身 自幼便感受到階級不平等

王幼玲，1956年出生，外省第二代。出生在一個典型的工人家庭中。

王幼玲的父親因其父（王幼玲祖父）早逝，在初中時便離家發展，未再升

學。一九四九年，王幼玲父親隨國民黨部隊撤退來台後就離開部隊，考進現在的台灣汽車客運，也因此結識當時在台汽擔任隨車車掌小姐的王幼玲的母親。父母都忙於生計，自小王幼玲與父親的關係，一直是處在「遠望尊敬」的情況；對於父親有更深入的了解，是直至家中四妹陪伴父親前往大陸探親，追本溯源之後，才經由妹妹轉述，原來父親曾是隸屬於戴笠系統下的國民黨特務。王幼玲的母親是本省人，出身傳統本省家庭。王幼玲母親在傳統家庭的觀念限制下，到國中後就未再升學。王幼玲是家中七姊妹的老大，所以小時她在姊妹群中的角色，就如同「母雞待小鴨」中領著小鴨走的「母雞」一般，在母親罹患「重症飢無力症」後，就擔起執掌家中事務與照顧母親、妹妹們的工作。

16

自小，王幼玲就從父親辛苦的工作中，深刻的體會階級差異與勞動者的艱辛。

王幼玲唸小學時，父親轉入公營銀行，擔任董事長座車駕駛。即使父親所屬的銀行是公家機關，工作內容卻經常是「公私不分」，得隨時受到老闆差遣使喚。她回憶兒時，經常在清晨四、五點，就被父親的梳洗聲吵醒，然後看著父親開著車接董事長去淡水打高爾夫球。除了公務的需要之外，董事長一家人的交通接送，父親也得全部包辦。由於家中姊妹眾多，有時候父親也會蒐集老闆女兒淘汰的「華麗舊衣」給她穿。¹⁷

¹⁶ 參考王幼玲訪談。「我是我們家的老大…以前因為姊妹很多，媽媽身體不好也需要人照顧，所以在家就自然形成照顧人的角色。我那時候是小六，所以就負責照顧家裡的大小。因為家裡的小孩子大概差一歲一歲、兩歲兩歲、三歲三歲，剛好是這樣一二二三三。所以我都是要帶我家裡的小朋友。…個性上是比較獨立的啦…」(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¹⁷ 參考王幼玲訪談。「我小時候看他(父親)都是早上五點左右就出發去淡水。有時候董事長要應酬，他得等董事長，就會很晚下班。而且他服務的不只是董事長，還得服務他(董事長)一家子。比如說大小姐要去哪裡啊，太太要去哪裡啊，都要負責接送。甚至老闆去偷腥，他還要幫忙做cover的人。但是他領的只有台北市銀行的薪水。」(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基於母親病情需要，王幼玲國中畢業準備升學考試時，家人期待她可以選擇修讀護理專科。除了家庭因素外，當時，護士就業機會多，畢業後就可以立即就職。因此，她放棄當時進入公立士林高中就讀的機會，選擇進入當時仍是五專制的台北醫學院護理專修科就讀。¹⁸

1974年，她從護理專科畢業後，進入台大醫院精神科擔任臨床護士的工作。因為工作的關係，王幼玲結識了當時在台大精神科的文榮光醫師。當時以醫學與兒童性教育為主題，文榮光替雜誌社寫稿，因稿件量多，就找了王幼玲幫忙分擔「業務」；當時王幼玲還幫忙翻譯了關於兒童性教育的英文原文書籍。¹⁹後來，更因為這些合作寫作的經驗，讓王幼玲參與了當時由文榮光、黃光國教授等人合開在《中國時報》的「婚姻與愛情聯合診所」副刊專欄。當時專欄所處理的個案，通常是家庭暴力、性侵案件，王幼玲因此開始頻繁地接觸起因於各個社會因素而釀成的不幸事件，以及台灣社會的各種人間「病相」；同時，這些寫作經驗也讓王幼玲打下了一定的寫作與編輯能力基礎。當時，《中國時報》需要一名專任編輯，在各方的推薦下，她辭去護士工作，轉行當起編輯。

然而，《中國時報》的編輯工作卻在個性耐直的王幼玲不能適應內部複雜人際關係的情況下，草草結束了。

¹⁸ 參考王幼玲訪談。「到了要考高中的時候，我考上了公立的士林高中，但是不是很好的公立學校。後來決定要去讀護專（五專制），是因為我媽媽的關係。護理最好的是省護（台灣省省立護專），但是我沒有登記上，我登記到的是台北醫學院的，所以就去讀了台北醫學院的護理專修科，是五年制。現在也沒有了，它後來改成三專，又改成大學。」（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¹⁹ 參考王幼玲訪談。「一直到了畢業之後，到了台大醫院去工作，我被分配到精神科，就認識了幾個精神科的醫師，才開始跟著吳濃光醫師寫東西。我其實在專科的時候參加過詩社，北極星詩社，寫詩啊、寫寫文章等等的。所以大概還可以寫一些文章。吳醫師他稿很多嘛，所以有時候別人跟他約了稿，他沒辦法寫，就找我幫忙。我記得他當時有拜託我幫他翻了一個專門教小孩子性教育的英文書。所以我時常幫他做翻譯、寫東西。」（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我只做了半年，水土不服。不知道為什麼，我跟我的主編不合。他覺得我不聽話吧！好像因為我跟那個主編他討厭的人，走得蠻近的，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辭掉了。（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似乎與文字書寫有著極深的緣份，王幼玲在大學時期再度進入《張老師》月刊書寫文章。當時月刊處理的議題很廣，包括家庭、心理、孝道等等議題。王幼玲在兼職期間，曾利用當時中研院十年一次的社會力大調查的資料，讓她對於當時整體的社會走向與各種面向有更多的了解。²⁰

幾年來專任或兼職的寫作與研究經歷，讓王幼玲在書寫文字與編輯工夫上，累積了一定的興趣與實力，也間接的激起了她在大學畢業後選擇記者工作的想法。然而，文字的累積，以及對於台灣社會、文化的普遍認知雖然有了，但是啟發她在進入《自立晚報》跑勞工線、積極投注心力與關注勞工運動前，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左派思潮，則是在她轉考中興大學社會學系所發生的。

大學時代---左派思惟的啟蒙

1977年，辭掉《中國時報》專任編輯的工作之後，王幼玲又再度回到護士的老本行，到台北市立療養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機緣下，王幼玲和朋友們去淡水踏青，同時結識了當時在大學雜誌中擔任主編的李先生。

當時，台灣社會正值鄉土文學論戰吵得沸沸揚揚之際，淡江大學正是這

²⁰參考 王幼玲訪談，2008.5.6。「到了中興的時候，還在半工半讀，不過那時候就轉到張老師月刊，就比較是做一些心理、社會的。那時候我就跟了一個還不錯的，叫做余德惠，那時候就會作一些調查。那時候我們也會去參與一些中研院的十年一次的社會力大調查。所以那時候對於一些社會的議題，就開始比較有了解。」（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波鄉土文學論戰的主戰學校之一。這位李先生也參與其中，並在大學雜誌中擔任主編，因此經常會鼓勵王幼玲將她在擔任護士時的所見所聞，包括各種家庭問題，社會因素所造的疾病等，書寫成文章投稿，刊登在他當時所主編的雜誌上。雖然隨著兩人的生活環境不同，朋友間的交往也逐漸隨時間轉淡，而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然而但這段年少時的偶然邂逅，卻是間接地影響了王幼玲之後轉考社會系，開始閱讀馬克思與各種社會學理論的發端。²¹

因此，王幼玲毅然決然結束了護士工作，轉考中興大學社會系。在這個階段，除了學校必修的課程之外，她時常會跑去台大旁聽葉啟政、許嘉猷、蕭新煌等人的課。由於有幼時經驗的連結，以及在擔任護士期間所見到社會病相，讓她在修習左派馬克思理論時，閱讀到「勞動價值」、「異化」等概念特別有感觸。



……我最喜歡聽葉啟政、黃光國、許嘉猷的課，反正有空，這幾個傢伙的課我都會去聽。當然，我最喜歡葉啟政的課。當時就覺得，欸，這馬克思，左派的思想蠻好的啊！大概有自己家庭的經驗吧。

（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當時，台灣島內前後經歷了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台美斷交等重大的政治變動事件，不論在社會層面、校園層面，都起了一股追求民主改革的聲浪。王幼玲當時除了受到左派理論的感召外，身處在當下的社會情境與氛圍裡，自然的也逐漸激勵出充滿理想抱負、一心想改革社會、關懷土地的熱

²¹ 參考王幼玲訪談。「有一次我去淡水玩，碰到一個寫文章的人，他有參與鄉土文學論戰，所以他比較有政治意識。我跟他來往過程中，他也會鼓勵我寫一些東西；因為我在精神科的護理工作，其實是蠻有一些報導性的。所以他就說：「欸，妳試試看！」所以我也曾經寫過一些精神科方面的文章，在他所編的一個雜誌上面登出來。我想那個影響有留下來。」（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情。²²大學畢業後，基於先前累積的寫作經驗，王幼玲認為自己既然可以「寫」，又逢解嚴，言論箝制逐漸鬆綁，記者在當時來看，又是個不錯的職業，因此決定進入媒體求職。

初入《民生報》求職碰壁

1987年，國民黨政府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尺度、面對社會各種自立救濟的運動接受度，都還在一個有待摸索與挑戰的模糊地帶。而這一年，也是王幼玲滿懷著改革社會的理想、熱切的擁抱左派馬克思理論，進入《自立晚報》跑勞工線關鍵的一年。

在進入《自立晚報》之前，王幼玲先去《民生報》求職。當時，閱讀了過去楊憲宏等人在《民生報》上一系列的环境公害報導，深受啟發。因此，她抱持著要做深入調查報導，揭發政府政策弊端「傻勁」，衝著王效蘭的面，對著她說：「我想要做楊憲宏以前做過的東西。」

然而，當時的《民生報》已經放棄民生、環保調查性的報導走向，計畫轉型成影劇與消費型的報紙；想當然爾，經營者面對像王幼玲這樣一個抱持著與報社經營策略完全相反，又毫無人脈背景的人前來應徵，自然是不會錄取的。

23

然而，初入媒體圈遭受的小小挫敗，反而讓王幼玲進入了與其志趣與志向相符相近的《自立晚報》。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 記者發揮空間大

²² 參考王幼玲訪談。「就是中興大學時候中毒啦！就覺得我要關心環保、關心社會，我要做社會運動！」（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²³ 參見本章第一節，頁34-36。

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進入《自立晚報》的王幼玲，與在1980年代前期進入的林美娜，對於報社環境的感受，有著明顯的差異。自1980年代中期後，《自立晚報》的內容走向，就著重在社會運動、社會改革與弱勢議題上，因此也吸引了許多崇尚本土、自由與具有改革理想的知識份子投入。1987年，在第一次求職失敗後，王幼玲轉而進入《自立晚報》---一個相對讓記者能保有其自主性的媒體環境，²⁴反而讓她對於土地與弱勢的關懷，能夠落實在她的文字與實踐中。

……我確實是蠻感謝《自立晚報》的，因為它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第一個，學習，因為本來不會，第二個，是在那個議題上，給我們很大的空間。(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我覺得《自立》的這些總編輯們，基本上都是比較站在改革跟社會運動的角度，所以他們對這樣的新聞容忍度是比較大的。從過去機場事件，自立的編輯風格，就大概是會比較站在群眾的這一邊。這樣的稿件，也許拿到別的報社去，也許不會被登，但是在自立，也許就比較容易。他也許來質疑你一下，或是在文句上改一下，但是基本上都是會登上去的。(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那在每次的運動後，大家搶著要看的就是《自立》；因為在非
常多次的街頭抗爭，他們覺得只有《自立》的記者會替這些的運動

²⁴ 自從1977年11月的中壢事件報導一出，《自立晚報》就開始受到各界矚目，發行量也大增；許多社會運動、弱勢團體開始把《自立晚報》當成「盟友」，因而對《自立晚報》前去採訪的記者會特別友善；加上報社不若其他傳統報社有嚴密的科層組織管理制度，《自立晚報》的記者通常能在那樣的環境下，較親近弱勢、與社運議題，又同時能保有對於新聞的自主性（蔡士敏，2007：43）。

者講話。呈現出他們的原始抗爭面貌，他們覺得只有《自立》看的到。所以每次有街頭抗爭的時候，我們的報紙在那邊賣的最好。（蔡士敏，王幼玲訪談，2007年10月9日）

在《自立晚報》當時具有如此「自由風氣」的工作環境中，加上長期與勞工、社運份子相處，逐漸理解勞工處境後，她往往不僅僅以「受訪者」的角色來看待這些工運份子與工人們，反而會因為視其為朋友、工作夥伴，而在處理相關新聞時，側重讓勞工發聲，並著力於工人運動的正向報導上：

……妳跟這些抗爭者，跟這些工運份子不完全是一種採訪者的關係，我現在覺得，其實是一種朋友的關係。妳寫新聞的時候，妳會作一些選擇嘛，妳會覺得哪一個部份對這個運動是比較好的；我會發這樣的新聞。你不能說那是不實的，是假的，因為新聞本來就很多的角度，那我會選擇這個事件正向的、有幫助的去報導。（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我們所謂的中立客觀，都是形式上的。也許那時候的形式上，我做得不是很好吧，我應該要問一下遠東化纖公司的說法，不過那時候大概不會有（中立客觀）。其實也不會啦，因為報社會幫你處理，因為會叫跑產業的記者去問，但是我這邊處理的完全是勞工的、運動組織，跟他們是不是有什麼下一步的行動。我大概會著重在這個部份。（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志趣使然 選擇專注跑勞工議題

在剛進入《自立晚報》時，王幼玲被指派負責內政部的新聞。當時因逢解嚴之初，內政部要處理許多過去曾是軍事管制區域的山地與海域開放問題。因此，她除了要每日追蹤、報導這些當日新聞之外，內政部底下大大小小的部門，包括勞工司，以及從內政部獨立出來的勞工委員會都在她所負責的範圍之內。業務量之大，使她當時難以負荷。因此，在勞工司獨立轉成行政院下的勞委會時，她想要專心致力於勞工新聞上；於是，王幼玲報請當時的總編輯李永得，讓她專心跑這一條線。

……當時，老總問我，要跑哪一邊，要內政部還是勞委會，讓我自己選。我其實也有考量到跑內政部的新聞會比較容易上版面，但是，我還是喜歡跑勞工議題，所以他就對我說：「那妳就去吧！」。（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從此，王幼玲開始勤跑工運現場，專注於工運與勞工議題，同時，也開啟她與勞工運動的不解之緣。

記者生涯中的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桃園客運、大同三峽馬達廠、遠東化纖廠

在進入《自立晚報》之前，她抱著對於左派理論的熱情，一心想要改革社會，要從事社會運動。因此，按照她自己的說法，當時社會上大小的遊行與抗爭幾乎是「無役不與」的。

……那時候動不動就上街頭。什麼五二〇農民運動上街頭，反核四也上街頭。這些活動我都有去參加，所有的街頭我大概都會去。（

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然而，知識份子最容易在初入實際的行動場域前，基於對理論的憧憬與崇拜，而懷抱著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圖像；以致於在實際進入運動場域之後，得面對實際情況與理論上的落差而產生不小的衝擊。因此，王幼玲在1980年代末期剛接觸工會運動時，是先以一種左派的理論視角去檢視與摸索，而在心中產生了不少質疑。採訪1988年的桃園客運追討加班費所引發的罷工事件，就是她在閱讀理論之後實際接觸工人抗爭情況的重要事件。

「勞工階級，永遠的弱勢階級」

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掀起一股全台客運司機追討加班費的風潮，可謂是在解嚴後工人起身爭取自身工作權益的第一波大型、全台工人運動。而這一波客運司機追討加班費風潮的起因，正源自於國民黨政府過去壓迫與忽視工人權益的事實。²⁵

²⁵回顧過去探討解嚴或戰後工人運動崛起的相關研究，可以歸納出下面幾個工運在八〇年代末期掀起熱潮的原因。第一，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缺乏對於勞工在法律面實質的保障。勞工必須長期忍受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隱忍資本家老闆對其的層層剝削。而這樣的剝削，實際上是來自於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政權與經濟利益所發展出的「政商一家」傳統。第二，1984年頒佈實施的勞基法，是在資本家壓迫下的妥協產物。其中許多保障勞工權益的條款，都是有名無實；尤其，在頒佈實施之後，國民黨政府為安撫資本家的不滿情緒，在實際用法時，並沒有要求資方完全遵守。另一方面，勞基法雖然是政府宣示性的產物，卻也提供了勞工力爭自我權益的憑據藍本。第三，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前，國民黨已發生政權危機。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國民黨在失去外部支援（中美斷交）的情況下，又相繼發生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高雄事件，乃至黨外勢力漸起，迫使國民黨政府由威權政體轉向自由化政體，並啟動各種回應反抗勢力與鞏固政權的機制；國民黨政府對於勞工階級的勞動支配體制，完全的反應在藉由行政立法部門的設立與立法，此種黨國的嚴密組織邏輯下運作、執行與推動的（徐正光，1989：108；李建昌，1991：24-32；何明修，2008：22-23）。如現在的勞委會在1988年8月1日正式成立之因，便是黨國機器展現的一種典型形態。勞委會的前身不過

王幼玲回想當時桃客抗爭事件之所以能夠號召全台客運業司機參與的主要因素，就在於1984年頒佈的勞基法，提供工人據理力爭的法律憑據。1984年公佈的勞基法，明訂勞工可以依法舉發資方不合理的事項或「討回公道」的追溯期是五年，而1988年發生的桃客追討加班費事件，正逼近追溯期的底線；因此，無論是時間點的急迫與訴求的正當性上，都成了桃客抗爭的因子。就訴求的正當與合法性而言，追討加班費這樣的訴求，其實關係著司機大哥們荷包與收入的實際經濟問題，因此，以合理合法的訴求作為抗爭的利基點，只要稍有人點燃燎原之火，立即就能攬人投入抗爭的行列。

……其實那就是解嚴之後的隔年而已，他們是剛好找到客運業者的營業形態，工時長底薪低讓他們去抓到了一個點去訴求加班費。因為，那個追溯期五年嘛。第一個，這個是很好的，大家利益是一致的，沒有人會去反對。第二個，這有急迫性，因為五年追溯期就要到了。所以就會一個點火就燒起來。因為勞基法是民國七十三年就開始了，那當時的抗爭是七十七年嘛，那五年很快就到了。也就是第一個碰上這種五年追溯期的問題。那當然也有點火的人，就像曾茂興。那他一打出來之後，其他的客運業就會學，就會主動跟他連絡。（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是內政部底下一個小小的勞工司。1986年，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王聰松、徐美英，在民進黨的推薦下，擠掉國民黨提名的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錫淇和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彭光政，當選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在這樣的情勢下，刺激了國民黨黨政部門的檢討與因應。於是，1987年8月1日，原本在內政部底下的勞工司，轉變成行政部門底下的勞工委員會，以因應並消融勞工階層長期的不滿，藉而挽回勞工階層的政治資源。（徐正光，1989：107-112；李建昌，1991：33-38）。

當時國民黨政府雖為了應對與鞏固政權與壓制可能興起的反抗勢力，而設立了勞工委員會，但該部門在實際上卻是為了黨國控管便利而出現的另一種掩人耳目的「黨國機器」。另外，國民黨政府長期與資本家互惠與掛鉤的政經結構，也讓勞委會內部組成成員即便有照顧勞工的進步意識，但仍然難以用缺乏具體條文的勞工法令去積極地保障勞工權益。以致於，勞委會在當時只能成為國民黨政府表面上為安撫勞工情緒而形造的「橡皮圖章」。

就自組報社工會的經驗與採訪工運相關議題的過程中，王幼玲發現，當時台灣不健全的勞工相關法令與相關單位處理勞資爭議的消極態度，更是進一步凸顯了在國民黨威權政府時期勞工處境的悲哀之處：

……比如說採訪經驗，跟我自己組工會的經驗，讓我會看到法令上再怎麼樣規定的健全具體，都沒有辦法阻止資方在法律的空隙裡面找洞，公然違法，那妳也不能怎麼樣。那，跟他們（資方）打官司，你的青春就整個都沒了。就是讓我看到，勞工真的是一個永遠的弱勢。以前我不覺得公部門可以在勞資爭議中替勞工做什麼事情。可是到後來抗爭的方向改了，大家在資方抗議不成，就會去找勞委會等政府部門...可是常常都還是失敗的。...以前的加班費抗爭，應該是一個權利事項，但是都還要這樣抗爭啊...（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在上述政經背景之下，導致1988年桃園客運展開追討加班費的行動，蔓延至全台客運公司；長期受到剝削的基層司機工人們，終究無法忍受資方多年的壓榨而起身抗爭。

桃園客運抗爭始末

桃園客運抗爭的起始點，來自於當時勞工無法再忍耐老闆無止盡的壓迫，以及為了討回公道而向政府機關或其他公部門求助時遭拒的難堪處境，因而發起自救形式的抗爭。桃園客運的「組成結構」，其實正如前所述，是在「政商一家」的體制下發展而來。²⁶當時，客運業除了取得必需的經營執照之外，更需要取得路權，是屬於政府列為特許的產業項目之一。國民黨威權政府時期，為了鞏固政權，以各種產業經營權許可執照的發派，來換取籠絡地方派系的政治操作，早已經是國民黨統治的特色之一。因此，在層層互惠的政商結構下，桃客的司機們，每天得工作超過十個小時，每個月休假不超過兩天；每逢春節過年，或是各種節慶，因為正值返鄉旅客搭車的高峰期，自然也都不得休假。同時，為了「節約成本」，壓低勞工薪資變成為了資方「省錢」最便利的方法。²⁷除了源自於資方剝削與政府漠視的不甘情緒，加上外部支援的力量進入，²⁸桃客的基層客運司機面對第一次能夠據法力爭與資方對抗要求加班費與休假日的誘因，紛紛投入了追討加班費的抗爭隊伍中。

這一波引發全台客運司機追討加班費與自我工作權益的第一彈——桃客抗爭，同時也是王幼玲在進入《自立晚報》後所跑的第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工人罷工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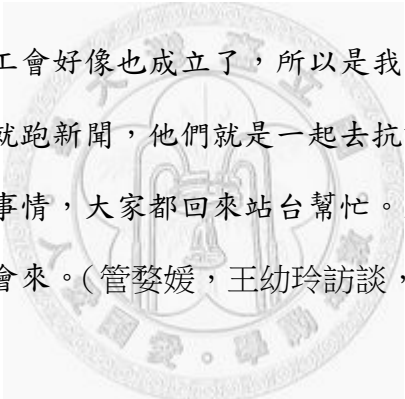
「我忙著採訪，其他同事忙著抗爭」

²⁶ 1934年，桃園客運（以下簡稱桃客）於日據時期成立時名為「桃園交通株式會社」，直至1947年戰後才改名為桃園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當時桃客主要的股東就是中壢吳家，即國民黨現任黨主席吳伯雄的家族。日據時期，中壢吳家便是地方仕紳，吳伯雄的伯父吳鴻森曾擔任過新竹州參議員，在國民黨政府時期，也曾出任過台灣省參議員、國民大會代表，以及桃客董事長。1988年桃客罷工時的桃客董事長吳運豐，便是吳鴻森的次子。1987年勞委會於內政部勞工司獨立出來前，就是在當時內政部長吳伯雄的管轄之下；而第一任的勞委會主委鄭水枝也曾任桃客的總經理（郭吉仁，1988；何明修，2008：23-25）。

²⁷ 桃客司機的底薪每個月不過一、兩千元，其他收入則來自於各種獎金制度；如載客獎金、里程獎金、省油獎金等等，全部加起來，客運司機每個月薪資不會超過兩萬塊。

²⁸ 在「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幫助下，桃園客運產業工會在1987年成立。「勞工法律支援會」在1984年5月1日成立，以法律服務為主，推動勞工運動。主要成員有邱義仁、郭吉仁、蘇慶黎、簡錫堦、楊青矗等人。

1988年2月14日，是桃客工會發動怠工的第一日。司機大哥們一大早就已聚集在中壢火車站前拉起抗議布條，齊唱抗爭歌曲。王幼玲與其他報社同事近傍晚時，才抵達抗爭現場。現場除了桃客司機之外，還包括各方來站台幫忙的工運團體；司機大哥們齊聲唱著改編版本的「心事誰人知」：「…踏入交通界，是阮不應該。如今想反悔，誰人肯諒解，頭家你若有了解…」，雖然讓抗爭現場少了份血淋淋的悲淒，卻呈現出抗爭工人們苦中做樂的景象。王幼玲下了車，就趕著去採訪，而開車載王幼玲下桃園的幾位報社工會幹部，則忙著前去一同抗議聲援。



……那時候我們工會好像也成立了，所以是我的工會幹部載我下去的。然後呢，我就跑新聞，他們就是一起去抗議。為那時候大家都是盟友…一方有事情，大家都回來站台幫忙。所以那時候人蠻多蠻熱鬧的，大家都會來。（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當時桃客發車採取三班制，所以工會幹部為了要預防有的司機在資方脅迫下「偷跑」，所以除了在中壢車站的抗爭據點之外，他們組成了「罷工糾察隊」，前往每個發車點「緊迫盯人」。當時王幼玲就跟著曾茂興跑遍每個發車地點，採訪現場。

當時我的印象就是空蕩蕩的啊（指發車站）。全部的人都罷工，也沒有什麼人來等車。我就到他們的工會辦公室去，然後他們工會也有幾個人在哪裡。我記得我跟著曾茂興去，他說要每個站都去看看，那我就跟著看狀況怎麼樣。（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無奈的是，發動怠工的隔日，桃客工會就收到桃園縣政府發來的一紙公文，要求他們結束罷工行為，立即復工。工會考量現實情況，怕政府壓制，就停止怠工。因此，為期不到兩天的怠工行動就此結束。這是王幼玲採訪桃客罷工的過程；然而，令王幼玲在採訪之初真正感到衝擊的，是首次與司機大哥們的「面會」；而這次的面會就是她在回憶《自立晚報》當記者時難以忘懷的場面。

這場令王幼玲難忘的「面會」，得將時間拉回罷工的前兩天，將地點拉回桃客工會在罷工前開會的大禮堂中…

當左派知青遇上工人「大老粗」…

桃客罷工前夕，總統蔣經國出殯的隔日，1988年2月12日上午，桃客產業工會在桃園縣勞工活動中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討論年終獎金、紅利分配、休假制度與加班費等事宜。這是王幼玲進入《自立晚報》跑勞工線的隔年，以及為了採訪桃客罷工而連夜睡在車上的兩天前。這次的採訪，便是王幼玲與桃客司機大哥們的初次「面會」。

當天上午，在偌大的活動中心中，王幼玲坐在最後一排，專注的聽著桃客工會常務理事曾茂興，拿著個大聲公面對台下勞工，慷慨激昂的疾呼訴求。這些不曾接觸過馬克思或任何左派理論的工人所使用的語言，聽在曾接受過左派思潮洗禮的王幼玲耳裡，只覺得他們是一群沒有理想的「大老粗」，一心只為追討加班費。

……我記得我那時候心裡想的是：「啊，這個人是個老粗、草包！」

」因為他（曾茂興）用的語言，跟我過去的經驗，或是跟我過去的

想像，那種對於左派理論的想像，其實是差異蠻大的。因為他是用那種很直接的語言去訴求。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啊，這個怎麼一點理想都沒有，就是為了追你們的加班費。」可是，後來，會覺得不一樣了。（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知識份子面對每一次的勞工抗爭，通常會順理成章地認為這是推展勞工運動的必經「環節」；換句話說，為了達到「運動終極目標」、為了順勢將勞工運動的發展往前推進，而將每一次的抗爭擴大、拉提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重大議題，也是引發各界關注、繼而挑戰政府底線的重要策略。然而，非勞作者如外力（如其他工運團體）介入者、知識份子等，卻難以體會參與抗爭的勞工們口中所謂的「成」與「敗」實際上是關係著他的荷包、飯碗保不保得住的生存關鍵。就如同，當初曾茂興在艾琳達的引介下，與美國左翼社會學泰斗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面會後回來，逢人就說的一段「趣事」：

……回來之後，曾茂興就到處向別人講，如果華勒斯坦的話，要讓工人回家想三天，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有用的嗎？（何明修，2008：42）

當時，王幼玲初入運動場域，也無可避免的使用知識份子熟悉的理論視角去檢視實際接觸的一切。王幼玲回想當初去採訪勞工抗爭時的心態，做了一番透徹的反省：

……這些知識份子都會想把它當作是一個議題並且擴大抄作，凸顯國家體制或法律的不正義，去跟社會訴求。可是對於這些抗爭的工人們來說，「我的荷包」、「有沒有拿到錢？」，有沒有實際的經濟收

益對他們來說才是比較迫切重要的，而且時間拖的愈長對勞工愈不利，所以會接受妥協見好就收，不能堅持原來設定的目標價值。所以那時候，老實說，會有一個這樣的矛盾在裡面。(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第一次接觸工人抗爭場合的經驗，讓當時抱持運動與改革理想的王幼玲，感受到了實際情況與書本上理論的落差。

……那我看曾茂興的時候，我也會用那種很理論的角度去看他，覺得不應該只是喊要錢，或者不應該只是拿到這個東西你就放棄了其他的訴求。但是後來我自己的抗爭經驗（指自立工會），讓我知道可能事情不只是這樣的。因為妳到了談判的場合，其實要擔心很多事情。我通常都會想說，我的後援力量夠不夠。(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隨著1980年代末，接踵而來發生的工人組工會、工廠關廠倒閉事件，王幼玲逐漸藉由採訪新聞、親歷現場、與工運人士頻繁的接觸，以及後來自組報社工會的經驗，感受到工人處境的艱辛，如她自己所言：「當然，後來覺得不一樣了。」

原先深植於她腦中，左派的、理想的抽象圖景，漸漸在了解實際環境的過程中，轉而變為一幅更為具體，卻也更為銳利、清晰的寫實畫作。在桃客抗爭之後，同年四月發生的大同三峽馬達廠工會成立事件，更讓王幼玲對於工人實際抗爭的情況，有了不同於初次面對桃客抗爭的體悟。

「工會等同於洪水猛獸？！」

在當時台灣社會政經環境下，工人要捍衛自己的工作權益，需要面對重重的阻礙與困境。工人除了依據不盡完善的勞基法與自組工會對抗資方壓迫外，還得面對隨時飯碗不保的威脅。

在1980年代以前，國民黨政府為了有效管理與限制社會可能產生的反抗勢力，對於勞動者的支配與管理，往往反應在「有形的」與「無形的」的層層壓制系統上。如上述的桃園客運抗爭起因，最明顯的狀況就反應在國民黨政府為穩固政治利益，而與資本家結合而附帶所產生了對工人重重的剝削與壓迫。大同三峽廠的抗爭，雖然同樣起因於「政商一家」結構長期對於工人有意識的欺壓外，也來自「工人自組的工會」與「政府扶植的工會」²⁹間的對抗。

正如前文所說，行政立法的目的在於建立國民黨對於勞工的合法支配與統治，在實際落實的層面上，則反應在貫徹此一支配體制的各級組織嚴密的運作過程裡。最明確的形態，即黨中央所扶植的「閹雞工會」³⁰。所謂的「閹雞工會」，就是國民黨政府藉由法令的制定，合法的介入與籌組各產業、黨國體制下的工會。雖有工會之名，但實質上卻是國民黨政府藉由工會控制與壓制勞工的監視系統；根本無法發揮保障工人權益之實。

²⁹ 國民黨有鑑於在大陸時期國共鬥爭的失敗，因此對於龐大勞工群的監督與控制，便成為國民黨為穩定政權、制定相關政策的重點之一。因此，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隨著各項國營產業——礦業、造紙業、製糖業、林業、紡織業等的設置，「閹雞工會」也一一建立。國民黨早期扶植的工會，實際的運作策略有幾個特殊的重心，例如得透過黨來策動工人組織工會；在工會中得設立黨團組織幹事會，而幹事會還得設置一名由黨部指定的書記；另外，凡是違反黨部所決策事物者，得以警告、申誡、停止黨權，甚至可以直接撤免職務。其中，工會幹部的選舉，資方通常透過提名與動員的方式，支持黨員當選監理事。前述各種運作重點，明顯可知由早期由國民黨所扶植的工會，不但無法有效的保障勞工權益，資方更得以用工會來隨便撤免勞工職務（徐正光，1989：109；李建昌，1991：15）。

³⁰ 其實不難從「閹雞工會」這個工人戲謔資方工會的稱呼來理解「閹雞工會」的實質意含。「閹雞工會」設置的背後意義，其實是為了「先搶先贏」，以抵制具有敵意性或是獨立性的工會出現。而提名黨員當選監理事的用意，就在於能夠主導工會運作，以避免無法操控的行為發生。

在勞工法律無法發揮正面效果，工會又遭到資方與黨國把持的情況下，工人除了組織自主性的工會爭取自我權益外，幾乎別無他法。大同三峽廠工人自組工會事件，便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燃起大同三峽廠工會的抗爭，始自1988年初的一張由工人曾水鑑發出的傳單。而大同三峽廠的抗爭，同時也燃起王幼玲對於整個體制不斷壓制勞工爭取權益的質疑。王幼玲事後回憶當時跑大同三峽廠組工會的感受時，她覺得整個政府體制在面對勞工自組工會時，是抱著恐懼與壓制態度的，以致於在剛解嚴時，工人自組工會的成立，是那麼樣的困難。

……那時候就真的覺得，難道這些工會的就是洪水猛獸嘛？只是要組個工會為什麼這麼困難？（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大同三峽馬達廠工會抗爭事件

良好的政商關係，自然有助於大同企業推展其經營版圖，承包各種重大的公共工程，更有助於壟斷市場成為獨霸一方的企業怪獸，大同企業與桃園客運有著類似的組成結構，同樣都是在政府優惠下扶植出來的產業。³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大同企業的勞工時常得隱忍老闆為了擴張版圖而做出的不合理要求與為了「節約成本」而發放的微薄薪資。1970年代，大同公司以叱吒風雲之姿建

³¹ 大同公司的前身，是前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的父親林尚志所創辦的協志商號，於1918年成立。1942年林尚志創辦協志工業叢書公司與大同學校公司，而林挺生當時就擔任大同學校公司的「教師校長董事長」，「大同」的商號由此而出。二戰過後的台灣，百廢待舉，林氏父子藉此投入修復火車頭的鐵路市場中，雖然鐵路市場與先關產業很快被國民黨政府收歸國有，但是林挺生也因此與國民黨政府建立關係，打下良好「政商一家」、「互通有無」的良好基礎。一如桃園客運的高層皆與國民黨高層有密切往來一樣，林挺生在1947年就當選全中國南區工礦立法委員，台灣省工業公會理事長、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台灣區電工器材同業公會理事長…等等獨霸產業一方的重要管理職務。除此之外，林挺生也曾擔任台北市議會議長，1971年更成為中國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1975年成為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成為蔣經國親近人士（林宗弘，2000：32-45）。

立了產業版圖；然而，到了1980年代，卻不敵國民黨經濟政策的走向，³²而逐漸崩垮。大同企業老闆林挺生，為了解決經營上的危機，甚至強迫員工認股，以非法吸金；更任意的開除工會幹部、未依照法令提撥退休準備金、非法雇用外籍移工，甚至為了壓低成本，不給付勞工們的勞保費用；不理會工人們因長期超時工作的抗議，直接將工作外包以壓制原本的勞工等（林宗弘，2000：40-50）。上述的種種原因，都成了大同員工要求自組工會與要求合理年終獎金的抗爭燃頭；以致於一張工人自印自發的寫著：「…工會是代表什麼？您了解嗎？…您知道什麼樣的工會才能為您爭取應得的權益？…」的傳單，就這樣燒開了大同工人們的勞動意識。

記者生涯中「難忘的花香」

王幼玲在這次的採訪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工人籌組自己的工會，是一條充滿艱辛與挫困的漫漫長路。工人得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資方的各種無情打壓，還得面對其他同事擔心飯碗問題而不給予支持的挫折。她在1988年6月8日《自立晚報》第三版上以特稿分析了當時大同公司不接受勞工機關裁決，而申請上訴，造成沒有資本、時間與資方對抗的勞工們更加弱勢的處境；在文中她寫道：「…由大同員工的事件，也許我們可以發現法律似乎成為維護勞工權益最後且唯一的防線，而法律在勞工客觀環境的約束下能否發揮絕對的公平性，則幾乎已成為社會正義能否伸張的焦點了。」除了在當時的報導文句中，她呼籲政府有關單位積極正視與處理大同員工事件外，在抗爭現場的採訪經驗，也帶給她極深的感觸。

³² 如當時的台灣社會的家庭中，基本家用電器都以達到飽和量，需求不再。而國民黨政府也在1985年解除進口國外家電的管制，加上當時發生的石油危機，導致大同公司的營運狀態漸漸下滑，聲勢大不如前。



(翻攝自《自立晚報》)

她回憶當時採訪現場時，每每心中總是悲淒與哀傷的情緒在打轉：

……我記得我那天心裡其實是蠻悲淒的，就覺得工人組工會，為什麼就要這麼悲情，為什麼資方就要給他們這麼大的阻力？…（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在歷經了多名帶頭組織工會的工人遭資方以千奇百怪的理由調職與開除，以及不下數十次的抗爭後，大同三峽馬達廠工會，終於得以在1988年5月25日成立。5月5日當天，大同員工預計在中午休息時間，進行工會代表的選舉。原本工會成員預定要在中午十二點整投票，但是距離投票時間即將逼近，選票卻都還沒準備好。原因出在依據動員戡亂時期「加強督導各級人民團體施行辦法」的規定，人民團體要罷免或選舉使用的選票，還必須要有主管機關的印鑑才行。

於是，當天中午，工會投票時所用的選票，其實是大同工會成員許守活、林慶雄等人，在位於板橋的台北縣政府勞工課客員黃雙喜的辦公桌前，好說逮

說、千拗萬拗，才得以讓害怕大同資方、政府壓力的黃雙喜，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在蓋了章的選票。而林慶雄與許守活拿著選票，跳上摩托車，一路疾飆回三峽廠。

雖然選票有了，但是資方仍不願出借廠區讓工會舉行投票。全體七百二十五位工會成員，只得站在工廠門口外，冒著細雨，在陰霾的正午，在口號的呼喊下，完成大同工人自主工會建立的第一步---票選工會代表（林宗弘，2000：63-69）。

當天，王幼玲與大同工會成員一同站在雨中，採訪大同三峽廠工會票選代表的實況。她回憶當天，因為資方不願出借廠區讓員工投票，因此所有的人都得站在門外淋雨；而幾位工會幹部，為了讓後面的人看得清楚，拿著大聲工就這麼硬生生地踩上工廠外圍的矮牆上演講。種在矮牆邊的「千日紅」，即台灣俗稱的「因仔花」，因此折斷；在冒著細雨的正午，隨著空氣飄出陣陣的花香，而那個香味，直到現在都還鑲嵌在她的味覺記憶中：

……因為當時廠方不讓他們開廠，所以他們就在場外舉行大會。他們站在工廠外面的矮牆上面，就是花園啦，他們就一個一個的站在上面，大聲訴求。因為他們站在上面，所以上面種的樹就會被踩斷，那個樹應該是我們台灣的「因仔花（千日紅）」，是有味道的，那個味道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就是那個場景，一直都出現在我腦海。那時候就覺得，喔，工人要組織一個工會，是這麼的辛苦的...（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直至今日，回想起那一次的採訪經驗、當時的場景、畫面與味道，王幼玲都還記得當時當時的體悟與內心的激動：

……那個場景跟味道...一直到現在，都連結到我當時的感受，覺得工人組織工會是辛苦的路，工會會員的意識凝聚往往抵不過資方的打壓，而且他們那時候有工會幹部被調職，那時候他們也有很多悲情的訴求...我這人雖然看起來是這樣，不過有時候還是蠻感性的（笑），就是一直受到當時氛圍的影響...（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其實，王幼玲對於弱勢勞工的同情與支持，不僅僅表現在她的報導上，有時還會表現在採訪現場的「突發舉動」上。一般人若單看王幼玲的外表，往往會認為她是個個性理性、冷靜、思惟清晰的人；但其實當年在採訪現場時的她，是個個性火爆的強悍女記者；在長期看到工人悲慘的境遇後，她在抗爭現場，時常會有「不平之鳴」的舉動而不自覺。王幼玲回想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形容她在採訪現場時的「火爆形象」時笑著說：

……像大同工會的白正憲，就跟我說，有一次我去採訪大同工會，也是兇巴巴的去罵警察：「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介入勞資爭議...！」。後來警察也都在問我是誰啊（笑）。所以那時候大概就是有工會運動的時候，你會對於國家機器，特別是這種有警力要特別去維持秩序的立場，會有很深刻的感受，會很反感，會覺得他們（警方）根本就沒有抓好分際。（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而王幼玲在採訪現場這樣的火爆性格，也讓她在日後採訪遠東化纖抗爭時，有了弄得自己頭破血流的經驗。

深刻體悟勞工處境而產生的不平之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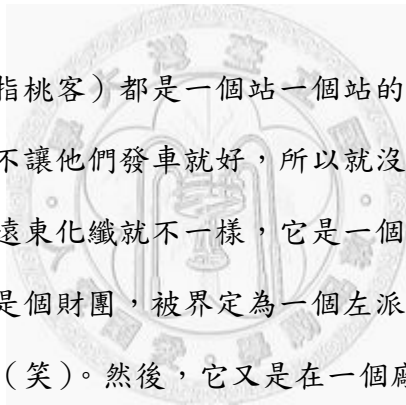
工人需要以流血、流淚來擊撞國家機器與不合理的體制，才能衝出一條荊棘之路，當時號稱台灣1980年代最強大自主工會龍頭---遠東化纖產業工會也不例外（夏林清、鄭村棋，1992：66）。

遠東化纖抗爭所面對的資方與政府結構，基本上不僅與大同、桃客抗爭如初一撤外，³³遠東化纖最早期工會同樣是由資方把持、政府勢力滲透的「閹雞工會」。即便遠化工會早於1977年成立時，勞工與資方管理階層在工會的比例已經呈現各半的態勢，且在重重的抗爭與談判之下，已於1986年成為一個由工人掌握主導權的自主工會，成為其他工人抗爭時的「榜樣」。但遠化工會在1989年5月間，因抗議資方違法將勞工任意調職的大規模罷工抗爭中，卻仍舊不敵主要工會幹部遭起訴而大失士氣，導致潰散。而遠東化纖產業工會那

³³ 1960年代，遠東集團是以紡織與水泥為主的製造業起家而漸取得該產業的龍頭地位，進而累積資本，擴張產業版圖，形成現今的遠東集團。1949年，遠東紡織廠公司在台北縣板橋市成立，主銷針織產品。1953年改名為遠東紡織公司，並於同年成立台灣遠東紡織公司，生產棉紗、棉布原料，隔年兩家公司合併為現在的台灣遠東紡織公司。1956年成立的合成纖維紡織廠，讓台灣遠東紡織公司成為全台第一個從紡紗、織布、印染、製衣「一手包辦」的紡織公司。1970年開始，台灣遠東紡織公司，開始併購其他紡織公司，逐漸拼湊出其寡佔市場的圖景。而1979年所買下的「亞東化纖」就是遠東化纖工廠的前身。而當時台灣遠東紡織公司，已經是個上通石化原料通路，下通下游銷售通路（遠東百貨）的大企業（賴建寰，2007：7）。遠東集團的創始人徐有庠，是上海有名的商人，國共內戰前，已經先後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遠東織造廠、大同棉業公司等。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失利後，隨國民黨政府遷台，在台北板橋線設廠。國民黨政府對於隨軍遷台的資產家，自是待其不薄。遠東集團能夠擴張至現在號稱台灣五大財團之一的規模，除了足夠的資本外，良好的政商關係更是「做生意」必備的通行證，否則以當時遠東集團名下的許多產業，都屬於政府的特許產業，若非有通往政界的階梯，遠東集團的擴張不可能如此迅速順利。1957年，與徐有庠共同投資成立亞洲水泥公司的立法委員王新衡，是蔣經國總統留學蘇聯的同學，同時也是替遠東集團打通對外關係的聯絡人。1984年前後，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時，設立了經濟改革委員會，當時邀集產官學與會，提出經貿建言，供政府施政參考，徐有庠、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和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經常是該會議的坐上賓。國民黨政府對於徐有庠的重視可見一般。

一年五月抗爭的失敗，同時也讓整個台灣從1980年代興起的一股工運浪潮，劃下尾聲（李建昌，1991：59-61；夏林清、鄭村棋：1992：102-103）。

以結果論而言，遠東化纖產業工會在1989年五月的抗爭的結果，是失敗的；但那一次的抗爭，卻同時也是台灣自1980年代工運的高峰期，人數最多、規模也最大。在《自立晚報》1989年5月14日第四版上，王幼玲曾寫了一篇題為：〈遠化罷工 會員步調整齊 訴諸族群 工運新的範例〉的特稿；文中分析了當時遠化抗爭之所以能夠聚集各方人馬成為史無前例的大罷工外，更認為這次的罷工行動是「台灣工運存亡的決戰時刻」（王幼玲，1989年5月14日）。王幼玲比較桃客抗爭與遠化抗爭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當時遠化的抗爭，不僅僅是「工人」們的抗爭，同時還囊括了各界來站台聲援的工運團體：



……因為他們（指桃客）都是一個站一個站的，都分散了，只需要把他們的車顧好不讓他們發車就好，所以就沒有比較大的、聚集起來的抗爭。但是遠東化纖就不一樣，它是一個傳統業，它不是一個服務業。同時它是個財團，被界定為一個左派去試煉的很好的場域，所以很多人去（笑）。然後，它又是在一個廠區的第一次罷工，當時也有罷工基金支撐。（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王幼玲認為，以當時遠化抗爭的規模與抗爭強度而言，在台灣整個1980年代工運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與影響力：

……那這個（遠東化纖）有戲劇的張力，有罷工嘛，又有圍廠，又發展出野貓式的突襲，這應該是第一次。桃客那時候還比較「偷吃步」，雖然是罷工，但是叫「休假」。那遠化是第一次員工投票通過的罷工，而且訴求挑戰管理權，所以，這個（遠化）在整個工運史上的意義都是凸顯出來的，而資方也把此次當成和工會較力的試金石，所有

的同業老闆都集結起來，支持遠化不能讓步。(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在這場會師各方的遠化抗爭事件中，王幼玲除了同時受到台灣整個工運態勢的高峰與式微之外，也讓當時的她，從自身籌組報社工會的親身經驗中，體悟了工人籌組工會得面臨的龐大壓力與國家機器暴力。

「頭破血流！」---採訪遠東化纖大罷工的經驗

1989年遠東化纖新埔總廠發生罷工事件，肇因於3月24日工會會員徐正焜被資方以「業務需要」為由任意調職，資方認為將徐正焜從新竹調至台北市管理權的行使，受雇者必須服從；另一方面，工會則認為調職是資方依據片面制定的工作規則所為，既未徵詢當事人，也沒有通知工會，有違勞動契約自由平等原則。此外，徐正焜是工會智囊人物，更讓工會懷疑資方藉調職之名，行打擊與瓦解工會之實。工會因此群起要求資方讓被調職與開除的勞工復職，資方態度強硬不予理會。遠化工會在與資方談判不攏的情況下，在1989年5月14日全體投票通過無限期的大罷工，遠東罷工抗爭自此展開（李建昌，1991：59-60）。

遠化正式罷工的第二天，1989年5月16日上午，天微亮，在新埔廠區外，一群遠化紡織廠基層女工，已經站在抗爭第一線，面對如銅牆鐵壁般密麻的保全人員、警察們高呼著「勞資爭議、警察中立」的口號（李文忠，1989）。

其實鎮暴警察早已於前一天進入廠區中，也許是資方下達的命令，或許是國家機器覺得此刻該是展現「國家公權力」的時刻，16日上午七點十分，鎮暴警察開始一字排開，鎮暴行動宛如弦上箭，一觸即發。王幼玲與同業前去詢問在場指揮官---新埔分局長潘榮：「是否聽到昨天縣議會罷工合法的決議」消息

時，鎮暴警察瞬間一湧而上，推倒了王幼玲與《中時晚報》記者楊文全等人（張添貴，1989年5月16日）。

瞬間被警方以盾牌推倒在地，王幼玲當時腦袋中一片空白，等到回神過來，已經看到同業憤怒上前質疑警方為何做出如此舉動，同時被同業拉扶著擦去臉上的血跡。她回頭看，幾十名警察已經開始追打當時是勞支會工作人員的李文忠與工運人士曾茂興，她脫口吼出：「警察怎麼可以打人？！」之後，差一點又要挨著警方懸空而下的警棍重擊，所幸她立即快步退開，而警棍則舉在與她僅兩步之遙的混亂人群中（王幼玲，1989年5月16日）。

王幼玲回憶當時心中的憤怒情緒，其實並非來自於自己遭受波及，而是氣憤遠化罷工既然是政府核准的合法罷工，警察就不應該以暴力介入這樣的勞資爭議：

……那時候覺得，警方你就應該要保持中立啊，那「我們」是合法罷工，應該受到尊重。欸，怎麼突然說成「我們」了…（笑）所以，警方就不應該替資方做這種事情…（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翻攝自《自立晚報》）

上述對現場情境的描寫，其實來自於王幼玲在事後所寫報導中的文字敘述。王幼玲談及當時被波及而受傷的狀況，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她認為這種突發情況，對於當時跑社會運動的記者來說，其實是家常便飯。她事後回想，當時之所以會將現場情況描寫得如此細緻，甚至有些誇大，其實包含著對於警方介入，以及對於國家機器如此粗暴對待勞工的氣憤：

……那時候跑社會運動，記者也是常常會被K的頭破血流，因為你就是跟群眾在一起嘛，那鎮暴一來，警方也不會管你是不是記者，都會被波及。不過我現在再看這篇文章（指在《自立晚報》所寫的當日報導），當然有加了我的誇大啦。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好像也沒這麼氣，沒那麼嚴重。因為那是瞬間很快發生的事…但是我就是想說，這是一個點嘛，我就把它寫出來。（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王幼玲在提及這段過去的採訪經驗時，其實對於自己受傷的印象已經模糊，反倒是當時遠化工會的羅美文遭到資方保全人員毆傷後流淚的畫面，令她記憶猶新；而這個畫面，成為了繼前述桃客抗爭、大同三峽廠抗爭之後，第三個在她回憶《自立晚報》記者生涯時，永遠難以忘懷的重要情景。

羅美文的眼淚

1989年5月16日遠東化纖新埔廠外，抗爭勞工在警方一陣粗暴的鎮壓之下，暫時結束了衝突與失控的混亂場面。當時，遠化工會的主要領頭幹部羅美文，在鐵門深鎖的廠內，也同樣遭受到資方保全人員的毆打（張添貴，1989

年5月16日)，³⁴王幼玲回憶當時現場的勞工開始推拉鐵門，要求放出羅美文的場景：

……他們（指遠化抗爭勞工與在場社運人士）去拉鐵門…羅美文被打了，然後他哭訴。那時候我有很深的感覺，就是雖然他是一個工會幹部，但是他哭了。但那時候我在想，他不是因為他皮肉痛而哭，其實是真的因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很大，因為你抗爭如果失敗，那整個工會就垮了，整個工運能量就會消褪。我那時候的領受是，我看到他哭了，我的感受是：哇，要做一個工會的幹部，要用一個單一工會的力量去跟資方做對抗，對一個工會幹部來說，是多麼大的壓力。後來，我們記者被資方招待進去，資方就帶我們去廠區看，說：「你看，因為他們罷工，我們的機器都停擺了，損失了多少錢…」（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5月6日）

在王幼玲的記憶中，羅美文在抗爭場合時，向來是以一幅硬頸鐵漢的形象出現，而那一次他留下的哭訴的眼淚，看在王幼玲眼中，有了更深的體悟：

……因為，大家都說他是硬漢，所以…我從那樣的眼淚裡面就感受到了。那這是讓我感受到，工人要跟資方用罷工的方式做對抗，感覺像以卵擊石，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嘆氣）。（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戰場不再 風飄零散 同志情誼仍在

³⁴ 原報導請見附錄四。

王幼玲回想那幾年跑勞工議題的時間，與當時的受訪者，包括抗爭的勞工、工運、社運份子，不僅僅是「採訪者-受訪者」或「朋友」關係，而是如上述她提及遠化罷工時，也常常將他們（勞工、工運人士），說成「我們」一樣的特殊關係；更具體的說，王幼玲認為自己是與抗爭者站在同一陣線上的「同志」、「盟友」。

……我自己就覺得這是…嗯，一種同志關係吧。我跟其他跑線的記者不太一樣，因為我自己就在組工會，就是工會幹部，那我們常常會參加聯合工會的活動，都會在一起。（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而這種「同志」情感的形成，來自於王幼玲長期接觸勞工與工運人士的經驗，以及志同道合的同業情誼，以及整體時代氛之中：

……因為，同一個場景，大家都會來，然後就會一起討論，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被同化了（笑）。而且，我覺得那會有一些壓力，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因為有些人還是比較走資啊，但是這種就不會跟我們一起。對喔，聯合報的記者也罵過我。…他說我是共產黨，一個跑勞委會的記者。…到後來，我們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樣，像《聯合報》，《中國時報》，這些大報的記者，就是後來來跑勞工的記者，跟我們這些最早有左傾想法的人很不一樣，那他們就會批評啊，說我們的行徑是共產黨。（管嫻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隨著台灣1990年代後，弱勢、勞工運動走入另一個階段，言論也漸趨自由

化；那種1980年代時，街頭激烈抗爭的場景不再，王幼玲口中的「同志」們，也隨著政黨輪替之後，有的人進入公部門，試圖運用更多的政治資源替勞工爭取福利；有的人選擇蹲在民間組織裡，繼續經營、集結基層勞工勢力。不管如何，都已經轉為個人在不同場域的自我耕耘。王幼玲雖然感嘆，卻也認為過去共同建立起來的那股「革命情感」不會消失：

……我覺得那時候解嚴吧，大家真的感情都蠻好的，到後來，也沒什麼運動了…（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在沒有工作連結的情況下，你就會慢慢去遠了…但是那種心情是會留住的，比如說前跑線，留下來的關照吧，還是會一直在的。（管嫫媛，王幼玲訪談，2008年6月13日）

從第一次在桃園的大禮堂中，聽見曾茂興的粗聲粗語，到嗅到大同三峽馬達廠外飄進鼻中的花香，以及目睹硬漢羅美文流下沈痛的眼淚；這三個場景，不僅僅是王幼玲記憶中難忘的畫面，同時也是她在跑勞工線的記者生涯中，透過自組報社工會的經驗、與工人長期相處的互動，去感受了在整個剛解嚴的時代氛圍下，勞工運動所面臨到的重重困境的體悟。而這樣的體悟，同樣也開啟了她作為一名跑勞工線的記者，試著用手中的一支筆，企圖幫助勞工運動往前發展；試著全心感受、投入群眾、設身處地的站在勞工的立場替他們發聲的實踐道路。

是體悟，也是種啟蒙。如同當年啟蒙她的左派、馬克思理論思想，促使她在1980年代，懷抱著改革社會的理想進入《自立晚報》當起勞工記者。又在每一次採訪過程中，面對勞工處境，而獲得了深刻的體悟。這些都更加堅定了她要為永遠弱勢的勞工發聲的信念；而以致於這樣的信念，變成了王幼玲專業

意理中最重要的內涵，讓她在那個剛解嚴之初的台灣社會中，實踐與發揮了她最原初、最理想的記者功能與角色---與弱勢者站在同方，並替其發聲。1994年，王幼玲在離開《自立晚報》後，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自此沒有再回去當記者。而這段在《自立晚報》頻繁與勞工運動接觸的經驗，促使她在1994年進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擔任秘書工作時，懷抱著成立「勞工學院」的理想；當時她認為，若能妥善的運用公部門的資源，能夠傳播更多勞工階級意識的思想，為左派社會主義社會作準備。但是，公部門的官僚體系與層層科層作業系統，讓她實際感受到在推動理想時的限制與困難。2000年，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她以熟悉勞工法令及行政事務的歷練，被招攬進入勞委會及其附屬單位職訓局擔任主任秘書；過程中，更兩度進出，回到民間的NGO組織--中華民國殘障者聯盟工作。而今，王幼玲再度回到殘盟，致力於推動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政策及法令的倡議，捍衛弱勢者權益。

第三節 李瓊月的生命圖像

李瓊月，本省籍，1958年出生於台北，在1988年進入《自立晚報》。李瓊月與林美挪，邱家宜分別是在1980年代不同時期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負責環保議題的記者。按照時序，李瓊月是在林美挪之後、邱家宜之前進入的。在進入《自立晚報》前，李瓊月在求學期間，並未發展出對於記者職業的具體想像；在進入《自立晚報》後，李瓊月藉由採訪環境議題逐漸發展出屬於個人的專業意理內涵。同樣地，李瓊月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生涯也緊緊扣連著1980年代的環保運動發展的態勢，而她也在採訪1980年代中後期的重大環境公害事件過程裡，藉由現場觀察、與當地居民的互動過程中產生的關懷倫理，逐漸形塑與理解自身的記者角色與位置。對於李瓊月來說，當時整體媒體環境對於弱勢議題報導的輕視，促成她極力在報導上凸顯弱勢聲音的偏向。因此，本節除了按照整體環境運動發展之背景，做脈絡性的鋪陳之外，針對李瓊月個人「印

象深刻」的三次新聞事件-林園圍廠事件、後勁反五輕事件、貢寮反核四事件的採訪過程中的所見所感與實踐（包括報導、採訪方式），逐一建構出李瓊月的記者專業意理內涵。

【李瓊月的生命圖像】

李瓊月，本省籍，1958年出生於台北。李瓊月出生在一個傳統家庭；父親領得是基層公務員的薪水，同時得照料四個子女的成長，在經濟負擔上相較於其他雙薪家庭更重。因此，李瓊月在求學階段時，得依據家中經濟狀況來考量與選擇就讀的科系與學校。在文化大學新聞夜校的求學過程，幾乎都是李瓊月自己半工半讀付學費完成的。

自小生長在一個傳統觀念濃厚的本省家庭，李瓊月從小時候就時常無法理解一些來自父母「耳提面命」家庭規矩。比如說，她每次都得等哥哥梳洗完畢之後，才能接著洗澡，又或者在幫忙作家事時，老是看不到兄長幫忙的身影；在折疊洗好的衣物時，女生的內衣褲絕對不能放在男生衣物的上面等諸如此類的「規定」，讓幼時的李瓊月百思不解，為何哥哥可以做的事情，身為女孩子的她就不行。然而自成長家庭所感受到對於女性壓抑的經驗，直至她在文化大學時進入工讀的《婦女新知》雜誌時，方才啟蒙她的女性意識與自覺，投入當時由婦女新知基金會所發起的一系列「反雛妓運動」等女權運動的行列之中。

1974年的大學聯考，李瓊月在未順利考上一般大學與師專後，她填選了當時的北市商職就讀。原本她在五專聯考時，考上了當時仍是五專制的世新大學，但是一來由於父親對於記者「沒有什麼好印象」，不希望李瓊月選擇念新聞相關科系；二來，礙於家中經濟因素考量，不得不選擇是公立學校的北市商。因此，李瓊月選擇了其實自己沒什麼興趣的商科就讀。畢業之後，李瓊月仍舊想要唸一般大學，所以她開始半工半讀，賺學費、準備考試。她曾經在貿易公

司打工做文書工作，又利用空餘時間補習準備大學聯考。1979年，李瓊月考上文化大學新聞夜校。其實，李瓊月一開始對於傳播新聞科系沒有太多的想像；只因為當時在丁組可以填選的科系很少，尤其夜校的選擇範圍又更小，李瓊月填選文化大學新聞時，只覺得：「…看到新聞大眾傳播啊，就好像比較活潑，那我就填了…」。

在文化新聞夜間部的求學階段，李瓊月因為得自己攢攬學費，除了有過編輯大學刊物的實際媒體作業經驗之外，對於媒體的實務經驗，其實來自於她校外打工的媒體經歷；而開始接觸「記者」與產生當記者的念頭，也在於她在《婦女新知》幫忙籌辦活動時，與當時線上記者的互動。

婦女新知工作經驗啟發的社會意識

1982年，還是大二學生的李瓊月，偶然得知剛成立不久的「婦女新知基金會（以下簡稱新知）」需要工讀生幫忙處理雜誌編輯與相關事務，李瓊月基於對於編輯工作的興趣，就和另外一位同學「分工」加入「新知」行列。沒想到，在與一群具有進步女性意識的學者、律師們鎮日相處，讓她重新理解在兒時感受到「男女有別」的經驗，進而啟蒙了她自身的女性意識。當年還未解嚴，「新知」就發起「反雛妓運動」與遊行；以及為了喚起女性意識，不停的舉辦定期的講座與宣傳，開立了台灣婦女運動的基石。李瓊月在「新知」工作的經歷，不僅開拓了在婦女意識方面的進步思想，在幫忙籌辦「反雛妓運動」的大遊行時，又時常和記者接觸與互動，看到當時《自立晚報》的相關報導，讓她產生了當記者的念頭，並以《自立晚報》作為第一志願。

……那因為我在唸書的時候，還在報禁，還沒有開放報禁，那我在「新知」的時候，新知在發起救援雛妓，就跟媒體互動，會認識嘛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心裡比較想去的，就是《自立晚報》。(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李瓊月還在「新知」工作時，報禁尚未開放，平面媒體環境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並不多；但從1988年報禁開放後，媒體機構逐漸增多，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需求量也大增。當時，李瓊月雖然有兩度進出「新知」，但前後總加起來，她在「新知」的工作已經有六年之久，因此，當報禁開放，懷抱著記者夢的她，離開了「新知」去報社求職。一開始，在朋友的介紹之下，她先進入了《大華晚報》。原本，《大華晚報》出缺的是影劇線記者，所以李瓊月並沒有立刻進入，直到有環保線的缺職，她才進入《大華晚報》擔任環保線記者。

「三十而立」進《自晚》…

跑環保新聞的記者除了需要編寫功力之外，也需要具備專業的知識，以及對於當時各大環保、公害議題有深入的了解。李瓊月雖是學新聞出身的，但初入報社時，她在環保專業知識領域仍是一片空白，因此她時常利用發稿完後的下午時間，補足自己的專業知識。除了去旁聽環保署的會議外，從過去到當時各類的相關報導與資訊，她也都一一閱讀蒐集，就像在「蹲馬步」練功一般。

……因為是晚報，所以下午有很多時間，當時，我就利用下午的時間去補了專業的知識。當時環保署有一些會議，我都會去旁聽，有點像在蹲馬步。因為，你如果只是每天跑，那就會很浮略嘛。(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沒想到這樣「蹲馬步」練功的過程，讓當時在《自立晚報》擔任綜合組主

任的林美挪看到了李瓊月的用功程度，跟其他被歸類為「官派報紙」的記者跑新聞的態度大不相同，因此，在《自立晚報》環保記者出缺時，林美挪就找了李瓊月接替環保線。

……可能是因為我跑新聞讓人家覺得說比較不像是大華晚報的記者。就那個時候，自立晚報有個缺的時候，那個…我的組長美挪就問我說：「欸，妳要不要來？」…她有遇到我，她也覺得說，一般來講，大華比較像是官方的報紙。那我自己的第一志願就是想進自晚，那時候沒機會。那我覺得，既然有個機會，那我就去了。（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李瓊月進入她的第一志願---《自立晚報》後，似乎如魚得水一般，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而《自立晚報》的科層組織與各組分工情況，又不如其他報社內部這般嚴密，因此李瓊月覺得當時即使領得薪水不如其他報社記者多，但是《自立晚報》卻給予她更多的專業空間與記者自主性，讓她覺得「我們是跑得很累，但也很快樂！」

……進去之後，我就覺得，哇，好像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也不知道這些意識從哪裡來。在《自晚》的時候，很enjoy，因為我的主管她不太會壓你，而且她給你空間。我們常常在早上趕稿的時候，看到其他報社的記者，聽他的長官命令東命令西的，而且他們也不太能去挑戰長官，感覺大家都很痛苦，然後聽長官在那邊指揮東指揮西的。而我們的空間很大。…所以當時就覺得，薪水領得少沒關係，但你作為一個記者的專業跟空間很重要。我覺得其他報社的記者都不是很快樂，但我們是跑得很累也很快樂。（管嫻媛，李

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有趣的是，原本反對她當記者的父親，在得知她進入《自立晚報》工作後，反對的立場也隨之一改，也許是基於自身立場與《自立晚報》重視本土性的創辦宗旨與形象相符，他開始逢人就說自己的女兒是《自立晚報》的記者，並甚至以此為傲。

……後來他們雖然反對（我當記者），但是因為他想法比較本土，所以他覺得，唉，《自立》也不錯。所以當他跟他的朋友講他女兒在《自立》當記者的時候，他不會覺得丟臉，他覺得不錯。（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其實，1988年，李瓊月入行當記者的那一年，她年歲已經三十，就「三十而立」的標準與入行當記者的資歷而言，³⁵她算是很晚才「入行」的新手；然而，她立志要當記者的目標，卻促使她在三十歲時，一無反顧的跳入媒體圈中，展開她隨後持續堅持站在第一線的漫長記者生涯。

她初入《自立晚報》時，就依《自立晚報》綜合組跑社會運動新聞的「規矩」；一個人被丟到南部工業區的抗爭現場，而這此現場採訪的作業經驗，卻也成為她日後的採訪「習慣」與準則：採訪必到現場，不然就不算是跑過社運的記者。

他們的苦難成就了台灣經濟的發展…

1980年代中期開始，地方居民因為長期受到工業污染所苦，逐漸由對於生

³⁵ 李瓊月在《大華晚報》擔任環保記者的時間，為1988年3月到1988年7月。

活環境不斷受到干擾的不滿，衍生出對於環保意識的覺醒與啟蒙，展開了一系列的自救抗爭。而1988年九月爆發的林園事件，就是在解嚴後，政治箝制鬆綁之際，而發展出的一波激烈的自救抗爭。

從1950、1960年代開始，台灣工業化的推展，一直是在國民黨威權政府強勢主導下發展的。一開始，以經濟為首要發展目標，是為了要和共產中國競爭；後來，則成了國民黨威權政府鞏固政權正當性的首要策略。然而，由威權政府所主導的工業化過程中，缺乏民主體制的監督與參與，因此，國民黨政府在1970年代大力推動的石化工業、鋼鐵工業與核能電廠等重型工業等，儘管確實造福了中產階級以上的民眾利益、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但卻讓身為工業區建設區的中、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伴隨著「污染」一同成長，而付出不可計數的環境污染代價（何明修，2006：10-11）。如果說，1980年代台灣展開的環境自救運動是由國民黨政府自己所埋下的地雷，一點也不為過。然而，隨著198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因失去外部支援，內部又遭逢民主化的聲浪震盪，至1980年代中期後，各地區因不堪長期污染而發起的自救運動，在政治箝制逐漸鬆動與黨外運動興起等等因素下，逐漸開展。李瓊月分析當時整個環境運動發展的脈絡，對於政經資源與資訊的在南北分配不均的狀況，有著極深的感觸：

……我覺得，很多公害因為你不是當事人，你無法去了解他們實際上的受害程度。今天一個公害問題會爆發，其實都是他們已經達到了某個容忍限度，才會爆發，傷害都是已經發生了，或是某些團體、學界進入現場，告訴他們，他們才會知道的。這就是資訊的不對等。因為地方居民很難知道實際情形，企業入主地方，只會跟他們說，可以增加你們的就業機會，他們也無法取得更詳細的資訊。（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我記得以前去後勁，妳坐火車坐到一個地方，妳聞到一個味道，妳就知道說，欸，後勁到了；顯示那個問題是長期累積下來的。那過去，高雄就是有好幾個工業嘛，譬如說，仁武工業區，林園工業區，後勁的中油輕油裂解工廠。那過去他們發展那麼多工業，其實，是有讓台灣的經濟成長，可是承受污染的就是他們。（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當時因長期工業污染引發中南部居民自救意識，而展開激烈圍廠抗爭的林園工業區，就是李瓊月進入《自立晚報》後，第一個單獨作業、親歷抗爭現場的公害報導。



由大雨沖刷出的抗爭---林園事件

1988年9月20、21日接連兩日，高雄林園鄉下起了打在人們肩臂上會發疼的大雨。

這場大雨，對於難得降下豪大雨的南台灣而言，原本該是場除去暑氣迎接涼秋的甘霖，卻讓林園鄉漁民們賴以為生的汕尾漁港，遭受難以恢復的嚴重污染，也沖刷出了林園鄉漁民們的憤怒與抗爭。

林園鄉，位於高雄縣南端，隔著高屏溪上的雙園大橋，與屏東縣遙遙相望。林園鄉位處在中芸、汕尾兩大漁港旁，當地鄉民皆以務農、捕漁業維生，在1973年經濟部低價收購當地農地興建工業區前，汕尾漁港中豐富的魚群，不僅是當地居民的經濟來源，更是林園鄉民兒時美好成長記憶的所在。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研究員王敏玲，在一篇回顧林園鄉事件的文章中，這麼寫著：「…異於現代孩童五光十色的投幣式遊戲機，有濃濃鹹味的中芸漁港就是他們兒時放學回來的遊樂場。老同學一見到歐吉桑又開始千篇一律地回憶著說：『早

時咱惦溝子內，隨便抓嘛全魚……』…」（見

<http://sowkh.sow.org.tw/e-paper/habitat/h-060716-01.html>）。

原本美好的魚米之鄉，在政府強勢主導「十大建設」的過程中，變成一座充滿民怨與臭氣的晦澀地帶。1973年11月12日，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宣佈十大重要建設之一的石油化學工業設廠地區，決定由林園魚米之鄉擔任這個重大的發展據點後，林園鄉瞬間就成為了「前景看好」的林園石化工業區。「前景看好」的林園石化工業區，在1976年興建完成，工業區內各工廠所排放的廢水，經由廢水處理廠處理後，就這麼直接排入林園鄉漁民的生計來源---汕尾漁港中，造成嚴重污染。政府一廂情願的推動工業建設，卻沒有推出保護環境的對應措施，反倒因而埋下南台灣的污染之源自打腳板之外，也促發了日後林園鄉為期21天圍廠誓死抗爭的抗爭因子。³⁶

林園事件爆發時，李瓊月剛入《自立晚報》一個多月，跑環保線的經歷前後加起來也不過六個多月的時間。然而，對於報社而言，無論這個記者跑了多久，或是對於事件夠不夠了解，記者面對報社指派的任務，就是得極力達成使命。

當時，《自立晚報》每天早上都要開編採會議，當時擔任綜合組組長的林美挪，開會回來之後，就對著當時的菜鳥記者李瓊月說：「瓊月，妳現在打電話給環保署長簡又新，問他林園的事情怎麼處理；然後呢，妳下午就訂個機票，去林園工業區。」李瓊月對於林園事件發生的脈絡雖略知一二，但對於在成長過程中，甚少離開過台北的她而言，林園工業區的地理位址在她腦袋中根本沒個頭緒。但李瓊月當時還是硬著頭皮打了電話給高雄的朋友請她幫忙接她，連住的地方都還沒搞定，她就這麼飛下去了。

³⁶ 1988年9-10月間，林園鄉漁民圍堵在中油二、三輕廠前。爆發因子來自於林園鄉漁民發現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的廢水外洩，造成汕尾漁港魚群大量死亡。盛怒之下的漁民們切斷處理廠的電源，造成工業區中18家廠商停工，影響仁武、大社的中下游工廠。幾乎中斷了台灣的石化產業。在居民長達21天的圍堵與談判後，中油宣佈停工，並賠償當地居民13億3千萬元的高額賠償金。（何明修，2006：130）。

……那時候就想說：「林園工業區在哪啊？」好，我就先做完早上的採訪，然後就打給工業局說，我下午要去拿林園工業區的資料。因為妳要去的時候，要先知道林園工業區是哪些性質的工業，然後位置在哪裡。我就打電話給高雄的朋友說：「不好意思，我沒有去過林園工業區，妳可不可以來小港機場接我，帶我到林園工業區？」結果我朋友就騎了摩托車來。我記得我們騎了很久才到林園工業區。然後，那時候已都在圍廠了。（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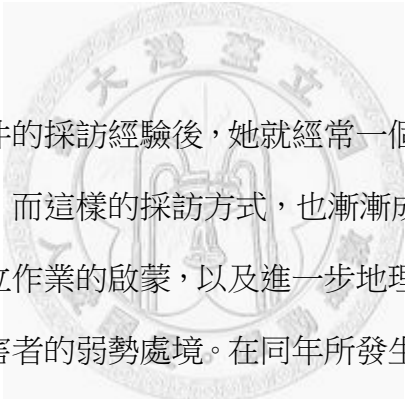
其實，當時《自立晚報》有駐當地的記者，因此，照理來說，在林園鄉發生的事情，應該由駐高雄的記者負責；但是《自立晚報》內部有個「不成文的傳統」³⁷：不管是不是妳負責的業務，有抗爭發生的地方，妳就得出現在現場。李瓊月當時也是如此；她認為這種要求是讓記者迅速成長的「必修體驗課程」。她認為，跑環保署的新聞，不應該待在環保署寫新聞，而是真正到達每個公害現場，才能實際體會「公害」是什麼模樣。李瓊月去林園鄉採訪時，因為當地淹水嚴重，她為了要發稿，還得到處在工業區內向工廠借傳真機發稿。

……那…寫環保署新聞，那在辦公室也沒公害發生，他都是在處理政策或環評，或者是跟地方配合，那我覺得，妳到了第一線，到了公害現場，對一個跑環保的記者來講很重要。我覺得環保記者應該就要去公害現場看，除了去林園，我後來也去新達港，還有二仁溪，都有去。那我覺得這些累積之後，妳再回去環保署寫官方的新聞，妳的視野會不一樣，或者是妳看問題…，因為他們都是在冷氣房

³⁷ 所謂「不成文的規定」其實有來自各種層面因素所促成的。我將在其後中提出解釋。

做決策啊，或者是在冷氣房討論，那他們不知道事實上地方所承受的公害問題有多麼嚴重。(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如果我沒有去看過林園工業區，那我在台北寫，我永遠只會寫環保署的政策怎麼在處理這件事，學者在怎麼評論，環保團體在怎麼講…那到第一線妳就會發現說…我記得他們那個時候還發生了登革熱，我就覺得，欸，怎麼那麼倒楣，又發生那個又有登革熱。汕尾漁港那邊都有登革熱。這對我來講，我還蠻覺得說，那段經歷是對我作記者來講，很重要的經驗。(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然而，有了林園事件的採訪經驗後，她就經常一個人被報社指派前往每一個公害、抗爭現場採訪，而這樣的採訪方式，也漸漸成為她的採訪習慣。林園事件的採訪，開啟她獨立作業的啟蒙，以及進一步地理解公害污染對於當地居民的傷害，以及這些受害者的弱勢處境。在同年所發生的後勁反五輕的激烈抗爭，讓她從親歷現場，親身體悟公害與受害居民的處境，發展至在報導寫作上的聲援與支持。

後勁反五輕抗爭，是李瓊月投入相當多心力採訪的公害事件，而當時後勁自救居民為了凸顯訴求而展開的激烈抗爭現場，也成了李瓊月回憶在《自立晚報》當記者時，永遠難以忘懷的畫面。

屠城巨馬入後勁

1990年1月10日，政府無視於後勁居民奔波各部門的訴求，以及持續三年多的激烈抗爭，以及工業區所造成污染而付出環境與社會成本；經濟部在當天

宣佈中油五輕廠在近日內一定會興建的決心。在三年多的抗爭期間，甚至更早之前，後勁居民得「習慣」這些建設所帶來的污染。包括從聞到令人作嘔的油酸臭味需要掩鼻，到泰然自若的吸進污染空氣；從喝了多年點火即可自燃的地下水，到吃下受到污染地下水源栽植的農作物；從就寢時需要緊掩窗門才能稍稍減弱從工廠區傳來的震耳噪音，到將這些惱人的噪音當作是環境的「自然音」。

在1940年代前，「後勁」是現今高雄市北部一帶廣大的農田，因為太平洋戰爭需要，日本海軍在1941年興建了專屬的燃料油工廠，即現今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前身。1946年，煉油廠被中國石油公司所歸管，當時台灣石化產業被定位為國防產業，在1970年代後，則被包含在政府宣佈的「十大建設」中的重點發展產業裡（何明修，2006：92-101）。原本後勁以務農為主的鄉村風景，被政府所帶來的石化產業破壞殆盡。一開始，政府宣稱能夠提供後勁人更多的就業機會，原本以務農為主的農村子弟，自然在這樣的說詞之下展臂歡迎，卻沒想到迎來了一座屠城的石化巨馬，讓後勁成為促進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石」的同時，也毀了後勁人的生活環境，讓後勁人活在一個痛苦不堪的火海深淵之中。

李瓊月採訪後勁反五輕的過程中，後勁居民抗爭現場，每每都令她傷感至極。但後勁人保衛家園與捍衛自我權益的抗爭意識，並未在政府宣佈五輕即將動工之後潰散，反而藉由激烈的抗爭形式，讓社會看見後勁村民的憤怒與無奈。1990年3月25日，李瓊月親睹後勁自救居民攀爬上滾燙燃燒塔的採訪經驗，讓她深切的體悟到後勁人的苦痛。

滾燙的中油燃燒塔

1990年3月25日午後時分，本該是個適合小憩的春天美好午後，卻是後勁居民持續抗爭三年未得善果之後，一個突發激烈抗爭的的午後時分。

下午三點多，後勁鳳屏宮正在上演著諷刺政府部門顛預決策的布袋戲碼，引著台下圍觀村民時時高呼叫好；鄰近鳳屏宮不遠處，卻傳來後勁反五輕自救會的劉永鈴、楊朝明突破警方與廠方重圍，攀爬上中油煉油廠的燃燒塔上，高掛反五輕的大布條，並把自己銬在燃燒塔上。

李瓊月當時就在中油燃燒塔下看著劉永鈴與楊朝明爬上塔的「驚險畫面」，心中隨著這些驚險動作起起伏伏而糾結成一團。李瓊月回想當時看到劉永鈴瘦小的身影，攀爬上十層樓高的滾燙燃燒塔上，不禁感嘆這些長期受中油迫害的後勁人，竟然為了要凸顯再正當不過訴求，就著麼不顧自身安危爬上去，讓她感觸極深。

……我記得跑後勁五輕的時候，居民已經弄了很多抗爭都沒有用，在立法院也被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有一次我就到後勁去，在要動工之前…我那時候去看，他們就跟我說，後勁人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抗爭作業。後來到了現場，劉永寧穿著後勁反五輕的衣服，他腳是一拐一拐的，不像我們一般人…他爬到中油煉油廠的上面，很高。那時心裡想，這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做法。那時候我看了就覺得，第一個，他腳不好，而且你又爬那麼高…因為那就是一個煙囪，會不會很燙？第二個，那到底會不會有危險？（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我事後問他們，上面會不會很危險，他們說有先去問過中油內部的人員，知道溫度是人可承受的。但我那時候看了就很難過，覺得台灣因為要經濟發展，然後在那邊辦一輕二輕，而一輕二輕他們的油管一直都沒有弄好，搞得地下水都漏油。那後勁在抗爭之前，他們（居民）都是喝地下水，那很可怕，因為後勁的地下水是你把

它舀起來，點火就有了，所以台塑他們也有去做過一些試驗。那我就覺得，在台灣所有的人民都納稅，那為什麼後勁的居民必須承受這樣的污染。我看了就覺得，這種環境不正義，社會不正義，在後勁是可以完全看出來的。後來來了一個強勢的郝柏村，就動工了嘛。

（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當時，李瓊月眼見後勁人為了要凸顯訴求，竟然得以這樣的方式表現誓死決心，因此，當她回到報社發稿時，一股腦兒的猛寫後勁當天的抗爭行動，稿件一篇一篇的發出，組長林美挪還因此笑她搞得像是要出書一樣。

……我記得我那天早上在發那條新聞的時候，我主管林美挪就說：「哇，這瓊月是已經要出一本書了是不是？」因為我就一直寫一直寫，然後機器就一直在收我的稿子，我也不管說我的版面到底有多少，我就一直寫。那時我覺得，你要把他們的訴求全部寫出來，雖然她也沒有把我的所有報導都登出來，但是她卻給了記者那麼大的版面。（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翻攝自《自立晚報》）

隔天出刊的《自立晚報》第三版上，幾乎以半版呈現了後勁抗爭的報導，

李瓊月從事發過程，到事後的訪問，都逐一呈現在報紙上。而她當時所感受到的經驗與感觸，就她自己而言，報導的呈現只是一小部份，其他未能以文字呈現的，才是她從這次採訪經驗，或是往後採訪經驗中，所得到最大個收穫與與觀察體悟。

……所以這條新聞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想盡辦法要凸顯訴求，可是就是沒辦法。那當時給他們的條件就是，二十五年遷廠，二十五年快到了，但是不太可能啊。我覺得政府就是犧牲他們了。因為我以前根本沒有機會去高雄，我覺得我跑這個新聞去高雄的次數，是我這輩子，因為我三十歲才開始當記者嘛，是這三十年來都不曾有的次數。…那時候跑高雄的這些公害事件，讓我深深覺得，台北的政經資源都太好，稅也都是台北收，但是高雄是讓台灣經濟起飛的地方，可是污染都在那裡。然後，寫了這些新聞，你也改變不了什麼…我覺得《自立》好的地方，就是他給記者、給環保議題比較多的空間去報導。（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我們在全國版的環保新聞，都是環保署的新聞，可是公害問題，或是查緝污染的問題都是在地方。那地方的話，除非妳大到像林園，像後勁，像濱南什麼黑面琵鷺那種，妳才可能在中央看到，不然妳如果在地方抗爭，妳也是地方版的新聞。可是地方版的新聞，台北人看不到啊，或者是，決策官員也看不到啊…（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所謂「台北人看不到」或是「決策官員看不到」的情況，在台灣當時所發生的環境公害事件，其實算是「常態」。經濟部的決策是在冷氣房裡想出來的，

環保署要發展對應的機制，也得在考量台灣經建發展利益的條件下有限制的訂定。但是對於那些伴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污染情況，卻是每日每夜的在「地方」實際發生的。那些地區曾經是提供台灣糧食，餵飽台灣人民的美麗「魚米之鄉」，在政府經建政策的推動下，卻成了最無辜的受害者。李瓊月猶記當時在環保署的環評會場中，居民為了讓在座的政府部門的「環境專家」們實際體驗到「後勁人所呼吸的空氣」與後勁人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恐懼之中，因此拿起殺蟲劑在會場內「狂噴」的舉動，頓時讓會場內開會的環保署官員們，立刻奪門而出的景象。

……有一次環保署在審五輕的環境影響評估，那次我印象很深刻。那次他們一直爭取，爭取到最後，居民代表可以進去聽。那時候我們有兩次截稿嘛，一開始因為學者都不願意講什麼，但我趕著發十點半的稿子。後來我就看到後勁的代表有點動作，審到一半的時候，他們拿出DDT（殺蟲劑），開始噴，然後所有人就跑出來。其實他們想要表達的是，後勁每天都過著這種生活。他們想說，他們那裡每天排放的廢氣，讓他們每天都睡不著，每天要關窗戶，帶口罩。他們只是想讓環評委員知道，他們身處在這樣的環境裡；每天都不知道排出來的廢氣裡面是什麼東西你們只不過遇到這個…就嚇得奪門而逃。…就好像我們去採訪灣裡的廢五金燃燒。為什麼小學生上學要戴口罩？就是那種感覺。那你在台北你無法感同身受。那他們用什麼遊行、來台北抗爭，住紮在中油門口，都沒有用。所以他們就用一個模擬的方式，讓你們知道。（管嫫嫫，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除了在公害現場實際看到地區居民的受害慘狀有感而促使李瓊月「死命埋

頭」的寫出環保、自救團體的訴求之外；當時媒體在報導上「北重南輕」的失衡狀態，也是影響她偏重讓弱勢發生的報導傾向的重要因素：

……其實因為那時候跑後勁就是說…第一個，我剛剛有講說，他們從一輕、二輕開始，那裡都是工業區嘛，那從一輕開始，本來就是從日本留下來的中油煉油廠…那，那裡的地下水污染，他們都不知道之前喝了好久的地下水，後來又要蓋一個五輕，然後…我覺得為什麼過去已經那麼多年都承受了，那妳還要把舊的留給他們，那如果留給他們，那環保問題要怎麼解決？其實你就看…那邊都是台灣非常典型的鄉下人跟很純樸的農民…為什麼都是他們在承受…那時候還是老三台的時代，那他們的訴求幾乎都出不來…她們能夠出來講一句話的機會很少啊。而且，她們又是在南部，本來媒體就比較失衡了，…所以後來她們也是常常來台北抗議啊，因為來台北，才會變成台北版的、全國版的新聞。(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當時媒體的失衡、對於公害環境的實際訪查、對於受災居民的同情，這些因素，都促使李瓊月在報導上傾向對於弱勢的「偏重」。多年的公害採訪經驗，李瓊月深刻的感受到，在發展主義至上的政府思惟下，受害的居民除了自救之外，只能仰賴有限的資源創造自己的反抗戰場；但現實的情況是：沒有政經背景與雄厚資本撐腰的這些弱勢居民們，面對著挾持雄厚資本與政經資源的大財團，只能將苦水往肚子裡吞吞。世代付出血淚反對核四建廠的貢寮自救居民們，就是這樣的寫照。李瓊月分析當時核四興建之所以引起當地居民極力反抗的原因，就在於台電與政府相關單位，都無法在確保居民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強勢要興建核四廠，而導致居民抗爭。

……因為根據國外的規定，就是應該要有32公里的隔離環境區，可是貢寮核四，只有一階之隔，換句話說，核四若發生重大意外，他們根本來不及跑。而且，sars之後更讓我覺得，真的發生意外，醫生護士願意進去嘛？若核四發生意外，交通可以疏散嘛？真的有人願意進去嘛？而且它就是在空氣飄，有誰敢？（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李瓊月在1980年代末進入媒體職場所跑的幾個重大環境議題中，核四爭議是最令她深刻感受到南北資源不均現實情況的案件：

……核四我有去跑公投。它是第一個台灣史上，第一個有行政單位（鄉公所）辦的核四公投。我記得當時去跑的時候…核四已經爭論很久了，蔣經國也曾經喊停嘛，所以是很有問題嘛。而且，我覺得台灣政府對東北角，就是金山萬里到貢寮這些居民真的很不公平，台灣四座核電廠，為什麼那麼近，他們要有三座？而且原本已經規劃一個國家公園風景區在那裡了，你為什麼還要蓋一個核電廠在那裡？（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跑核四新聞的時候，台北縣規定，內政部規定，他們的房子不能超過三層到四層樓，因為會影響什麼。可是，核電廠卻蓋了十幾層，那他們為什麼不能蓋超過三到四層？當地居民想蓋觀光旅館都不行。（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從1980年9月政府宣佈將在貢寮興建核四廠後，貢寮鄉民們開始展開為期

幾十年的世代抗爭。³⁸李瓊月開始跑核四議題時，反核四運動已經開展一段時日了，當時，令李瓊月印象深刻的一次採訪經驗，是在1994年5月份由貢寮鄉公所舉辦的核四興建公投事件。

台電欺負人！

在5月23日公投前夕，台電公司在台北開了一場記者會，會中發表了核四興建的意願調查資料，說明有多少成的人贊成興建核四廠，這項消息經媒體報導一散出，對於隔日就要舉行公民投票的貢寮鄉居民而言，無疑地，是一波很大的打擊。李瓊月回憶當時聽到台電開記者會時，她心中充滿了憤怒與不平，認為台電公司利用它原本具有的雄厚資本來壓迫這些弱勢的貢寮居民：

……我記得我在要投票的前一兩天就下貢寮。那時候，台電在投票的前一天，在台北開了一個記者會，說明有多少人贊成蓋核四。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對等的，因為台電請蓋洛普來調查，你也是用政府的錢，可是對貢寮自救會的人的來說，他們怎麼會有這個錢做這件事。可是台電就是想利用這個來影響媒體的效應，所以我當時就很生氣。台電最被人詬病的就是台電文化問題。如果說，台電你願意出一筆錢給貢寮的居民說，你們也來作你們的宣傳，那這樣才

³⁸ 能第四發電廠計畫，早在1980年便已提出，在1982年至1986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中也編列新台幣110億元，並執行三十一億餘元。1986年，當年發生車諾比事件，行政院長俞國華有鑒於各界質疑聲浪不斷，加上用電成長趨緩，指示暫緩興建；同年7月，未執行的七十九億預算遭立法院凍結。1992年，立法院預算委員會通過解凍核四預算案；1995年、1996年又分別通過核四預算1126億餘元。1998年5月24日，立法院通過「立刻廢止所有核能電廠之興建計畫，刻正進行之建廠工程應即停工善後，並停止動支任何相關預算且繳回國庫」之決議。行政院隨即於6月12日提出覆議案。10月18日，在民進黨及新黨黨團缺席下，覆議案獲得通過。貢寮鄉民從1980年代之初就已經展開反對興蓋核四的抗爭。

對等，可是你在投票前辦了一場記者會。我當時也去質疑他們，為何在公投前做這樣的事情，因為台電一直在利用他們的行政跟資源做這樣的事情。可是我覺得，台電的記者會其實造成一個反效果，因為貢寮人很生氣。我覺得那次公投算是很成功，因為投票率還不錯，而且投票出來反對是百分之九十幾。而且已經經過那麼長的（改善／溝通）時間，可見你台電做的敦親睦鄰也好、說明核電有多安全什麼的，都是失敗的，應該要再檢討的，可是他們還是要蓋啊。政府中間雖然有一些妥協的方式…但是最後還是要蓋，那可見公投根本就是玩假的啊。（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在李瓊月漫漫記者路途中，從藉由對於公害事件本身的探訪，到理解弱勢居民的實際處境，都讓她在報導時，傾向讓弱勢發聲，努力傳散環保與自救團體的訴求，以扭轉媒體報導失衡的狀態。在採訪的過程裡，她對這群弱勢的受訪者的關係，不僅僅止記者與受訪者的採訪關係。她對於這些弱勢居民在新聞事件發生之後的生活處境，有著極深的關懷。這也反映在她從事記者工作二十年間不曾間斷過地，只要一有機會就會重返貢寮鄉探訪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上。

……貢寮，從我開始跑到現在，自救會已經換了很多任會長。現在的會長叫做吳文聰；即便是現在和他們通電話，他也會知道喔，是你啊，他們也會很樂意接受採訪。就是…雖然離開了這條線一陣子，但是從過去累積到現在的人脈都還是在的，他們對你還是有印象的。因為我一直對核四議題很關心，所以即便在不同的媒體，我都有寫過核似的新聞，或者是，他們有比較大型的活動，我已經不在那條線上，但都還是會到現場去看。（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

年5月1日)

「看到他眼眶泛紅，我好難過…」

事實上，環境的改善就如同一條持續在進行的接力賽跑，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因為某一篇新聞報導就讓政策轉向。長期待在環保線上持續努力讓環境弱勢者發聲的記者李瓊月，在面對貢寮世代反核四運動的自救居民現今的處境時，有時也感到非常無力與感傷。

……反核到現在，已經二十一、二年了，還是要蓋啊，貢寮居民也是很無奈啊。今年總統大選前，我有去貢寮拍，問他們今年投這一票，跟往常有沒有不一樣？他們就說，就很失望啊，對民進黨也很失望。他們覺得這是民進黨的政見，你為什麼不好好做？弄到最後，核四也被整個犧牲掉了…那沒有辦法，馬英九也一定會幹的。其實民進黨繼續執政他也一定會蓋。(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李瓊月認為，當政府以經濟成長為由而興建「不得不蓋」的重大工程時，一些處在邊緣角落的弱勢者，就必須一肩扛起與承擔「提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沈重擔子。這對她而言，不僅是對弱勢者的忽視，更是整體社會正義與公平無法彰顯的寫實情況：

……現在大家都用經濟成長來壓你，國外也有例子，就是投票看要不要蓋啊，可是台灣就是沒有這個空間。貢寮沙灘，當時也是整個犧牲掉了，我看了也是很心疼…(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

1日)

不僅心疼台灣土地在政府追求經濟成的過程中所受到的侵害，李瓊月面對這些長期抗爭卻未能如願成功的弱勢居民們，也同樣感到心疼與不捨。在一次偶然機緣下，李瓊月再度回到貢寮鄉去探訪從反核運動開始就不停記錄每一次抗爭影像的貢寮鄉民廖明雄，想要看看他的近況。當她看到廖明雄講到激動處，逐漸眼眶泛紅哽咽時，她自己也無法抑制的陷溺在這樣無奈的氛圍之中。

……他們很多的會長也都死了，有人一家世代都在反核。有一個叫廖明雄的，他從反核的第一場活動，就拍了好幾萬張的反核照片。因為我那次去訪問他嘛，他就有點哽咽的說，他拍那麼多照片，如果有一天，核四廠運作起來，他的子孫問他為什麼不反核的時候，他就會說：「有啊，這些照片給你看！我們有啊，但我們也無能為力…你的爸爸、媽媽，你的祖先，我們有反核的，但是，我們不成功。」講一講他就很難過，有點眼眶泛紅。我好幾次去那邊，就很難過。(管嫻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面對從未真正被解決與改善的公害事件，面對因為每日新聞作業不允許你一天到晚追著這個議題不放的現實條件，李瓊月除了竭盡所能的利用機會讓這些議題曝光之外，剩下的，也只有無奈。

……其實我們跑一跑也很無力，因為即便我們下去了，可是我們也不可在那邊待很久啊…那每一次發生大事件，我們才下去，或是像上次二仁溪，我們是因為要去做那個專題，所以我們下去，可是我們回來報導之後，結果呢？公害還是每天在發生啊，那回來之後，

我們又要忙著下一個題目，或是忙著每天的新聞。我覺得台灣公害問題議題沒有很大的解決啦，就是還是一直在發生。那人…有時候為了生活，他必須…，像後勁，我後來聽說劉永寧他去種竹筍…那，也沒有辦法保持連絡；因為…包括如果妳換線了，妳不再跑這個，妳也就不會再…。那也包括說，妳也沒辦法駐地一直寫那些新聞，而且媒體也沒辦法一天都讓妳登那個新聞。（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我是運動型記者嗎？

對於這些弱勢居民的關懷，無疑地，都反映在李瓊月的報導立場與筆調中；然而面對所謂的「記者專業倫理」與弱勢關懷之間的分寸拿捏，李瓊月自有其一條時時反省與提醒自己的準則。

……我自己會有警惕。有時候我碰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說：「啊，你寫得好棒好棒！」我就會想說，那我是不是報導只有寫他們的好，我不會很高興，會覺得，那我可能要注意一點。但在報導的比例上，我不會否認我給他們的篇幅比較多。但我覺得我們的媒體本來就失衡啊，比如說，為什麼我們的媒體都在台北？為什麼他們就叫地方版？我覺得，長期以來，政府資源、預算、經費，或者在媒體觀點上，都是失衡的。有些記者，有時候也會說，啊，你幹嘛寫那麼重？我自己會覺，我只是多寫他們一點而已。譬如說…我去跑中油、五輕這種，我很難去寫中油的好…，不只好而已，或是要寫這其實是一種經濟的必要，或者是怎樣怎樣的…而且是一個汰舊換新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她們已經被忽視了二三十年了，那個媒

體從來都不重視她們的，那…那個時候，當有個五輕要蓋的時候，我覺得她們的聲音，應該更多更多被知道。(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5月1日)

即便李瓊月自認有這樣的自我警惕，但是許多同期的同業，還是認為她是屬於「運動型的記者」。她對於自己被人理解成「運動型記者」有著這樣的解釋：

……那…我覺得運動型記者，應該是說…我沒有去參與策劃什麼啦。那…應該說，那個年代在跑社運新聞的時候，有一些人把一些人跑新聞的方式，跟呈現新聞的方式，設定成是運動記者。(管嫫媛，李瓊月訪談，2008年7月9日)

從1988年，她三十歲那一年，進入媒體當記者開始，李瓊月已經持續在新聞路上，持續跑了二十個年頭。即便在離開《自立晚報》後，輾轉從幕前到幕後、平面到電子媒體工作過，所經常關注與報導的新聞，更是從沒離開過弱勢與環保議題；今年五十歲的她，仍舊堅持在要在第一線當記者；目前，她在公共電視的「獨立特派員」擔任新聞製作人，日前因為報導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而獲得新聞獎項的肯定。即便她自己承認體力大不如前，但她認為新聞的生命力，就在於能夠在第一線採訪時得到的那種喜悅與「累得有價值」的感動，因此堅持至今。

也許大環境與時代的影響，當她走過這些大大小小的公害現場時，很難不被這些慘況與弱勢居民的抗爭所震撼；也許是當年《自立晚報》所提供給她的自主空間與同事氣氛，讓她能夠「放肆」的報導這些議題；當然，這些外部環境的因素，還不足以構成讓一個記者在其崗位上，持續努力的尋找更多讓弱勢

聲音展演的空間。她說她不喜歡被定位成「運動型記者」，因為她沒有實際的參與社運團體內部的運作與討論，頂多是多寫弱勢的訴求與聲音。然而，在那個剛解嚴的年代，當多數媒體按照政府邏輯報導時，她與《自立晚報》的一群同事們下筆時的「重弱勢」的傾向，其實不僅是用筆報導與記錄而已，以某種標準而言，李瓊月是在用「筆」來實踐她對於土地與弱勢者的關懷，同時也參與、聲援、鼓吹了當年環境運動的發展。

第四節 彭琳淞的生命圖像

彭琳淞，本省籍，1961年出生於新竹，1989年進入《自立晚報》。彭琳淞在選擇就讀東海社會學系前，對於社會學系的認知是「一個服務人的科系」，直到實際就讀社會系之後，才恍然大悟自己當初的錯誤認知。但也因為這樣的錯誤認知，促使他接受社會學思惟的訓練，在求學階段已經開展出自我的社會改革理念；這樣的訓練與理念的養成，對於他作為《自立晚報》記者有極大的幫助。在新聞專業實踐上，他以鉅觀的社會條件，觀察新聞事件發生的各種面向加以分析，逐步地建立出自己的報導風格。對於彭琳淞而言，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是他在政治組記者時期，建立報導自信的關鍵事件，也從這一事件中，他選擇了他所認為應處的記者位置---「站在群眾的角度看」的記者位置。而1993年他耗費一個多月，自己上山下海深入原住民足部落的深度報導，則是他在進入綜合組之後，真的深入採訪地點「站進去」的關鍵點，我們可以在這一部份看到他因與受訪者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關懷倫理。基於上述，本節寫作重點，除了鋪陳野百合學運與原住民運動之背景外，更關注於他個人所認為的兩次關鍵採訪經驗過程中，他藉由實地採訪、接觸，而產生的影響與感受，如何構成他專業意理的形貌與內涵。

【彭琳淞的生命圖像】

彭琳淞，本省籍，1961年出生於新竹市，家中經濟小康。彭琳淞在家排行老四，有三個姊姊，一個小妹。在國、高中時期，他覺得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服務／幫助」，並可以從中體悟到人生的快樂。1979年，彭琳淞參加大學聯考時，本著要「服務」與「幫助」他人的單純心情，又在對於「社會系」好像就是「服務人的科系」如此一知半解的認知情況下；他在志願表格上，填滿了「社會、社工、社會、社工…」相關課系。然而考試分發結果出爐，他只考上了丁組排名最後的逢甲大學統計系。一年後，他才轉學進入東海社會學系，遂順了己意。進入東海社會系就讀後，所學雖然與自己原本所想的「服務人的科系」有所落差。然而，卻使他開始沈浸於社會學課程中；原本一個從小立志服務、幫助人的單純男孩，開始學習以細膩的眼光，認真觀察在鉅觀的且不斷變動的環境下，微觀的個人如何與社會、他人互動的觀察者。而社會學的思惟訓練方式，以及當時1980年代台灣各式社會運動風潮，更促使他懷抱著改革社會的初心。

1980年代校園氛圍

從台灣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校園、社會開展的各式社會運動，³⁹使得許多青年學生開始藉由實際的社會參與，拓展視野，更激起了當代知識份子與年輕學子對於自身土地的關懷與實踐。

當時，不少學生開始自己編寫社團、地下刊物，發表評論；而批評的要點

³⁹ 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大學校園與社會文化界，充斥著一股要理解自我生長土地的熱切渴望，因此，文壇開始出現了一批藝文作家，寫出一篇篇貼近台灣社會與土地的文學作品，書寫著個人生活環境的真實面貌，引起了校園青年學子與社會知識份子的共鳴，同時也引爆現代文學派作家與鄉土文學派作家的辯論；而這些辯論，也一一刊登在當時的各大報刊上，形成了一股文壇風暴——鄉土文學論戰。實際上，這不僅僅只是文壇「茶壺裡的風暴」而已，而是由這些辯論引發風潮，由風潮引發思惟與知識上的啟蒙與轉向，再引發更多的辯論，衝向台灣社會與各大校園之中。

與當時學運的訴求，尤其反映在學生開始批判校園控制，如要求教官退出校園；求以及拓展言論自由，即反對言論審查制度上。如台大的「自由之愛」⁴⁰、「大新事件」⁴¹、「五人小組」⁴²、「李文忠事件」⁴³等等。

大學生開始衝撞校園威權管制的行動風潮，在各大校園裡改革派的學生社團，產生了一種大家各憑本事、誰也不讓誰獨領風騷的良性競爭；有時候甚至結合在一塊兒，學生間義氣相挺；校園學生運動在台灣1980年代從校園內體制與言論的改革，發展至跨校性的合作。之後，隨著1980年代黨外、工運、農運、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紛紛湧出，學生也開始步出校外，實際參與社會各種民主運動。

當時彭琳淞就是在這樣的校園、社會氛圍之中，從1986年展開他在東海大學至研究所的學習階段。當時的大學校園，已經逐漸開展出對於要求更多自由與民主的聲浪，尤其在1978年台美斷交的整個社會衝擊之下，學生們也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中，所能夠參與與實踐的方式---不只是在課堂上乖乖唸書就好，甚至應該參與與投入。而這些實踐，其後就反應在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黨外運動上；而其參與實踐的第一步，就反映在爭取學生自我權益的校園民主化運動中；彭琳淞這個接受社會學思惟洗禮的大學知識份子也不例外。

東海大學的「滋事份子」

⁴⁰1987年，繼大新事件結束之後，大學社團針對廢除審稿制度的訴求，以大新社、大論社、大陸社、三研社等社團，自11月間，以「自由之愛」的名義從事校園改革運動，舉行演講、發行「自由之愛」刊物（林志修，1987／范雲編，1993：181-190）。

⁴¹1987年七月間，台大大新社主要成員南下參與鹿港反度邦運動，且出版「台大學生度邦事件調查報告書」，而遭校方查禁，後又遭停社一年（林志修，1987／范雲，1993：181-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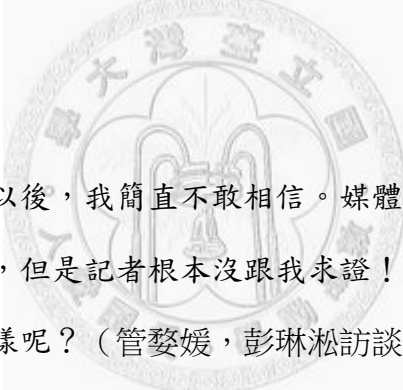
⁴²「五人小組」主要成員是台大大論社成員，1981年左右，他們在台大校園內展開「海報游擊戰」與「早安寫黑板」的方式，企圖帶動校園改革意識與學生參與。相關研究認為這是八〇年代學運風起雲湧之序幕（左又新，1986／范雲編，1993：93-103）。

⁴³1986年，當時還在就讀台大政治系的學生李文忠，因為要在其所參與的「自由之愛」刊物中，要求校方讓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鼓吹學生靜坐絕食，而遭校方處以留校察看，之後更遭校方退學。

這群莘莘學子是當年實踐與投入改革社會行列的知識份子；同時，他們在校方與政府眼中也是群不折不扣的「滋事份子」。

彭琳淞在就讀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二年級時，因為不滿學校畢聯會強制要求每個學生繳交會費，而聯合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一同在東海校園中「搗蛋作亂」。

由彭琳淞為首的校園「滋事份子」，開始展開抗議行動，他們在校園游擊式的張貼海報與發送傳單，喊著「自由參加、自由繳費」口號。彭琳淞還將整理好的資料主動寄給媒體，希望媒體能夠發揮影產生給校方壓力的效果與影響力，卻沒想到招致莫名的抹黑與指控。彭琳淞談及當時的結果，還是難以忘記當時所受到的衝擊：



……報導刊出來以後，我簡直不敢相信。媒體說我是拿了另一家廠商的好處才反對，但是記者根本沒跟我求證！我很氣憤又失望，覺得媒體怎麼會這樣呢？（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7年10月23日）

當時媒體的做法，雖然對學生時代的彭琳淞，是一大打擊，但社會學思惟的訓練，卻也同時促使他進一步思考：一個拿筆見證時代與歷史的記錄者——記者，應該是什麼樣的模樣？於是他當下定了畢業後的心願與志向；他想當一位記者，而且是一個「揭露事實，拆穿謊言」的記者。

……那我唸社會學，那對我個人的知識，或是看事情的觀點，都有很大的影響。我為什麼說，不完全只是那個畢聯會的事情？而是說，包括整個社會學的訓練，會讓我了解說，記者這個角色…像我當時訂下一個心願：「揭露事實，拆穿謊言。」讓我覺得，欸，記者

就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就這樣去當記者，去投入這個行業。(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時台灣社會剛解除戒嚴，報禁也剛開放，民間社會力正呈現一股「躍躍欲試」的狀態，不論是在擴展言論自由或是要求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各個改革、黨外、運動團體都處在一個「試風頭」的勢態。彭琳淞在1989年進入《自立晚報》這個在當時無論在政治言論尺度、追求社會民主化都走在前幾名的報紙，準備加入這股「試風頭」的社會改革行列。

《自立晚報》的記者生涯

1989年，剛入《自立晚報》的彭琳淞，被分配在政治組，主跑教育線新聞。當時的台灣社會正適逢一股在要求解散「萬年國會」的氛圍中，形同一種全民運動，不分階級老少，都期待台灣能夠走向更民主與自由的道路上。1990年三月，在中正廟堂前的野百合學運，就是這樣一個匯聚了整體改革民氣、扣下板機的第一道轟雷震耳的民主槍聲。當「野百合」正立於中正廟堂中央時，記者身分的他，藉由採訪，自然成了一個觀察、記錄，與見證「野百合學運」的觀察者，更甚，他是拿著「筆」參與與投入了這場學運之中。他分析當時的政經環境，認為當時學生之所以群起聚集在廣場上，正是為了要求民主政體的落實：

……那個時候，整個學生全部聚在一起，為了那個訴求，跟那時候的政治環境，那個國民黨的「二月政爭」吧；那時候，李登輝要再選總統，到底能不能再選上，那是蔣經國死後，第一個繼續選的總統，又是在資深國代的狀態…過去每一次蔣經國在選的時候，那些資深國代都會有一些要求啊，不管在制度或福利上面…。所以那時

候學運的訴求就是要求要廢除國民大會…（管嫻媛，彭琳淞訪談，
2008年6月21日）

綻放中的台灣民主野百合

1990年3月16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在偌大地中正紀念堂⁴⁴「大中至正」門下的一個小角落，一群台大學生楊弘任、周克任、何宗憲等來自各大學與工技學院的九名學生，頭上綁著「解散國大」、「老賊不倒民主不來」、「廢除臨時條款」的黃色布條，一字排開的，默默地坐在掛在圍牆上白底黑字寫著：「同胞們！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榨壓！」的白布條下。他們時而起身發送著印製著「美麗島」歌詞、寫著「解散國民大會，召開制憲會議」訴求、署名「憤怒的大學生」的傳單；時而向路過的行人解釋靜坐的訴求。

僅僅幾個人臨時起意的靜坐行動，沒想到在幾天之內招來了全台幾千名學生與教授的參與、聲援；他們應該也沒想到，五天之後，廣場的水泥地上，就這麼硬生生的「長」出了一個超級大的野百合花；更沒想到的是，台灣民間所期待的民主社會理想圖像，也就這麼樣地落地生根，像顆預備生芽開花的種子，砸進台灣長年閉鎖堅固的威權土壤裡中，預備鬆動斬裂它。

也許我們得把影響這場撼動社會的學運開端之因，拉至九名學生靜坐的前幾日；一群資深老國代在陽明山中山堂裡的一場「國民大會臨時條款審查會」上，老國代們「自己」審核通過「自己」提出來的「自肥條款」⁴⁵所引發的眾怒。又或著，再把時間往前拉一些，地點拉遠一點；1989年，台灣海峽的另一

⁴⁴ 中正紀念堂現已改名為「民主紀念館」，而「大中至正」也以改為「民主廣場」，但本文所寫之時間點，仍為舊稱，故為書寫當時實際情形，在本文中仍以舊稱呈現。

⁴⁵ 1990年三月，總統大選期間，兩組總統候選人，為了籠絡資深國大代表，而展開政治利益鬥爭與分配。而七百名資深國大因而藉機在總統大選期間提出臨時條款，用以擴權；內容為將國民大會設置為常設機構，以增加常態性的會期，以增加薪資（黃嘉琪，2003：59）。

頭，在北京的天安門所發生的民運風波。⁴⁶總而言之，台灣在三月學運之後，所進行的一連串民主轉型與民主政體的落實，決不是偶發且突然的。當年野百合學運決策小組之一的范雲，就曾這樣形容：「…我們做了扣板機的工作，而事實上，提供整個彈藥的，不是我們自己，而是整個台灣社會的民氣。…（【民主、政治、野百合】，2003）」

在野百合學運發生的當下，彭琳淞不過是個初入《自立晚報》六個月時間的「菜鳥記者」，對於記者工作的實際作業形態與內容，都還在適應與摸索中，⁴⁷這一次的學運採訪經驗，不僅建立了他作為一名記者與報導寫作上的自信，同時他也在採訪現場中，運用所學，實際的去觀察與體驗。

「我睡在廣場上一個禮拜」

彭琳淞回想當時跑野百合學運時，他為了能夠不放過任何觀察機會，從3月16日到22日，他幾乎與靜坐抗議的學生睡在一起。在一個星期中，只大概洗了兩次澡，早上回去報社刷牙、寫稿而已：

……我那時候住板橋嘛，只回去洗了一次澡。還有一次好像是去朋友家洗澡吧。就是整晚都耗在那邊，那邊有供應睡袋，早上起來就去濟南路報社去刷牙寫稿，就回去現場。（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時的彭琳淞，才剛當記者幾個月的時間，遇到這麼一個龐大的學生抗議

⁴⁶ 1989年四月至六月期間的天安門事件，又稱六四天安門、八九民運等。當時因主張改革派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會，北京各大專學校的學生，藉機提出民主改革訴求，中國大陸採取軍式鎮壓，造成流血事件，因而天安門事件又稱為「六四屠城」。

⁴⁷ 當時彭琳淞初進報社當記者有一段適應期。他自認為自己缺乏新聞寫作經驗，缺少記者該具備的「哈啦」本事（蔡士敏，2008：47-48）。

場合，隨時會接收到抗爭現場最新的情況與資訊；在截稿時間的壓力下，他必須要充分觀察現場與迅速理解情況，立即整合與消化整理出一篇報導。

彭琳淞在學生時代所撰寫的畢業論文，⁴⁸就是在處理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的學生運動發展；因此，他對於學運發展脈絡已經先有了一定的了解基礎，加上一個星期的「蹲點」，以及過去在社會學系所受到的思惟訓練，讓他在現場鉅細靡遺的觀察，不放過任何一個有趣的場景。同時，他更從從鉅觀的整體外在結構，來分析野百合學運的形態、形式等等。這一系列的報導，使彭琳淞建立了對於自己的報導的自信，並找到了屬於他的新聞寫作的方式。

……其實我那時候重點都是在觀察，那個時候我才剛當記者，所以我一直在觀察。但是那些重要的場合都被我注意到了。而且，進一步我去理解那是什麼意思。（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本來我的論文就是寫學生運動，所以在台灣校園學生運動這一塊，我已經處理一部份了，只是畢業之後，它（學生運動）才有一個盛大規模的抗爭出現。那也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建立了自己作為一個記者的信心。因為我的投入，甚至整天沒洗澡就耗在那邊；或者是我自己的觀察、自己對於這議題的關心；或者也基於我以前對於學生運動的了解。所以在這個採訪過程，甚至在以後寫的相關的東西，幫我建立了信心，這對我來說很重要。（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在他「參與觀察」的採訪過程中，彭琳淞發現到在一個抗爭運動的場合，決策小組得面臨多麼大的群眾壓力，而他也觀察到了當時廣場上的各個決策小

⁴⁸ 彭琳淞自1989年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當時他所寫的畢業論文就是以學生運動的發展為探討主題：《政府遷台後學生運動變遷知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互動關係來說明》。

組間，互相爭奪詮釋權與主導權的複雜過程與矛盾之處，而這些觀察也都出現在他當時與同事張廖萬堅在事後所寫的學運系列報導裡面；如「各路人馬暗較勁，逐鹿中正堂」（彭琳淞、張廖萬堅，1990年3月28日／林美挪編，1990：42-46）、「從掌聲到噓聲，教授風向球失靈」（彭琳淞、張廖萬堅，1990年3月29日／林美挪編，1990：47-58）等等，裡面針對野百合學運的發展有著深入的批評與檢討。然而，這一系列的報導是在3月23日，也就是學生撤離中正紀念堂之後，才發表於《自立晚報》上，而在學運發生的期間，《自立晚報》每天刊登超過一版的學運新聞，聲援野百合學運。彭琳淞回想當時在中正廟堂上的一個星期，他除了找到了「如何看」、「用什麼角度看」的新聞寫作方式外，令他更加印象深刻的，就是呈現在他與張廖萬堅共同寫出的一列深度分析報導中：

……在這過程當中，我看到的是去處理一個群眾場合的技巧與困難度。那時候有兩個決策團啦，一個是范雲跟鄭文燦這些學生，一個就是教授，瞿海源、賀德芬與幾個教授的部份。那學生跟教授之間也會出現緊張；當時決議解散後，那台上的leader跟台下的學生也是緊張，因為台下的學生也會質疑說「難道我們就這樣回去了嘛？」之類的。但是對這些leader來說，他們有必須要負的責任，所以他們會避免一些不好的情況發生。那學校的老師又會覺得說，我們好像在幫忙你們，要幫忙你們解決問題，那彼此也會有猜忌，有不諒解。這讓我感覺到說，尤其在那麼多人的場合，你需要去面對那種氛圍，那種群眾的壓力，我覺得這是讓我印象很深刻的。（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跟群眾站在一起的記者

在野百合學運的靜坐現場，其實除了運動組織內部的緊張矛盾、群眾與領導組織的緊張情緒之外，場外的媒體與場內的學生也存在著某種緊繃的壓力。報社與記者在報導立場上若傾向弱勢與社運團體，記者在採訪過程中，自然能夠相對於其他偏向官方立場的媒體記者順利許多。更具體的來說，不受群眾歡迎的報社或記者，通常在報導上容易動輒得咎，引發群眾憤怒情緒。尤其，野百合學運是第一個抗爭者在抗爭現場，就可以直接透過巨大電視牆「觀看」自己抗爭場面的社會運動；而對於所有平面媒體報導若有錯誤者，廣場文宣小組也會在每天發刊的「民主廣場通訊」中立即刊登更正聲明與發出批評之聲。

當時，台視的報導就惹出的一番風波。

1990年3月21日晚間，從廣場巨大的電視牆上傳送出台視某記者製作的新聞，新聞內容因為「扭曲、醜化」了抗爭學生，引發靜坐學生群起抗議。當晚，該則新聞一播畢，學生堆中立刻有人大喊「抗議」。學生廣場文宣組也立刻在當晚11點3分發出「市民廣場No.7」中，指責台視，甚至迫使到台視某記者當著學生群眾的面前，拿個麥克風道歉與說明（〔學生廣場文宣組〕，1990年3月21日／林美挪編，1990：138）。彭琳淞談到當時在現場所看到的畫面，仍記憶猶新：

……那時候有一個台視的記者，因為電視台報導偏頗，結果現場的壓力迫使他必須到前面拿著麥克風解釋。（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相形之下，彭琳淞與其他在現場「流竄」的同事們「《自立晚報》的記者」的身分，其實間接地幫助了他們與採訪對象---學生間順利地互動。其實，對彭琳淞來說，甚至是對於《自立晚報》的某些記者而言，與這些社運團體或者是學生運動團體等相處，似乎比與官方相處與採訪更加地「投己所好」：

……其實在社運的場合，《自立》是最…被這些所謂的運動人士，視為友善的人，所以也是讓人比較好跑一點。這個就好像說…我們也沒有想去跑官方的說法，重點不在官方，重點而是在這些社運（議題）。反正我們（指《自立》記者）跟他們親近，會覺得更easy。（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時《自立晚報》的記者在跑群眾運動現場時，確實屬於「較受群眾所喜愛的」記者群。彭琳淞談及當年在整個媒體環境中，他所處的記者位置與角色時，提到過去與《自立晚報》同事曾文邦閒談之間的談話，正好點出了當時這群《自立晚報》記者到底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報導者角色來報導群眾運動議題：

……前一陣子，有個朋友叫曾文邦（前《自立晚報》攝影記者），他用了一個字眼，我覺得講得很好…他是講說，那時候有兩種攝影記者，一個是站在群眾的角度去拍官方，拍拒馬後的警察；另一種是站在警察的後方在拍群眾的。那他們是屬於站在群眾要拍官方的（笑）。我覺得這形容很好，就是有一群記者，在那個時空點上，是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的。（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其實這句話的意義，正凸顯、代表了彭琳淞當年所扮演的記者角色內涵。

彭琳淞在採訪抗爭現場新聞時，面對弱勢、社運、學生團體遞來的與傳來的抗議布條、訴求口號時，他通常會就將布條直接綁在頭上，甚至跟著喊口號。這些實際的動作，除了來自於他對當時各個運動團體所提出的訴求，發自內心

的認同之外，其實也來自於與這些受訪者建立某種「信任關係」。

……說一個記者如何在專業與涉入之間取得平衡的東西…。譬如說，我們在採訪的過程，或是社運的抗爭，原則上，如果心血來潮，會跟著喊喊口號，情緒來了就跟著喊。……當然，我也承認突然的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裡面…（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人家拿來的布條我們也會拿來綁一綁。那綁一綁有兩種意思，一種就是你跟受訪者的親近，第二種就是說，自己發自內心的支持這個訴求。另外，有時候，我不用採訪或是採訪結束了，那就更輕鬆的跟著走啊、遊行的，那個反而是在…因為我是晚報嘛，那有時候交稿了，就比較easy了，一邊觀察，一邊遊行（笑）。如果說有涉入，反而是這樣的情況。是以個人身分去參與運動，而不是同時在這兩個角色間跑來跑去，這個比較不會。對我而言，還不至於涉入、投入其中無法跳脫，好像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而這種與現場抗爭者「建立關係」的動作，以及「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的採訪方式，其實對於彭琳淞而言，與受到當時整個台灣社會的結構、環境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當時的台灣社會民間力量，正在促使社會與政治體制走向解嚴後、去威權的民主化政體，而這實際落實在展現普世的人權價值、平等價值、社會正義等等。包括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所提出的解散萬年國會等的訴求，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下被提出，確實符合當時民氣方向。彭琳淞認為，以當時現實的環境與條件而言，他之所以在抗爭現場綁上布條，跟著喊訴求口號，在交了稿之後

跟著去參與抗議遊行，除了因為個人對於社會正義與改革不容置疑的「信仰」之外；同情與站在社會、弱勢團體位置的來理解而報導，也同樣來自於當時整體社會風氣的催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說，像因為這樣的涉入、同情啊，才能有助於你寫分析報導。就好像我常常覺得說，你到底能不能理解，你必須有同理心你才能夠去站在他的角度來理解他。你至少有這樣的能力去跟他建立關係，是認識他，而不是說，我根本很反對，我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他，站在外圍寫。那這種方式好壞當然可以被討論，但是對我來說，因為這樣的一層關係，讓我對他們能夠更深入的理解。（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時候的一些運動訴求，有一個較高的道德層次訴求在那邊。比如說，國會沒有全面改選，那你就會覺得理所當然，就會跟著喊；勞工真的有些保障是沒有的，那就跟著喊啊。你會發現說，這是屬於普遍道德層次上不會有問題的部份，但是，我得說，我那時候比較幸運。（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反過來是說，我們那時候的運動，好像就是有一個高的，比如說人權價值的東西在那邊，所以呢，你去涉入了，就好像，以為自己參與了某個神聖的事情一樣，會有一種榮耀的感覺。（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然，在當年，除了少數的地下刊物、黨外雜誌之外，幾乎所有的平面、電子媒體在報導社會運動議題上，幾乎很難得見到所謂社會運動團體的訴求；

彭琳淞在報導上的立場與偏向，也受到當時媒體環境的影響：

……在當時的媒體環境，這樣的訊息是被壓制、壓抑的，出不來的。那…讓這種聲音出來，我是刻意的，沒有錯，我是故意要讓這類聲音多一點，是因為媒體比例失衡。（管嫻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的採訪與報導方式，在彭琳淞擔任《自立晚報》記者的這個時期，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是一次對他來說難忘的經驗，建立了他對於當一名記者的自信與專業價值；而1993年，他費時一個多月時間上山下海所報導的「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系列，又是一個讓他「站在群眾重的角度在看」的經歷。

「我想跑弱勢新聞！」

「野百合學運」是彭琳淞在政治組時期所採訪的新聞事件；而繼學運之後，1991年底中央民代的退職，1992年底，立法院又全面改選；1993年初，彭琳淞轉入綜合組。

其實在1991年底，資深民代退職之後，他認為在台灣社會政治體制上的問題，之後已經可以藉由選舉的方式解決；基於他個人對於政治情勢的判斷，覺得「弱勢」應是個人該投入的部份，因此，彭琳淞就曾經向當時報社的總編李永得提出想轉調到綜合組的要求，但礙於當時政治組「人手短缺」，彭琳淞只好繼續留在政治組跑新聞。直到1992年底，國會立委全面改選之後，當時他想：「啊，這樣子我可以走了吧？」因此，他再度要求轉調至綜合組。因此，1993年開始，他轉調至《自立晚報》的綜合組，負責勞工、社運等新聞。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走向另一個階段，未來的方式就會用選舉來解決了嘛，透過政黨政治的方式。我就不想再跑政治新聞，我想跑弱勢的新聞。所以我和主管提出來。(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當時，政府提出要在台灣多處山林地區建設國家公園，而這些所謂「國家公園」所圈劃的範圍與台灣原住民居住的部落有非常大的重疊。國家公園的政策中明訂在國家公園圈劃範圍內之「一草、一木、一石」都「動」不得，屬於國家資產，然而，原本就在山林成長的原住民們，他們的衣食住行接取自於天然山林，而因為「國家公園」的建設，卻迫使他的們生活方式遭到侵犯。

面對這次的新聞事件，彭琳淞仍舊選擇「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只不過，他這次站到了山林裡、部落中、外島上。

「山是我的！土地是我的！」

從日據時期開始，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民族意識，從法律與實際的管理方面，就可以看出，如當時所頒佈的「理蕃政策」與「皇民化政策」，旨在強迫其對於原住民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強迫洗腦」，使其心向「日本國」。而國民黨政府時期，所頒佈的「山地平民化」、「山地現代化」等策略指標，都可以清楚看到不管從日據時期的日本殖民政府，一直到國民黨威權政府時期，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認同不尊重的態度，都展現在在一種「去異求同」的硬性立法與實際管理策略上。隨著時序進入1980年代，台灣在經歷一聯串民主化的過程中，提供了各種改革運動鬆動威權土壤的契機，而原住民運動也在此時出現在台北街頭，引發各界關注（王嵩音：1998：

6；陳震，2004：15-19）。

在1993年期間，原住民北上舉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返國家公園的抗議行動；當時，彭琳淞在前去採訪原住民遊行的過程中，結識了幾位原住民團體抗議領袖，留下了連絡方式，在1993年五月到六月期間，他就一個人跑遍各國家公園，深入原住民部落探討這一連串的問題的癥結、起因。

如果說1991年野百合學運的採訪經驗，是建立了彭琳淞作為一名記者的自信、建立了自我寫作風格，以及選定要站在「群眾的角度看」的記者位置的重要關鍵事件的話；則原住民運動報導經驗對於彭琳淞個人的重要意義與轉化之處，就在於他以原先具有關懷意識的知識份子角色，進入實際的、不同於他自身成長環境裡的「他族」弱勢環境中，深刻的理解了與原住民族群的弱勢處境；而這些理解反而讓他回頭修正、開拓了他原先僅止於「我族」弱勢處境的想像；即藉由不同於自己族群的文化、歷史的理解與隨之而來的文化衝擊，實際的貼近理解，換言之，原本選好站在群眾角度看記者位置的彭琳淞，這次是真的「站進去」了。

這一次長達一個多月的採訪，也因此成為令他極為難忘的採訪記憶。

彭琳淞在採訪前，雖然做了「事前功課」，閱讀了非常多的文獻與資料，但是在還未深入採訪現場之前，一個從小生活在台北、新竹、台中的平地漢人，連半個原住民朋友都沒有的他，其實非常憂慮，擔心自己寫不出「新意」也無法切入核心重點。

……我去跑原住民的議題，是因為有原住民來抗議當時國家公園的建設等等的，我去採訪，才了解一些，那就想去採訪。不過去採訪前，也會很擔心，覺得，欸，他們的訴求我都知道了，那還能寫些什麼呢？（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但實際到了現場，看見各個原住民族的生活方式，他逐漸實際地理解了這些原住民族在台北街頭遊行時，所喊出的「山是我的！土地是我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後來去了之後，才發現說，你真的去了…因為我要去，所以得準備好多的資料啊，才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更了解。所以當我到了現場的時候，我更能去感受到，怎麼叫做一草一木的…，或者是，他們傳統生活領域是什麼樣子。而不是我關在冷氣房裡面去想。（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假如我沒有去，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說「山是我的」。因為我在台北，別人會講說，他們憑什麼說山是他的。所以比較重要的，是這個採訪。所以就類似那次學生運動，對我來說是重要的。（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彭琳淞回想當時採訪時，經常得在採訪地與台北之間兩頭跑；然而，報社內部也給他相當多的採訪時間與空間；他除了「顧好」每天發生的新聞之外，一個星期之中，他又抽出三到四天的時間往山裡跑，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來來回回」的奔波終告結束。回來之後，就在他正要動筆之際，總編李永得有天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嘲諷他：「你到底還寫不寫啊？」沒想到這一動，彭琳淞就停不下來了。從1993年的7月14日連載至7月29日，這總共十四篇的「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權益」系列報導在《自立晚報》上，除了有時篇幅有調整，隔個一兩天才繼續刊登外，報導持續刊登在四版頭的位置不曾「移動」。

……因為我計畫先去採訪回來再寫，那李永得也給我很大的空間啊

。譬如說，一個禮拜七天，那我就是三四天在台北，那三天跑下去，這樣持續大概將近一個多月。(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1993的六月左右吧。大概採訪一個多月，就寫了。我也不知道要寫多少，結果一寫就寫這麼多，他們也讓我就這麼做了…。中間有一兩次中斷，我反而還喘一口氣(笑)，那時候還不是用電腦，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先寫草稿，最後又再謄一遍給編輯。(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他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與時間在這系列採訪上，而這系列報導，也獲得了1993年台灣人權報導獎。他在提及這系列報導時，也非常「自豪」的認為，這是他得意之作。確實，1993年，彭琳淞所撰寫的這一系列的報導，深入的描寫了原住民的歷史、傳統、生活文化，反省了漢人與政府當局的傲慢，以及平地人對於原住民族的不理解以造成的錯誤認知與刻板印象，批判了政府當局處理的失當，分析了原住民的邊緣處境；他在最末幾篇結語之中，引用了他在台北街頭幾次原住民族遊行的過程中，所聽到的「山是我們的！」這句話，提醒了讀者、政府，甚至是彭琳淞他自己，要去認真傾聽、重視這個幾十年來身處台灣社會邊緣的原住民族所喊出地這般沈痛的「歷史控訴」：

……當警察厲聲喝止，當罰單一張張開來，當管制不斷加強，原住民漸發現家園山林的山豬山羊不可抓，靈芝、蘭花不可採，世代耕種的土地竟不是自己的，而一切耕作也須按「規定」來。此刻，原住民驚覺「原來這座山竟已不是我們的」！……身為強勢族群的漢人，實應易地而處，去理解台灣原住民族在此過程中實質的被剝奪

與心裡上被剝削、被欺騙的感受！「那座山是我們的」，不是笑話，而是一項歷史控訴！（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翻攝自《自立晚報》）

然而，其實對於彭琳淞而言，得獎不是他最大的收穫，而是在採訪過程中所見所聞，以及藉由採訪而理解了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形式，並且從中學習、體悟。

當時，彭琳淞前往各個部落採訪，除了有當地原住民菁英領著他，帶他了解當地文化，以及理解原住民處境之外，他在採訪過程中，時常一個人「亂跑」閒逛，時常到採訪者的家中作客，親身的體驗到了原住民族的生活習性與自己的差異。

有一次他結束了玉山國家公園內原住民不落的訪問，正要從高雄梅山搭車回台北前，一群好客的原住民朋友請他等一等，說完，就跑走了。眼看著發車時間就要到了，他才看見那位原住民朋友抱著一堆李子「咚咚咚」地跑回來。發車之後，開進市鎮，可能是原住民的司機大哥，突然把車子往路邊一靠，竟自己騎著摩托車走了，當時彭琳淞只覺得：「奇怪了，這司機跑去哪了？」。換成在未理解原住民生活方式之前，生長在都市的彭琳淞，也許會非常生氣；但是當時的他，反而很耐心的等，覺得非常有趣。

這些採訪中實際的觀察與體驗，並沒有出現在他的報導之中，但這些經

歷，卻是彭琳淞除了完成報導之外最大的收穫。從一開始面對民族文化差異的衝擊，繼而理解，甚至與原住民成為朋友，這是他從未體驗過的生命經驗。

……我應該講，我去採訪的這些，除了表現在報導上，最大的感覺是，我去認識了原住民的朋友，我去理解了他們，而那些東西不是寫在裡面的。就好像我去了蘭嶼，人家叫我睡在室外床上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害怕的；因為我不習慣睡在戶外，萬一有雞啊、狗啊跳上來怎麼辦？但是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是一個他們在招待客人的地方，也是最涼快的。另外有一次在中橫一個泰雅部落中，有原住民朋友非常好意的拿了醃豬肉，好肥好肥的拿給我吃，我吃了一塊之後，他們要我再吃第二口，我就說拜託不要了（笑）。但是我從當中去理解了，我經歷到了不同於我生命的、文化的東西。或者說是，對我來講，他們的文化，那種人性的美，甚至跟他們建立了一種很棒的友誼關係。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講可能是比較重要的。（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其實我在這當中，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尤其是感受到很多生命經驗，那是我過去所沒有的。那些東西雖然沒在上面（報導），可是那卻是很棒的經驗，很棒的生命經驗。（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後來，這一系列的報導得了獎，彭琳淞獲得了一筆為數不少獎金，對於當時在《自立晚報》領著微薄薪水的他，自是額外的收穫。沒想到，彭琳淞一股腦兒的，把全數的獎金，都送給了當時仍是學生，致力從事保存部落與地區文

化的魯凱族青年台邦·撒沙勒。⁴⁹

……我寫了這些報導之後，得了獎，我把獎金都給了一個年輕人，叫台邦·撒沙勒。…我為什麼捐款給他？我幾乎也沒寫他的什麼報導，但是我只是看到一個原住民的青年自己一個人，這樣子的投入自己的部落、家鄉的文化，那讓我非常感動。所以我後來就將五千塊美金的獎金，我就都給他了，我覺得很開心。（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一枝筆」的微小改革力量

很顯然地，從彭琳淞在學生時代立下要「服務人、幫助人」的志向，到當記者時決心要「揭露事實，拆穿謊言」，在他當《自立晚報》當記者的生涯中，他確實一路地實踐了當初他對自己所許下的心願；他的實踐意識與作為，甚至表現在他離開《自立晚報》後，進入九二一災區，投入埔里社區重建的志工工作中；而彭琳淞則笑稱這個選擇是對自我進行「勞改」。

在台灣社會邁向民主化的關鍵時間點，彭琳淞選擇做一名記者，而且是一名「站在群眾角度在看」的記者，一名在街頭運動中，站在抗議群眾中的記者，一名上山下海到處「蹲點」的記者；他選擇「站的位置」，讓他切實的感受受到當時台灣社會的「生命力」與「改革力量」的所在，這些是在他選擇所站的街頭上、群眾中、山林裡。這些都是他成長中寶貴的經歷，他慶幸在那個時代中，他選擇去做一名記者，而非其他職業，而造就了「現在的他」，而不是「其他樣貌的他」。

⁴⁹ 台邦·撒沙勒致力於魯凱族文化保存與復興，當時瑪家水庫的興建，要遷移整個好茶村落，他就是當時領頭抗爭與致力保存的發起人。1996到1998年，謝長廷擔任高雄市市長時，他擔任高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的主委。現任大仁科技大學原住民發展中心主任。

……我只能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這對我的生命來說，非常重要。而且是成長當中，非常重要的地方。假設我碩士班唸完就去工作，我可能會變成一種我現在最討厭的那種人，一種對社會不了解的人，反動的，甚至是古板的、保守的人，很可能我就是這種人。假設我那時候唸完，就去唸博士，繼續去讀書的話，很可能就是會變成一個象牙塔的學者，但是我很慶幸的是，我去當了記者。我能夠這麼樣的貼近這個土地；我在採訪當中，那麼樣的去貼近了權力的核心，才知道說，喔，原來power在哪邊。Power包括，做決策的人的權力，我才感受到。而不是我在課堂上，或是書本裡面，冷氣房裡面可以感受的。也因為這樣，在台灣社會脈動很快的時候，我以…記者的角色，身歷其境的感受，去體會到，台灣那個時候的變化。(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對我來講，我因為這樣，可以身歷其境的去掌握社會的脈動，跟理解這個社會。然後呢，好像我用了這支筆，扮演了一個非常非常微小的社會改革力量，這個也讓我感到…很開心。或許是到了今天，覺得，至少曾經做過那樣的事情；曾經透過了這枝筆，去寫過了那些所謂的，改革的，對這些土地有幫助的事情…即使那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管嫫媛，彭琳淞訪談，2008年6月21日)

對彭琳淞而言，當時他所站的記者位置，其實就是拿著一枝筆，扮演著「非常微小」的改革力量，而這枝筆，從關懷、同情、支持、改革、服務的理念中，寫出了一篇篇關懷弱勢、貼近土地、催生民主的報導；同時，也藉由一枝筆，實踐了他所認知到的「記者本色」。

第五節 邱家宜的生命圖像

邱家宜，外省第二代，1964年出生於台中，1990年進入《自立晚報》接續當時離開的記者李瓊月的醫療科技環保線。邱家宜從小生長在一個外省家庭，因此讓她自小就處在一個相對優勢位置，這也影響到她在進入東海社會所之後從更鋸觀的角度檢視與反省自己，轉而同情弱勢的態度。從大學階段的「政治白癡」到進入社會所之後的政治意識啟蒙，正是她在選擇求職單位時，以《自立晚報》為首要的考量。基本上，邱家宜屬於學運世代，因此受到學運風潮的影響，在研究所求學階段，她的社會改革意識圖像已經漸趨清晰。本節將針對邱家宜擔任《自立晚報》記者期間印象深刻的關鍵採訪事件：無住屋運動、貢寮反核四運動中的經驗與感受，做相關背景脈絡的鋪陳，以及在事件過程中她個人的新聞專業實踐（採訪方式、報導傾向）與感受，逐一構築出邱家宜的記者專業意理內涵與形貌。在邱家宜所敘說的重大採訪經驗中，我們除了可以藉由她在新聞專業實踐上的選擇，觀察除其偏向鼓吹類型的記者意理外，更能透過她當時報導書寫中，在字裡行間所透露出對於人的關懷情感。

【邱家宜的生命圖像】

邱家宜，外省第二代，1964年出生於台中。邱家宜父親是從大陸遷移來台的流亡學生，來到台灣之後，在高雄地方法院擔任書記官；母親則專心在家務上。邱家宜是家中長女，據她自己描述，因為在家是老大，得帶著下面三個妹妹們，所以在個性上比較進取，具有責任感。因為父親是公務員，所以邱家姊妹們，從小就可以「享有」政府補助軍公教人員子女的教育補助費，相較於一般非公務員家庭的小孩來說，如邱家宜這樣的「軍公教子女」所獲得的資源，自然比其他非軍公教家庭的孩子多。而從小所處「優勢位置」的成長經驗，讓

邱家宜在大學時，開始對於那些相對於自己較「弱勢」的人產生同情與自省，也漸漸去注意相對於她的「弱勢者」的處境。

……就是我會了解到說，我們是社會上的相對優勢，那我就會開始去注意到有些人其實是相對被剝奪的，就是不公平的。就是心裡會默默的知道說，這是不公平的，而且會覺得，我們應該為這些人打抱不平。（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為了有效去除日本殖民時代推行的「皇民運動」所一留下來在文化與語言認同層面的「餘毒」，而推行了「國語運動」；這尤其反映在「學校」機構的機制中；包括校際、地區性、全國性的朗讀比賽、作文比賽、演講比賽等等競賽，就是在這樣的政策機制下衍生而來的。換言之，從教育制度上就限制學生們從小就得「說國語」，而這種政策，實際上是藉由語言的制約，強迫不同族群放棄對於自身語言的使用，進而壓縮了不同族群間各文化的發展空間。在文化論述上，甚至劃分出「講國語」是屬於高等、有教養的、相對優異的；而講其他語言的人，就是文化上相對低等的、粗鄙的。很顯而易見的，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這種制度，讓出生於外省家庭的小孩，在學習過程中，擁有相對優勢，進而累積了外省家庭小孩的優越感。而邱家宜既是外省第二代，國語又是她生活中再自然不過的慣用語言，自然在學習的階段中，容易取得相對於本省家庭、客家、原住民家庭小孩的學習優勢。邱家宜回想她求學階段中，面對自我所處的「優勢」環境，時常會出現一番這樣的反省：

……那我就會想說，其實台灣社會是有一些比較受到保護啦，那軍公教有比較多的照顧。然後我們從小就是使用我們的國語，那在學校學習上會有優勢。在文化的論述上面，以國語所發展出來的所有

的表述啊，或是書寫啊，所以在文化上是比較高尚的，那其他就會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那如果說他從小的生長環境，不是像我們以國語為母語的，那他在學習上是比較辛苦，如果他是要從事人文方面的，是這樣的。(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即便在求學的階段，邱家宜因為接觸了其他相對弱勢的同儕，而逐漸產生了這樣一番反省；但是，生長在一個「忠黨愛國」的外省家庭之中，外省家庭與父親對她的影響，使她一開始對於台灣在文化、歷史、社會形態方面的理解，是受到某種環境上的制約與障礙的。比如說，一個對於歷史有只濃厚興趣、從小便閱讀許多歷史古籍的邱家宜，到了大學唸歷史系時，才知道台灣在1947年，曾經發生過二二八事件。

外省家族中「空白的歷史」

1983年，就讀台大歷史系的邱家宜，在一次與社團同學閒聊之間，才「赫然」發現；台灣在1947年曾經發生過二二八事件那段慘痛的歷史。身為一個唸歷史的大學生，竟然到了大學才知道台灣曾發生過的那麼重要的歷史事件，讓她非常驚訝。

也許是出生的環境就已經替邱家宜這樣一個出生在外省家庭的小孩，限制了 she 可以接收到的資訊範圍；又或者，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於資訊的箝制與管制工夫，做得如此之嚴密，以致於沒人敢提、沒人去議論，讓她直到了大學才猛然驚覺原來台灣還有過這麼一段歷史。邱家宜提及曾經看到陳芳明所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描述陳芳明直到去了美國哈佛唸書時，才知道台灣發生過二二八事件，讓他大為震驚，邱家宜在閱讀這篇文章時，對於陳芳明當時的那股「震驚」之情，心有戚戚焉：

……像我們這種外省家庭，我沒有聽說過二二八，你知道嘛？我是歷史系的學生，我一直到大二的時候，社團的同學才跟我講發生的事情。陳芳明，他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的，他在一篇文章裡面講說，他是到哈佛之後，才知道台灣發生過二二八事件，他大為震驚。因為他是歷史系的高材生，他對自己的知識向來很有信心的。不過就是說，台灣那時候的思想箝制，除非你是二二八受害者的家庭，不然完全不知道的。那二二八家屬或家庭，他們也不敢去跟別人講，整個社會壓抑的那種氣氛。我後來才去回想，那整個社會真的是一個極度壓抑的狀況。對於人很多生命經驗的觀察，其實完全摸不出頭續的。(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我爸爸因為是民國三十八年才來，所以他對於二二八也是聽聞，所以說，那時候是完全被消音的嘛，像我就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而且，你看喔，二二八距離我們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沒有多久欸。所以你現在想想看，那時候社會對整個記憶的清洗，對遺忘的強制，那是不得了的一個工程，可是他做得那麼好，做得那麼徹底。(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這樣的衝擊，讓大學時代的她，開始反省，過去自己所接受到的，那些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甚至是過去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與自己所「看到」的是世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是個政治白癡」

就邱家宜自己的描述，她自己的政治意識啟蒙非常晚，甚至是個「政治白癡」。在進入大學、研究所前，邱家宜一直是在家中父親的「期待」中乖乖的成長的好孩子。她在唸景美女中時，就已經被國民黨分布各個校園的黨國「系統」招攬進入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分布在各個校園間的重要控制機制，就是平常看似在校園中隨意的漫步、沒事叫同學停下來整理衣衫、每天早晚在司令台上訓話的「教官」。邱家宜記得高中時的教官，會在學校間觀察每個學生的家庭背景，若是那種「身家清白」者：如外省人家庭、父母是公物人員，或是國民黨的忠貞黨員，在校成績優異者，自然是國民黨亟欲招攬吸收的「優秀年輕黨員」。邱家宜當時也「傻傻地」在教官的招攬下，加入了國民黨，甚至到大學時，都還參加國民黨系的社團，⁵⁰處在一個不知黨外是何物的階段。

不知世間事的少女

邱家宜口中所述當年的那個「政治白癡」到底是什麼模樣呢？1986年，在邱家宜大四時發生了一件趣事，也許可以從中一窺大學時代的她與其後的她之間的落差。

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被台大校方開除，在台大傅鐘前開了一個「惜別會」，李文忠當時慷慨激昂的控訴校方的不合理做為，而吸引了一群學生在傅鐘前聲援。當時，邱家宜還是一個留著長長秀髮，身著波西米雅風長裙的飄逸文藝少女，就著麼飄飄的牽著腳踏車經過傅鐘準備回家。經過傅鐘看見一大堆人聚集，便好奇的牽著腳踏車湊過去瞧，瞧完了，又這麼飄逸的牽著腳踏車回家了。

……那時候李文忠「坐監」惜別會，在傅鐘那邊開，一堆人擠在那

⁵⁰ 當時台大校園中所謂的國民黨系社團，最明顯的如中國國民黨青年團。

邊，那時候我大四，我就過去看什麼事情，好熱鬧喔。我跟李文忠太太很熟，我跟她聊說：「欸，你老公那時候大學的坐監惜別會，我都還從旁邊牽著腳踏車經過。(笑)」可是那時候是政治白癡，那時候還在文學院，頭髮長長的，穿個波西米亞風的長裙，還在做夢(笑)。因為自己成長環境的關係，所以其實政治啟蒙是蠻晚的，大概是到研究所。(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歷史系的求學階段

就讀台大歷史系期間，邱家宜即便對於探索知識有著熱忱，但對於歷史系授與她的傳統史學治學方式卻仍感不滿足；她期待可以學習到新穎的思想理論，而這部份在歷史系傳統的課程安排上卻無法取得。當時，黃進興教授的一門西洋思想史課程，讓她開始閱讀與接觸西方理論思想。與傳統史學的治學方式相比，邱家宜更喜歡有關哲學與理論思考的學習方向，也促使她開始私下找書亂讀。據她自己的描述，大學時代的她，是那種「非常不進入狀況的學生」，對於知識有熱愛，但是「治學無方」。於是，第一次考史學研究所失利之後，在因緣際會之下，她跑去當張忠棟教授的助理，而張忠棟也因此成為邱家宜「生命中的貴人」。

我的貴人---張忠棟老師

當時，邱家宜成為當時被稱為台大「四大毒草」之一的張忠棟教授門下當助理。在邱家宜的印象中，張忠棟教授是「非常擇善固執的人」，同時，非常照顧學生。張忠棟知道她在準備考研究所，就告訴她說：「沒關係，我這邊也沒什麼事情給妳做...」就讓她每天抱著書坐在辦公室中盡情的唸自己的書，準

備考試。當時張忠棟因為「特殊的」政治立場，使他在台大始終處在邊緣的位置。但是當時的邱家宜，還處在「搞不清楚事情」的狀態，對於張忠棟的處境，以及自己每天在辦公室裡抱著書啃卻「不做事」，而受到其他同事排擠的狀態，更是沒有察覺。⁵¹然而，因為張忠棟老師的幫助，讓她能夠「專心治學」，因此，隔年她順利的考上東海社會學研究所。

東海大學的求學階段---政治意識的啟蒙

1987年，邱家宜進入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就讀。當時台灣校園的學生運動已經如火如荼的燒開，而校園中興起的一股改革氛圍，也鼓動著大學生走出校園、關心社會。邱家宜進入社會學研究所，自然開始接觸來自西方的哲學思惟與各種左派思想。她開始學會如何從社會結構來觀察社會事件。如果說，過去歷史系給予她的思惟訓練，讓她學會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世界，以具有敘事性的、故事性的、一貫性的方向來理解事情；那麼，社會學的思惟訓練方式，則是教會她如何從不同角度、框架、理論視角來探觸社會面向。甚至也讓她對過

⁵¹ 參考邱家宜訪談。「那他（張忠棟）就跟我說：「沒關係，我這邊也沒什麼事情給你做…」然後我就每天去，就看書。所以我就很感謝他。可是因為張忠棟在美文所的處境也是很邊緣的，因為…反正他是「獨草」嘛，他的同事，對他是尊敬，但也是保持距離。所以我坐在那邊，也是被同事排擠，可是那個時候也耐耐小小的，我也是不是很知道該怎麼跟人家相處，也不是很了解張老師的狀況，那時候還不太了解狀況就是了。可是在那邊，每天都在看書，大家會覺得妳都不做事，會被修理，不過那都小事啦，後來就考上東海，就去唸了東海。我也非常感謝張老師。後來他生病以後，我跟瓊月有去他住的地方看他，因為他其實是完全給我一個favor，給我一個時間唸書。可是他後來去世的時候，我應該是在國外，就是…在心裡感謝他。他住在大台北華城，他家也很漂亮，他太太很能幹，不知道，可能現在也退休了吧。我其實並沒有什麼跟他唸書啦，就是，我對他的人格是很尊敬的。他後來也參與台灣一些運動…比如說反惡法啦，反惡法那件事情他也有參與，也許他後來身體比較差，但都是精神上支持。他是我們的前輩，早期的黨外運動裡面，少數幾個外省人像他這樣的…。」（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去自我所成長的環境---那些她在進入研究所前覺得理所當然的事物展開一番反省，讓她對於社會上的弱勢、邊緣人的處境，有了更深的關注；進而開始去批判那些在威權體制之下享有既得利益的一群人，甚至包括她自己。

……到了研究所才嘗試從自己的生活經驗框架以外的，來觀察周遭的事情、世界，我覺得才啟蒙我。所以你說，真的，知識的訓練真的對我產生了啟蒙的作用。我覺得如果不是讀那些東西的話，我可能…因為我的成長背景，對我造成一個制約，是很奇特的。(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你開始就會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社會，就會…天生的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會有正義感嘛，然後對於社會上的弱勢，或是過去威權政治之下有既得利益的，有相對剝奪的，你就去發現，我們可以去這種分類，或是在這樣的框架之下，重新去了解你周遭的事情。社會學的訓練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在就讀研究所的期間，除了同儕與老師之間會針對社會弊病展開一番對於時事的討論之外，她也開始大量閱讀相關文章。當時台北的中正廟堂前，正發生野百合學運；邱家宜那時是研究所三年級的學生，她每天都會跑去買《首都早報》、《自立晚報》來看；在學校間，也會從前去參與的同學間打探現場消息；即使事件發生地點是在台北，但是在遙遠的台中大肚鄉的她，仍舊受到這些社會運動的撼動與啟蒙，甚至在週末趕回台北參與這場學運盛會。

……那時候，雖然在東海念研究所，但是台北發生學運，那那時候

我研究所二年級升三年級，對我們影響很大。…那時候大家也都很緊張，覺得：「哇，台灣是不是要戒嚴了…」(笑)。雖然我們在遙的台中大肚鄉，但是還是會每天都去買報紙，都去買《自立晚報》。可是那個雜貨店呢，就大概只有兩份《自立晚報》(大笑)，那…這個雜貨店老闆看我每天都去買《自立晚報》，他就說，那好，我明天幫你留一份。那時候我們看兩種報紙，一個是《自立晚報》，一個就是《首都早報》，其實《首都早報》很難買啊，除了台北以外，雜貨店他可能會有…有嘛…好像也有買到過。那你就會很喜歡看，很想看這方面的東西，很想知道那時候發生什麼事。(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那時候我在所裡面，還在唸書的時候，禮拜六禮拜天還跑去中正紀念堂看一看他們在幹嘛。…我們有個學弟叫方孝鼎，當時也是很活躍。那方孝鼎他們跑去絕食嘛，就學運的時候嘛，後來都昏倒了。因為他很高大嘛，那我們在學校聽到，說：「啊？方孝鼎昏倒了，怎麼那麼虛弱啊！」(笑)」那時候就這樣子，那時候我們都很關心。(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也因為受到當時整體社會、校園改革風潮的影響，一畢業之後，她急著想要參與與見證台灣社會變動轉型這些關鍵的歷史時刻，那時她認為記者這個工作，就是個絕佳的位置，可以讓她直接見證這些事情；因此，1990年畢業之後，她就進入了《自立晚報》工作，這個在求學時期她不停閱讀藉以了解社會發展脈動的報紙。

……那時候也覺得自己對唸書有興趣，但也不是什麼優秀的學生，

可是就是覺得說，知識可以燃起我的熱情。可是那時候碩士念完，就不想再繼續唸書，我想要趕快去參與社會和運動，然後覺得當記者是可以直接見證這些事情。那的確也是啊，其實我做的工作，確實是符合我當初在學校的想像。因為剛開始跑新聞的第一個月，就跑去無住屋的現場，跟人家一起露宿忠孝東路。（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先造反再說！」

邱家宜在進入她一心嚮往的《自立晚報》前，其實發生了段有趣的插曲。

邱家宜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忠貞黨員」，面對一個從高中就乖乖加入國民黨的女兒邱家宜突然選擇跑去當《自立晚報》——一個具有濃厚本土意識的改革派報紙的記者，自然是難以接受的。其實，邱家宜在還未畢業前，《中央日報》就已經向她「招手」，希望她可以進入《中央日報》當記者，繼續「為黨國效命」。但是，經過左派理論與運動思潮的洗禮，邱家宜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在台大校園，牽著腳踏車、穿著波西米雅風長裙，留著長長秀髮「不知世事」的文藝少女。在社會改革風潮的影響下，她一心想要投入社會，關懷弱勢；即便對於當時自己一心想反抗與改革的情緒還摸不清頭緒，但是面對一個黨國色彩鮮明的媒體機構，她自然是不願意「走回頭路」的，也因此，邱家宜父親對於她想進入《自立晚報》的決定非常不滿，甚至覺得家裡出了個「異端」。

……當然，這都是事後的回想，那時候其實自己只是覺得不對勁，我過去所受到的洗禮，過去所受到的教育都不對勁，就是還沒想清楚，但是先造反再說！（笑）。…所以在那樣的心情下，才會進入…只要是說鬆動既有體制的，只要是反抗的，我覺得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當然是去《自立晚報》囉，當然不會去《中央日報》囉。(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於是，在「先造反再說」的心情下，邱家宜寫信給當時已經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的學長彭琳淞，請他幫自己「找工作」。

……彭琳淞他在跑中正紀念堂的時候，他們就跑啊，跑得有聲有色。然後我就想說，欸，彭哥在《自立晚報》嘛，我就寫個信給他，我說：「你幫找工作！」他就說：「好！就把你的履歷寄來。」然後那時候總編輯是胡元輝，就把我的履歷拿給胡元輝，然後就叫我去上班啦，就這樣子（笑），然後就去上班了。(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於是，邱家宜在1990年七月份進入《自立晚報》工作，從「先造反再說」的想法出發，開始她一連串參與與見證關鍵歷史的記者生涯。

「我們綜合組，四版的這些人…」

1990年七月，邱家宜在學長彭琳淞的引薦之下，順利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剛好當時跑環保線的記者李瓊月離開綜合組，預備進入《首都早報》，所以原本的缺職，就由邱家宜接力繼續跑。當時適逢報禁開放已經邁向第三年，《中時晚報》與《聯合晚報》也相繼在報禁解除那一年成立；兩大報藉著雄厚的人力與資金，逐漸在整個晚報市場開疆闢土。晚報市場的版圖，逐漸從過去的《自立晚報》獨占鰲頭的情況，轉為「三國鼎立」的時代。整個報紙產業也轉向一個報禁開放後爭相競逐言論尺度與進步思惟的局面。對照當時台灣

政治體制箝制的鬆綁，以及媒體環境，邱家宜對於當時整體的晚報市場局勢，有著如下的分析：

……《自立晚報》是很多老闆拿錢給吳豐山去辦報紙的，那大家都曉得，所以虧一點也無所謂，就是搏個好名聲。可是後來報禁開放之後，兩大報集團化了嘛，對《自晚》就很不不利啊，就被擠縮。後來整個民主化之後，社運反而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反而那個敵人已經慢慢的…感覺上敵人已經沒有那麼巨大了。所以在這種狀態下，反而不利《自立晚報》的生存。所以，我覺得它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我一直覺得說，《自立晚報》最大的貢獻，絕對不是在什麼政治的言論尺度，因為那個時候，至少我在《自晚》那個階段啦，言論已經鬆綁了，就是政治方面的言論已經鬆綁了，那就已經是不同時代了，那真正衝撞到社會的那種結構的，其實是社運這一塊。(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即便政治言論尺度隨著報禁開放，已經逐漸放寬，但是自1990年五月，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後，國家部門以治安為首要任務，要「矯正」過去因為「執法不彰」而造成的治安問題；而所謂的社會運動、自救運動等，也列入首要管制目標。郝柏村甚至在上任時表示：「四、五、六---核四、五輕、六輕，是我重振公權力，改善投資環境的重要指標。」隨後更要求依法嚴辦所謂的環保、工運、農運三類「流氓」(何明修，2006：131-132)。原本在八〇年代大鳴大放的社運熱力，逐漸在軍人閣揆上台之後，抗爭空間為之緊縮，一夕間，風雲變色。

在上述的政治情勢下，除了少數的平面媒體外，主流媒體對於弱勢、社運團體的消息，仍是隨著政府經建政策的走向而一面倒；弱勢的聲音在台灣政體

逐漸邁向民主化的九〇年代，仍只能在有限的空間中發聲。當時進入《自立晚報》的邱家宜，有著很深個感觸：

……後來我進去的時候，就大概是台灣最關心社運的報紙了。其實我覺得…政治解嚴以後，言論的尺度就開了嘛，其實《自晚》在那個階段，與其說它是在政治的尺度上比人家寬，不如說是在社運的報導上…因為它讓很多本來沒有辦法見諸大眾媒體的一些議題，對特定的族群來講，起了一個很大的…就是，訊息的傳布，也是鼓勵的作為。就是說，欸，弱勢團體做了一些事情，我們所謂的主流媒體、就是大報，根本不理它們，不會像《自晚》給它們做了四版頭，讓它變成是一個公眾議題、公眾事件，像蘭嶼的遊行、反核廢料的事情，自晚都是一兩個月一直持續的在報導。無住屋運動啊，自晚也是每天寫每天寫，只是說大小而已。那像其他的報紙，大概就是遊行的當天，會有報導而已，會是就是一小段這樣，除非有很大的衝突，不然都是做得很小。(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面對當時媒體對於弱勢新聞的不重視，以及官方與民間團體在媒體呈現的失衡狀態，邱家宜在進入《自立晚報》後，基於「想鬆動台灣現狀」的心態，每每在報導弱勢、社運新聞時，都有意無意的「偏袒」他們：

……所以就是在那樣我剛剛跟你交代的那種心情下，就進去，很認真的去跑那些足以鬆動台灣現狀的那些力量（笑），然後跑去鼓吹他們，把他們寫得很重要，他們其實只有小貓兩三隻而已，可是就每天都寫他們。(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除了對於媒體報導失衡環境而讓邱家宜在報導上偏重弱勢、社運團體外，在《自立晚報》的同儕間因「道義相結合」而互相激勵的影響下，也加深了邱家宜抱持著要關懷弱勢的心情與信念。

……那《自晚》的這些同事，大家不見得完全彼此認同，可是呢，只要有事情，大家都會相挺。因為大家覺得，我們是道義相結合，我們不是說為了什麼好處才去與妳結交。因為大家都是一種……我們的工作比人家多，薪水比人家少，然後大家一起工作，妳會有那種「同志感」。比如說我們現在大家在社會上四散，我們不會結黨，可是一旦有同事出來，有事請妳幫忙，只要能力所及，大家都會出來；有這樣子的一種，革命情感，可以說這是一種革命情感，就是對這個人妳有基本的信任，因為妳知道在這個狀況之下，他會去做這個事情，有一些東西是妳可以相信的，不會太遠…所以，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基礎在。所以《自立》的這群人，其實是蠻特別的。尤其是我們綜合組，我們第四版的這些人。（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我有這種傾向耶（笑）。對，我會同情弱者，這是我的一個傾向，不知道，個性裡面吧…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跑社運的記者，通常基本上有這樣的傾向，一定不是趨炎附勢的，一定不是那種…基本上，大家就是會同情弱勢，或是說有一些正義感，就是會打抱不平。…那…這些運動，基本你就是會覺得，要關懷弱勢，妳會覺得說，啊，這些窮人，可憐的人，邊緣的人，他們不是活該倒楣就是這樣，我覺得妳應該要去考慮這些人，而不能把妳自

己的特權視為理所當然，然後覺得他們就是愚昧的，是低等的。(

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當時的政治氛圍如何強勢的主導與影響媒體方向，如何限制街頭運動的情勢，從邱家宜在《自立晚報》所主跑的幾個令她印象深刻的事件，就可略窺一二。尤其是在她初入《自立晚報》當記者之後，所「見識」到的第一個街頭大場面---「無住屋運動」。

坐在「社運流氓」的辦公室

「咻～～咻～～咻～～」，鞭炮聲震耳欲聾，花火劃過黑漆的夜空；一大群抗議群眾圍著一隻黑色的無殼的蝸牛跳舞歌唱，遠看像極了一場傳統節慶的儀式，和整個熱鬧的忠孝東區商圈形成了一種突兀的對比。

這是1990年8月25日晚上的忠孝東路街頭。一群自前一年8月26日發起「萬人夜宿忠孝東路」活動、為了爭取都市居住權益與合理住宅政策的「無殼階級」們，在政府承諾改善住宅政策的選舉承諾跳票後，又再一次聚集在熱鬧的忠孝東路上。

從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島上，頓時湧入了一百五十萬人的「政治難民」，帶了一波住宅需求問題。直至1960年代，台灣在經濟政策上，以發展出口導向的輕工業，致使許多原本務農的青壯人口，轉至台北、高雄都會區的工業部門，形成一城鄉移民風潮，而政府在因應的政策上，也一直未有效的處理都市人口暴增之後可能發生的不良效應。在歷經了1987年到1989年狂飆的房地產炒作景況之後，一群結合知識份子、專家學者、社運團體的「無殼階級」，終於趁著1989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政治機會，發起「無住屋運動」，獲得了各界同為「無殼」者的熱烈回響（呂

秉怡，1992：13-21)。然而在1989年底的選舉熱潮過後，政治人物為了競選而爭相拉攏的這票「無殼階級」時所開的政策支票，未能如期兌現，致使他們又再度的回到1989年8月抗議的高級住宅商圈---忠孝東路街頭，重起爐灶。

邱家宜在1990年七月進入《自立晚報》後，就開始報導「無住屋運動」的相關新聞。面對政治強人郝柏村上台之後宣稱要「肅清街頭流氓」的政治氛圍，無住屋運動第二次在忠孝東路街頭的集結，不同於前一年那種嘉年華式的抗爭方式，⁵²顯得較為緊張與肅穆。

……我那一年跑的時候，是無住屋運動的第二年，第一年的運動我沒有看到，就是第二年，我剛跑新聞沒多久，就去跑無住屋。…因為那一年已經是郝伯村當行政院長，所以後來就驅散…好像是吧。那個時候顏坤泉因為工運的事情被判刑，那他們在現場就有作一些示威，那就被驅散，就有點衝突性…。不像前一年，1989年，坐在忠孝東路，那一次就完全是嘉年華，就城鄉所做得很和平，很熱鬧。那個時候好像郝伯村還沒有上台，所以那一次（1990）氣氛就整個不一樣，就比較肅殺，我跑的是那一次。…那大概到下半場的時候，比較晚了，就開始…一方面也是因為群眾比較少了，大家來湊湊熱鬧就走了。然後曾茂興他們就…那警察就開始驅散，就衝突了。所以那天晚上的氣氛，不是像前一年那樣像社運嘉年華。（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邱家宜當時跑無住屋運動時，相對於一些往政府部門問消息的記者，她反而每天坐在無住屋運動相關聯盟的辦公室裡面，向這些所謂的「社運流氓」討

⁵² 無住屋運動堪稱是自台灣1980年代以後，第一次以和平、非暴力嘲諷、戲謔包裝整個運動形象的和平抗爭，扭轉了大眾對於街頭運動的暴力形象。同時，由於無運的訴求能夠打動社會中、低層民眾，進而產生共鳴，因此，運動初始才能引發社會輿論的支持與各界聲援（呂秉宜，1992：16-21）。

消息：

……就是每天去崔媽媽那邊…除了那個曾旭正、陳志梧之外，還有一個陳冠甫；陳冠甫他現在到政府機關去工作了，那時候也是老夏的學生，那他就負責對外發言。那我就是每天去那邊，跟他們聊天。人家是跑部會，我們是跑社運團體，像某個晚報的記者，每天都是去環保署坐著，等新聞稿來，然後去問官員。我們也會去環保署啦，去環保署寫新聞稿吹冷氣。不過我們通常都是每天去社運團體那邊，然後就坐著，打電話什麼的（笑）…。（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而一天到晚和這群「社運流氓」討消息，加上邱家宜「本質上」就認同這些社運團體的訴求，以及報社支持社運的基本立場，以致於，我們若翻開當時《自立晚報》報導無住屋運動的一系列報導，可以很容易的發現，邱家宜口中所說的「鼓吹」運動、「壯大聲勢」的寫作方向。從1990年8月25日「重返忠孝東路」的行動前，邱家宜就寫了一篇「預告」性質的報導：〈「重返忠孝東路」今天很熱鬧〉（自立晚報，1990年8月25日）；報導中的首段就引述了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的成員表示「動員情況良好」的說法，替還沒開始的抗議活動「造勢」。而自立晚報則把這篇報導放在六版綜合版的版頭位置，旁邊再搭配了一則邱家宜從24日就開始寫的深度報導聲援當晚的活動（邱家宜，1990年8月25日）。行動的隔天，《自立晚報》的第六版，幾乎可以說是「無住屋運動」版；從行動現況到場外花絮，佔滿了整版版面。

事實上，相較於前一年無住屋運動在忠孝東路的人氣，1990年這一次的「重返忠孝東路」聲援人潮明顯少了許多（呂秉怡，1992：19-20）；然而在邱家宜的筆下，這一次的活動，仍舊呈現了「氣勢如宏」的態勢。邱家宜在寫作方面

的「偏重」，在之後她所跑各種運動中，都明顯的顯示出來，這尤其反映在官方部門對她的「抱怨」上：

……就是妳對你自己要誠實，當然我們有時候會澎轟（台語）環保團體的一些狀況，有時候也會誇大他們的影響力。政府官員有時候也是會很不服氣說：「就小貓兩三隻，妳把他寫得好像多壯大…」。

（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1990年8月的無住屋運動，是邱家宜當記者之後，所遇著的第一次街頭場面，而從她當時所寫的報導中，其實就可以定論她絕對不是一個坐在冷氣房裡與官方要消息與公關稿的記者，而是一個「立場鮮明」、「偏重明顯」、老是與郝柏村口中的「社運流氓」一起「混」的記者。而這樣的採訪方式與寫作方向，更顯現在其後她所跑每一次環保運動新聞上。

以筆替「反核暴徒」平反

根據張茂桂(1989)的分析，台灣社會對於核四廠興建議題的討論，在1984年之後，才逐漸明朗化。1984年12月，政府宣佈「暫停興建核四」，反核運動達高峰。然而，反核運動在宣佈停建之後仍持續進行；從1989、1990年連續在四月間的反核大遊行就可看出核四運動，甚至是1980年代末，整體環保運動與公民自救意識的高漲（張茂桂，1989／徐正光、宋文里，1989：189-209）。

這股從1980年代中期就開展的反核運動，原本該是一場貢寮地方居民自救與環保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1991年發生的「一〇〇三事件」，卻讓反核運動蒙上了血染的陰霾。

在1991年二月開始，歷經四個月的核四環評報告書出爐之後，貢寮居民在

核四預定地搭建「核電告別式」的棚架，準備展開長期的反核保衛家園戰。在自救居民與警方交涉之下，警方原本承諾不會擅自拆除，但在1991年10月3日的清晨，警方趁居民熟睡時，拆卸了棚架，而引發警民衝突，也因此釀下悲劇。事發當日，邱家宜恰巧在貢寮附近的社區做專題，聽到消息之後，她才匆忙趕過去，錯過了事發關鍵時間點，她與報社同事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考量為避免新聞報導一出傷及反核運動，因此。當日在《自立晚報》第六版上，只出現了小小一則約180字的報導，並以〈警方拆除「核四告別式」棚架 十餘鄉民、警員受傷〉這樣輕描淡寫的標題帶過。而當日的某家晚報與隔日各大報紙，則紛紛以「暴民」、「暴力流血抗爭」的形象描寫事發經過，⁵³重重的打擊了反核士氣。

未能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又在為了維護運動團體的考量之下，無法及時報導出相對於其他報紙抹黑扭曲貢寮居民抗爭的觀點，讓邱家宜在事後感到非常懊悔：

……那個貢寮核四的事情，貢寮的警察死掉的事情，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在現場。其實《聯合晚報》是報導的最多，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有打電話回報社，因為已經超過我們截稿時間，我就打電話回報社。因為《聯合晚報》截稿時間比較晚，因為他們機器比較好，速度比較快，那我們的截稿時間比較早。那我有打電話回報社；是同事接電話，可是同事的那種社運傾向比我更強…那時候我就說；「啊，有一個警察死掉」，那他就說：「那民眾有沒有受傷？」，我說：「我不太確定」，可是他就是主觀上他不想把警察死掉這件事情放大，所以我們好像見了兩行吧，兩行。…所

⁵³ 1991年10月3日的《聯合晚報》頭版，以「兇手頭綁反核終結者布條，先丟汽油彈…」的內文呈現。隔日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更在內文中，以「反核暴徒」、「暴民」、「反核暴力行為」等等形象與字句描述貢寮自救居民，《中央日報》更以全版引據官方說法「譴責」反核暴力。

以《聯合晚報》那天就做很大，說什麼警察…生命垂危啦，差不多就是送醫院急救之後就死掉了。那那個事情對核四運動當然是很傷，就是從那個事情之後，整個反核運動就受到很大的影響，就整個被汙名化。(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邱家宜回想當時主流社會與媒體輿論，對於整個貢寮鄉與反核運動的抹黑與汙名，讓貢寮鄉自救居民遭受極大的打擊；更不用提當時在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郝柏村表示：「這不是單純的反核行為」、「政府絕不寬貸」、「不容許這樣的暴力事件發生」，並指示警調單位要徹查真相，揪出兇嫌後，整個貢寮鄉彷彿再一次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在員警衝入居民家中搜索「預謀證物」的情況下，貢寮鄉的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嚴肅與緊繃的氣息。

……那江春和，就是那個自救會的會長，後來就抑鬱而終，就肝癌，然後因為這個事情受打擊很大，然後他們就被扭曲報導，然後整個貢寮被搜索、約談啊，被打壓。…那時候貢寮就開始掃街啊，警察就一家一家進去搜啊，說：「你們是不是有什麼危險物品啊？」貢寮人就嚇死了，因為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危險物品，可是他們都有走私，他們那時候有很多大陸的東西，因為他們在海上交換，漁船出去，都在海上交換，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食品啊，南北貨，他們都拿出來賣給他們，那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違法的，那你說，如果警察要抓他們就違反了啊…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就是兩岸還沒有開放貿易，可是大家都走私啊，那他們都很害怕被抄…，那老百姓看到警察，嚇都嚇死了。所以那個事情是印象很深刻，你就會知道說，喔，這就像是白色恐怖…(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主流媒體觀點所發揮的影響力，在「一〇〇三事件」中，完全呈現出來。也反映出邱家宜所說的「報導比例失衡」的情況是多麼的嚴重。實際上，即便《自立晚報》當天出刊的報導上，出現了能夠稍微平衡當時其他媒體一面倒譴責反核暴力的論述，也不見得能扭轉「頹勢」。但是未能在第一時間寫出不同於其他媒體觀點的報導，還是讓邱家宜覺得遺憾；尤其，邱家宜在事發的前一天和開車衝撞警方的當事人談過話，也了解這樁悲劇的發生絕不是立基在所謂「預謀殺人」的事前計畫中。因此，邱家宜針對事情發生過程再度寫了一系列深度調查報導。從其報導裡「反核與流血悲劇不能劃等號」（邱家宜，1991年10月4日）、「澳底居民成了社會輿論下的孤兒」（邱家宜，1991年10月7日）等文句描述，以及《自立晚報》隨後看似「力挽狂瀾」奧援性質的報導，都可看出邱家宜與《自立晚報》企圖幫助反核運動回歸軌道與替貢寮居民洗刷汙名與冤苦的傾向。

……可是…這其實是，要在第一的時間之內做正確的判斷本來就很難，我們本來時間上就比較壓縮，所以那個新聞其實是…《自晚》有跟沒有就差不多，因為那個訊息就…當然，《自晚》還是有；後來我就做了那一系列報導嘛，有關事情發生之後，包括事情發生的當天，還有事前。…其實我事前就跟…後來開車撞警察的那個人，我們其實前一天有談話。因為那時候大家就講那是一個預謀殺人，可是這其實完全不是預謀殺人啊，妳可以確定，它就是一個在運動現場的，一個臨時起意的衝撞，…但是那時候就是衝撞性…造成的傷亡。那當然…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然後…某種程度的失策，在那樣的狀況之下，是某種程度的失控。（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翻攝自《自立晚報》)

《自立晚報》在「一〇〇三事件」的報導，在多方考量下，未能在第一時間登出不同於其他媒體的報導觀點，主要的原因除了截稿時間、印刷機器設備不足等現實條件限制下，邱家宜與報社同事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在於擔憂資訊不足的報導一出，恐怕傷害到這些脆弱的社運團體。

……社運團體內部也是很多問題啦，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去寫社運團體內部的問題，我們不太去寫，這個也是我們的bias吧，會覺得說，那不是很重要吧，或是覺得說，我們沒有必要去做這個事情，去傷害這些脆弱的社運團體。(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官方部門想「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

邱家宜在報導上的傾向，在於讓這些所謂的「社運流氓」、「反核暴徒」等弱勢者發聲，以平衡當時媒體報導的失衡情況；而這樣的傾向不僅只顯現在

「無住屋運動」、「一〇〇三事件」上，更反映在其後她得獎的系列作品，如〈大林蒲公害事件調查報告〉⁵⁴與〈隨水逝去的鄉愁---美濃客家庄反水庫記要〉⁵⁵中。在「一〇〇三事件」、「林園公害事件」發生後，政府對於環境自救運動的壓制的力道越來越重（和明修，2006：142-143），因此在1992年5月26日，中油大林煉油廠排放出有害白煙，引發長期抗議中油污染的當地居民再度前去場區抗議，而引爆激烈的警民衝突，而這群在政府眼中的「社運流氓」自然是遭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邱家宜當時所作的一系列報導，就是在《自立晚報》為了要還原真相，寫出這些「暴民」的心聲而產出的。⁵⁶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被汙名化的很厲害。那中油的公關，他們也是很強勢。我是那時候核四的公關跟中油的公關，競相拉攏的對象（笑），因為我是搗蛋份子，所以他們都很想要讓我投降。（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像邱家宜採取這種報導方式的記者，在相關政府單位與企業財團眼中，自然成了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自立晚報》的記者在採訪社運議題時，是這些「社運流氓」歡迎的「同志」，卻是官方部門與企業財團一方面要拉攏，一方面使臉色的不收歡迎的人物。邱家宜當時就實在報導環境公害議題時，被官方部門找去「聊天」，甚至時常被官員不客氣的大罵，以及惡狠狠的掛上採訪的電話。她回想當時面對到的這些情況，一方面來自於當年輕的「憨膽（台語）」，一方面也來自於整體政治環境的改變：

⁵⁴ 〈大林蒲公害事件調查報告〉系列報導，在1992年獲得新聞局金鼎獎專題報導獎。

⁵⁵ 〈隨水逝去的鄉愁---美濃客家庄反水庫記要〉系列報導，在1993年獲得第八屆「吳舜文地方新聞獎」。

⁵⁶ 參考邱家宜訪談。「那時候已經是李永得當總編輯，那他就想說，欸，這個小姐好像，就是他覺得我好像可以坐專題，他就叫我去坐專題，因為那時候《自立》也覺得一些新聞獎可以參加，整個氛圍慢慢得改變了，然後一些不同的聲音漸漸受到重視，所以就想說應該去參加一些新聞獎。那他可能覺得我坐專題還可以吧，就派我下去，叫我去做。」（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原報導請見附錄四。

……我那時候，其實不非常的有技巧，現在回想起來，不是那麼有技巧，不是那麼的世故，就是，其實自己野蠻佩服自己的，什麼都不怕，膽子很大，妳知道嘛？那種鎮暴警察的場面啊，也不怕被打，不知道哪裡來的熊心豹子膽（笑）。像他們要找我去溝通，我也就去了，從來都不會不，反正就是千萬人無往矣，就是對於自己所堅持的東西還蠻有自信的，然後對於自己所面對的體制的威力，不是完全了解，就是憨膽憨膽（台語）這樣子。可能也是幸運吧，因為整個狀況已經改變了，自己是媒體記者的時候，所以其實也沒有人敢對你怎麼樣。其實那時候真的很多人想把我去之而後快（笑），我現在想想那些人，是想把我除之而後快的，一些處長啊，一些中油、台電的公關啦。他們表面上當然是表現出非常籠絡的樣子。（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邱家宜，是官員眼中的搗蛋份子、替弱勢發聲的另類觀點、鼓吹與壯大社會運動的「社運流氓」的同志。然而她自己對於當年自己的角色則有了一令番詮釋：

……基本上，當然會有那種人跟人之間的那種…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是…會啦，因為基本上我們做的很多都是弱勢啊，運動團體啊，那其實你說你是《自晚》的，人家都會知道說，「啊，那你是來為我們說話的」，會有這樣的一種理解，所以對你的態度會比較客氣。那當然也會有不了解《自晚》的屬性，可是因為你是記者，你是年輕的女性，然後你的態度很和善，你很客氣的請教，通常…我們不會得到太不好的回應。（管嫫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我覺得，身分還是要清楚，就是角色還是要清楚。因為，就是說，我的角色…我跟社運團體的朋友很密切，可是我覺得我的角色…我是一個同情社運的記者，可是角色還是要清楚。(管嫻媛，邱家宜訪談，2008年6月26日)

即便是同情弱勢的記者，即便下筆時的重點在讓弱勢者發聲，以及壯大社運團體的聲勢，但對於邱家宜來說，她仍為當時她所站的記者位置與運動者之間，劃了一條界限；她自認為對於運動的熱忱不如報社的其他同事們，於是她為自己劃的這條界線，讓她用洗鍊的文字功力，極盡地寫出她的所見所察，寫出一篇又一篇發人省思與動人的報導；同時，也實踐了她進入媒體場域前的信念：參與、見證這些重要的歷史關鍵時刻，而又在這些見證之中，實踐了她作為一名「同情社運」的記者角色。

在離開《自立晚報》後，邱家宜曾短暫在《新新聞》雜誌工作，但因為雜誌走向與她個人關注的議題有出入，因而離開。目前，她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擔任執行長，致力於媒體環境改革、推動媒體素養等事務，並發掘與鼓勵更多關懷台灣社會各種層面的新聞從業人員；即便離開了第一線的媒體工作，她仍試圖在不同跑道上，讓媒體環境變得更好。

第六節 綜合分析

本章第一到第五節將五位記者生命史，先後以時序做了脈絡性、故事性的鋪陳詮釋。為了避免研究者主觀上的認知與想像影響記者基於個人認知所陳述出的自我理解，因此，在上五節研究詮釋中，本文除了以受訪者訪談內容作為詮釋之基礎外，本文的詮釋角度，則以研究者與受訪者在訪談互動的情境中，共同建構的認知角度來鋪陳個人生命史。更具體地說，根據本文之研究主旨---

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研究者在與受訪者建構他們的生命圖像時，將焦點放在每一位記者在《自立晚報》時期的採訪經驗，以及在每次事件之中，其自身的實踐方式與內容，來探討與理解影響記者專業意理的形成與實踐。

本文以五位受訪者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階段的生命歷程與經驗如何影響其形成個人專業意理為觀察重點，而對於受訪的五位受訪者而言，這段生命歷程皆距今已有快二十年的時間，因此，受制於個人記憶力有限，當受訪者回溯過去而敘說的感受與經驗，通常屬於以「現今」的狀態來回想、詮釋「當下」的情況。因此，除了每位受訪者依據記憶來回溯與整理建構出個人的生命圖像外，本文在詮釋的過程中，也補充了當時整體社會的政經條件與媒體環境，藉以對照個人生命發展的社會情境。藉由五位受訪者分別在不同時間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對於時代、報社環境等等的感受，每個人各自有不同的體觸；本文也得以從五人的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生涯中，觀察到其中的同質與異質性。本節前段分別按照記者生命圖像整理出其專業意理與新聞專業實踐上的主要轉變。後段則基於本文架構中設定可能影響個人之外部因素；包括家庭環境、求學歷程、媒體環境、時代背景，做了以下整理。

一、記者生命圖像整理

（一）林美挪部份

依據林美挪的敘說與自我詮釋，在誤打誤撞進入《自立晚報》前，她其實並未對於記者工作懷抱著憧憬，或是已先養成社會改革意識。林美挪對於記者專業意理的詮釋與自我記者角色的建構，是直至她在1983年實際進入媒體工作後，伴隨著重大事件採訪經驗而逐漸養成。在本章第一節所呈現的林美挪生命圖像中，我們可以大致發現林美挪生命歷程中的幾次重要轉折與衝擊，以及幾次重要採訪事件如何影響她的專業意理之形構，以及這樣的專業意理內涵如何影響她的新聞專業實踐。

以記者專業意理養成過程中的影響因素為觀察重點，本文發現，可以將林美挪的生命圖像分成兩個階段觀察：在進入《自立晚報》前與進入《自立晚報》後。

在進入《自立晚報》前的階段，即林美挪的求學階段，大約是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她選擇就讀文化大學時之因素，並非來自對於記者工作之憧憬；而是在整體社會結構的限制與師長影響下所作的選擇。而進入文化大學後則因校外採訪與實習經驗，而逐漸構築出對於記者角色的模糊形貌。本文以「模糊形貌」來指稱林美挪在實際進入媒體工作前，對於記者角色之理解，乃因，當時林美挪對於記者的想像，是因為接觸了在擁有資源優厚的大報社中工作、能夠採訪「大場面」議題的記者，而非因個人在實際新聞作業過程中，藉由自我採訪經驗而產生的。因此，面對求學時期對於大報社中記者形貌的想像與期待經驗，使她在進入《自立晚報》初期，因實際接觸所屬工作單位與採訪路線不受重視而產生了衝擊與落差。

在1983年進入《自立晚報》後，林美挪首先得面對的，是必須尋找與建築自我記者位置與內涵的問題。一開始，她認為被報社分派到「不受重視」的環保署新聞，同時，因為官署不重視《自立晚報》，讓她感受到在場域中尋找自我記者位置的徬徨，甚至一度萌生辭退之意。而這樣的徬徨感，直至她在1986年前往美國報導杜邦案後，有了轉化，而其專業意理的內涵與記者特色也在採訪過程中逐漸具體而鮮明。

本文藉由林美挪的敘說發現，林美挪因接承著求學時期對於記者的印象，企圖在進入媒體工作後，尋找能夠讓自我發揮與建立記者位置的機會。當然，這部份不僅僅是林美挪在工作成就與個人位置上的現實利益考量，也包含了她對於議題的關懷與重視。而這樣的轉化可以從林美挪在採訪杜邦案時發現：她開始與受訪者接觸而產生對於人的關懷情感，這這份關懷情感在其新聞專業實踐與專業意理內涵中的發生的作用與轉化。例如我們可以從下列幾點觀察出：

首先，在採訪李長榮化工廠案的報導中，我們可以發現，林美挪的報導重點與關心層面，開始從「議題」延伸至「人」身上，前期在她尋找關注議題時，屬於第一階段，即個體生存導向，而林美挪在新聞專業實踐層面中的報導目的與方向的改變，即開始關注「人」，則屬於從第一階段轉換製第二階段之轉換期，即在自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對於他人的特殊責任與關懷。再者，在林美挪長期採訪環境議題、與弱勢及社運團體接觸後，逐漸延展出清晰的記者形象。不論是新聞專業實踐中報導方式與目的偏向替弱勢者發聲外，她在新聞工作外實際投入社會運動之中的實踐方式，屬於第二與第三階段之間，其實見方式除了滿足自己之外，也為了服膺他人的需求，並加深對於責任的概念。而此點正是對自己、他人負責後產生的普遍性關懷。而這些都明確地讓她在專業意理中具有鮮明的「鼓吹者」意理。另外，正義倫理之概念也存在於其專業意理內涵之中；如她對於政府政策走向之批評，以及投入社會運動之中並要求社會公平等等，皆屬於正義倫理範疇。換言之，她所面對的受訪對象與事件性質不同時，其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的情感也都有深淺之不同。

（二）王幼玲部份

藉由本文第二節所呈現的王幼玲生命圖像，我們可以發現，家庭、求學、進入《自立晚報》後的採訪經驗如何影響著王幼玲專業意理內涵轉化與形塑。其中可以發現王幼玲生命歷程中幾次關鍵經驗的連結，如何促使她致力於勞工運動之中，以及影響其在新聞專業實踐與專業意理的形構。其中包括：一，王幼玲生長在勞工階級家庭的經驗。二，大學時期左派理論思想的啟蒙。三、進入《自立晚報》後的幾次重要工運採訪經驗（這部份經驗又與她自身在報社組工會的經驗互相交錯影響）。

藉由王幼玲的敘說，本文發現，王幼玲對於記者工作的想像與功能，實際是構築在她為實踐左派、推動工運的理想圖像中，換言之，正如本文第一章所

述，她以知識份子的身分進入媒體場域中，試圖發揮改革力量。此一時期，在其身上所發生的關懷倫理較無法藉由她個人之敘說而觀察到，反而比較偏向於受到正義倫理內涵之感召。而在護士工作後轉行當記者之契機，其一，是王幼玲在1987年進入《自立晚報》當記者前、擔任護士工作期間，因建立了新聞編採經驗，而產生對於新聞寫作與論述興趣，加上左派理論思想啟發了她的社會改革意識，促使她欲參與社會改革實踐。其二，則是時代環境因素影響；當時整體平面報紙逐漸發展出了對於環境、弱勢關懷的報導走向，因此，她認為記者工作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改革功能，因而投入記者一職。這點可以從她在進入《自立晚報》前，前去《民生報》應徵時的說法：「我想做楊憲宏以前做過的東西」得到驗證。因此，在她實際投入媒體前，我們可以發現她已經具有某種社會改革意識，甚至，可能也已經先行產生了對於記者功能的想像，且對於媒體功能與記者功能之理解，也是偏向於正義倫理的層面。

在王幼玲進入《自立晚報》後，我們更能藉由她所敘說的三次重要採訪經驗，發現她在新聞專業實踐、專業意理內涵上的轉化與形塑。一開始，她的改革意識源自於理論與書本的啟蒙，而在實際接觸工人運動後，她發現理論與現實情況的落差，而逐一調整她的想法與實踐方式。其後，更因為她自身組工會的經驗，讓她更能夠從工運者的角度觀察與理解她的受訪對象；我們可以發現，王幼玲與林美挪在社會改革意識的發酵時期雖然不同，但是同樣是從關心「議題」開展，而延伸至對於「人」的關懷。這也印證了本文所提出「關懷倫理」以補充記者專業意理內涵之概念；即藉由實際與人接觸後所產生對於人的關懷情感，實際影響了記者專業意理的形塑。而此一時期，正是關懷倫理的第二與第三階段，及能夠設身處地的考量他人之立場，而言伸出對於他人之責任與情感。因此，我們也可以從王幼玲在新聞專業實踐層面中，偏向替弱勢與勞工發聲的報導方式與目的觀察到，王幼玲專業意理內涵中鮮明的「鼓吹者」角色不僅僅停留於正義倫理的層面，同時也藉由與受訪者之接觸而產生之關懷倫

理。

（三）李瓊月部份

李瓊月是本研究五位受訪者中，唯一在目前仍從事新聞工作者。我們不難從她對於新聞工作的堅持，以及長期在報導崗位上關注弱勢、環境議題上，發現她專業意理之偏向。

她在1988年進入《自立晚報》前，曾經有好幾年的時間在婦女新知工作，對於社會的改革意識、女性意識的啟蒙也來自於這個階段。李瓊月在大學時期選擇新聞系就讀時，還未產生對於記者工作與功能的明確想像與自我定位，直至她在1988年先後進入《大華晚報》與《自立晚報》負責環保新聞後（因兩報社該新聞路線出缺而進入），才藉由採訪與接觸弱勢、公害現場經驗，而逐漸構逐出她對於自我記者角色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李瓊月以《自立晚報》作為求職第一志願，顯現了她對於該報報導立場與定位上的認同。

藉由李瓊月的自我敘說與其報導方式，本文發現，在新聞專業實踐上，她的報導目的與方式偏向替弱勢發聲、批評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規劃；而就目的而言，較偏向正義倫理之範圍。但影響其實踐方式之因素，除了對於議題的關注，以及對於要求社會正義、公平之價值觀外，也來自長期與弱勢、社運團體互動的經驗、理解弱勢者在不平等社會體制下的弱勢處境而產生對於人的關懷情感，以及關懷倫理階段性的轉變：第一階段利己考量，包含了記者個人尋求自我位置與成就。第二、第三階段的轉變，則從與人接觸而產生的情感與責任經驗中，影響其寫作與報導方式發生；例如在後勁事件中，我們可以明顯的觀察出她的新聞專業實踐方式，不僅止於對政府政策之批評，而是來自對於抗爭團體的同情與關懷。因此，藉由李瓊月在《自立晚報》期間所採訪的幾次重要環境議題經驗，本文發現，這些經驗與過程，強化了上述她同情、聲援弱勢、社運團體之報導傾向，而將其自我記者專業意理指向「鼓吹者」之內涵。

（四）彭琳淞部份

藉由本章第四節所呈現的彭琳淞記者生命圖像，本文發現，彭琳淞在1980年代末期進入《自立晚報》前，已逐漸養成明確的社會改革意識；而這也促發他在投入記者工作時，選擇進入與其志趣與理念相符的《自立晚報》工作。彭琳淞較前三位受訪者不同之處在於，他對於社會改革的意識與理念已經在求學階段萌芽，並投入校園民主化運動之列。此點受到外在環境、時代氛圍因素影響；他就讀大學、研究所的時代氛圍已經進入1980年代中期，即社會運動黃金時期。他和其他四位受訪者在《自立晚報》期間的採訪經驗又另有差異；在進入《自立晚報》初期，彭琳淞是政治組教育線記者，在1993年後才轉至綜合組，轉跑勞工與各類社會運動議題。

依據彭琳淞在《自立晚報》期間不同採訪路線所採訪的重要事件經驗中，本文發現，他在政治組採訪野百合學運的階段，著重在建立自我新聞專業技術信心上；而在綜合組時期的他，則因為採訪多種社會運動議題，而逐漸開展他選定自我記者角色的採訪位置。就關懷倫理的層面而言，此時的彭琳淞屬於第一階段轉至第二階段的轉換期，即由個體生存導向轉而為他人利益考量之導向。如兩個階段共通之處在於，他明確的選定自己是「站在群眾的角度在看」的記者，換言之，即為弱勢、社運團體發聲的記者位置。在綜合組時期採訪原住民權益議題，讓彭琳淞藉由短暫的「蹲點」，建立了在地的視野，並能夠貼近、理解不同文化的族群在不平等結構下的共同弱勢處境，並藉由報導替其發聲。而也在採訪過程中，產生了對於「人」的關懷情感，而其關懷倫理也從第二階段轉向第三階段。綜合上述，彭琳淞在《自立晚報》期間所呈現出的記者專業意理內涵與屬性，也偏向「鼓吹者」角色。

（五）邱家宜部份

據邱家宜的自我敘說，她在進入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階段前，社會改革意識仍未開展；而在其研究所階段，因同儕、師長、理論智識上的啟蒙與影響，促使她建立了社會改革與弱勢關懷的理念；這部份與彭琳淞、王幼玲在進入媒體職場前，就已經建立了社會改革意識與理想相同，也同樣受到台灣1980年代中期社會環境影響。邱家宜選擇進入《自立晚報》之原因，除了因為求學階段時常閱讀這份有改革理念的報紙外，學長彭琳淞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的表現，也讓她發現，記者是一份能夠「直接見證這些事情」的工作；因此，當時她拒絕《中央日報》的招攬，選擇進入與其理念相符的《自立晚報》工作。

在邱家宜擔任《自立晚報》環保線記者期間所跑的記個重要議題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她在新聞專業實踐上（報導方式、目的）偏向弱勢與同情社運的傾向；如第五節所描寫她在採訪核四事件、無住屋運動時的報導內容、方式等等。就關懷倫理的層面而而言，屬於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的轉換時期。而據本文所呈現的這幾次重要關鍵採訪經驗，我們也可發現，這些經驗逐一強化了她的記者報導位置與傾向；而與受訪者接觸的經驗與體觸，也使她從對於議題的關注，延伸至對於人的關注、關懷。因此，不論就新聞專業實踐目的或是專業意理內涵方面，邱家宜皆偏向「鼓吹者」意理之內涵，而其中也包含了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兩種倫理道德觀。

綜合上述，五人之敘說所呈現出來的專業意理圖像，都偏向「鼓吹型」記者角色，同時，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情感在面對受訪對象與事件性質不同時，又各有所偏重。藉由五人之生命經驗，本文發現，正義倫理通常展現在記者個人之價值觀與信念系統之中；因此，當他們報導關於社會正義之議題時，其信念與價值皆偏向於正義倫理層面中，追求社會公平的概念上。而在採訪的現場與面對特殊採訪情境時，關懷倫理則發生在實踐過程中。

而在專業意理之形成過程中所發生的轉化與形塑時期，五人亦有所不同；林美挪、王幼玲、李瓊月屬於進入《自立晚報》後，因採訪經驗而逐漸產生對

於自我記者專業意理的想像與形構，而彭琳淞、邱家宜兩人，則是在進入《自立晚報》工作前，就已經對於記者工作有了明確位置的想像與形構。這樣的差異除了五人在不同時期進入《自立晚報》，面對的時代、政經環境、社會運動發展態勢等條件不同外，《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在1980年代也有階段性的差異；這一部份將在下面做更細緻的分析與整理。

二、影響記者生命圖像形構之外部因素

(一) 家庭背景之影響因素（父母、兄弟姊妹、省籍、家庭氛圍）

五位受訪者皆出生於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王幼玲：1956，外省籍；李瓊月：1958，本省籍；林美挪：1960，本省籍；彭琳淞：1961，本省籍；邱家宜：1964，外省籍）；當時台灣整體政治外在環境，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戒嚴時期。隨然時代脈絡相去不遠，但基於個人先天特質、生長在本省與外省家庭之差異，每個人所受到家庭氛圍、時代的影響程度與範圍，又各有異同：

外省籍第二代的王幼玲與邱家宜在成長經驗中，有許多共同之處：父親同是「忠國民黨愛國民黨」人士；相對於本省人，擁有相對優勢資源的環境中等；因為受父母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王幼玲與邱家宜的政治啟蒙、關懷弱勢意識，皆發生在求學與進入媒體之後。如邱家宜生長在軍公教家庭，父親在公家機關擔任中階官員，相對於原住民、本省小孩擁有較多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因此家庭環境的影響，反映在日後邱家宜對於自身所處的優勢位置所產生之反省，進而關懷弱勢者處境。

而因父母社經地位的差異，可能又產生了不同影響。例如，在王幼玲的自述中，她進入《自立晚報》選跑勞工線的理由，除了在大學時代閱讀左派、馬克思理論的影響外；自幼生長在工人階級家庭的經驗，也是日後影響她對工人運動有興趣的因素之一。而邱家宜則生長在軍公教家庭，其父親屬於政府部

門的中階官員，因此相對於父親是基層勞工的王幼玲，享有更多的文化、經濟資本。

另外，受訪者出生在外省家庭與本省家庭的差異，也可在受訪者選擇進入標榜本土意識的《自立晚報》時，家庭成員截然不同的態度上觀察得到；例如，本省籍的李瓊月與外省籍的邱家宜，在選擇進入《自立晚報》時，前者父親持贊同意見，而後者則持反對意見，甚至將其視為家中「異端」。

五位受訪者之中的王幼玲、邱家宜，在家中排行老大（生長在全是姊妹的環境中），就兩人在陳述自我個性時，皆認為，因為自己是家中的長女，得擔任照顧妹妹的角色，因此自小就養成較為獨立、樂觀、積極、善於照顧人的特質。而在李瓊月的自述中，因生長在具有「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家庭，因此日後在她進入「新知」工作時，承接了這樣的家庭經驗，開啟了她的女性意識。

另外，本文基於受訪者個人認知來作研究詮釋時發現：在彭琳淞、林美挪的經驗裡，兩人皆認為，家庭環境的影響因素與其後他們選擇進入《自立晚報》後的實踐方式並無太大關連。

（二）求學歷程之影響因素（老師、同儕、社團、校園氛圍）

首先，五位受訪者大學、研究所階段，大多受到知識上的啟蒙，而各自產生不同於父母之政治意識與社會關懷。如王幼玲在大學時期修習的左派、馬克思思潮，影響她日後在《自立晚報》、甚至離開媒體之後，仍持續關注勞工議題、勞工運動。而彭琳淞、邱家宜兩人，則在就讀研究所時期，因為受到社會學思惟的訓練，促使其對於台灣當下的政經情勢與民主發展，有著敏銳的觀察與反思，進而產生社會改革、追求民主的理念。再者，如本文受訪者之一的邱家宜，基於她出生於「外省家庭」經驗的限制，她認為她的政治意識啟蒙發生在就讀社會所的階段；除了理論、知識的促發之外，也受到當時整體時代氛圍（校園民主運動、野百合學運）、同儕的影響。而彭琳淞也同樣受到整體時

代、校園氛圍與社會學思惟的訓練，而衍生出對於社會改革、追求民主的理念。而李瓊月與王幼玲、林美挪則受到來自學校教育之外的「實務經驗」影響，而產生對於記者角色的想像與雛形。

再者，五位受訪者除了林美挪、李瓊月兩人畢業自新聞系、王幼玲曾經有實際的報導寫作經驗之外，其餘兩人在進入《自立晚報》前，皆未受過新聞系所的相關訓練。按照蔡士敏（2008）的研究指出，「解釋型」記者大多畢業於新聞相關科系；然而，在本文中則出現「特例」：如林美挪雖然畢業於新聞系，但在《自立晚報》期間，她卻同時擁有「記者」與「運動者」的角色；顯示出她並未受到太多正統新聞系對於「記者」形象內涵的影響。相反的，彭琳淞雖畢業於非新聞相關科系，但對於自身的「記者」角色與「運動者」角色卻有著明顯的劃分。這正也說明了，每個人因為個人特質與生命經驗的不同，可能產生出不同的「結果」。而並非完全可以藉由邏輯與因果推演而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推論。

（三）媒體環境之影響因素（長官、同儕、組織內部氛圍、組織外部媒體環境）

1. 《自立晚報》內部工作環境

除了彭琳淞在1989年進入《自立晚報》時擔任政治組記者，直到1993年轉為綜合組記者外，其餘四位受訪者皆在1980年代間進入《自立晚報》綜合組擔任記者。五位受訪者皆指出，《自立晚報》的內部環境，給予記者的自主性空間高於其他報社，同儕間又具有「志同道合」的氛圍，因此，促發他們在新聞專業實踐上，傾向支持弱勢、社會運動。然而，藉由林美挪進入《自立晚報》初期的經驗，可以發現到的有趣現象是：即便四人同時在1980年代進入《自立晚報》，但仍因為時代、環境因素的影響，個人所感受到的報社氛圍有著些許落差：第一、林美挪在1980年代前期（1983年）進入《自立晚報》時，她所感受到的報社氛圍與王幼玲、李瓊月、邱家宜等人在1980年代後期所感受到的經

驗有所出入。林美挪在初入《自立晚報》綜合組負責醫療環保線時，她認為報社是「政治掛帥」，只重視政治新聞版面；而《自立晚報》開始轉而重視其他重大社會議題，則是在她擔任綜合組記者「第三年」以後。若以林美挪的經驗對照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可以發現報社對於政治運動之外言論的重視，多少與外在政經背景、環境運動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連結。政府當局開始重視環境議題的時間點，是在反杜邦、反核四、反李長榮化工廠運動之後才逐漸提升的，如1987年成立的環保署，在1980年代前期，仍附屬在衛生署之下的環保局；相對的，媒體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也與政府當局重視程度與環保運動態勢有關係。

第二、從林美挪的經驗中，本文發現，《自立晚報》對於弱勢、環境、勞工議題的重視，除了報社為因應時局改變而促成報導重視的轉向外，同時可能也來自記者個人所作的努力。如林美挪前往美國採訪杜邦案時，報社主管早已認定事情「已無其他發展空間」或是「不具新聞性」了，但在林美挪三萬多字的報導成果發揮了實質效益之後，報社開始重視這一類的報導。由此可知，報社給予記者的新聞自主發揮空間，除了來自報社李瓊月、邱家宜、王幼玲等人所說的報社「向來」注重弱勢議題的「傳統」之外，也來自於記者（行動者）個人本身所開拓出的空間。

2. 整體媒體環境

在1988年報禁開放之前，台北縣、市領有政府發放執照之民營、黨營、軍營報紙總數，總共有十七家，其中三家是晚報，其餘皆為日報（陳國祥、祝萍，：199）。在1988年報禁開放之後，報紙數量立即倍增，媒體工作機會相對於報禁開放前增多。就本文之五位受訪者進入媒體的時間點而言，可以觀察到除了林美挪與王幼玲分別在1983年與1987年，即報禁開放前進入《自立晚報》外，其餘三位受訪者皆在1988年之後進入；其中，除李瓊月認為報禁開放後，工作機

會較多，因而在報禁開放後進入媒體工作外，彭琳淞與邱家宜兩人，則皆在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之後立即進入《自立晚報》工作。其中，藉由林美挪的經驗，可以觀察到的有趣現象是，她認為非政大、師大畢業的學生，想進入兩大報的門檻相對於畢業於政大、師大的學生高。就她在1983年時進入《自立晚報》所觀察到的情況，她認為，《自立晚報》的記者大多畢業於私立大學，如世新、文化等等。而兩大報因為向來具有所謂的「政大幫」勢力，因此在採用新人時，有時也會以這樣的人脈關係系統作為是否錄取之考量。

這一點雖未能經由普查得到驗證，但也提出了值得繼續研究與觀察之現象；即選擇進入《自立晚報》工作的記者，除了在理念上認同報社走向與立場外，也有可能因為學歷限制，當他們準備為了就業而做打算時，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選擇欲進入的媒體選項。

另外，在五人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促成他們在報導上偏向弱勢、替弱勢發聲的影響因素除了報社內部環境因素外，當時主流媒體報導的失衡也是一大主因。如每一位受訪者在提到偏向弱勢的報導立場時，都認為以當時的媒體「重北輕南」、「偏官方輕弱勢」的報導方向，都促使他們在當時極力在報導上呈現弱勢的聲音與處境的報導方式。

（四）時代、環境之影響因素（社會氛圍、政治情勢、經濟條件）

五位受訪者在《自立晚報》期間，皆形成了「關懷弱勢」、「同情弱勢」的報導傾向，而形成此種傾向的主因，與當時1980年代各種社會運動的發展、弱勢處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林美挪、李瓊月、邱家宜三人，主要負責環保運動；王幼玲負責勞工運動，彭琳淞負責學生運動、原住民運動等。而這些在1980年代前後台灣社會民主轉型時期所興起的新興社會運動，都具有追求社會公平、公義、民主化的特質。正如受訪者之一的彭琳淞所述，當時社會運動的訴求大致上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高道德性」，類似求諸四海皆準的普世

價值，例如環境自救運動就在追求一個更合理與平等的居住環境，原住民運動則追求人權平等與族群尊重。因此，當他們親歷公害現場、抗爭現場，以及與各運動團體接觸，在長期體驗當時體制的不合理與不公正、不公義情況下，而產生了同情與支持的態度與報導立場。同時，這些來自採訪社會運動的經驗，也影響了五位受訪者離開《自立晚報》後的職涯選擇。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五人社會改革意識之啟蒙點雖然不同，如有人是在進入《自立晚報》後逐漸開始，有人是在求學階段就已然形成，但我們不難從五人形成對於改革社會的理念與對於弱勢的關懷時間上，發現重疊之處。這段重疊的時間大約是在1986年前後，環境、勞工與各類社會運動開始大鳴大放的時期。關於此點，本文將留待第五章結論作詳細說明。

上述整理了五位受訪者受到後天環境、人物因素之影響，而為了能夠具體地呈現五位受訪者記者專業意理之內涵，我將在第五章結論部份，針對受訪者在擔任《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期間的所形成的專業意理內涵與新聞專業實踐內容，作統整與分析，並與本文所提出之理論架構作進一步的連結與陳述。

第五章 結論

本文藉由在1980年代進入《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的五位記者生命史來探索記者專業意理之形成與實踐。本文以1980年代台灣整體歷史脈絡、媒體環境作為背景，藉由記者個人所敘說、建構的個人生命圖像來探索記者專業意理內涵之形成過程時發現，五位受訪者依台灣歷史、政經脈絡、媒體環境等條件，在每一次關鍵事件（個人主顯節）中，所做出對應的實踐方式，形塑或轉化了其自身的專業意理內涵；而五位受訪者之專業意理，乃是在三種專業意理中不斷流動、游移的。若依據五人對於媒介功能與記者角色之信念系統做推類，則五人皆屬於專業意理中「記者欲藉由報導改變社會現有結構」之「鼓吹者」角色。

藉由本文探討五位受訪者生命史的過程中發現：專業意理是一種經由記者個人生命經驗與時代歷史背景交錯、互動下，而產生的一種不斷形塑、轉化中的信念系統，並非僵化固定、一成不變的。五人在價值、理念系統偏向鼓吹者角色，但是五位受訪者會藉與時代背景之互動來調整與選擇其專業實踐的方式；因此，他們有時選擇傳達其他媒體無法呈現的弱勢訊息，扮演了「資訊傳播者」的記者角色；有時選擇深入的調查與解釋，分析法律、政治情勢與政策內容，提供深入的報導給予公眾，扮演了「解釋／調查者」的角色；有時，他們又會選擇以報導支持、推動、壯大社會運動的聲勢與發展，藉以改變不合理的體制、政策與現存之政治結構，又成為了「鼓吹者」。

本文之研究發現，與Weaver & Wilhot在1986年的量化實證研究所呈現的研究結果類似；即一位記者有時兼具兩到三種的專業意理，而極少數固定於其中一種意識形態類型中。Weaver & Wilhot在1986年的研究中，引述了Martin Linsky（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的說法顯示了其研究中記者所呈現之樣貌：「…

早上九點，他們（記者與媒體）是反對者，到了十點，他們與反對者融為一體；到了十一點鐘，他們又獨立了出來；到了十二點，政客正熟練的操弄著整個出版業。他們反反覆覆，混亂且令人困惑。（Weaver& Wilhot, 1986：144）」Weaver & Wilhot並強調，「當代記者是一種專業職業，但並非只有一種專業意識（Weaver& Wilhot, 1986：145）。然而，本文之研究發現，與過去Weaver& Wilhot等人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研究不同之處，就在於探索專業意理形成之「過程」；即個人如何與情境、環境互動而形成自我的專業意理內涵。回到本文主要之研究問題，以下則就研究問題之內容，來說明本文之研究結果與發現。本文第一個研究問題為：在理念與選擇上，《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的新聞專業意如何形成？

本文對於專業意理之定義內涵：「記者對於媒介功能及記者角色的信念系統。」照定義之解釋，記者角色內涵與信念價值系統，實際上需要由記者自身作詮釋與定義。這也是本文選擇以生命史研究取向來探索記者專業意理實踐與形成之因素。因此，以五人對於「記者角色的認知」而言，本文以台灣1980年代歷史脈絡作為背景，依據五位受訪者對於自我記者角色認知之敘說發現，影響記者進入職場前、後所形成之專業意理，與家庭、學校環境、媒體環境、時代情境有著極大的關聯。本文在第四章第六節的部份，已經依照「普遍的獨特個體（universal singular）」⁵⁷其中「普遍的」外部環境條件的「共通主題」，整理出影響五位受訪者專業意理內涵形成之外部因素；然而，在時代、媒體環境這些普同性的主題、條件中，個人感受與經驗又有所不同，因此又產生了「獨特個體」之差異。

在「獨特個體」之差異部份，五人之中，畢業於新聞系的林美挪、李瓊月與早期擔任護士工作的王幼玲屬於進入《自立晚報》（媒體場域）後，經由採

⁵⁷ 「普遍的獨特個體（universal singular）」：雖然每個人的生命都受到許多具有普同性的主題所塑造，但對於這些普遍的主題來說，每個人都活出了獨一無二的事例（Denzin, N. K, 1999：235）。

訪經驗才逐漸形塑出個人專業意理內涵者。而三人在進入媒體工作前，對於記者與媒介功能之理解與想像，乃來自於與媒體記者之互動經驗。如林美挪在進入《自立晚報》前的理想記者形象來自於可以獨自採訪、經歷「重大事件」之前輩黃年。而李瓊月對於記者、媒介功能之想像，則來自於在「新知」工作期間，與《自立晚報》記者互動之經驗。而兩人選則當記者之原因，則來自於「新聞系畢業自然要當記者」的想法；而選擇進入《自立晚報》之原因，兩人又有差異，前者屬於在媒體環境的限制之下，因「人脈關係」而進入《自立晚報》者。而李瓊月雖屬意《自立晚報》為其工作單位之第一首選，但同樣基於當時媒體環境（報禁未開放前工作機會相對少／報社擇人之考量）之限制，因而先進入《大華晚報》後才進入《自立晚報》。而進入《自立晚報》選擇路線之原因，皆屬於報社內部人事出缺（醫療環保）之因素，並非來自於個人自由之選擇。而李瓊月在採訪路線之選擇，又與林美挪稍有不同；雖因報社出缺才能進入報社工作，但在面對出缺路線之不同時，⁵⁸個人基於興趣與特質，而又有所選擇。

而王幼玲基本上將記者工作作為推展工運理念的「階段性工作」。她基於當護士期間的實際寫作經驗，累積對於記者、編輯工作的興趣與實力，並認為記者工作能夠參與與見證時代變動與發揮影響力，因此，王幼玲在一開始並未設定以《自立晚報》為目標，先去了《民生報》應徵，其後因《自立晚報》有工作機會而進入，負責內政部新聞業務。在個人選擇新聞路線方面，雖然王幼玲如同李瓊月與林美挪兩人，是因為報設有缺職才被分配進入該路線，在1987年，勞工司獨立於內政部成為勞工局後，王幼玲報請主管要求專跑勞工局，顯現了她對於勞工運動的關注與關懷意識。

彭琳淞、邱家宜兩人，在選擇進入媒體工作前，對於記者角色之社會功能有著類似的想法。雖然彭琳淞、邱家宜在進入媒體工作前，對於記者工作之實

⁵⁸ 參考第四章第三節李瓊月生命圖像之部份。

質內容並未接觸，但卻都是因為抱持著社會改革之理念而促使其進入媒體工作。在選擇《自立晚報》為工作單位之部份，彭琳淞、邱家宜兩人因為基本上認同《自立晚報》之報導方向而進入。然而，邱家宜與彭琳淞選擇進入《自立晚報》之因素又有所出入，如邱家宜進入《自立晚報》是因為當時原本負責醫療環保線的記者李瓊月離職，而接續這條新聞路線；同時，邱家宜在《自立晚報》內部的「人脈關係」⁵⁹，也是讓她選擇進入《自立晚報》之因素。而邱家宜在選擇媒體的主動性部份，又比其他四位受訪者更為明確；如當時《中央日報》已經提供她工作機會，但基於上述原因，她選擇進入《自立晚報》。在新聞路線的選擇上，彭琳淞、邱家宜皆因為報社內部人事因素，而被「分配」其負責路線。在個人選擇方面，前者則基於個人政治判斷，在1993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選擇從政治組轉調至綜合組。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塑造五個「獨特個體」的「普遍的」「共通主題」：即時代因素。從上文我們得以觀察到，即便五人對於社會改革理念、對記者專業意理的想像開始產生形塑的時間點，在其各自的人生階段上各有不同；但大約都是在1986年，即1980年代中期前後發生的。此一時期的台灣社會爆發出了許多各類社會運動，包括環境、婦女、勞工、原住民運動等等，是民間力量展現時期；同時，正是解嚴的前一年、報禁開放前夕，社會民主化轉變時期，整體社會範型正在轉變之中，所有的自由思潮、改革想像、左派、右派論述蓬勃迸發的時代。除了個人的成長經歷影響自身選擇往後的人生走向外，台灣1980年代的特殊社會環境，也提供了五人一個得以選擇各自人生走向與記者專業意理類型的機會。分別在1983年、1987年、1988年進入《自立晚報》的林美娜、王幼玲與李瓊月，受到了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灣社會力爆發前夕時社會力醞釀時期的時代影響；而在1988年與1990年進入《自立晚報》的彭琳淞與邱家宜則受到1980年以後已經具體凝聚社會力量與改革氛圍影響。

⁵⁹ 參考第四章第五節邱家宜生命圖像之部份。

換言之，時代條件對於五人專業意理之影響與發展，是一個特殊與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五人在1980年代台灣的特殊氛圍中，選擇進入《自立晚報》這樣的媒體中，展現知識份子的力量與抱負，並又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媒體環境裡形塑初個人之專業意理內涵。而藉由五人之敘說，本文發現，五人普遍受到時代氛圍影響，而產生要求社會正義與公平之價值觀點，因此，就整體而言，正義倫理的概念屬於五人信念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的催化劑。

而五人在進入《自立晚報》後，可以明顯的藉由五人經歷的幾次重要採訪事件之中觀察到，個人所建立、形構出的記者角色與專業意理內涵，與藉由實踐過程而產生的「關懷倫理」。而這一部份則屬於個人在新聞專業實踐、記者信念系統建立之過程，即本文第二個研究問題：**在記者的專業實踐上，基於記者個人之專業意理，《自立晚報》綜合組記者如何形成其新聞專業實踐？**

本文發現，經由五位受訪者在進入《自立晚報》所經驗到的重要採訪事件中，可以觀察到個人之專業意理在每次關鍵採訪事件中，實際發生的轉化與形塑。本文也發現，由「實踐」過程而產生的「關懷倫理」，是影響記者新聞專業實踐方式的重要因素。長期與弱勢、社運團體互動、接觸而產生的「關懷」情感，是記者專業意理中極為重要的內涵。以下將就五人在關鍵採訪事件中的新聞專業實踐，以及這樣的專業實踐如何影響自我形塑專業意理內涵作一整理與分析。

下面整理了本文五位受訪者在《自立晚報》期間之新聞專業實踐形式；本文將其分成兩個層次來討論。再者，本文將整理關懷倫理分別落實在記者新聞專業實踐哪些層面之中。

就新聞專業實踐形式的第一個層次而言，本文針對記者在新聞作業內容，包括報導方式、報導上的立場等；因此，藉由上述方向，分析了受訪者之敘說內容、新聞報導、出版品等。第二個層次，則針對記者在新聞工作之外的實踐

內容，如實際加入社運團體，參與決策、討論；以及參與社會運動的遊行等聲援行動；此部份乃藉由受訪者敘說之內容來分析。

五位受訪者之中，林美挪在新聞工作內容之外，更實際介入社運團體之中，參與決策與討論，身兼「記者」與「運動者」角色。其餘四位受訪者，則在新聞工作結束後，以「非記者」的身分，參與當時社會上各種遊行、聲援場合；四人並無實際參與社運團體的決策與討論過程。而本文需要再深入討論的概念是：五位受訪者對於「介入」新聞事件的定義與認知。藉由五位受訪者對於「介入」的描述，本文發現，五位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報導方式，確實具有同情、支持、聲援弱勢、社運團體的傾向，但仍屬於「記者」身分。然而，除林美挪實際參與社運團體，同時身兼「運動者」身分外，其他四位受訪者皆不認為上述的新聞專業實踐方式（報導立場、傾向）是「介入」了新聞事件之中。

五位受訪者對於實際「介入」運動的理解各有不同。如林美挪兼具「記者」與「運動者」角色；其他四人皆選擇在報導與採訪方式上支持運動訴求與弱勢、運動團體；並認為「記者」與「運動者」角色應有清楚分界；比較特殊是，王幼玲認為，因為整體工運氛圍促使記者與工運人士產生「同志情誼」，所以即便當時有記者實際加入工運團體參與決策、討論，也是當時跑勞工議題記者的「常態」。本文發現，四人對於「介入」的定義，在於「是否有參與社運團體內部的決策與討論」。但若依照專業意理的「鼓吹者」角色之定義：「有意藉由報導改變政策」來檢視四位受訪者之新聞專業實踐時，則王幼玲、李瓊月、彭琳淞、邱家宜四人皆有意藉由報導凸顯弱勢處境、改變現存政治結構與政策之實踐作為，四人確實以報導「介入」了事件之中。換言之，王幼玲、彭琳淞、李瓊月、邱家宜四人與林美挪在實際實踐作為上的差異，即是在「介入」程度上的不同。因此，若將「鼓吹者」意理對於「介入」新聞事件的方式拉成一個據「程度」而形成深淺的光譜，則五人則都屬於「鼓吹者」角色，但在深淺之位置上則有不同。

另外，影響五人新聞專業實踐之選擇與方式之因素，除了受到其所認知的記者、媒介功能外，五位受訪者基於對於議題的關懷，而在採訪過程中，實際與受訪者之互動與接觸，進而產生了對於「人」的關懷。而此種在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關懷倫理」亦包含在其專業意理內涵之中，並影響了記者在新聞專業實踐方式的選擇。

五位受訪者皆在接觸受訪對象---弱勢團體的過程中，產生了對於受訪者的關懷情感。換言之，五位受訪者與弱勢、社運團體的關係，不僅止於「採訪者---受訪者」的關係而已，他們會基於對於弱勢者的同情，或是基於與運動團體的「同志情誼」而產生「關懷」；不論是實際投入運動之中，或是藉由採訪方式、報導立場的偏向，都顯示出五位受訪者在實際採訪工作中，藉由與受訪者的互動經驗，而確立其「為弱勢者發聲」之傾向。因此，本文歸納出關懷倫理實際落實於記者新聞專業工作實踐的幾個方向：第一，關懷倫理的產生通常容易發生在某些特定情境與事件中；具體來說，就記者採訪的事件性質而言，這些特殊的事件通常屬於社運、弱勢團體，基於政府政策、社會制度織不健全或是權力遭受剝奪情形發生時容易產生。如在1980年代所發生的一系列自救運動等等，皆屬於此一性質之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議題也屬於正義倫理概念中的「公領域」範疇，換言之，這些記者同時也基於這些議題牽涉個人對於社會正義之普同價值觀上的落差，而產生對於議題之關懷。

第二，記者在採訪上述性質之事件過程中，因與社運、弱勢團體頻繁接觸時，容易受到情境與人的影響，而產生記者與受訪者之外，對於人類之惻隱之心與關懷情感。而這樣的情感亦會影響記者在新聞報導的目的、方式、寫作筆法等等。而本文亦須補充，本文訪談的五位記者，在面對報導對象的不同時，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亦會有所轉換，或是有所偏重。如所報導之對象若屬於公部門，則記者容易站在一種要求公平與監督者的角度下筆；相反對，若面對的報導對象為受害的勞工與弱勢居民時，則關懷情感通常是影響其下筆方式與報

導目的的主要倫理規條。上述所歸納的條件，也同時回應了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在各自的道德倫理方面的不同應用本質；前者屬於價值體系，以及普同的信念系統之倫理觀，而後者則屬於實踐性質之倫理觀。

而當上述條件不復存在時，記者之專業意理內涵，又會有和轉變？在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之初，台灣政體漸漸步上民主國家運作之軌道，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態勢已不再，而伴隨著民主化時期而來的自由經濟競爭市場，卻也讓媒體在報禁開放之後，步上以商業邏輯至上的經營道路，形成媒體企業間的惡性競爭。《自立晚報》終不敵連年的財務虧損，在2000年之後熄燈，轉由工會接手發刊（蔡士敏，2008：1）。這群專注致力於社會改革、社會運動議題的記者們，頓時失去了他們的發揮舞台。而過去這段在《自立晚報》的經歷，又將如何影響他們其後的人生？

本文藉由觀察記者敘說之生命歷程發現，即便五位受訪者在離開《自立晚報》後，有人轉戰其他戰場，以不同身分繼續為改革理念與弱勢發聲，有人繼續留在媒體努力平衡失衡的媒體環境，但過去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經歷，以及在其中所建立之專業意理、信念、價值系統，仍在其後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跡。

林美挪在1991年，離開《自立晚報》後，輾轉在不同機構工作，除了綠色和平電台主持節目外，媒體環境的改變，以及個人機遇之變化，使她無法繼續從事新聞工作，而轉戰政治領域，實現其改革之理想與抱負。如今，基於個人生涯考量，轉而擔任多家媒體之廣告代理。王幼玲，離開《自立晚報》後，抱著實踐其理想中的左派社會主義社會圖景，而進入公部門，為勞工拓展更多政府資源。在2008年政黨輪替後，她辭去公職，進入民間NGO組織，轉而替身心殘障之弱勢爭取權益。李瓊月，離開《自立晚報》後，在多間平面、電子、網路媒體擔任記者與新聞製作人，目前五十歲的她，仍堅持留在新聞第一線採訪，她所報導之議題，也從未脫離弱勢、環境議題。彭琳淞，在離開《自立晚

報》後，進入九二一災後重建區---埔里社區擔任志工，如今除了自由撰寫外，更投入台灣人權發展歷史的回溯與重建。邱家宜，離開《自立晚報》後，仍持續留在「半個」媒體圈中，擔任卓越新聞基金會執行長，推動媒體改革。而五位受訪者在離開《自立晚報》後，有人受到現實環境限制，即便仍想留在媒體崗位上，但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有人因為其後的媒體環境與《自立晚報》落差太大，而適應不良，無法久留。在本研究訪談過程中觀察到的現象是，五位受訪者在離開《自立晚報》後的境遇雖各有不同，但都充滿坎坷與艱辛。媒體環境的變化，是如何讓這群當年在戰場上英勇突圍的記者如今失去可以容納他們戰場？本文雖礙於研究主題與篇幅所限，未能深入探討，但卻提供了一個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過去相關探討記者專業意理的研究，多以專業意理量表測量記者新聞專業實踐方式指向何種專業意理；即以實際新聞作業、技術等條列化的選項，讓記者「自己」勾選在實際新聞作業時可能採取的報導方式。然而，本文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若研究者以上述量表內容直接詢問受訪者偏向哪種類型的寫作方式，得到的回應往往可能將受訪者歸類為「資訊傳播者」角色，而忽略了新聞專業寫作技術往往可能只是記者在受到限制的情境下所選擇的工具或技法，以致於無法彰顯記者報導的目的，以及到底記者是在何種時代條件下選擇某種報導方式的意義。本文認文，記者報導目的與本懷，才是記者專業意理最值得探索的部份，而過往相關研究卻未能傳達與彰顯此一重點。

Weaver & Wilhot在1986年的研究中，雖然已明確的說明記者專業意理包含了角色、價值與倫理三種重要概念，但在其量化研究中，仍舊以記者呈現新聞的方式來評斷記者的專業意理，而未能進一步探索記者所認知的自我角色、價值、倫理三種概念如何影響記者選擇這些報導方式。本文藉由記者個人敘說的過程來探索報導背後，個人所持之報導理念與目的，是一個強調「理解」的研究，而非單藉由報導來評斷記者專業意理。

本文採取生命史研究取向之意義，在於藉由行動者基於對於自我的理解與詮釋，建構出屬於其個人的生命圖像與生命內涵。而本文的五位受訪者，在建構個人專業意理內涵的過程中，他們對於「記者」角色功能之內涵能夠具體言說，但同時，卻不認為自己屬於某一類型之記者。正如本章前文所說，記者專業意理乃是一種經由記者個人生命經驗與時代歷史背景交錯、互動下，而產生的一種不斷形塑、轉化中的信念系統。而本文旨在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觀察記者專業意理之內涵，並藉由個人生命史的敘說，理解專業意理之形成過程，補充過去相關研究不足之處。藉由記者個人的生命敘說，對照以台灣本土情境之脈絡，我們能夠更貼近、深入地理解不同於西方理論時空脈絡下的台灣記者面貌與其專業意理內涵。

本文之研究限制與回應

本文所採之生命史研究取向，以及敘說研究方法，以個人生命的主觀經驗作為主要研究素材之限制在於，個人在詮釋自我生命感受時，時常會因時代久遠、細節繁瑣而記憶不全，而導致研究之內省性與回溯資料的效度不高，內在效度低等問題。基於此點，本文除了強調個人經驗外，運用了及集體生命史的方法，以五人之生命經驗互相參照彼此說法，補足上述可能缺失。此外，本文更蒐羅了當時時代背景相關史料，考察當代整體社會文化脈絡，加以對照與佐證訪談所取得之資料，藉以補充研究深度。

本文認為，生命史研究取向之重點，在於正視行動者的能動性與主體性，並尊重個人的理解與詮釋，彰顯個人經驗的重要性。本文亦認為，若本文採取量化研究方式來探討本文之研究主題，則得到之研究結果也未必就具有絕對的客觀與可驗證性；因量化研究之客觀性與可驗證性之基礎，基本上是立足在研究母體之數量與在研究中可具體化約的可控制變項。但量化研究方法雖能迅速得出得以不斷重複驗證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卻忽略了「個人」的生命經驗中無

可計量與化約的影響與變化；換言之，量化研究結果可能將本研究之五位受訪者推類至「資訊傳播者」或「解釋者」角色，而與本研究採取質性的研究過程所得出的結果產生極大落差。因此，本文的五位受訪者之主觀經驗，雖然無法推論至其他個案，但我們仍舊能夠從五人的生命經驗中，看到對於事件的多元詮釋觀點，以及在其中看到記者如何重新探討與思索個人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後續研究發展方向建議

本文受限於篇幅與主題限制，未能繼續探索五位受訪者在《自立晚報》之經歷如何影響其後的職涯規劃；以及，本文未能進一步比對今昔媒體環境之差異如何影響五位受訪者在專業意理內涵中的轉化與轉變。這些都是值得後續研究繼續關注的重要課題。再者，以本文所選取的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的媒體環境而言，當時的媒體正從威權體制的控管下逐漸解放開來，屬於仍在轉型與變動中的媒體轉型期，記者在其中較能夠趁著轉型期間開拓自主與發揮空間，尋找個人的記者位置；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媒體逐漸發展成企業化、集團化、商業化的經營邏輯，記者為了求取生存，似乎只能在已集團、壟斷化的商業媒體中求存，記者能夠保有的自主性相對於1980年代的記者所能擁有的機會與空間又降低了許多。在這些轉變下，在1980年代進入媒體場域中的這群記者，又如何在今日發展至極致的媒體重商結構中，做出回應與挑戰？本文的五位受訪者，如今只剩下李瓊月仍在媒體工作，繼續第一線報導的記者生涯，但仍能從其言談中看出她在堅持記者道路上的艱辛與困境；究竟，急遽變化的媒體環境如何影響這些1980年代就進入媒體職場的記者們的工作條件？若能夠從此一時期的記者身上汲取可借鏡之寶貴經驗，來思索台灣當今媒體環境之弊病與記者工作的困境，則這些得以讓後借取與學習之經驗，又提供了哪些視角與觀點？

2008年7月，中時報系傳出將大幅度裁員的消息，顯示從1988年報禁開放後，傳統的平面媒體轉型為重商邏輯的營運作業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從什麼時候發生的？又在何種政經條件下發生？如何解決這樣的媒體危機？許多人觀察到網路媒體的發展，也許能夠化解重商媒體世代的危機，然而，專業意理的概念在網路世界中流動、流竄的部落客、公民記者、獨立撰寫人身上，是否還具有任何值得研究與探索的意義？本文所能關注的主題與研究書寫的篇幅有限，但研究者卻能夠隨著時代變動、媒體環境的變遷不斷衍生出新的研究課題；本文僅就目前能夠發展出的題目做了初步的提問，而這些都是值得逐一深入、嚴肅探討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台北：遠流。（原書為Runyan, W. M., (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中華民國新聞年鑑編輯委員會（199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八十年版》。台北：中國新聞學會。
- 王幼玲（1988年6月8日）。〈評斷結果 大同不接受 勞工機關 奈何不了它〉，《自立晚報》，第3版。
- 王幼玲（1989年5月14日）。〈遠化罷工 會員步調整齊 訴諸族群 工運新的範例〉，《自立晚報》，第4版。
- 王幼玲（1989年5月16日）。〈警察怎麼可以打人？〉，《自立晚報》，第3版。
-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2003）。《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王敏玲（無日期）。〈關於幸福，我們瞭解的不夠（上）〉。上網日期2008年6月20日，取自荒野保護協會網頁
<http://sowkh.sow.org.tw/e-paper/habitat/h-06071601.html>。
- 王雅各譯（2002）。《不同的語音：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發展》。台北：心理。（原書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王嵩音（1998），〈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之媒體再現〉，《淡江人文社學學刊》，2：67-95。

- 王麗雲 (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 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編, 《質的研究方法》, 頁265 - 306。高雄: 麗文文化。
- 台大新聞所 (2008)。《黑夜中尋找星星: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台北: 時報。
- 何明修 (2004)。〈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刊》, 7: 33-80。
- 何明修 (2006)。《綠色民主》, 頁142-143。台北: 群學。
- 何明修 (2008)。《四海仗義: 曾茂興的工運傳奇》。台北: 台北勞工陣線。
- 何彩燕 (2004)。《社會工作師職涯轉換之研究—以縣市政府具轉任資格之社工師為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余亭巧 (2003)。《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秀瑾 (2005)。〈依靠與和平: 論Kittay 愛的勞動〉, 《女學學誌》, 19: 157-185。
- 吳芳如 (2001)。《消息來源、新聞框架與媒介真實之建構; 以政黨輪替後之核四爭議案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東熹 (2002)。《台灣戰後民營報業發展的歷史結構分析—以自立晚報為例》。私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秉怡 (1992)。《運動組織與組織運動: 無住屋運動之資源創造與轉化》。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丁讚、林文源 (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 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 1970-86〉,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133-206。
- 李建昌 (1990)。《80年代的台灣勞工運動—結構與過程的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祖舜 (2004)。《擺盪在政治與專業之間: 報紙政治記者對新聞實務與專業角

- 色與認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李瓊音（2000）。《關懷倫理與公領域》。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慶祥（2006）。《黨國體制下的臺灣本土報業：從文化霸權觀點解析威權體制與吳三連《自立晚報》（1959—1988）關係》。私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仁傑（2003）。《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台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立珩（1999）。《由勞工意識看女工就業至關廠的歷程經驗》。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宗弘等（2000）。《打拚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 林美挪（1989）。《台灣的綠色災難：台灣環保運動啓蒙紀實》。台北：前衛。
- 林美挪（1990）。《憤怒的野百合》。台北：前衛。
- 林家德（2004）。《社工員專業承諾之敘事研究---以兒福聯盟出養社工員為例》。文化大學心裡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麗雲（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台灣產業研究》，3：89-148。
- 邱家宜（1990年8月24日）。〈住宅政策跳票 公信力打折扣〉，《自立晚報》，第6版。
- 邱家宜（1990年8月25日a）。〈「重回忠孝東路」 今天很熱鬧〉，《自立晚報》，第6版。
- 邱家宜（1990年8月25日b）。〈蝸牛主義 但求一殼棲身〉，《自立晚報》，第6版。
- 邱家宜（1991年10月3日）。〈警方拆除「核四告別式」棚架 十餘鄉民 警員受傷〉，《自立晚報》，第4版。
- 邱家宜（1991年10月4日）。〈反核與流血悲劇不能劃等號〉，《自立晚報》，第4

- 版。
- 邱家宜（1991年10月7日）。〈悲劇之後 澳底陷入白色恐怖〉，《自立晚報》，第4版。
- 邱家宜（1992年6月9日-15日）。〈大林蒲公害事件調查報告〉，《自立晚報》，第4版。
- 姜苑文（2004）。《電視新聞記者生涯規劃之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信民（2006）。《臺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台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施致平（1991）。《記者專業意理與新聞製作流程對體育新聞報導之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幼慧（2005）。《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范雲（199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5：133-194。
- 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
- 夏林清、鄭村棋（1992）。〈站上罷工第一線---由行動主體的角度看1989年遠化5月罷工抗爭的發生及影響〉，《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66。
- 師瓊璐（1999）。《橫越生命的長河－三位國小女性教師的生命史研究》。台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正光、宋文里編（1990）。《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 徐明（2003）。《關懷倫理作為現代公民道德基礎之研究---深入多元領域民間團體志工的服務人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徐明（2004）。《從女志工服務經驗探究「關懷倫理」之公民道德價值》，《公民訓育學報》，15：113-147。
- 翁秀琪（1991）。《傳播內容與社會價值變遷：以報紙對勞工運動的報導為

- 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翁秀琪（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
- 翁秀琪（2000）。《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 高秀蓉（1999）。《生涯轉換之質性分析研究：以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之教師為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涂建豐（1996）。〈「新聞自主的挑戰與回應」訪談〉，《新聞學研究》，52：109 - 118。
- 張茂桂（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張添貴（1989年5月16日）。〈遠紡勞資衝突再度流血〉，《自立晚報》，第1版。
- 張復欽（2002）。《電視攝影記者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私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張舒斐（1997）。《電視新聞記者專業價值觀之研究》。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碧華（1992）。《結構／個人：影響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及其對新聞產業工會態度之相關因素研究—以「中國時報」、「自立報系」為例》。輔仁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賜祿（2005）。《報社編輯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研究—以中國時報系個案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傳陽（1991）。《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運動：一個議題傳散模式的初探—以宜蘭反六輕設廠運動之新聞報導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特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原書為McQuail, D. (1983).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陳國祥、祝萍（1987）。《臺灣報業演進40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
- 陳淳毅（2003）。《衛星電視新聞頻道社會記者專業性與守門行為之研究》。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陳雪雲（1991）。《我國新聞媒體建構社會現實之研究－以社會運動報導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雅琳（1993）。《報社記者與編輯角色期望之研究》。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 陳順孝、譚士屏（1999）。〈威權時代的筆桿子：新聞記者在政治高壓下的報導策略〉。台北：「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結案論文發表會宣讀論文。
- 陳震（2003）。《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曉宜（2005）。《報社記者抵抗資源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陳櫻慧（2002）。《台灣旅遊雜誌採訪編輯之職業角色-以公開販售的旅遊雜誌為例》。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單文婷（2003）。《國會記者新聞專業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琳淞（1993年的7月14日-7月29日）。〈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權益〉系列報導，《自立晚報》，第4版。
- 彭慧蕙（1998）。《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運動－以「反雛妓」社會運動為例》。文化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 曾春榮（2003）。《個教育壓力團體的組織生命史研究－以人本教育基金會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華源、胡慧嫻、李仰慈、郭世豐（2006）。《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
台北：洪葉。
- 童靜蓉（2006）。〈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社會話語〉，《傳播與社會學刊》，
1：91-119。
-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原書
Touraine, Alain., (1984). *Le retour de l'acteur*. France: Fayard.）
- 黃怡菁（2002）。《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之研究---關懷倫理學觀點》。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義書（2004）。《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認知、角色、專業權力及生存
心態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嘉琪（2003）。《都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化---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分析》。世
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一哲（製作人），吳企慧、楊一哲（導演）（2003a）。青春、土地、歌【影片】。
（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
- 楊一哲、宋穎鶯（製作人），陳蘊馥、宋紘（導演）（2003b）。以民主愛國之
名【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
- 楊一哲（製作人），楊一哲（導演）（2003c）。象牙塔與自由鐘【影片】。（公
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
- 楊一哲（製作人），楊一哲（導演）（2003d）。民主、政治、野百合【影片】。
（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75巷70號）
- 楊志弘（1991）。《臺灣地區報社總編輯職業角色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所博士論文。
- 楊渡（1994）。〈社會運動與新聞倫理〉，《台大新聞論壇》，1：53—63。
- 楊韶彧（1993）。《從消息來源途徑探討議題建構過程－以核四建廠爭議為例》。
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 楊憲宏 (1986)。《走過傷心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台北:圓神。
- 楊麗雪 (2004)。《民營報社編採人員工作壓力、工作滿足對組織承諾影響初探——以中國時報為例的探討》。私立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廖郁毓 (2002)。《台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以聯合報家父長的生產體制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熊同鑫 (2001)。〈窺、潰、餽:我與生命史研究相遇的心靈起伏〉,《應用心理研究》, 12: 107 - 131。
- 臺美光 (2002)。《女性自我與中年的對話:兩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文桂 (2002)。《偕萬來生命史與Kavalan文化復振》。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鳳英 (2000)。《家庭、工作與女性主體:五位國小女性主任追尋自我的生命史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郁欣、林佳誼、蔡貝侖譯(2008)。《探究新聞倫理》。台北:韋伯。(原書 Sanders, Karen.(2003). *Ethics & Journalism* . London: Sage.)
- 鄭玉清 (1999)。《報社新聞記者專業性與新聞教育關聯性之研究》。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阿勤(2003) 。〈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 5: 195-250。
- 蕭新煌 (1994)。〈台灣地方環保抗爭運動的性格與轉變:1980-1991〉,《環境保護與產業政策》, 頁550-573。台北:前衛。
- 蕭新煌、黃世明、翁仕杰 (1995)。〈百年來台灣社會力的沉浮與轉型〉,《百年來的台灣》, 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 頁110-149。台北:前衛出版社。
- 蕭蘋 (1988)。《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建寰（2007）。〈此處不留爺沒有留爺處——1977至1989間遠化工會的成立、抗爭及其自主想像〉，《史苑》第67期。台北縣：輔仁大學歷史學會文書組，2007年7月出版。

簡成熙（2005）。《教育哲學專論：當分析哲學遇上女性主義》。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戴華（2001）。《姬莉根的關懷倫理與康德的道德觀點》，「台灣哲學學會 2001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薛化元、楊秀菁（2003）。《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人權理論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鍾維達、王淑芬、李建昌編（1993）。《台灣工運經驗》。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顏加松（2005）。《數位時代新聞人員工作滿足感：科技使用、組織溝通與工作壓力之分析》。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芊玲、蕭昭君主編（2002）。《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意識成長歷程與實踐》。台北：女書文化。

〈警方拆除「核四告別式」棚架 十餘鄉民、警員受傷〉（1991年10月3日）。《自立晚報》，第6版。

〈暴民駕車衝撞 員警一死17傷〉（1991年10月4日）。《中國時報》，第1版。

〈反核暴徒在貢寮駕車衝撞執勤警察 保警一殉職 二十二人負傷〉（1991年10月4日）。《中央日報》，第1版。

〈鹽寮反核集會 駕車撞死警察〉（1991年10月3日）。《聯合晚報》，第1版。

〈反核暴徒 開車衝撞 丟汽油彈 保警一死十八傷〉（1991年10月4日）。《聯合報》，第1版。

英文部份

-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Location: Sage Publications.
- Deuze, Mark.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 6(4), 442-464. London: Sage.
- Fredrickson, R. H. and Macy, F. U. and Vickers, D. (1978). Barriers to adult career change . *Personnel and Guidance Journal*, 55(3), 166-169.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Golan, N. (1981). *Passing through trans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Goodson, I. F. (1992). Studying teachers' lives :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I. F. Goodson (Eds.), *Studying Teachers' Lives*. London : Routledge.
- Goodson, I. and Sikes, P. (2001). *Life histor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Learning from lives*.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atch, J. A. and Wisniewski, R. (1995).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questions, issues, and exemplary works. In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Heddesheimer, J. (1976). Multiple motivations for mid-career changes. *Personnel and Guidance Journal*, 55(3), 109-111.
- Hostetler, A. J. and Sweet, S. and Moen, Phyllis. (2007). Gendered Career Paths: A life perspective on returning to school. *Sex Roles*, 56, 85-103.
- Kanchier, C. and Unruh, W. (1988). The career cycle meets the life cycl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37, 127-137.
- Kemp, J. (1994). Career paths revisited : The experience of graduates in nursing who no longer work full-tim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0, 377-381.
- Leibowitz, B and Schlossberg, N. K. (1982). Critical career transitions : A model for designing career services.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36(2), 13-19.
- Noddings, N. (1991). Stories in dialogue: Caring and international reasoning. In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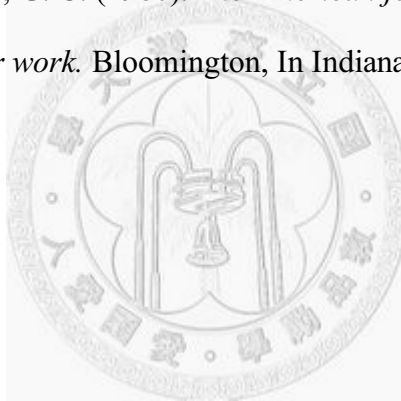
Witherell & N. Noddings (Eds.), *Stories lives tell: Narrative and dialogue i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Noddings, N. (1995). Car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W. Kohli (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Richardson , P. W. and Watt, H. M. G. (2005). I've decided to become a teacher: Influences on career chang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1, 475- 489.

Teixeira, M. A. P. and Gomes, W. B. (2000). Autonomous career change among professionals : An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study.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31(1), 78-96.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附錄一：訪談題綱

林美娜女士訪談題綱：

- * 出身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經歷、職業經歷？
- * 當記者是你從小立下的志願嗎？在進入報社之前，對於記者的想像是什麼？
- * 進入文化大學新聞系就讀時，台灣社會正是動盪不安的時期；前後正歷經中壢事件、台美斷交，之後又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等重要的歷史事件。當時感受到的家庭、學校及社會氛圍如何？
- * 什麼樣的機緣進入《自立晚報》？在進入之前對其印象如何？環保線是一個專業門檻極高的新聞路線，當初為何選擇跑此路線？如何適應？所跑的路線是自己選擇的嗎？
- * 進入《自立晚報》的第一位主管是誰？當時有哪些同事？
- *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是否與其他報社不同？（同事、長官、工作氛圍等）
- * 進入《自立晚報》後，所跑的第一個（印象最為深刻的）重大新聞事件是什麼？
- * 你在1989年出版的《台灣的綠色災難》一書的後記（「構不到的公義」）中，提及在你記者生涯中的每一場重要新聞事件，所帶給你意義與學習、啟蒙，可否談一下書中幾件重大新聞事件的第一現場採訪經驗／印象／感受、所帶給你的影響、和事件關係人（官方／民間受訪者）的關係？（請參考下列題目）
 - （一）不畏懼出遠門的啟蒙：你在文中提及，前往西海岸採訪綠牡蠣事件，成為你不畏懼出遠門採訪的啟蒙。當時是單獨前往採訪嗎？可否回憶當時採訪該新聞的始末？
 - （二）勇於單獨作業的啟蒙：

／你在「我的美國杜邦行」一文中提及，在行前曾就該不該去參觀杜邦公司一事向社方爭取，當時內心的考量為何？社方的考量為何？

／考察團在回國之後，出現了質疑考察團受賄等流言蜚語，原因出自考察團成員對於設廠疑慮與反對立場趨於和緩，甚至表示贊同；你在連續的好幾篇報導中，詳盡的一連舉出問題所在，呼籲杜邦公司與台灣政府應該正視問題，成為一片「報喜不報憂」喜鵲群中的烏鴉。事後又有壓制反對言論的「機密消息」走漏，你當時應當承受來自公部門極大壓力與批評，你如何處理與回應？社方態度如何？其他同業是否有表示意見？

（三）不畏懼參與的啟蒙：李長榮圍堵事件

／作為一名環保記者，時常得往公害現場跑，因此經常得親睹災害現場，與受災居民接觸，長期與之相處，必然會受到公害現場、抗爭現場的慘況而感到震撼。你曾在報導中細緻的描寫在李長榮化工廠圍堵百日的受災居民；眼見、耳聽他們的抗爭與辛酸，當時，你如何在新聞專業與個人關懷、情感之間取得平衡，寫出報導？

／又，如何拿捏與自救居民的關係？

／在當時的抗爭現場，你是否曾經介入，參與其抗爭？

／採訪李長榮事件帶給你的影響是什麼？為何說這是「不畏懼參與的啟蒙」？如何影響你日後的新聞工作？

（四）甘於投入的啟蒙；（後勁反五輕立院請願行動／流血事件）

／1987年10月20日，發生台灣反公害運動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後勁居民包圍立法院，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該次的採訪經驗，如何影響你日後的新聞工作？對於記者的角色與認知，是否有所改變？

／1987年底，你成為綠色和平工作室的發起人，與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等人，共同為環保運動而努力。這是你文中所言「甘於投入」的實踐嗎？什麼樣的原因引發你「直接」投入環保運動當中？

／承接上文，此舉是否有引發同業批評或是有來自社方的壓力？

* 當時剛解除戒嚴，當時整體社會的氛圍如何？媒體環境是否有變化？

* 你在台灣社會轉型的年代，親歷重大的公害事件、政治事件；你對於記者角色的認知與自我角色的定位，與為進媒體前有何不同？

* 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當一名「公害」記者，你遇到最大的挫敗經驗？最大的滿足與成就感又是什麼？

* 環保記者總是要親歷各大公害現場，接觸受災居民，面對抗爭場合，面對總是來得遲緩又消極的政府應對機制，面對公義的隱沒而感到疲累；你曾在文章中提及，多年的記者工作，讓你的天真破碎，同時，又因為這股天真使你積極樂觀，是什麼樣的「天真」動力讓你想要（持續）新聞工作、持續追蹤公害問題？如今想法是否有改變？

王幼玲女士訪談題綱：

* 出身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經歷、職業經歷？

* 家中成員有人在勞工運動圈，而您在政府部門工作，是否常常會有觀念與理念上的衝突？

* 工作環境從醫院（護士）轉而成為媒體（記者）的因素為何？在醫院做醫護人員的經歷與所見，是否有影響您對於新聞工作的想像？

* 為何選擇立自晚報？主跑何種路線？自己選擇的嗎？為何選擇此路線？

* 在選擇當記者前，對於記者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功能的想像為何？當記者後，您曾經說過：「我的報導就是替團體、工會發聲……當然有誇大工會抗爭的力量。」，所以您認為您的記者身分，其實也是為了推助勞工運動嗎？與當記者前對於記者的想像是否有很大落差？

* 若現在讓您重新選擇，您還是會選擇當這樣的記者嗎？

* 您曾在接受訪問時提到：「那個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跑勞工的記者

同樣也是勞工運動者？」是否有不同案例的記者？

* 在張老師月刊與中國時報工作時，時常接觸到社會與家庭問題，後來您在自立晚報選擇跑勞工／運動線，是否與此有關連？

* 在自立晚報時期的採訪生涯當中，曾經讓您印象深刻的幾次採訪經驗？
（如：和採訪對象之間的互動、印象深刻的採訪情況、上級壓力、報導之後的影響等）

*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是否與其他報社不同？（同事、長官、工作氛圍等）

* 您是否曾經介入採訪現場？當時為何選擇這麼做？和消息來源（官方／弱勢團體／社運團體）的關係如何？

* 是否因為介入採訪現場，而遭到同事與上級批評？

* 主跑社會運動或勞工議題時，曾經遇到的挫敗經驗？

* 您曾經說過：「我參與的運動就不寫這條新聞。」然而，當您遇到自己支持的議題（如勞工議題）時，您如何在報導與專業之間取得平衡？（試請舉採訪經驗為例）心中的準則為何？

* 當您遇到自己同情或支持的社運／勞工團體時，您如何在報導與專業之間取得平衡？（試請舉採訪經驗為例）

* 您覺得自己是哪種記者？（客觀／中立 or 解釋 or 鼓吹／反對）或者全都包含？又或者全部都不足描述您？您覺得這樣的記者分類是否合理？此三種記者的專業意理內涵是否足以描述您個人的記者特質？

* 曾經參與過的社會運動？

* 您將自己定位在一個運動的參與者，卻未投身到勞工運動團體，選擇進入政府部門做事，這樣的選擇原因為何？

* 您認為社會運動者與記者之間相似與相異的特質在哪裡？若讓您重新選擇一次，當初還是會進入媒體工作嗎？或者投身勞工運動圈中？

* 是什麼樣的機緣或是動力讓您想要（持續）跑勞工運動線？

*是什麼樣的機緣或是動力讓您想要轉入政府機關工作？

*新聞工作對於自我生命的意義，有何轉化或改變？最大的成就感與無力感在
哪裡？

*您在上次訪談中，提及您出身自勞工家庭與選擇進入報社擔任勞工線記者的
相關係意，也提及在大學時代修習左派思想的求學經歷，當時轉考社會系的動
機為何？當時台灣社會黨外運動正值興起之際，您感受到的社會與校園氛圍如
何？

*在學生時代就曾經看過《自立晚報》嗎？當時對其印象如何？

*您提及曾去《民生報》應徵記者，並表示想要做環境、運動議題的報導，當
初這種念頭如何產生？家人對你想做記者這份工作的態度？您又如何看待當
時的媒體環境？

*在苗客抗爭事件發生時，您在報上曾發表幾篇分析報導，眼見當時各大工運
團體、組織介入苗客抗爭之中，您曾以「煽火救火 突顯工運遊戲規則」描
述當時苗客抗爭過程中的團體角力。您當時如何看待苗客抗爭？

*接續上次訪談，您曾提到採訪生涯中難忘的三次經驗，為了再深入理解這三
次事件對您的意義，請您再度回憶當時的現場場景、採訪過程：（下列問題提
供您參考）

*桃園客運罷工事件：

（一）1988年2月12日上午，桃客產業工會符在桃園縣勞工活動中心招開會原
代表大會，那是你進入《自立晚報》跑勞工線的隔年；你提到工會常務理事曾
茂興，在群眾前面拿著大聲公，操著「工人的語言」，講得慷慨激昂。你當時
所看到台下的員工反應是？

（二）你曾提及在現場聽著曾茂興這個「大老粗」慷慨激昂的演說，內心只覺
得「他們這些人只是為了討工資，一點理想都沒有」，這樣的想法，在你採訪
過程中，是否有改變？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件讓你的想法改變了？

(三) 1988年2月13日下午(14、15日展開正式怠工抗議)，工會得到資方不予理會勞方訴求的結論，群起激憤，前往火車站站前廣場拉開「怠工無罪抗議有理」的布條抗議、演講、唱歌、呼口號，當時幾天你是否怠工抗爭現場？你所看到的景況如何？

(四)當時抱著何種心情報導這次罷工事件始末？報導之後是否有來自各方反應意見？在剛解嚴的當年，你感受的社會與工運氛圍如何？

***大同三峽廠罷工事件：**

(一) 1988年1月，因大同總公司員工曾水鑑自行印發爭取年終獎金之傳單，引發怠工效應及三峽廠自主工會成立事件。5月5日當天中午近七百多名員工與工運界人士冒雨前往場區大門口抗議(因資方不願出借廠區)，發起工會幹部選舉活動。你提及在當時在採訪經驗中難忘的「因仔花(千日紅)」香味，在那一次的採訪過程中，感受到了工人為了要組工會的艱辛，可否請您回憶當日採訪的經過。

(二)採訪大同三峽廠工會成立的過程中，工人遭調職、資方對待勞工的不平等種種辛酸，您當時在採訪過程中感受到的工人處境為何？

***遠東化纖新埔廠罷工事件：**

(一) 1989年5月12日，遠東化纖展開罷工，當天晚上十點多，工會設立了「罷工糾察線」，您在隔日的報導上寫著當時在現場工人們唱歌喊口號的情形。當時，您在現場所觀察到的抗爭景況如何？您的感受如何？

(二) 1989年5月16日上午，新埔廠前，抗爭員工、聲援團體與資方保全、警方發生激烈衝突，工會常務理事羅美文遭到警方毆打。當時，一排基層女工站在門口，高喊著「勞資爭議、警察中立」的口號。你在採訪現場親睹羅美文「哭了」；當衝突發生的當下，你的感受如何？

(三) 1989年5月16日上午，抗爭情勢高昂，勞方與聲援團體堵住工廠大門，阻擋資方運輸原料、產品，造成一波更為激烈的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當時，

鎮暴警察不只抗爭勞工、工運人士，甚至連在現場的記者一併毆打；您也在當日的《自立晚報》上，寫了一篇〈警察怎麼可以打人？〉的文章，詳述當時混亂的情況並提出質疑。該次的採訪經驗，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

(四)當日記者們也聯合發表聲明，譴責當日警方的行為。聲明見報後的隔日，是否引發其他效應，報社如何看待這次的聯合聲明？

(五)遠化抗爭過程中，資方蠻橫、政府又無力處理、偏袒資方，又有黑道介入，您如何看當時解嚴後的這波遠化抗爭？

* 上次的訪談中，您提到曾經因寫工黨新聞，而受到工黨成員批評，那次的採訪經驗帶給您什麼樣的影響？

* 上次訪談中，您提到當時因為跑勞工議題，和工運人士（勞支會，新潮流等）較為親近。當時的「友好」狀態，是基於您原本的政治立場（如有人說你是「綠色的」）還是基於理念上的認同、或是長期相處的關係使然？

* 承接上題，當時和幾位工運人士的關係如何？（如賴勁麟、郭吉仁、張照碧、羅美文、曾茂興、白正憲、李文忠、蘇慶黎、汪立峽、王義雄等人）

* 您在上次訪談時說，當時有些跑勞工運動的記者會進入工運團體內部的會議討論、給意見，您也習以為常；但當時您基於何種原因，沒有進入工運團體內部參與討論？會認為這有違「記者」角色嗎？

* 您如何看台灣當年整體工運的發展？

李瓊月女士訪談題綱：

* 出身背景、家庭狀況、個性、求學經歷、職業經歷？

* 您曾經是婦女運動的大將，又長期關懷弱勢；是何種因素引發您參與社會運動、關懷弱勢者？

* 在何種情況下決定當記者？對於記者的想像為何？

- * 為何選擇自立晚報？主跑何種路線？自己選擇的嗎？為何選擇此路線？
- * 記者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功能為何？
- * 在自立晚報時期的採訪生涯當中，曾經讓您印象深刻的幾次採訪經驗？
(如：和採訪對象之間的互動、印象深刻的採訪情況、上級壓力、報導之後的影響等)
- *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是否與其他報社不同？(同事、長官、工作氛圍等)
- * 您是否曾經介入採訪現場？當時為何選擇這麼做？和消息來源(官方/弱勢團體/社運團體)的關係如何？
- * 主跑社會運動或弱勢/環境議題時，曾經遇到的挫敗經驗？
- * 當您遇到自己支持的議題(如環境議題)時，您如何在報導與專業之間取得平衡？(試請舉採訪經驗為例)
- * 當您遇到自己同情或支持的社運/弱勢團體時，您如何在報導與專業之間取得平衡？(試請舉採訪經驗為例)
- * 您覺得自己是哪種記者？(客觀/中立 or 解釋 or 鼓吹/反對)或者全都包含？又或者全部都不足描述您？您覺得這樣的記者分類是否合理？此三種記者的專業意理內涵是否足以描述您個人的記者特質？
- * 是什麼樣的機緣或是動力讓您想要(持續)跑環保/運動線？
- * 是什麼樣的機緣或是動力讓您想要(持續)待在新聞媒體工作？
- * 新聞工作對於自我生命的意義，有何轉化或改變？最大的成就感與無力感在哪裡？
- * 林園圍廠事件：(1988.9-10)
 - (一) 1988年發生林園圍廠事件，當時您剛進《自立晚報》沒多久，在當時，面對群眾圍廠，以及突如其來的下鄉經驗，當時感受如何？
 - (二) 可否請您回憶當時的採訪現場？當時到達林園工業區時，自救居民的圍廠行動已經開始，當時令您印象深刻的景象為何？

(三) 作為一名環保記者，時常得往公害現場跑，因此經常得親睹災害現場，與受災居民接觸，長期與之相處，必然會受到公害現場、抗爭現場的慘況而感到震撼。你曾在報導中細緻的描寫在林園是建中圍堵工廠的受災居民；眼見、耳聽他們的抗爭與辛酸，當時，你如何在新聞專業與個人關懷、情感之間取得平衡，寫出報導？

(四) 在當時的抗爭現場，你是否曾經介入，參與其抗爭？

* 後勁反五輕：

(一) 前往後勁採訪時，您提到當時看到劉永寧爬上中油煉油廠上時的心驚經驗，那時，看到他們如此的抗爭方式，內心感受如何？

(二) 承上文，因而造成您在回報社發稿時顧不得版面大小而使勁寫稿的原因嗎？

* 您的同事王幼玲曾提及在長期跑勞工運動時，對於那些勞工時常不只是一種「採訪者—受訪者」的關係，而是像朋友一般。在您長期跑環保，公害議題的豐富經驗中，是否曾有過相同的感受？

* 承上題，這樣的關係是否會影響您在報導時的比例偏重？（如：在五輕自救居民爬上中油廠上時，您寫了大約半個版面之多的新聞）

* 若要您回想曾經影響您對於記者這份工作職志的確認的話，是否有曾經影響您極深的關鍵新聞事件？

* 楊憲宏曾經提及在長期跑環保與公害新聞時的無力感，除了得面對失靈與緩慢的政府機制與緩不濟急的補償之外，還得質疑自己的報導是否有發揮正面的作用，這似乎是跑環保與各種運動議題的記者都會面臨到的困境。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持續在環保議題上的投入長期的關注與心力？是否曾經感到無力過？是否曾經質疑自己的報導是否對於環境改善發揮正面作用的經驗？

* 承接上題，可否具體描述當時的經驗？

* 據您多年在環保議題上的採訪經歷，您對於當時台灣在解嚴前後的一九八〇

年代之初的環境運動有何觀察與見解？

*對於您當時在《自立晚報》的同事兼上司林美挪後來直接投身到環保聯盟之中有何看法？當時是否有其他報紙的環保記者直接參與自救居民的內部討論之中？您如何看待他們這樣的做法？

*您常被人認為是「運動型的記者」，或是較為激進的記者類型，若要您自己形容在記者這條漫漫長路中的自我定位的話，您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樣子的記者？或者，您認為的「記者」，應該是什麼樣子？

彭琳淞先生訪談題綱：

*家庭背景？個性？特質？家人如何看待您當初選擇進入媒體工作？

*求學歷程。

*您就讀大學時，仍處戒嚴時期，當時感受到的社會氛圍與校園氛圍如何？

*大學時為何選擇就讀社會學系？大學時代的求學歷程、同儕相處、社會學的訓練與思惟方式，帶給您什麼樣的影響？

*您的碩士畢業論文研究主題是學生運動；當時在大學與研究所時期，曾參與的學生運動經歷？對您產生何種影響？

*您在碩二時，因不滿畢聯會強調學生繳會費，與同學發起反對活動；當時還被記者不明究理的錯誤報導，對媒體有了負面印象；在選擇當記者之前，您對於記者工作的想像為何？

*何種因緣際會之下，您選擇進入《自立晚報》？在進入報社前，對其印象如何？

*《自立晚報》時採訪經歷。

*您在解嚴的隔年進入《自立晚報》，當時台灣社會在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方面，仍處在探索階段，當時為何選擇進入《自立晚報》？

*《自立晚報》的工作環境、同儕氛圍如何？當時的主管是誰？有哪些同事？

* 進入《自立晚報》後，您多半跑社運新聞，當時主跑的路線是您自己選擇的嗎？為何選擇此線？

* 您進入《自立晚報》後，第一個採訪到令您印象深刻的新聞議題是？可否詳述當時跑此新聞的細節，以及令您印象深刻的情況？

* 您的同事蔡崇隆曾在文章中提及當年與您共事的經驗，是他在《自立晚報》採訪時的難忘經驗與激勵，「... 當時晚報的彭琳淞松跟我路線相仿，有時我才抵達運動現場，就會碰到他匆匆迎面而來，塞給我一把他剛傳真回報社的稿子，讓我在第一時間得以了解最新狀況繼續採訪，兩人好像在進行一場無聲的接力賽跑。多年之後，他熱切的眼神，龍飛鳳舞的字跡，以及抗爭現場的群眾吶喊，都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我最珍貴的媒體記憶...」，在您的《自立晚報》生涯中，可否有與同時在採訪新聞時的難忘經驗或互動？

* 您曾經在接受訪談時提到，社運記者同情與支持社運、弱勢團體而「涉入」是在所難免的，但是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可否請您再對「涉入」與「越界」具體解釋？可否有類似經驗？

* 承接上題，您又如何看待當時的新聞同業在跑新聞的過程中，因為同情或是理念相近，直接投入運動團體的情況？

* 您在1990年代初期，寫了一系列原住民權益與國家公園的相關報導，當時在何種機緣下，去採訪該系列的深度報導？

* 您在接受訪談時曾經表示，這一系列的報導，是您耗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走訪全台國家公園的深度報導，也是您回憶記者生涯時難忘的經驗；可否具體說明當時採訪的經驗與感受？（如：與受訪者互動之關係、如何取得受訪者信任等）

* 蘭嶼雅美族人，起初對於出來此地的漢人與外來者、記者，抱持著非友善或者是不予理會的態度；您在〈蘭嶼國家公園〉的系列報導採訪過程初始，如何化解這樣的情況？

*您在台灣社會轉型的年代，親歷重大的公害事件、政治事件；您對於記者角色的認知與自我角色的定位，與未進入媒體前有何不同？

*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經驗，您遇到最大的挫敗經驗？最大的滿足與成就感又是什麼？

*在您的採訪經歷中，總是要親歷各大公害抗爭現場，接觸受到資方不公平對待的勞工、面對抗爭場合，面對總是來得遲緩又消極的政府應對機制，面對公義的隱沒而感到疲累；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當時想繼續新聞工作？如今想法是否有改變？

*台灣在1980到1990年代前後，正值社會的轉型期，據您長期跑各類運動議題的經驗，您對於當時的社會運動有何見解？又，當時整體的媒體環境如何？

*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經歷，給您什麼樣的影響？

*許多人對於《自立晚報》的記者印象，通常是較為本土、激進的，若要您自我的定位的話，您認為自己是什麼樣子的記者？或者，您認為的「記者」應該要是什麼樣子？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能與社會角色？

(五) 邱家宜女士訪談題綱：

*家庭背景、個人特質、個性。

*家中經濟狀況、兄弟姊妹、父母影響。

*父母對於您當初選擇進入媒體工作的看法？

*求學經歷。

*在大學時期，是否曾經加入校內、校外社團？理由為何？

*您在就讀台大歷史系時，台灣社會正值解嚴前後，當時感受到的社會、校園氛圍如何？

*自歷史系畢業後，為何選擇轉考東海社會學研究所？大學歷史系的思惟與訓練，如何影響您在社研所的求學經驗？

- * 社研所的思惟訓練，如何影響您在往後擔任記者工作時的實踐？
- * 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大學時代便很喜歡閱讀《自立晚報》，認為它「經常會報導很多社會運動新聞」；在進入《自立晚報》前，對其印象如何？何種機緣下，使您在畢業後進入《自立晚報》工作？
- * 在進入媒體工作前，對於記者角色的想像為何？
- * 《自立晚報》採訪經驗。
- * 進入《自立晚報》時感受到的工作氛圍、主管、同事關係如何？
- * 您在《自立晚報》時，多半主跑農民、勞工、環保、原住民運動；您所跑的新聞路線是自己選擇的嗎？何種原因支撐您持續關注在這些議題上？
- * 進入《自立晚報》時，正值台灣學運風潮，當時感受到的社會氛圍如何？曾經參與過學運靜坐、抗議現場嗎？
- * 進入報社後，第一個令您印象深刻的採訪經驗與新聞事件為何？可否回憶當時採訪的過程與狀況？
- * 您在《自立晚報》時，經常跑各類運動現場，當時，採訪各種抗爭現場，是否有令您難忘的經驗？
- * 大林蒲公害事件：
 - (一) 您在什麼樣的機緣下前去採訪這一系列報導？
 - (二) 當時因為自救居民圍廠引發警民衝突事件，部份媒體將自救居民以「暴民」的形式呈現，您前往大林蒲前，對於這件公害事件引發的流血衝突有何看法？
 - (三) 您在報導中提及，採訪之初，當地居民多半呈現不信任記者的態度，您當時如何化解居民對於你的不信任感？
 - (四) 在報導中，您寫道大林蒲事件可能是政治人物撈取資源與籠絡選票的所在，您當時如何看待介入大林蒲事件的「外力」？
 - (五) 大林蒲系列報導刊登之後，是否有來自同業、大林蒲居民、政府的正面

或負面意見？

(六) 該次的報導經驗，否帶給了你什麼樣的影響？

(七) 該次報導之後獲得了金鼎獎專題報導獎，得獎之初的感受如何？

* 您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的期間，是否曾經有過自己的報導受到長官或同事批評的經驗？（太過偏袒運動、弱勢團體等）是否可具體描述當時的情況與新聞事件？

* 楊憲宏曾經在《走過傷心地》一書的前序中，反省、質疑自己獲得的報導獎項，是否只是「踏血前行」、書寫他人苦痛而成就自己。您也曾多次因報導公害議題獲得新聞獎項，是否曾經有過類似的掙扎與經驗？

* 作為一名跑環保議題的記者，時常得往公害現場跑，因此經常得親睹災害現場，與受災居民接觸，長期與之相處，必然會受到公害現場、抗爭現場的慘況而感到震撼。一如您在報導中細緻的描寫在大林蒲現場的受災居民；眼見、耳聽他們的抗爭與辛酸，當時，您如何符在新聞專業與個人關懷、情感之間取得平衡，寫出報導？

* 若要您回想曾經影響您對於記者這份工作職志的確認的話，是否有曾經影響您極深的關鍵新聞事件？

* 在1980、1990年代之初，長期跑環保與公害新聞的記者，除了得面對失靈與緩慢的政府機制與緩不濟急的補償之外，還得質疑自己的報導是否有發揮正面的作用，這似乎是跑環保與各種運動議題的記者都會面臨到的困境。是什麼樣的動力讓您持續在環保議題上的投入長期的關注與心力？是否曾經感到無力過？是否曾經質疑自己的報導是否對於環境改善發揮正面作用的經驗？

* 台灣在1980、1990年代前後，正值社會的轉型期，據您長期跑各類運動議題的經驗，您對於當時的社會運動有何見解？又，當時整體的媒體環境如何？

* 您如何看待當時的新聞同業在跑新聞的過程中，因為同情或是理念相近，直接投入運動團體的情況？

- * 在《自立晚報》的記者經歷，給您什麼樣的影響？
- * 您常被人認為是較為激進的記者類型，若要您自己形容在記者這條漫漫長路中的自我定位的話，您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樣子的記者？或者，您認為的「記者」，應該是什麼樣子？
- * 在您的記者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感來自何處；又，最大的挫折感又是什麼？
- * 在《自立晚報》擔任記者的時期，是否曾經有過什麼遺憾的經驗？（報導上、工作上、生活上）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況，是否會有不同的做法？



附錄二：訪談時間地點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長度
林美娜	2008.7.17 下午3：30	遠企B2公共空間	一小時二十九分鐘
王幼玲	2008.5.6 下午2：30	殘障聯盟辦公室	一小時三十七分鐘
	2008.06.13 下午2：00	殘盟辦公室	一小時十七分鐘
李瓊月	2008.5.1 下午3：40	華視附近咖啡館	一小時三十六分鐘
	2008.7.9 下午5：30	華視附近咖啡館	四十五分鐘
彭琳淞	2008.6.21 下午1：00	台大附近咖啡館	一小時三十七分鐘
	2008.8.16 下午2：00	台大附近咖啡館	兩小時
邱家宜	2008.6.26 上午10：00	卓越新聞基金會 辦公室	一小時十分鐘

附錄三：受訪者大事紀

林美挪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1951	地方選舉		
1958	出版法修正：報業共識		
1969	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組黨運動受挫	林美挪出生於彰化縣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4		林美挪就讀於彰化女中	
1976			三晃化工廠在台中縣大里、太平、霧峰鄉交界一帶成立，從事原料生產，提供下游工廠製造農藥。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1977年3月仙人掌雜誌創刊，王拓、朱西甯、銀正雄的三篇文章引起鄉土文學大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許信良脫黨參選桃園縣長，因國民黨作票傳聞，引發中壢市民包圍、搗毀警局
1978	台美斷交	進入文化大學新聞系就讀	第二次國軍文藝大會，重申反共文學，停止批判鄉土文學家，論戰停息。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美麗島雜誌》創辦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1981	以黃順興等人創立 《生活與環境》雜誌。(第一份)		文學界南北派爭議， 台灣主體性問題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 大里反三晃 1982-1986	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系	反李長榮：李常融化工廠在新竹成立12年後擴建。 1988年4月，李長榮公司同意拆除生產設備。(歷經三次圍堵與兩次陳

	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 1982-1988		情1983、1985) * 見自晚1987.8.14 與自晚1988.2.27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 (黨外雜誌) 原住民知識青年成立《高山青》雜誌 (探討原住民所面臨的壓迫與處境)	進入《自立晚報》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新潮流》創刊 第一波地方環保運動風潮四起(蕭新煌, 1999: 44)		5月4日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村民前往縣政府要求解決鎘污染問題。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7/7核三廠一號機發生爆炸(七七事變)		中油公司在高雄縣永安鄉沿海地區興建台灣第一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遭受當地居民抗議。(砂石卡車壓壞路面, 造成民防龜裂)
1986	機場事件 9月 民進黨成立 美國杜邦公司欲置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反杜邦) 1986-1987 車諾比爾事件	* 四月: 前往台灣西海岸, 採訪綠牡蠣事件。 (第一次下鄉, 影響其日後不害怕出遠門之啟蒙) * 夏天: 參加行政院訪問團, 6月5日赴美採訪杜邦公司(單獨作業之啟蒙) →7/2-16 於《自立晚報》刊載杜邦系列報導。	3月反杜邦運動開始 6月24日鹿港發動台灣反污染運動史上第一波遊行「我愛鹿港, 不要杜邦」。十餘天後, 行政院長俞國華宣佈不同意設廠。 12月13日鹿港民眾在總統前抗議。

			10.10 黨外編聯會發動近百人到台北台電大樓抗議核電政策。
(解嚴)			
1987	<p>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 中時工會事件（解雇了率領勞方抗爭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等三人）</p> <p>《新新聞》創刊 7月 後勁反五輕 1987-1990 11月 宜蘭反六輕 12月 桃園反六輕 反蘇澳火力電廠</p> <p>年底，環保聯盟（張國龍、施信民）與綠色和平工作室（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成立</p>	<p>春天：五天（5/11-5/15），露宿水源里九甲埔路採訪李長榮事件。→此次圍堵為第三次圍堵，為期425天（成為其不畏懼參與的啟蒙） 第一次採訪（水源里）：1/19（當時圍堵已經一週）</p> <p>秋天：在立法院採訪後勁請願活動（第一次流血經驗，成為其甘於投如的啟蒙）</p>	<p>反杜邦： 杜邦公司宣佈站提鹿港投資。兩年後才在觀音工業區設廠。 三月：鹿港居民上街頭，引發警民衝突。</p> <p>反核： 3.26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恆春國小舉行「從三哩島到南灣」反核說明會 4.24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台北舉行「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事件週年紀念」演講會 4.26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台電公司門口聚集後，前往核四預定地鹽寮舉行室外演講與反核遊行。（手持「全民監督核電廠」、「別讓台灣成為盒子垃圾島」、「只要孩子不要核子」等標語）</p> <p>反五輕：</p>

			<p>8.5 後勁反五輕自救會成立。</p> <p>9.30-10月 後勁前往高雄市政府陳情。</p> <p>10/20 後勁居民圍堵立法院，發生警民衝突。引發流血事件。</p> <p>12.30-1988.1.2 警民</p>
1988	<p>解除報禁、聯晚創刊</p> <p>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p> <p>五二〇農運→楊渡</p> <p>9-10月 林園鄉事件</p> <p>1月 基力化工鎘污染</p> <p>綠牡蠣受害者陳情</p> <p>2月 反對蘭嶼核廢料場</p>		<p>反五輕： 環評場外，後勁居民採取激烈抗爭行動。</p> <p>林園： 9月 林園鄉漁民發現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廢水外洩，造成汕尾漁港魚群死亡。</p> <p>* 蘭嶼反核廢： 5/20 三百餘人的「驅逐蘭嶼的惡靈」大遊行</p>
1989	<p>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p> <p>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p>	<p>2.15 出版《台灣的綠色災難》。集結近四年來的環保報導。</p>	<p>林園： 2月 環保署提出公害糾紛處理10項不可接受條件，嚴從對付環境抗爭。行政院長李煥指示警政署草擬《防治危害治安暫行條例》（13條草案條文中有14個死刑，其中第12條專為林園事件而設計）</p> <p>* 見新新聞</p>


			1989.10 反核四： 4.23大遊行
1990	郝伯村上台		台灣三月學運 反五輕： 3.25 激進派在煉 油廠北門發動抗 議 * 見自立晚報 1990.5.8公投後 反核四： 4.22大遊行
1991	徐瑞希事件 貢寮鄉1003事件 第二波環保運動高 潮 反軍人干政 520大 遊行		反核四： 10.3警民衝突，造 成一名保警死亡， 5.5大遊行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 月立法院通過刑法 一百條修正案 大林蒲事件		公佈實施「公害糾 紛處理法」 大林蒲： 中油大林廠冒出 白煙，因發居民抗 議。(5.26發警民衝 突) * 見自立晚報：邱 家宜 1992.6.9-6.15 反核四： 5.5大遊行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 促銷成功		
1994	地下電台風潮、 自立事件、 九〇一遊行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1996			
1998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 發行		
2005	中晚停刊	擔任媒體之廣告代理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變成跨媒體集團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2007			
2008			

王幼玲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0年代白色恐怖）			
1950	8月 國民黨發表「現階段政治主張」強調「積極扶植勞工組織」		

1956		王幼玲出生	外省第二代
1958	出版法修正：報業共識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組黨運動受挫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3	立法院先後制定「礦場安全法」、「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一次石油危機		「勞工安全衛生法」通過的同時，附帶決議「函請行政院迅將勞動基準法草案送本願審議」，行政院內部乃據此以原有的「勞工法草案」之「勞動基準編」及「勞工檢查編」為藍本，召集相關單位積極會商。從1985.12經六個月多次研議後修正定稿。(1995.7.19在國民黨強力運作下通過)
1974	勞基法的推動制定起始	並在台大醫院精神科與市立療養院做臨床護士。	因廠礦災變與勞工罹患職業病事件頻傳。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插班轉考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去台大旁聽葉啟政的課 張老師月刊擔任編輯	《現代文學》復刊
1978	台美斷交		
(台美斷交／八〇年代社運黃金期)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		

	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第二次石油危機		引發國際保護主義的抬頭。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1981			
1982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南方朔等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信倒閉風波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5.1 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成立(台灣戰後知識份子企圖以組織形式切入勞工議題,發展勞工運動先聲)		勞基法制定,頒佈。8.1公佈實施。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1986	機場事件 民進黨成立		
(解嚴後/隔年報禁解除/媒體商業化企業化)			
1987	7.15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 11.1 工黨成立 中時工會事件(解雇了率領勞方抗爭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等三人)	大學畢業,進入自立晚報跑內政部==>勞委會(勞工線)	8.1勞委會成立
1988	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桃園客運:2月與

	<p>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6月 工黨分裂 桃園客運罷工抗爭事件 苗客罷駛事件 10.30新光士林紡織廠關場 4.2 大同工會抗爭之始（曾水鑑發傳單事件） 4.29 高雄市工會幹部聯誼會（高雄市工聯／台灣工聯會） 5.1 全國自主勞工聯盟成立 *多廠工會成立與舊工會改造</p>		<p>11月兩次勞資爭議。前次在於提高年終獎金和春節期間額外津貼等（成功）；後一次的爭議在於資方解雇工會靈魂人物曾茂興（失敗）。</p> <p>*苗客：員工薪資結構不合理、資方違反勞基法。</p> <p>*新光士林：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Shinkong Textile Co., Ltd.）士林廠位於台北市士林區。資方以「機器老舊」、「經營虧損」為由，宣佈於1988年10月30日關廠；實際原因係該廠房位居黃金地段，關廠後被資方改建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p>
1989	<p>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 3.29 勞動黨 5月遠東化纖新埔總廠勞資爭議事件</p>		<p>*遠東化纖：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遠東化纖罷工事件是一起非經濟性的罷工事件，發動者為當時台灣自主工運界的龍頭工會——遠東化纖產業工會，導火線是工會領導幹部徐正琨遭到調職。罷工始於5月15日，期間資方派出保全人員，政府則出動了鎮暴警察與水車，強力鎮</p>

			<p>壓；至5月25日，工廠全面復工，事件遂以工會的失敗告終。徐正焜、羅美文與曾國煤三位重要幹部遭解雇，此外羅美文等九人事後因「煽動罷工」，依《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遭到起訴。此事件既是1987-1989年間台灣工潮的高峰，同時也是尾聲。遠化罷工失敗後，台灣工運進入了一段相對萎縮的時期。</p> <p>* 勞動黨：夏潮系統極其網絡下的工會幹部，在勞權會中介下，成立勞動黨，以發展台灣統左路線為任務。</p>
1990			
1991	徐瑞希事件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1994	地下電台風潮、自立事件、九〇一遊行	擔任台北市勞工局輔導員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擔任台北市勞工局主任秘書	
1996			
1998		任台北市勞工局主任秘	

		書 8月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主任，後還兼任婦女部主任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5月任職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主任秘書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2002		4月任職業訓練局主任秘書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2005	中晚停刊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擔任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理事長	
2007		4月 勵馨基金會特助 5月 擔任勞委會主任秘書	
2008		擔任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擔任執行長	

李瓊月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1951	地方選舉		
1958	出版法修正：報業共識	李瓊月出生	本省籍
1969	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組黨運動受挫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4		進入北市商就讀	
1976			三晃化工廠在台中縣大里、太平、霧峰鄉交界一帶成立，從事原料生產，提供下游工廠製造農藥。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畢業於北市商	1977年3月仙人掌雜誌創刊，王拓、朱西甯、銀正雄的三篇文章引起鄉土文學大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許信良脫黨參選桃園縣長，因國民黨作票傳聞，引發中壢市民包圍、搗毀警局
1978	台美斷交		第二次國軍文藝大會，重申反共文學，停止批判鄉土文學家，論戰停息。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進入文化新聞系夜校就讀	



	《美麗島雜誌》創辦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1981	以黃順興等人創立 《生活與環境》雜誌。(第一份)		文學界南北派爭議， 台灣主體性問題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 大里反三晃 1982-1986 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 1982-1988	進入婦女新知工讀 	反李長榮：李長榮 化工廠在新竹成立 12年後擴建。1988 年4月，李長榮公司 同意拆除生產設備。 (歷經三次圍堵 與兩次陳情1983、 1985) * 見自晚1987.8.14 與自晚1988.2.27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 原住民知識青年成立 《高山青》雜誌(探討 原住民所面臨的壓迫 與處境)	畢業於文化新聞夜校	侯德建事件引爆台灣 意識論戰，黨外雜誌 如《生根週刊》(後 被查禁而改名《台灣 年代》)、《前進週刊》 、《夏潮論壇》大幅 討論台灣結／中國結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新潮流》創刊 第一波地方環保運		5月4日桃園縣觀音鄉 大潭村村民前往縣府 要求解決鎘污染問題。

	動風潮四起（蕭新煌，1999：44）		
1985	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7/7核三廠一號機發生爆炸（七七事變）		中油公司在高雄縣永安鄉沿海地區興建台灣第一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遭受當地居民抗議。 （砂石卡車壓壞路面，造成民防龜裂）
1986	機場事件 9月 民進黨成立 美國杜邦公司欲置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反杜邦） 1986-1987 車諾比爾事件		3月反杜邦運動開始 6月24日鹿港發動台灣反污染運動史上第一波遊行。十餘天後，行政院長俞國華宣佈不同意設廠。 12月13日鹿港民眾在總統前抗議。 10.10 黨外編聯會發動近百人到台北台電大樓抗議核電政策。
1987	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 中時工會事件（解雇了率領勞方抗爭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等三人） 《新新聞》創刊 環保署成立 7月 後勁反五輕 1987-1990 11月 宜蘭反六輕 12月 桃園反六輕 反蘇澳火力電廠		反杜邦： 杜邦公司宣佈站提鹿港投資。兩年後才在觀音工業區設廠。 反核： 3.26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恆春國小舉行「從三哩島到南灣」反核說明會 4.24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台北舉行「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事件週年紀


	<p>年底，環保聯盟（張國龍、施信民）與綠色和平工作室（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成立</p>		<p>念」演講會 4.26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核四預定地鹽寮舉行室外演講與反核遊行</p> <p>反五輕： 8.5 後勁反五輕自救會成立。 9.30-10月 後勁前往高雄市政府陳情。 12.30-1988.1.2 警民</p>
1988	<p>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9-10月 林園鄉事件 1月 基力化工鎘污染 綠牡蠣受害者陳情 2月 反對蘭嶼核廢料場</p>	<p>進入《大華晚報》 八月 進入《自立晚報》</p> 	<p>反五輕： 環評場外，後勁局民採取激烈抗爭行動。 林園： 9月 林園鄉漁民發現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廢水外洩，造成汕尾漁港魚群死亡。</p>
1989	<p>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p>		<p>林園： 2月 環保署提出公害糾紛處理10項不可接受條件，嚴從對付環境抗爭。 行政院長李煥指示警政署草擬《防治危害治安暫行條例》（13條草案條文中有14個死刑，其中第12條專為林園事件而設計） * 見新新聞1989.10</p> <p>反核四： 4.23大遊行</p>

1990	郝伯村上台		台灣三月學運 反五輕： 3.25 激進派在煉油廠北門發動抗議 * 見自立晚報 1990.5.8公投後 反核四： 4.22大遊行
1991	徐瑞希事件 貢寮鄉1003事件 第二波環保運動高潮 反軍人干政 520大遊行		反核四： 10.3警民衝突，造成一名保警死亡， 5.5大遊行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大林蒲事件		公佈實施「公害糾紛處理法」 大林蒲： 中油大林廠冒出白煙，因發居民抗議。(5.26發警民衝突) * 見自立晚報：邱家宜 1992.6.9-6.15 反核四： 5.5大遊行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1994	地下電台風潮、自立事件、九〇一遊行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進入《黑白新聞週刊》	
1996		進入《台灣日報》	

1998		《我們的島》節目擔任專題記者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擔任Acer121.com資深企畫 東森資訊編輯中心任副總編輯、東森廣播資深製作人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Taiwan News》擔任資深主筆 《Taiwan News總合周刊》任採訪主任 公視電視台新聞部製作人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2005	中晚停刊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變成跨媒體集團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2007			
2008		公視電視台「獨立特派員」 新聞節目製作人	


彭琳淞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 (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0年代白色恐怖)			
1951	地方選舉		

1958	出版法修正：報業共識		
1969	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主義、組黨運動受挫		
1961		彭琳淞出生於新竹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1977年3月仙人掌雜誌創刊，王拓、朱西甯、銀正雄的三篇文章引起鄉土文學大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許信良脫黨參選桃園縣長，因國民黨作票傳聞，引發中壢市民包圍、搗毀警局
1978	台美斷交		第二次國軍文藝大會，重申反共文學，停止批判鄉土文學家，論戰停息。

1979	<p>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美麗島雜誌》創辦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p> <p>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以山地籍民意代表為核心的原住民政治菁英組成「山地建設協會」,創刊《山地文化》雙月刊。</p>		<p>*《山地文化》雙月刊,出版十二期後停刊,於一九八五年四月重新發行。</p>
1980	<p>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p>	<p>進入東海社會系就讀</p>	
1981	<p>以黃順興等人創立 《生活與環境》雜誌。(第一份)</p>		<p>文學界南北派爭議,台灣主體性問題。</p>
1982	<p>《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p> <p>大里反三晃 1982-1986</p> <p>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 1982-1988</p>		
1983	<p>黨外編聯會成立(黨外雜誌)</p> <p>五月 原住民知識青年成立《高山青》雜誌(探討原住民所面臨的壓迫與處境)</p>		<p>侯德建事件引爆台灣意識論戰,黨外雜誌如《生根週刊》(後被查禁而改名《台灣年代》)、《前進週刊》、《夏潮論壇》大幅討論台灣結／中國結</p>

1984	<p>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新潮流》創刊 十二月 排灣族歌手胡德夫等知識菁英組成「原權會」(其後因名稱過於敏感,改成「山外山」) 第一波地方環保運動風潮四起(蕭新煌, 1999: 44)</p>	<p>畢業於東海社會系</p>	<p>04.05行政院核定通過成立太魯閣國家公園。</p> <p>*原權會與黨外編聯會有密切接觸。</p>
1985	<p>二月十信事件 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 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 7/7核三廠一號機發生爆炸(七七事變)</p>		
1986	<p>機場事件 9月 民進黨成立 美國杜邦公司欲置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反杜邦) 1986-1987 車諾比爾事件</p>		<p>11.28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p>
(解嚴)			
1987	<p>／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新新聞 ／中時工會事件(解雇了率領勞方抗爭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張玉琴等三人) ／《新新聞》創刊 ／基督教山地宣教會等菁英份子,組成「台灣原住民領袖發展小組」(先後創</p>		<p>*「台灣原住民領袖發展小組」受到基督教長老教會、在野政治力量,學術界中關心山地的人士支持。</p>

	<p>刊《山青論壇》、《原住民之聲》以「服務、文字、言論、和平行動等方式，保障並促進台灣原住民之權利」。</p> <p>年底，環保聯盟（張國龍、施信民）與綠色和平工作室（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成立</p>		
1988	<p>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 ／三月 山地籍民意代表和學者專家組成「中華民國山地同胞福利策進會」 9-10月 林園鄉事件 1月 基力化工鎘污染 綠牡蠣受害者 陳情 2月 反對蘭嶼核廢料場</p>		
1989	<p>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p>	<p>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碩士班 進入《自立晚報》政治組教育線</p>	<p>*畢業論文：政府遷台後學生運動變遷之探討—以四個重要因素互動關係來說明（指導教授：陳秉璋）</p>
1990	<p>郝伯村上台</p>		
1991	<p>徐瑞希事件 貢寮鄉1003事件</p>		

	第二波環保運動高潮 反軍人干政 520大遊行 3月 野百合學運 *507金門反戒嚴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大林蒲事件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年初 轉調至綜合組負責勞工社運線 〈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權益〉系列報導獲得台灣人權報導獎	
1994	地下電台風潮、自立事件、九〇一遊行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1996			
1998		進入《自由時報》	隔年離開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進入行政院新聞局擔任簡任秘書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2002		擔任總統府秘書室咨議,9月離開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發行		
2005	中晚停刊	擔任《新聞大舞台》編輯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變成跨媒體集團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2007			
2008			


邱家宜大事紀


時間	社會背景	記者個人生命經歷	備註 (重大紀事)
1947	二二八事件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1951	地方選舉		
1958	出版法修正：報業 共識		
1964		出生於台中	
1969	中央級民意代表選 舉		
1960	九月雷震案：自由 主義、組黨運動受 挫		
1970	台獨聯盟成立		
1971	十月退出聯合國		

1976			三晃化工廠在台 中縣大里、太平、 霧峰鄉交界一帶 成立，從事原料生 產，提供下游工廠 製造農藥。
1977	鄉土文學論戰	進入高雄道明中學就讀 	1977年3月仙人掌 雜誌創刊，王拓、 朱西甯、銀正雄的 三篇文章引起鄉 土文學大戰。
	十一月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許信良 脫黨參選桃園縣 長，因國民黨作票 傳聞，引發中壢市 民包圍、搗毀警局
1978	台美斷交		第二次國軍文藝 大會，重申反共文 學，停止批判鄉土 文學家，論戰停 息。

1979	六月八十年代雜誌 《美麗島雜誌》創辦 (其後二十三種黨外雜誌，統獨兩大系統) 八月美麗島雜誌 十二月美麗島事件		
1980	二月林宅血案、 三月美麗島軍法大審	進入景美女中就讀	
1981	以黃順興等人創立 《生活與環境》雜誌。(第一份)		文學界南北派爭議， 台灣主體性問題
1982	《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 大里反三晃 1982-1986 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 1982-1988	進入台大歷史系就讀 	反李長榮：李常融 化工廠在新竹成立12年後擴建。 1988年4月，李長榮公司同意拆除生產設備。(歷經三次圍堵與兩次陳情1983、1985) *見自晚1987.8.14 與自晚1988.2.27
1983	黨外編聯會成立 (黨外雜誌) 原住民知識青年成立《高山青》雜誌 (探討原住民所面臨的壓迫與處境)		侯德建事件引爆台灣意識論戰，黨外雜誌如《生根週刊》(後被查禁而改名《台灣年代》)、《前進週刊》、《夏潮論壇》大幅討論台灣結／中國結
1984	黨外公政會 十月江南案 十一月美洲中時停刊		5月4日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村民前往縣政府要求解決鎘污染問題。

	<p>《新潮流》創刊</p> <p>第一波地方環保運動風潮四起（蕭新煌，1999：44）</p>		
1985	<p>二月十信事件</p> <p>六月民眾日報被處分（李旺台）</p> <p>公害環保風潮楊憲宏</p> <p>7/7核三廠一號機發生爆炸（七七事變）</p> <p>／新環境雜誌社、新環境基金會（學術、媒體界）</p>		<p>中油公司在高雄縣永安鄉沿海地區興建台灣第一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遭受當地居民抗議。（砂石卡車壓壞路面，造成民防龜裂）</p>
1986	<p>機場事件</p> <p>9月 民進黨成立</p> <p>美國杜邦公司欲置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反杜邦）</p> <p>1986-1987 車諾比爾事件</p>	<p>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p> 	<p>3月反杜邦運動開始</p> <p>6月24日鹿港發動台灣反污染運動史上第一波遊行「我愛鹿港，不要杜邦」。十餘天後，行政院長俞國華宣佈不同意設廠。</p> <p>12月13日鹿港民眾在總統前抗議。</p> <p>10.10 黨外編聯會發動近百人到台北台電大樓抗議核電 政策。</p>
（解嚴）			
1987	<p>解嚴，開放大陸探親</p> <p>新新聞</p> <p>中時工會事件（解雇了率領勞方抗爭的記者鄭村棋、吳</p>		<p>反杜邦：</p> <p>杜邦公司宣佈站提鹿港投資。兩年後才在觀音工業區設廠。</p> <p>三月：鹿港居民上</p>

<p>永毅、張玉琴等三人) 《新新聞》創刊</p> <p>／環保署成立</p> <p>7月 後勁反五輕 1987-1990 11月 宜蘭反六輕 12月 桃園反六輕 反蘇澳火力電廠</p> <p>／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年底，環保聯盟 (張國龍、施信民) ／綠色和平工作室 (粘錫麟、林俊義、林聖崇)成立</p>		<p>街頭，引發警民衝突。</p> <p>反核： 3.26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恆春國小舉行「從三哩島到南灣」反核說明會 4.24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台北舉行「車諾比爾核電廠爆炸事件週年紀念」演講會 4.26 新環境雜誌社等團體在台電公司門口聚集後，前往核四預定地鹽寮舉行室外演講與反核遊行。(手持「全民監督核電廠」、「別讓台灣成為盒子垃圾島」、「只要孩子不要核子」等標語 p.207)</p> <p>反五輕： 8.5 後勁反五輕自救會成立。 9.30-10月 後勁前往高雄市政府陳情。 10/20 後勁居民圍堵立法院，發生警民衝突。引發流血事件。 12.30-1988.1.2 警民</p>
--	---	--

<p>1988</p>	<p>解除報禁、聯晚創刊 赴大陸採訪案宣判無罪 五二〇農運→楊渡 9-10月 林園鄉事件 1月 基力化工鎘污染 綠牡蠣受害者陳情 2月 反對蘭嶼核廢料場</p> <p>／雅美青年聯誼會（蘭嶼地方人士） ／鹽寮反核自救會（貢寮地方人士）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東北角分會 ／台北縣萬里反核自救會（萬里地方人士）→核二廠污染</p>		<p>反五輕： 環評場外，後勁局民採取激烈抗爭行動。 林園： 9月 林園鄉漁民發現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廢水外洩，造成汕尾漁港魚群死亡。 * 蘭嶼反核廢： 5/20 三百餘人的「驅逐蘭嶼的惡靈」大遊行</p>
<p>1989</p>	<p>首都早報創刊（1990年停刊） 太平洋日報、環球日報曇花一現</p> <p>／雅美文化促進會（蘭嶼地方人士）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萬金石分會（萬里、金山、石門地方人士）→核一、二廠污染 ／恆春鎮核三廠監督委員會（恆春地方人士）→核三廠污染</p>	<p>畢業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哈伯馬斯論理性與理性化--兼論韋伯在哈伯馬斯溝通行動理論中的策略性地位。指導：高承恕）</p>	<p>林園： 2月 環保署提出公害糾紛處理10項不可接受條件，嚴從對付環境抗爭。行政院長李煥指示警政署草擬《防治危害治安暫行條例》13條草案條文中有14個死刑，其中第12條專為林園事件而設計） * 見新新聞 1989.10</p> <p>反核四：</p>

			4.23大遊行
1990	郝伯村上台 ／台灣教授協會 【環境保護組】(學術界) →核四案	七月 進入《自立晚報》	台灣三月學運 反五輕： 3.25 激進派在煉油廠北門發動抗議 * 見自立晚報 1990.5.8公投後 反核四： 4.22大遊行
1991	徐瑞希事件 貢寮鄉1003事件 第二波環保運動高潮 反軍人干政 520大遊行		反核四： 10.3警民衝突，造成一名保警死亡， 5.5大遊行
1992	二月退報運動，五月立法院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 ／大林蒲事件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北分會(學術界、地方人士) →台北縣市輻射污染	以〈大林蒲公害事件調查報告一～七〉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專題報導獎項	公佈實施「公害糾紛處理法」 大林蒲： 中油大林廠冒出白煙，因發居民抗議。(5.26發警民衝突) * 見自立晚報：邱家宜 1992.6.9-6.15 反核四： 5.5大遊行
1993	自由時報賓士黃金促銷成功 ／五月 爆發大社事件 ／民生別墅受災自救會(輻射屋受害者)	以〈隨水逝去的鄉愁—美濃客家庄反水庫記要〉系列報導，獲得第八屆「吳舜文地方新聞獎」	* 大社事件：4月5日晚間，大社工業區發生不明氣體外洩，造成數百名身體不適。隔日民眾圍堵抗議。
1994	地下電台風潮、		

	自立事件、 九〇一遊行		
1995	記協 三退聯盟成立 民視取得第四家無線電視台 ／濱南環評衝突事件		
1996			
1998			
1999	自立早報停刊 九二一地震		
2000	三月政黨輪替		
2001	六月中時裁中南編 自立晚報停刊		
2003	五月蘋果日報在台 發行		
2005	中晚停刊		12/24 中時報系集團收購中視、中廣、中影等「三中」，加上中天變成跨媒體集團
2006	華視公共化、 民生報停刊		
2007			
2008			